《红卫兵小报和我》（重庆文革纪实）

周孜仁

目录

一•文章缘起

人家都说我是《８１５战报》的主编。

文革动乱，耿耿十年,群众组织的小报多如恒河沙数。从没听说谁给谁封过什么主编。我也如此。之所以认可我是该报主编，是因为这份小报曾闯了一个大祸，大到已忤达圣聪,惹怒龙颜。上峰追查太紧了，谁都抵挡不住，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一下罪责吧。这样，我就认了。本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确实在该报负责。说我主编也不冤。

时间是１９６７年秋天，四川省两大派为打刘张和保刘张闹得冤冤不解。刘张是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简称。其时刘任四川省革委筹备小组副组长而张为政工组负责人，被中央文革捧红了半边天的著名左派。保刘张派说：“张梁刘张好干部，敌人反对我拥护。”张是指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革筹组组长；梁，指司令员、革筹组副组长梁兴初。梁是坚决的反刘张派。

张、梁当然是在口号中被陪绑。反刘张派则说："张梁蓝白好干部，刘张两挺烂萝卜。"蓝、白是指坚决支持反刘张的５４军副政委及副军长蓝亦农、白斌。１１月初，四川省反刘张派主力：重庆８１５、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南充"指挥部"在重庆大学召开联系会，交换意见并制定作战方略。笔者忝列该会，并在会后写了一篇文章，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达圣聪、惹怒龙颜的"大毒草"，题曰：《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７、８月,江青一伙在全国导演的的反军高潮，以中央"９.５命令"为终结而全面受挫，只好将因武汉"７２０事件"而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关峰、林杰三人抛出来作替罪羊。其时，这股反军潮对四川地区影响尤为深重，死伤动辄成百上千、动用除飞机之外所有火器的重庆大武斗及武装支泸，万县、云阳等地的武斗，都发生在这段时间。王、关、林的意外倒台对于一直对５４军心怀芥蒂的刘张二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于紧跟刘张的四川８２６派和重庆反到底派，自然也是一份凶信。而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的８１５派，自然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于是就欢呼雀跃，开会游行。而以文斗为业的重庆大学《８１５战报》，当然也跃跃欲试，要来点大块文章了。这样，我和编辑部另外三个同学，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然后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好些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似乎只要再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咱们的了。于是凭空相象，开始舞文弄墨。文章由四人分头执笔，写好后由我润色定稿。感觉不错，想增加一点份量，便和当时８１５大派的报纸《山城战报》商量，以两报编辑部的名义联合发表。报纸出版，反响果然巨大。听说当天就有学生夤夜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游行我没看见。但标语我是看见了。接下来，几乎全川８１５派和红成派的小报都先后转载，有一种齐步走的感觉：效果大大超出原来想象。《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重庆石油学校老师）事后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很高兴地说：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文章有个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像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九评"，把苏修头目赫鲁晓夫乾净利落评下了台。当时我们已经走火入魔，也想几篇文章就把刘张评成"历史的狗屎堆"。事后，《山城战报》就把我"关"在他们报社让我写"二评"和"三评"。写"四评"时我去海南岛出差，由四川外语学院一个中文老师接着写。该文对我印象最深是其中有一段写反到底派头目黄廉在潘家坪宾馆结婚。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新郎乜斜着醉意阑珊的眼"对新娘如何如何。我当时不认识"乜"字，还查了一下字典，还有，按当时说法，这段描写有点黄色。所以我记得。

谁知道黄粱未熟，好梦已惊。１９６８年3月１５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周恩来以下全体首长到会。现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讲话的原文。但我记得绝对清楚，在这个有名的"３１５指示"中，周传达说：《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这一句话,后来马上被演化为：周ＸＸ（指笔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竿、反动文人，必须抓起来。这些话是张西挺在同年７月２９日和８月１４日在四川省大学生分配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大字报上的说法就更多了。

于是，那时就有了全国五大毒草的说法。这五大毒草分别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广西大学的《今日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我们的纲领》、重庆的《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我记得《四》文是被江青点的名，《今》文是被康生点的名，湖南两文被中央谁点名记不起了，而《８》文被点名的"规格"最高。这样，我在劫难逃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发配云南边疆所受到折腾也够充份了。窃以为，我力图远离政治，靠一个工科学生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兢兢业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事实上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可红卫兵小报的生活经历却总像阴影一样笼罩头顶，挥之不去。直到１９８４年，我已经在一个公用事业公司担任技术科长、总工办主任，某天，一位远在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黄肇炎（也曾是《８１５战报》的编辑）突然从山区跑来昆明，（他们厂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的山顶），他告诉我说："母校来人啦！来调查你、还有战报的人员情况，你可小心！"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境非常平静，我说：反正国民党的战犯全都特赦了，国家总需要一些反面教员吧。让他们来，我认了。

后来，重庆大学的外调人员果然来了。我非常清楚，其时，很多同学都正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而且都需要过"文革表现"这一关，所以——我现在承认——当时我恶作剧地嘲弄了一番远道而来的外调人员之后，除了为"亲者讳"，对他们想了解的同学一律评功摆好，此外，我给他们提供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和伪证。

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８１５战报》和我共过事的、在重庆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都已经年迈,有些已经作古。该当官的也已当到头了。该退休的也已退下来了。他们都已经走完或者即将走完自己的仕途，把这些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了，我想。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

现在我开始写。

二· 加盟

作为重庆８１５派的带头羊，重大８１５战斗团的机关报《８１５战报》，它的出版发行至少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战斗团本身要有足够的政治、组织基础；二是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如经费、纸张，还有印刷厂等。第一个条件，应该说１９６６年8月１５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具备。具体说，相对于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８１５战斗团一开始就具备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原因见拙文《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８１５运动》）。第二个条件则是该年１１月１９日才具备的。１０月8日至２５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清算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三司为首的左派在社会上与之呼应，便提出了所谓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等口号，并开始对本单位的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实行打砸抢。重大８１５的学生如法炮制,在１１月１９日这天上午１０点正，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实施突然袭击，包围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 、广播站，当然还有印刷厂等等，没有经过太多争斗，很快便夺取成功。

在此之前，８１５实在是很可怜的。传单全是用毛边纸。油印机也多是自己制造：用几根木条钉一个框子，再蒙上一层纱网，用胶皮将油墨一刮就成了。这种传单质量差是差,可本身就极具宣传效果。人生而心多测隐。尤其莘莘市民，尤其从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为同情弱者。一看见可怜巴巴的毛边纸，就恨不得马上高呼８１５好得。一九六六年十一

国庆，重大８１５故意把自制的油印木框作为道具参加游行，当场赢得不少同情之泪。而保守派的道林纸传单，美则美矣，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况每次进城开会他们都坐车，还派发点心，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重庆地区过中秋喜吃麻饼，而麻饼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实属高消费美味，因此听说"思想兵"派发的点心是麻饼，市民便义愤填膺，将保守派一律蔑称为"麻子兵"，该提法在重庆乃至四川一直广为流传。我姐姐的大女儿当时１１岁，就读于重庆南岸区雷锋小学，报名参加"８１５小闯将"组织，口试便有这样一题：问，"思想兵"开会吃不吃麻饼？如果回答：吃。那行！否则有保皇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

其时，重庆流传有所谓革命童谣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铁竿保皇，铺盖两床。

该"童谣"很可能系大人编造，但确能反应当时市民心理。此外还有一副对联 反映上述事实：

想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

看今朝，造反派毛边加油印打败保皇派。

把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夺过来情况当然不一样了，但困难仍然不少，比如印刷，重大有个印刷厂，原来就印些讲义教材什么的，共有四台四开机、一台石印机,还有几台圆盘机。厂里的工人均对共产党感情很深或者深怕别人认为不深者，所以运动一来，理所当然都参加了保守派。造反派把权一夺，大家全都名正言顺回家休息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姓名已经忘记）没走，好像是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怕造反派整他，就留下来了,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权威。字架密密麻麻，铅字成千上万，要拣出来，拼成文章，还要印成报纸，光他一根独苗苗当然不成。因此就组织了同学若干，分头在字架前站好，一人盯看几个字架，统一由一人朗读文章，每个字每个标点逐一念来，铅字找好，再由一人专门收集，收集好了再交"独苗苗"排版。我记得老头很有文化，每拼好一篇文章，打出小样，他都要认 真阅读，并和我们交换意见。

《８１５战报》最初的发起人是动力系五年级同学刘福。刘福，四川中江人，好书画，热心公益活动。二年级时担任级会主席，曾举办过一次画展。其时，笔者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所以他一张大红请帖把我请去了"光临指导"。画展实在算不得什么画展，那些书那些画，全被他们用浆糊直接贴在墙壁上，贴得满满宕宕，书画水平当然更不能恭维。但就因为此事，我认识了他。刘后来官至贵州省瓮福磷矿党委书记。短短几年,国家对该矿山的投资动辄就几十、上百个亿，足见该矿规格不低，刘的官位也不低。这是同学们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贯为人和气，一说话就嘻嘻地笑，笑得十分认真，由于太认真，嘴里总像在不断吹气，作可 爱的希希声，让人总觉得欠着他什么似的。

８１５战斗团成立后，他在北京办事处当头儿。后来办事处撤消，学校已经夺权，他就回来筹办小报。我写文章在学校已大有名气，他自然要我加盟。开始我一直推辞，经不起他百般笑容，最后一刻同意了。我说这样吧：你负责，我做些具体的文字工作。出了问题由你顶着。他同意了。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牛气冲天，动辄就“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我这样的胆大妄为之徒，当时偏偏出此低调不祥之语，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原因。

虽然我曾是８１５事件的主要发起人，而且在事件第二天便作为五人代表秘密去了北京告状，（五人之一的周家喻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８１５一号人物；另一位：吴庆举，也一直是８１５的主要“勤务员”。我和另二人：师专造反派的一号唐宗明、重大文工团的王太康先行出发，周、吴二人因故未能成行）并于８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两次受到当时中国第四号人物陶铸的接见，进了中南海，可恰恰因为那时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北京红卫兵实施“红色恐怖”的种种惨状，我一下子就失了底气。告状回校，马上激流勇退，回美术队战斗组当起一般成员了。激流勇退的原因是我自觉家庭出身十分可疑。所谓可疑，是对父亲解放前夕到底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干的？我浑然不知。所以大学时代，每次面对登记表我准发愁，我搞不清楚我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是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和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每人填写的家庭成份都不一样。大姐工作最早，解放初，她填的是：民族资本家。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国家阶级政策风声日紧，成份也就依次递减。有的填：工商；接下来：商人；再下来：小商；再下：城市贫民。我忝居中庸，填的是倒数第二种。填是填了，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北京“红八月”，到处杀气腾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纳粹党徒驱赶追杀忧太人一样迫害得鲜血淋淋，看见这,我不自觉担心起自己的命运来。事实是，后来我在成都的老家果然被抄，年迈的父母被斗得死去活来。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穷经皓首，都喜欢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十多年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而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北京之行，却将我恐惧万端地把自己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人？回到重庆，我就开始溜号。只是刘福相邀太切，碍于情面，我勉强答应 ，再作冯妇了。

我曾查阅了１９６６年秋天的全部日记，认真回忆了当时每一个思维细节：在我的疯狂的宗教狂热中间，似乎还没有觉察有任何个人的欲念。只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同时，家庭出生的先天不足所带来的自卑感，一方面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让我裹足不前。想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我回到成都被抄的狼籍不堪的老家。空荡荡的屋里已一无所有，连地板都全部撬光。冰凉的泥地上就扔了几捆稻草，年过七旬的父母亲蜷在杂乱的草堆中。无处藏身的老鼠也在稻草中穿来穿去。灶台被彻底夷平，爸爸妈妈只能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像开野炊一样做饭。面对如此凄紧的场面，我记得我公然表现得十分超然。我以为我没有因他们的过失影响我而责东怪西，这就非常宽宏大度了。我将重庆姐姐委托我稍回的一床旧棉被交给他们便匆匆离去。以后几天，我都是到外地学生接待站过的夜。我查阅了当天日记，上面只有这 样短短一行：

“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怎么行呢？”

几十年后，当父母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每次回乡扫墓，跪倒在潮湿的泥土和抖嗦的落叶上，我都回想起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的日记，那一刻我总会诅咒自己的卑鄙和丑陋。

除了刘福和我，编辑部还有一位张姓同学，动力系学生，原在市文联住点，眼镜儿，也和刘福一样，永远对人微笑着。动力系四年级有位生得很体面的女生，吴秋仙，原先在演出队帮

忙，后来退出，说没事情好干，也来了编辑部。张、吴二人没有干多久就离开了。战报最兴旺时，编辑多达十几人，但开始，就是这么拼拼凑凑起家的。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的事。

三• 战报创刊和“１２４血案”

《８１５战报》共出刊６０多期（笔者保留的合订本共收６０期，其后报纸已无收集,故不知准确数字)，前后历时一年多。创刊号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出版的。该报出版前五天，即１２月４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届时为止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血案。血案直接导致了官办保守组织的全面瓦解，同时也暗中点燃了造反派内部份裂的导火线。对报纸编辑工作全然门外汉的我们，事件的发生是猝不及防的，我们只好胡乱收集了几篇现成的发言稿、大字报，再加点按语、评论，再加上一个发刊词，加上一个稿约，就这样匆匆忙忙发稿了。

血案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级党委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极不情愿又不得不给运动初期因“造反”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而一直以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为宗旨的保守派组织，眼见得被他们捍卫的对象纷纷认错，自尊心被极大伤害，顿时陷入十分尴尬的困境。他们觉得有必要迅速做出姿态，表明自己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确属耿耿忠心。

于是，１１月２８日，重庆全城同时飞传一张《海报》，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１２月４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其时，重庆的官办组织有四个，学生中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赤卫军”。赤卫军为“思想兵”的外围组织，成员均为出身成份较差者。工人组织就一个:“工人纠察队”。以上组织，当时俗称“保皇四军”。海报中所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其实就“工人纠察队”名称改换而已。工人纠察队要在造反派牛气如虹而保守派全线溃退的形势下来此一举，政治上的用意实在太明显不过了。这就是：挽回面子，摆脱困境，重整旗鼓，侍机再战。

受压制了几个月的造反派们当然不允许摇摇欲坠的“老保”东山再起。消息既出，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赴渝红卫兵便认定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坚决对其造反。大会造反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行为，即：纠集人员，冲击会场，占领主席台，抢夺话筒，发表造反声明，等等。此种捣乱行动的结果轻则让对方大会流产，重则双方大打出手，一场混战。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史研究专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谈到希特勒冲锋队的任务，曾这样定义：“保护纳粹党举行的会议，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古往今来，社会动乱中的种种政治行为，总是如此雷同。

当时，市委领导人对“１２•４”大会可能导致的群众冲突十分着急，并紧急召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劝其取消大会，并通过各部委和区委，通知所属各单位工人纠察队不要参会，均无果而终。原本由党委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工人纠察队，现在却不听他们的招呼了。

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经济利益,而前者是政治荣誉。后者的英雄往往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前者的英雄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工纠急于要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顶不光彩的帽子，大会不开，岂不授人以柄，再次招来耻笑 ？箭已在弦，他们不得不发了。

就在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捣乱大会的策划。１２月３日上午，以重大８１５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会议，制定造反方案，决定：如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开大会，以和“工纠”大会对抗。该计划立即遭到反对，被激进份子斥为太“温良恭俭让”，太“右”。同日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除安排谁冲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谁卡住大门外，还特别安排在主席台后边马路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一头目称，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就是要准备死人,准备血战一场。

以上背景情况，我是几十年后从一位文革史家何蜀的资料上看到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正忙于报纸的出版。我所亲历的情况是：１２月４日上午我赶去会场时，人山人海的大田湾体育场里，两派冲突已经开始。情况是这样的：率先上了主席台的周家喻和重大八一五另一头目强行要求发言，遭到拒绝，并被早有准备的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与此呼应,被激怒了的会场马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８１５坏得很!”“８１５滚出去!”。先期进入会场的８１５学生趁机摇动旗幡，以同样的愤怒向主席台发动冲击。为首的人我看得清楚,是重庆大学采矿系学生：郑全体。此人干任何事情都极端亡命。全国有名的“智擒李井泉”事件，首席执行人就是他。毕业后分配广东平石矿务局挖煤，多次创造日掘进尺的新纪录，领导和群众印象不错，于是很快入了党－－不意正准备提拔为局长，重庆大学一纸公函到了，历数他文革中多种不是，局长未当成，党籍也顺带取消，从此后便心灰意懒直至退休。主席台上冲突一开始，被阻隔在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便如狂潮急浪一般向水泄不通的体育场发起拼死冲击：混战就此开始。台上台下数万群众，开始是 喊叫、谩骂、吐口水，马上升级为推搡、为扭扯，为撕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成了武器，于是满场喧嚣，满场哭喊，满场血腥。我入场不久便被四面八方的与会者包围，他们发现我的身份，双方始而辩论，接着就“暴徒”“土匪” “滚出去”地骂开了，我寡不敌众，自然挨了不少冤枉拳，正不知如何脱身，发现主席台已被８１５占领，高音喇叭气急败坏地通知:“工人战斗军的同志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工人战斗军和夤夜赶来助战的“保皇四军”，三区八县的学生、老师、大人、娃娃，丢了一地狼藉的断旗杆、碎红旗、标语牌、鞋子、帽子，稀里哗啦就败退出去。我莫名其妙发现自己已经自由，而造反派，已经占领了会场,同时很快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

笔者查阅了当天的日记，有如下一段记录：

“……人们抬着伤员在街上游行。人们举着血衣在街上游行。宣传车的广播员跳上车顶，把缴来的凶器、袖章高高挑起，大喊大叫。工人们用白纸缠额，像电影上的日本示威者，白纸上写着：以血还血！手里拿着大纸板,写着：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他们在街上冲过去，冲过来，把工人纠察队的标语统统撕个精光!在血的教训面前，纠察队员认清了，退出了，他们把袖章摘下来，扔到宣传车上，一个北京女孩子把这些袖章穿成一串，挂起来，向群众高呼：工人纠察队中要革命的同志，好样的，就站过来!”

目睹当时的血腥场面，如果有人告诉你:会场上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你绝对不会有半点怀疑。

我也这样。当我怒气冲冲地从城里步行十多公里返回沙坪坝，一路听得街传路议,死人已由几人迅速增至几十人！走回寝室，我已经怒不可遏，邀约两三个同学，抱一捆纸,提一桶墨汁,便把沙区窄窄的街道写满了标语，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的诅咒。

完全象杀红了眼，当天晚上，我们仅仅二十多人，冲到学校松林坡上，一口气又把有数倍于我们人员保卫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砸了。我们砸得轻而易举。既然死了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对方自觉输理，怕我们杀人报复，所以我们砸东西、抱东西，他们都乖乖让一边，惟恐把我们激怒，只在嘴里不听地骂：“８１５，暴徒 ！”“８点１刻，暴徒!”君子动口不动手，眼睁睁看着我们扬长而去。

死了人，文章就很好做了。第二天８１５派就在事发地：大田湾体育场开了一个隆重异常的追悼会。笔者当天的日记对会场气氛有如下记录：“……我们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入场，群众对我们热烈鼓掌：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

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人们自觉地从各地来到大田湾，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环、一幅幅挽联，为烈士堆成了一座小山。”重大８１５的首领周家喻和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称：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千、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他们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会后第三天，即１２月７日，在体育场举行了陈放有五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前往悼念者凡数万，花圈祭品无数。文艺界造反派迅速谱写出悼念悲歌，题为：《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如下：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歌词共四段，每段开头都是“干什么”－“想起了你”，曲调凄婉悠扬，催人泪下。当时硬梆梆的革命歌曲大行其道，两相对比，这首歌曲自然大受欢迎。一时间，重庆大街小巷、码头车站，到处张挂歌单，好事者高踞桌凳义务教唱，学唱者唱会一批又来一批，情切切而意深深，当今卡拉ＯＫ发烧友无法与之比肩。其势大有一夜楚歌，吹散十万雄兵之概。

保守派完全被气势汹汹的反击吓破了胆，一直躲在屋里不敢露面，几乎半个月后，才又开始出来。害怕挨揍，都是一群一党地集体活动。他们走到街上，先选好一块地方，然后便手拉手围成弧形实施保卫，集体颂读毛语录以为掩护，接着小心翼翼，开始张贴反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其景凄惶寒惨，让人望而怜。即使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造反派也决不给他们半点好脸色。我在沙区供电局门口就亲眼见到这样一幕：重大的“思想兵”正在张贴大字报，一位怒气冲冲地老头不问青红皂白，粗暴推开正念语录的人墙，三把两把便将还没贴完的大字报撕个精光，而思想兵却毫无反抗之意，仅面面相觑，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排成两行纵队，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续前进，寻找下一个张贴点 。

１２４事件确实打伤不少人，事发当天，笔者曾去医院采访过，鼻青脸肿者有之，腿瘸臂折者有之，更有甚者，不能动弹、躺在床上输液的，也不乏其人。何蜀在《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一文中说：“仅据造反派最后一次公布的单方面统计的数字，就有４０５人（基本上是造反派一方的伤员），若加上工人纠察队一方的伤员人数，则至少会比这个数字多出一倍。”但是，说死了多少多少人，却纯属子虚乌有。那个所谓“烈士遗体展”，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五具尸体，其中四具是从火葬场强行弄去的，另外一具，则刚刚因心脏病死于医院。但这已经不重要。“死人”给了造反派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并且事实上把对方已经打得落花流水，那么讨论这武器到底是核弹还是银样蜡枪头，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保守派曾试图以“尸体”问题打开缺口，作最后一逞。他们在惊魂甫定后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主题就一个：你们“亲爱的战友在哪里？在火葬场！” 。毕竟大势已去，这种反击已经完全徒劳。

法国史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当王朝和保王党最终覆灭，就轮到革命党人来打得头破血流了。１２４事件将市委和所谓“保皇四军”最终逼下重庆政治舞台，确实就该让造反派内部来捉对儿撕杀了。１２４事件中所表现的同仇敌忾，事实上是造反派内部最后的蜜月。作为重庆地区第一张造反派小报编辑，我非常敬业地沉缅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１２４给了我们很好的题材。从１２月９日创刊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中央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报纸共出刊７期，平均六天一期，非常准时，而且其中还加出了两期增刊、一期“画刊”。题目都是些：“必须制裁反动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重庆黑市委是‘一二四血案’的元凶”等等。满纸豪言壮语，对保守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根本不知道,造反阵容内的两派 政治势力都已经在暗地里霍霍磨刀。

在匆匆付印的《８１５战报》创刊号的第四版，我们平行刊载了周家喻和罗广斌在 12 月５

日追悼会上的发言全文。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作为两种势力的代表，二人便分道扬镳,开始了剑拔弩张的生死对抗。

四·罗广斌其人

在当时的小报上，文章作者一般都不署个人姓名，而直接署“ＸＸＸ战斗组”“ＸＸＸ编辑部”。之所以如此，一则是避突出个人之嫌；二则是出了事，责任可由组织集体承担。《８１５战报》在刊登的１２月５日追悼会上的发言，连一号“勤务员”周家喻的发言署名，也只敢用“重庆大学８１５战斗团代表”，而偏偏罗广斌，是直书其名了，曰：“《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之所以如此称谓，是有两层意思，一，不清楚他属什么组织的代表；二是，他一本小说《红岩》，影响实在太大，从而作者个人的名气，也实属超重量级。把他的名字抬出来，可以大大加 重我们的政治砝码。

罗广斌在１２５大会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１２４事件”的一个星期前，正好是１１月２７日，这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制造著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死难纪念日。由于《红岩》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影响太深,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成为了中国青年一代向往的革命纪念地。“１１·２７”，成了凭悼革命先烈的神圣忌日。而罗广斌，作为小说作者，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也随之成为了全国青年顶礼膜拜的英雄。因此，在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２７日这一天，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由全国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纪念大会，就显得尤其涌跃热烈，而罗广斌在会场上的出现,更引起了全场青年汹涌澎湃的欢呼。罗广斌是乘坐敞棚吉普车进入体育场的,并且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受红卫兵朝觐的场面。在全中国只允许一个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存在的年代，罗广斌在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娃娃中煽起的偶像崇拜，实在有点离谱，难怪事后马上传出微词，说罗的做法太过份了些，甚至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当然完全不知道罗自己的肚子疼。虽然罗因为一本《红岩》而名满天下，据说在日本诸国的青年中都引起巨大反响,均欲一睹风采而后快,但罗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恰恰因为在大屠杀中幸存，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正好构成了他让人放心不下的最大历史疑点。不是那么多革命志士都壮烈牺牲了吗？为什么你罗广斌偏偏溜掉了？肯定你经不住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和利诱。你投降了。共产党最讲气节，对于变节者一律恨无赦。历史研究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戚本禹，就因为考证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晚节不忠，武断宣称：“假投降就是真投降”，马上就一路擑红，被钦点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南开大学几个学生因为在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六十一位共产党人的“自首书”，马上被中央文革高度首肯,成了驰名遐迩的“揪叛徒”专业户。罗广斌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创造的甫志高，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一样，成了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反面典型，只配让双枪老太婆之流“代表党，代表人民”一枪崩掉。顺理成章，只需给刘少奇戴一顶“叛徒”的帽子，要让全中国人民都对他恨之并欲“食其肉、寝其皮”就轻而易举了。那岁月要收拾一个异教徒实在太简单了。不管多大名气，都不可能成为你继续存在的理由。５７年反

右斗争搞掉的重量级人物够多了吧。５９年反右倾搞掉的人物也没一个是小不点儿。罗广斌一介书生，出一本书算老几？该查的问题，查！该写的交代，写！１９６３年，罗的名气已如日中天，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罗广斌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一句话便轻易否决。１９６４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亦遭同样原因否决。后，日共邀请罗渡海东访，再次被有关方面婉辞，罗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广阔社会的显赫名声和小局部的重重怀疑、不信任和压抑，结合得如此完美：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种困境中。应该写出伟大作品的笔,只能畏畏缩缩地写检讨书。应该被尊敬、鲜花和崇拜簇拥的一代才子，却只能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渔场，做相当于“弼马温”的“场长”。“长寿湖渔场”的雾霭是沉重而寂寥的，罗广斌就在那儿消磨着才华横溢的日子。

因此，我们有充份理由猜测，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广斌喘不过气的市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称为“８１５”的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

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８１５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罗广斌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这不奇怪,重大学生对党的感情太深。工科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让他们把抽象的“党”和具体的重庆市委区分得清清楚楚。他们8月１５日的造反，就因为对作为“党的化身”的党委书记郑思群深情依依，无以割舍，因而认定将郑迫害致死的重庆市委绝对有问题。重庆市委是“黑市委”，但决不等于被“党”怀疑过的罗广斌就代表正确路线。

工科学生们只知道将机械的旋转运动变成往复运动，只会呆头呆脑地用计算尺计算节点电流和环路电压，对于著名作家这个品牌、以及混迹官海多年的老干部的政治含金量，他们一无所知。重大８１５娃娃们的无知显然使罗广斌非常失望。文科学生就不一样了。充沛的激情和多愁善感使他们和罗广斌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更何况他们的毕其一生的追求,就是作一位像罗这样的人呢！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了重庆另一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西南师范学院８３１纵队的接纳和追捧：他很快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其时，西师８３１和首都三司等组织的驻渝联络站已结成联盟，后者的通天手眼和全国性工作网络，必然使罗的政治胆量和社会欲望迅速膨胀，进而有了前面那场招来非议的表演。

只是，距１１•２７纪念会后仅仅７天，１２•４大规模武斗事件很快为罗广斌板回了一分。１２５大会，造反派真诚地让他又出了一回风头。接下来，１２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１２•４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他一人掏腰包为控告团十几个成员购买了全部车票。12 月 17 日,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大会。规格之高，可想而知。而罗广斌作为唯一的外地代表发了言。据《首都红卫兵报》报导，“重庆代表”在长达４０分钟的发言中，“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１２•４’血案的滔天罪行”，并称此次血案有革命群众被打死。他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会上，罗广斌还将有关“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呈交给了周恩来和江青。

正当罗广斌像一颗明星在北京的政治天空冉冉上升，重庆的８１５派对内部悄然出现的反对派活动已经有些不耐烦。当时，除了那个“赴京控告团”到处抢镜头，更有一个叫“124 联合指挥部”的组织开始运作。组织者显然想用它取代由重大 815 为核心的 815 派组织事实上的领导地位。重大８１５当然不高兴。有一天在重大松林坡礼堂开群众大会，快结束了，教工领袖赵云生突然站起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说：“我说一个问题！我就说一个问题！”赵身材清瘦，永远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小胡子。精力极端充沛。他的每句话都斩钉截铁，让人感到极具份量。他说，关于“１２４联合指挥部”，我们的意见是：“框烂！”。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动辄就“砸烂”这个，“砸烂”那个。赵云生这位大学老师，公然小事糊涂，把这个司空见惯的“砸”字读成了“框”，顿时引来满堂大笑。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把高举的手臂又挥了挥，再次重复：“对！就是要彻底框烂 ！”

其实当时在学校的同学谁也不知道那个“联合指挥部”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后来确实被砸烂了。罗广斌肯定是知道的，只是他远在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争斗和罗的厄运，注定暂时延期了。

１９６７年的新年到了，我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除了继续揭露重庆市委和保守派制造１２４血案之外，战斗团开始忙着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整风，开赴工厂、农村、专县，去“向工农兵学习”。这段时间所发表的文章很多属于这一类，如：“《为人民服务》学习辅导材料”、“《纪念白求恩》学习辅导材料”、“《愚公移山》学习辅导材料”、“学习老三篇”，“狠触灵魂”、“对目前重庆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象红岩八三一那样抓革命促生产”、“红岩机器厂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二封信”,等等。

这些题目，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１２月２７日，我把关于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的第二个调查报告“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完成，接着发排１９６７年1月1日出版的稿件，我写了元旦献词：“而今迈步从头越”，就近岁末了。除夕夜，“风雨球场”举行演出。风雨球场就在印刷厂门口。看了一会，都是些张牙舞爪的红卫兵舞蹈，再加一些毛的语录歌，觉得无甚意思，又回厂赶印贺年片。贺年片上同样是红卫兵，同样张牙舞爪，作“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状。如果晚会对我有什么印象，那就是：校业余体育队那为身材高挑的女摩托车手陈淑月，她在台上表演独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扮像、声音、动作都出人意料的美丽动人。

但是后来，她疯了。

五· 工人造反风潮

仔细浏阅从创刊号到全市夺权之间的几期《８１５战报》，你很容易发现，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内容就是：“红岩机器厂８３１”造反派如何如何、通过他们的行动，真正的工人造反派应当如何如何，等等。

要说清红岩８３１，必须从重庆的工人造反风潮说起。

重庆大学的造反行动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杀出校门，走向社会。先是在各区，如江北、南岸、九龙坡、杨家坪等各地驻点办联络站，和当地的中学娃娃一起,开演讲会、搞辩论、表演造反舞、印发传单，诸如此类。少男少女们在一起，没老师、家长管束，爱怎么造反就怎么造反，很是快活的。当然有谈情说爱之类的风流快事，但是很少，珠胎暗结更没有听说过。记得我们班同学在重庆南岸３９中驻点，一次放电影,有位仁兄忽然间春情难抑，动手摸了一中学女战友大腿。该女孩以大局为重，没当场呼救，散场后立即投诉于我班战斗组长，全班同学马上群起而批之。先颂读毛语录几页几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条某款：“不准调戏妇女”，于是便定性了，结论是：将此一念之差的登徒子断然清洗出战斗团以正法纪，从此以后以至毕业分配，该可怜虫便孤魂野鬼，再无人愿与之理会，直到两年后发配边疆，他半个“不”字也不敢哼。那时候年轻人都觉得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属于未来的，属于未来的事业都是很神圣的，它需要献身、禁欲和死亡，而不是尘世的欢乐。亚里斯多德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制度将人民投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密切联系之中；它使阴私或个性没有容留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只有少数圣人才具有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文革那会儿，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圣人——这是另一个话题。下面继续说工人运动。

１９６６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市委马上诚惶诚恐地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贯彻，情愿或者不情愿地认真检讨前一阶段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开始被平反，整理、搜集的所谓“黑材料”开始被清退或销毁。这一下，聪明智慧的中国人算是搞清楚了：伟大领袖这一次显然不准备旧策新用：什么“引蛇出洞”、什么“搞阳谋”、什么“秋后算帐”，他统统不用了。林彪不是说过吗，毛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 个”。他的招数多得很。

于是，动摇、静观了好几个月的“工人阶级”终于蠢蠢欲动了。笔者查阅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笔者所写的一篇文章：《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在“伟大的转折”小标题下，对当时的形势有如下描述：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真理，明白了真相，于是便起来革命、起来造反了！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立了！红工８１５战斗团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成立了！居民８１５战斗团、供电８３０、红岩８３１战斗团、重纺８１５战斗团……都在革命的喊杀声中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 这是一支顶天立地的队伍！他们一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就以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民主觉悟、政治远见和坚强斗志表现了无穷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标志着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转向了新阶段，这就是，由８１５所掀起的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该文是笔者根据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授意写成的。在此之前，１１月２２日，吴曾亲自操笔写过同样意思的文章以指导运动，题目是：《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是意犹未尽，文字欠煽动性，故而要我再写一篇。说写文章“以指导运动”，并非将该文章印成总团“红头文件”下发。不是的。造反派不需要“红头文件”。除了毛泽东诸人,当时泱泱中华没任何权威。红卫兵连国家主席都爱怎么羞辱怎么羞辱，况论区区总团“勤务员”！当时战斗团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召开全体队员的辩论大会以作出决定。重大８１５的这种会议一

般都在风雨操场或者松林坡礼堂召开。而大会从来都吵得热热闹闹乃至乌烟瘴气的。这种集会上，似乎人人都是政治天才、智者、辩手和谋略家，都可以用滔滔雄辩让众人臣服，而只要一句话不对胃口，满场顿时就会起哄啸叫要你滚下讲台。吴庆举出身贫农，穷乡野地长大，自然比不得城里孩子那般伶牙俐齿，他明白自己的弱点，因此每次到辩论大会发表演说，总要事先写成文稿反复推敲，并总要让我为其润色。吴，四川遂宁人。父亲早年故世，由母亲一人将他养大成人，而且培养成大学生，足见其母亲的刻苦坚韧和勤劳智慧。吴正是从母亲身上遗传了这些优秀的特质，故而得以在风云际会的动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喑呜叱吒的好汉。他和我同在校业余文工团当点“小官”，他为乐队队长，我为美术队队长。二人多年邻室而居，是以成为莫逆，尤其我俩文革初期同受市委工作组压制，后又共同策划了重庆 的８１５运动,更给两人关系赋予了生死与共的色彩。因为他出身硬朗，不似我后忧重重，于是一路冲杀，在重庆文革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精彩有致的活剧：关于这一点，笔者下面还有记述。

还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地区保守组织处境日蹙，加之工人造反风潮日盛一日，保守组织更有兵败如山倒之势了。各地办点的同学们觉得有些无事可干，便开始不耐烦了，甚而至于对总团过于刻板、正统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甚至主张：“８１５必须大乱!”，扬言：重庆文革要深入，“必须砸烂８１５总团!” 云云。作为总团“勤务员”的吴庆举可是有足够耐心的。此人的特点就是成天忧心忡忡，主意迭出。恭维他的人，说他是“小诸葛”，小视他的人呢，就说他“多谋 不善断”。不论褒贬，反正还上大学他就一头“少年白”：就凭这点，你就得对他的鬼点子服气。有了上面那些混乱认识，因此吴就大会小会地宣传“工人运动好得很!”，宣传他的走“１２９道路”，宣传他的“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招还真灵，很快便获得了全体同学共识。本来，“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这一课题毛泽东早已教导多年，对一代青年学生，可说是刻骨铭心，已经固化为一种潜意识甚至本能。文革前夕，笔者曾去达县，即著名画家罗中立悉心描绘过的川北山区，参加了七个月的农村“四清”。在异常贫苦艰难环境里生存的山民，他们所表现的坚韧、朴直和厚道，确实让人感动有加，而同时，作为穷乡野地的小生产者，他们的狭隘、偏见乃至于让人很感可笑的自私，对人也记忆尤深。但当时我们却不愿意想这些，即使看到了，想到了，也必然马上自警：快快刹车！这是知识分子的偏见作祟！毛主席教导我们：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知识分子乾净得多”。文革之初，毛确实热情洋溢地鼓动红卫兵造反，可此后不过两年，即１９６８年7月２７日，毛便怒气冲冲地将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去教训不听招呼的娃娃兵了，并且降旨“无产阶级金棍子”姚文元，令其著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称，一起加以“奉劝”：从此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蒙冤，当了整整十多年的“臭老九”。毛非常清楚知识及精神力量的可怕。读书人一旦较起劲来，坐牢、杀头、满门抄斩，甚至诛灭十族都面不改色。毛是不能让你翘尾巴的。还上大一，党史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延安整风，要知识分子“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作人。”在毛看来，知识分子是某种尚未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随时随地让工匠或者农妇对其进行圈养驯化。重庆无线电三厂一个叫黄仲勤的女工，派到重庆大学当工宣队员，天天把教授、学者召集起来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其时她刚满十六岁。几十年后，我在深圳一间公司作总经理，她被聘为出纳，说起文革旧事，她自己都觉得荒唐透顶。

１９６６年的吴庆举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８１５的所有同学也绝对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一听说要“和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大家二话不说,背起书包就出发：下厂去、下乡去、下专县去。只是这一回情况有点见鬼：如今的大学生，毕竟已经和原来有点不同，毛泽东好像把他们宠坏了。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傻乎乎的、只能任人教训的“没头脑”，他

们已经见了大世面、经了大风雨,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革命闯将”。凭着几个月的革命经验，他们发现这些开始造反的所谓“工人”，尤其某些响当当的“工人领袖”，其实并不怎么样,并非毛告知的那样“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反过来，保守派骂他们“社会渣滓”、“牛鬼蛇神”、“三教九流”，还真有点那个意思。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在工厂里,劳动模范、先进份子、共产党员……这些人，好吃好在， 备享尊荣，他干吗反呢？想反的，还不全是些受过或者正在受压制、冤枉过或者正在被冤枉的、平时吊儿郎当、经常被领导数落批评的主儿，按十多年根深蒂固的观点看来，他们当然不是好东西。

我姐夫就是重庆最先的工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他也对社会有“不满倾向”。姐夫出身重庆的一个银行世家，大约家境优裕，因此性格洒脱不羁，火爆任性。重庆刚一解放，他立马投考“革大”，草草训练数周，便派赴川西藏族地区开辟工作。出发前回银行告别，他那一身皱巴巴的列宁装让昔日的同事们惊羡不置：哟！没想到你老佘原来是个地下党呀！我姐夫姓佘，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最大。

他满怀自豪地去了。到了雪山深处一个叫杂谷堖的蛮荒野地当了一名小小的财会人员。姐姐告诉我，说那个镇子不过十来户人家，买米打油需要骑着马向山外跑整整两天，相当荒远。不久就开始“三反”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政府效率是很高 的，北京一个喷涕，连杂谷堖这样的地方也免不了感冒。“三反”有一反就是“反贪污”。山窝子里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吃官饭的也不过就十来号人。哪儿找清洗对象呢？领导绞尽脑汁左思右想，这小旮旯不就有个姓佘的小子成天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重庆大码头，傲气熏熏，有一次领导去信用社找他借电话打打他公然不买帐。他不贪污谁贪污？于是就抓起来。于是就开会斗争。你小子不承认啊？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行，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啊，实在受不了，只好认帐：我贪了。贪了多少？胡乱说个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只好自我加码，一直加到领导满意为止。行了。又问：你贪的钱放哪儿了？能放哪儿呢？他的行李就一口箱子，早抄过了：一无所获。那时候，由杂谷堖到重庆远如极地探险,巨额贪污款想送回老家都不可能。他只好说：都送土匪了。行，有来龙，有去脉，事实清楚，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说钱都送土匪了吗，他理所当然和土匪关在一起。他是大都会来的白领呢，被查抄的皮箱里，出发前他还傻乎乎地装了几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和舍不得系的领带呢。他压根儿不知道在这儿是不需要穿西装的，更不知道他如此向往的新社会还要他和土匪一道领略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十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还心有余悸。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只是在美国的西部电影里见过啊！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我们党是很喜欢落实政策的——于是，放了。于是发回原籍，到重庆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涂山煤矿当起了矿工。原本在银行写字楼过得悠哉游哉的小白领，现在只能天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的，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几十年后，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改革开放了，他接到一纸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感谢党，好歹算是寄来了。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是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２００元。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半百。他用那２００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扇。他对我说：你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得这一把电扇呢。

文革开始时他还不老，但生活却早把它折磨得万念俱灰。夫妻分居，他只能常年住煤矿的集体宿舍。那不叫宿舍，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上大学时，隔几个星期我总会去南岸看看他，而他总是沉默寡言，从井下省一个大号加班馒头让我吃，然后把我带到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

去绕来，拣一个乾净点的地方便囫囵睡去。那时候有部阶级教育片，叫“燎原”，描写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如何之凄惨。每次恶卧 在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我都会想起电影里的布景。文化革命真够伟大的，不过短短数月，公然把我姐夫这样的人也鼓动起来了，成了最早的造反派。

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位工人造反派，我的表哥。他是我舅舅的儿子。两房单传，从小受到的溺爱自然无以复加。小学时我曾和他同班，娃娃中间，他不待说是为王为霸的：闯了祸，反正有爹妈给他赔礼摆平。有时我去外婆家找他玩，稍有不悦，他向大人一告，结果总是舅母不问青红皂白将我训斥一通，继而“金生长、金生短 ”地将宝贝小子诓慰不止：“金生”是表兄的小名。如此任性娇惯的孩子学习成绩自然很难好起来，和我同班一期他便理所当然留了下去，而且后来还继续留：留得不能再留了，就只好参加了工作。先在砖瓦厂，后又去建筑队去当小工。文革来了，好得很。“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他没上九重，却当了个很实惠的小头头，腰杆上还别一柄盒子炮，很神气的。有一次我和他偶尔相遇——他是我的对立派——只是他全不像当时很多同志那样“亲不亲，阶级分”，为一个政治观点，一家人也会闹得反目成仇——他根本不和我探讨政治问题，而且他对政治问题似乎毫无兴趣。他很得意地告诉我，那位原本耀武扬威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如今见了他是如何毕恭毕敬，还说他神气活现带着队伍去端某街道据点，仗刚刚打响，突然发现对方也有真家伙：他吓得如何魂飞魄散，拔腿就跑。

家族中所有工人中，只有成都的五姐夫是唯一的先知先觉。他是驾驶员，文化不算高,大约江湖上走南闯北，见识广，在全中国人民都被搞得如痴如狂的１９６６年秋天，他公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红卫兵跳什么跳？全给人家当官的垫背。不信走着瞧，运动完了，鸡还是鸡，凤还是凤。那时刻，五姐夫的自信和固执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下面还是说在涂山煤矿当矿工的姐夫。１２月的某一天，他突然来到报社找我，我上大学五年，这是他第一次到重大来。他告诉我说他们造反了，要成立战斗队。工友们知道他的妻弟在重大，还是战报编辑，特地要他来邀请我前去参会。记得听到这一消息，我当时一点也不高兴。我知道我姐夫不是坏人，但理论上却属于社会的另类。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８１５，都不是好事情。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见我嗫嗫难决，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８１５的人，心里就怕。我犹豫再三，让另一个同学：同我去北京告状的王太康跟我姐夫去了。回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行）!

王当然不知道，两年后，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我姐夫果然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被揪出来，关进煤矿私设的监狱里，一关又关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平反”。

这只是发生在我小小家族里的故事，社会上工人造反者状况的形形色色有多精彩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在类似修道院环境长大的大学生来说，所有这些陌生的社会风景便显得有些猝不及防了。他们理论上可以接受所谓“工人阶级伟大”、“工人运动好得很”的结论,但面对千奇百怪的个案，他们不知所措。就在上面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12 月２１日，《８１５战报》便急不可待地出版特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其中观点当然不是报社自作主张，同样是在全团大会一片呐喊和啸叫中通过的，代表了同学们共同的忡忡忧心。文章煞有介事提出什么“必须纯洁组织”，“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钻入

我们的阵营把我们从内部冲跨”,提出什么“司令部要革命化”；提出什么“应该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设备”，文章甚至还书生气十足地搬出了在政治学习中辅导员危言耸听的训示：“现在，我们应当看到国家还不富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做牛马的时代，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一定不要贪图享受，要把世界革命的大旗扛下去，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走到底。”这些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现在看来，就是在当时看来，也天真滑稽得可以。难怪人家要说重大８１５“右”了，成了“变相的工作组”，等等。不过客观地说，学生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候，他们是万般真诚的。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领头羊的重大８１５，当然就急于要按图索骥，寻找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了。这个典型必须由真正大工业的产业工人组成，要有很多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所有成员必须历史清白……总之，他们必须完全符合毛泽 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技术标准。这样，他们找到红岩机器厂了。

六·关于红岩机器厂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六十年代新建的内迁厂，位于远离市区的北碚区歇马场。生产船用柴油机。工厂人员由两个地方迁来：一部份来自于无锡某厂，另一部份来自洛阳某厂，两个派系的工人便组成了一个“双民族”社会,两个派系的头领便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人家乡观念无疑是非常要命的。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增广贤文》有云：“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之谓也。如果说，老百姓为生活计，从五湖四海走一起来了,只用磨合磨合，最终也不难彼此融合。麻烦是当官的，因为权力诱惑，两帮人就很难尿进一把壶了。当然，如果上级协调得当，问题也不难解决，反正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问题是，上级委派来的工作组恰恰把屁股坐歪了：偏偏地坐到了洛阳派一边，事情就越搅越麻烦了。时间是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6月８日。市委工作组是来搞所谓工厂“四清”的。事情还没“清”，市里的文革已闹腾得地覆天翻，心里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的无锡派工人，眼看得满重庆都已洪水滔天，学生又提供了现成榜样，焉能不闹？

这样，８３１事件作为重庆最早的群体工人闹事，便发生了。

关于事件的叙述，当年的文章是这样记录的：

“……由于工作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了群众革命热情……几个月来，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八月十五日发生的’八一五事件’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 。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下禁令、封消息……忠实执行市委反动路线的红岩工作队更是把该厂封锁得铁桶一般！

“但工人们迫切要求关心国家大事，纷纷要求到市里看大字报。在他们和工作队进行了一番

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在８月３１日，１０００多人一起到市里来了……在市里，他们与总工会的一小撮保皇分子做了两天两夜顽强的斗争，并于九月一日胜利返厂了。这就是轰动山城的八三一事件。”

和当时发生的所有故事一样，“市委工作队”“急急忙忙在厂里拼凑了一个’无产阶级红卫兵’（后改编成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利用围攻、斗争、盯稍、调职等手法,对‘八三一’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其他工厂发生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在造反派连连得手之时，被市委支持的一派乾脆撩掉摊子，拍拍屁股走人了：“工人纠察队在离厂的时候，把厂里的生产工具、保管室钥匙、技术资料等都统统拿走了，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比如：……车辆被全部开走了……变电所走了四分之三，锅炉房有一个中班走光了，水泵站人也走光，阀门也给锁上了。总机、机要室、武装部的护厂民兵等差不多走光，公章、公函、采购证等也统统锁上或带走……食堂炊事员走了４０％……托儿所的炊事员走光……”

那年头发生的故事都是造反派快快活活地满世界捣乱而保守派忍辱负重地呆在家里搞生产，红岩机器厂恰恰反过来了。保守派心安理得出去上访问串联，而把双倍的生产任务留下来让无锡籍的造反派们慢慢享用。８３１的造反派们确实还蛮争气的，他们不但把生产坚持下来，而且确实还干得不错，据战报载，“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

继续摘引大段大段关于造反弟兄们“抓革命促生产”的事迹显然就太腻味了。当年的虚妄和偏见，如今早已冷却甚至已被时间的泥土深埋为一堆化石，那么今天，当我们拨开那些空泛响亮的政治外衣，该怎样解释他们确实让人感动的劳动激情呢？群体的荣誉感。我以为，这种群体荣誉感，实际上就是常言所说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结这一类概念的微缩版。它已是一种超越经济和功利的文化现象。当经济的发展让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走向全球性的沟通与融合，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国阶级斗争却让本已相当狭隘的一国文化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这已直接关乎这个群体、从而其中每一位个体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存。那年月，你的行为稍有“不革命”，对毛泽东稍有不忠，你的敌人就可以象掐一只昆虫一样,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地将你掐死。为了战胜洛阳来的对手，无锡人必须表现得比洛阳人更革命。

根据笔者的日记，我前后曾两次到红岩厂调查。第一次是１１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日记有如下一行：“到红岩机器厂作了两天多的工厂调查，教益不小，写了关于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报告一份，拟送中央文革”.“送中央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清楚。我只记得是吴庆举让我去的。造反派都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说得非常神圣，有点像生意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广告做得很响亮一样。吴作为总团“勤务员”尤其如此。大学毕业后，大约是１９７３年，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受到市委领导青睐，派去南桐矿区当一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他公然兴冲冲地来信告诉我，说他正在读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谈到当年列宁在维堡区从事工运，列宁夫人说：正是那段经历，“使依里奇成长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足见吴庆举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想象得有多神圣。不过我只是个事务主义者，不管当时或者现在，我都料定８１５总团没本事和中央文革搭上热线,让这样的破文章也能直达天听。作为小报文章宣传宣传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反正印刷厂就在自己手上。于是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将文章发在了《８１５战报》的第三期，题曰：“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 。本文前面那些叙述就摘自该篇文章。

第二次去红岩厂就在第一篇文章发表当天。那天的日记也就一行：“我和吴庆举到红岩厂去了，中央要求我们再写一个红岩厂的调查报告”次日，２７日的日记也是一行：“把第二个

调查报告完成了，题目是：《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由红岩厂的五名代表带上北京去了。”这个“中央”绝对又属子虚无乌有，如果说沾一点谱，估计叫我写这篇文章是新华社重庆记者站出的招，因为后来，１９６７年1月１１日，在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中，确实用了约四百字的篇幅介绍“红岩机器厂革命造反派职工”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事迹。发表这则综合消息，是为了配合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贺电”，反对经济主义、打退所谓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虽然消息长度不足我所写文章的十分之一，但我们依然大受鼓舞，毕竟是新华社啊。毕竟是我们抓的典型啊。大约为了显示我们对此事的专利，第二天，即１月１２日，我们马上以特刊的形式，全文刊登了上面那篇据说是“中央”让写的调查报告。

几十年后，我有机会调查很多当初工人造反的个案，七十年代，我本身就曾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案牵连而被弄到一个工厂当过多年工人。这个工厂在云南文革中也闹得特别起劲。我有意识地了解了很多工人的造反经历，对照之下，我以为红岩厂的情况实在没有太多典型意义，更有代表性的，倒恰恰是我那位当矿工的姐夫和那位从小不喜欢读书的表哥。比如，造反头目何某，原来在厂里当维修电工，一次，因机床限位开关质量出问题，机头从床身上冲了出来，于是厂保卫部门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之百般盘查，没完没了。还有一钳工，文姓，曾和我同一车间。五十年代一次班前会，他和团支书发生口角继而踢了对方一脚，团支书不依不饶，一状告到厂党委：文某立即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去农场劳教十余年。下班返家，我俩常骑车同行，一次我问：为踢人一脚就劳教你十多年，觉得冤么？不料他豁达一笑，回答：我踢团支书一脚，就等于踢了共青团一脚；共青团是属共产党领导的，我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一脚；踢共产党一脚，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主席一脚：踢毛主席一脚才劳教十多年，有什么冤？值！文革开始后，工人们把平素威风八面的保卫科长揪出来批斗，戴高帽，挂黑牌——这黑牌可不是纸板作的，而是重达几十公斤的气缸盖！细铁丝挂起来，往科长脖子上一套，细细的铁丝便像刀刃剑锋一般直往肉里嵌，顿时嵌得鲜血淋淋！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红岩厂成为的造反派典型，还有一点让人费解的是：无锡作为著名的江南水乡，民风素多温婉娟秀，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和“造反”这个往往意味着刁民枭雄的概念搅到一起？而不让同一个厂的、来自洛阳的北方人？这一回，红岩厂的文化大革命偏偏让强悍骠勇的北方人反串了一回保守派的角色。历史真正是开了一回玩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红岩厂作调查的情景。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工厂，活动于那些热情有加的造反工人中间，我没有感到过半点火药味，他们全都操着那么动听的音乐般的吴侬软语。接待我的工人，一位姓过，叫过文南，除了戏剧《十五贯》里那位叫“过于执”的混官，我是第二次遇到这个姓。过师傅精力充沛，一看而知具有南方人的精明。另一位是女工，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只觉她眉清目秀，让人想起六十年代名躁一时的江南风俗画家徐启雄笔下的采莲女。她将我安排在不知谁的寝室过夜，事前将卧具全都换洗得干乾净净，还能闻到淡淡的肥皂香味，刚刚钻进被窝，我突然发现：在雪白的被单上，她还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了一行字：“向重大８１５小将学习、致敬！”——这个细节对我记忆尤深。在后来写的一篇小说里，我曾把这个细节用进去了。

这样，红岩 831 理所当然成了８１５派的死硬分子，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铁杆”、“钢杆”。几个月后，武斗战火燃遍山城。１９６７年6月５日后，根据某协议，８１５的武装力量暂

时撤出北碚区，让给对立派“反到底”。这样，红岩机器厂成了孤岛，习惯于坚守岗位的８３１工人，就成了对方的瓮中之鳖。据当时小报载，１９６７年7月8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西师８３１等数千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等，对红岩机器厂发动突然袭击，使红岩厂的８３１惨遭大败。7月２５日出版的《８１５战报》成都版，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章中列举了死者的名单，红岩机器厂计有：黄习琨、吴华明 、徐秋林、余春保。后来还死没死，死了谁我已经不得而知。听到消息，扼腕咨嗟之余，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名单中没有过文南，以及那位像采莲女一样的女工。

很多年后，１９８３年秋天，我有机会第一次去无锡，是开一个技术研讨会。我曾利用会余闲暇时，独自去旧城的寻常巷陌和寂静的锡惠山低徊漫步，寻访早就神往的二泉夜月，和瞎子阿炳悠远旋律带给我的种种遐想与幽思。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远在重庆的歇马场，那一片孤独的内迁厂，想起那儿曾经发生过的激情、疯狂和血案。有一刹那，我突然很自责。我对自己说：如果当初我和吴庆举不去那个工厂，不写那几篇大可不必的破文章，不将他们树成典型，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８１５的死党的。他们旁边，北碚区，不现成就有一个反到底派的主力“西师８３１”吗？他们完全可能与他们结盟。这样，在１９６７年７、８月烽火连天的重庆北碚，他们就不会沦为孤岛了，也不会被忽然降临的血洗而死去。

于是我在心里诅咒：该死的《８１５战报》!

七·新年的花絮

历史上任何震撼世界的大革命都有它的华彩段。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有他们的１７９３年，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他们的１９１８。在这种史诗年代，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必然格外复杂和惨烈，这样年代的故事必然异常悲壮动人，这样的年代必然英雄辈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和法国大革命及苏俄十月革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作为动乱的先驱：学生，仅仅是奉旨造反。如从若干社会活动的表象看,文革中确有很多与前面两场革命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机敏才智和勇敢无畏确也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但是必须指出：催生这些英雄故事的政治平台，即人们所拥有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最高统帅钦赐的。只要最高统帅哪一天不高兴了，将这些东西一旦收回，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们便什么也办不成了。１９６７年，最高统帅还高兴着哩，他还需要娃娃们继续大闹天宫，还想让他们锻炼锻炼，哪怕动刀动枪动炮。他很轻松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要打，就象重庆那样，双方几万人，开大炮！伟大领袖赐给了这么大的自由，１９６７年还能不精彩吗？１９６７，是中国文革的华彩段。

在１月１日出版的《８１５战报》上，我撰写的“元旦献词”记录了重庆大学造反学生新年伊始的洋洋自得：“一九六七年，我们要砸烂黑市委，直捣西南局，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清算八二八的老帐，讨还一二四的血债……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大破李井泉、黑市委的修正主义统治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要踏遍蜀水巴山……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西南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同一天的《８１５战报》还破例，同时出版了一期画刊。画刊上的几幅木刻版画，均为四川

美术学院两位学生的大作。其时，二人被我们礼聘为美术编辑。一名邹昌义，现为“川美”绘画系教授。他在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绘画才能，而是有一天他全副戎装来找我。时间是１９６７年的８月。他气喘犹急，很有些开心地对我说，他们刚刚开着坦克去“敌占区”示威回来。他头戴钢盔，腰间挂一柄枪：像是手枪,可枪口粗硕惊人。我正奇怪，他却快活一笑，爽快地将枪递过来，说：是打信号弹的哩！没手枪，只好用这个对付对付。几十年后久别重逢，见到我，他还像当年那样亲热地大呼：“狗Ｘ的周孜仁！”。另一位叫毛世勋，文革造反，名字也就革成了“毛峰”，并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多彩的人生已经在他的名字前面积累了许多让人惊羡的头衔：报社副主编、大学客座教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等。文革那会儿他们都刚出世道，极朴拙忠厚的。为方便他们创作，报社专门开车到四川美术家协会免费弄来了许多梨木板，这让二人非常开心。梨木板宽平细腻，当是刻版画的上好材料，对于两位穷学生，绝对是梦寐难求的极品。木板原来的所有者、美协的版画大师们极不情愿地看着我们把宝贝木板一块一块搬上吉普车，心里肯定极端难受。画家们认真地叮嘱我们小心，别把板子碰坏了，还一再说明这些东西来之不易。我注意到木板上，有的已经用铅笔起好了草稿，遂想：如果不是文革，板上的这些线条和块面一定已经印上全国一流报刊的显著版面而被推崇备致。六十年代，四川美协的版画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还上中学，我还做着画家梦的时候，李焕民、吴凡、牛文、徐匡、吴强年……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但是那一天，看见画家们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眼睁睁看我们把东西拿走，我没有把他们和上面那些名字一一对应。我已经不关心他们谁是谁。还有，看见画家们悲悯的表情，我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木板装车完毕便一溜烟开走了。我想我们当时一定很像保守派传单上骂的“土匪”、“暴徒”：虽然我以为我们很客气。

１９６７年一月，市委和他们组织的“保皇派”，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１２.４”大武斗，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重庆市委事实上已经瘫痪。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事实上也什么都不能干了。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工人纠察队还想做最后一搏：但已经毫无意义，无非是他们尴尬政治使命结束之前的回光反照。

下面摘抄的是一位同学当时的日记。他叫侯念平。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毕业后曾分配云南边疆工作。７０年代调回老家，临行前路过昆明，很珍重地把保存完好的日记本送我了，他说：留着吧，以后写文化革命历史，你用得上的。１９６７年初，他们班被派往长安机械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该厂就是现在制造“长安”牌汽车的著名企业。很大，文革那会儿，它专业制造武器。这些日记，算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段实录：

“１月３日：今天下午长安厂举行干部大会，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黄顺义代表重大８１５战斗团上去讲了一些话，谈得挺尖锐，但不怎么突出重点,信口开河，有一些赤卫军派人物感到难受就退场了。”（笔者注：黄顺义是重大８１５的著名“勤务员”。他的著名，更是因为他的勤勤恳恳和仗义执言。因为勤恳，在同学中素有“老黄牛”的美誉。而他的仗义，使他在政治谋略方面恰恰显得缺乏理性，甚至有些无知。在总团领袖里，我一直以为他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本色的良心和过于纯真的激情和勇气。）

“１月４日：……从１月３日起我调换了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实行半天劳动半天搞文化革命的时间制。原来的８小组群众动得比较好了，现又调到１小组去……现在时间很紧,上午劳动，下午搞传单、大字报。今日又帮助《九一》钢铁战斗队整理材料……生活紧张,但是愉快。”

“１月５日：今天上午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小组要我读，于是我边读边讲，结合自己通过几个月文化革命的感受，及了解的情况，讲了一下。这篇社论写得好极了，无处不谈出了我们心里话，特别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次明确地指出了出路。对受蒙蔽的群众给予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来厂劳动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造反派也有老保……联络站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进厂区看大字报……”

“１月１０日：……近几日，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即原工人纠察队开始大肆活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继续欺骗、蒙蔽一部份群众，企图为之保驾。……九日晚厂里发生由于一辆可疑宣传车被扣而调动大量战斗军企图制造冲突。并且一小撮垂死挣扎的混蛋企图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煽动部份工人罢工。昨日、今日,好几处地方停工。我厂战斗军今日也进城去了，聚集了上万人在两路口一带堵断交通。想抄造反军总部，至今而返。”（注：笔者当天日记也有“罢工达到高潮。几十万工纠在市内包围造反军总部,我们发出呼吁书并奔赴最前线宣传抓 革命促生产”诸语。）

“１月１２日：今天与另一同学参加了２４车间的批判大会。车间指导员死顽固，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出洋相，给保守派极好教育。一个前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铁的事实面前觉醒了，揭发了许多问题……”

“１月１３日：我们车间今日也开批判大会，会开得比较好……”

“１月１４日：今日全厂召开批判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得较成功，会后，造反派一举接管了电台（广播站）、印刷所，让这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工具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切权利归左派。……今日我们车间一些人去红岩８３１参观，我和刘云生作８１５代表前往。同行的有车间主任、管理员、老师傅及造反派共２０余人。”

“１月１６日……今天，我８１５战斗团采取了革命行动，一举接管和砸烂了设在重大的一切保皇机构……战果辉煌。我参与了砸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行动。我们挤开了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愿专家招待所的门，冲入房内，又把挡在楼梯上的工人战斗军拉下来,冲上了楼，一举攻占了他们的司令部……我们总共缴获了黑材料、数十万张纸、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麻饼、香蕉、造谣传单、广播机……。这个行动，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晚上我们通过了对重庆黑市委的通令，勒令以鲁大东为首的黑市委１８日晚１２点以前到我校报到，２３日公开向全市人民做检讨，否则格抓格斗勿论，并勒令解散市文革（笔者注:“通令”发出后，副市长段大明、候补书记丁长河、书记处书记廖苏华、书记处书记鲁大东确实均次第按时报到，分别安排在各学生寝室住宿，由专人监管。事后检点，只有书记处书记岳林缺席，他已被交通学院９１５战斗团的造反派们提走了。）

交院９１５擅自抓走岳林这件事，显然是对重大８１５权威地位的公然蔑视。蔑视重大８１５权威地位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交院９１５，而是整整一股正在暗中崛起的政治势力。他们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下决心要在即将开始的全市夺权中重新洗牌，和重大 815 及其附庸决一雌雄。这股力量的代表是：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８３１纵队和交院９１５战斗团。他们背后，是来自天子脚下的首都一司和三司的驻渝联络站。重大８１５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御林军看在眼里，对于他们的指手画脚从来置若罔闻,这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下决心要让这帮“土老财”知道“中央来人”的厉害。还有，后来几乎主宰了整个四川命运的四川大学８２６战斗团，对于重大８１５这个山城地头蛇气焰嚣张地

跑去省会成都招摇过市,也甚感愤愤。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反对派一边。最后，大名鼎鼎的罗广斌不正带领着“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坚守北京吗，12 月 17 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他已经出够风头，正信心十足地等待中央首长接见,面授锦囊呢。

只是没有时间了。全国性的夺权已经进入倒计时。罗广斌实在太缺乏耐心。事实上，和他同样落魄的“受迫害干部”而后来险些儿真当上“四川王”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当时的情况和他也差不多：老婆带着几个随从在北京做报告、造舆论、拉关系，老公则呆在四川和红卫兵接应周旋。“二月逆流”狂飙骤至，老公见事不妙，乾脆星夜出逃，也躲来皇城根儿暂避风雨了。权威材料介绍：夫妇二人留京期间，共作“控诉”报告五、六十次,听众三十多万人。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包括：中央办公厅下属某单位、中央监委、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等等。还有组织特别为他们出版张西挺《狱中日记》，细说李井泉、西南局对夫妇俩的迫害如何残酷，以及夫妇二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高风亮节：事后曾有许多人对“日记”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不过，该“日记”即使千真万确，其名气和影响与《红岩》相比，也绝对相差着好几个数量级。但夫妻二人的的优点就是能等——这相当要命——而他们确实等到了舆论造足，等到了上层关系攀的很可以，等到杀气腾腾的二月镇反不仅结束而且挨了中央狠狠一顿，时来运转，二人这才风光无限，得胜凯旋。政治斗争是极端需要耐心的。王莽谦恭下士，刘玄德后园学圃：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阴谋家早就在韬晦之策方面提供了许多经典模式。而罗广斌，毕竟文人一个，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能成什么气候呢？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罗广斌的个人命运里，算是不幸言中了。

１月１１日，罗广斌等人从北京匆匆忙忙回到了重庆。其时，所谓“１２４惨案烈士”这一情节已经被证明纯属虚构。事实是，从一开始筹办所谓１２４烈士尸体展览，重大８１５一伙“右倾分子”就表示了坚决反对。当时罗的决心是很固执的，他坚持要办起来再说，用这个来发动群众，又让群众通过展览来辨认。假烈士尸体的童话既已戳穿，已经够被动了，企图取代８１５地位的所谓“联合指挥部”又被砸掉，还有，即使尸体事实成立，罗广斌离开重庆这一个月功夫，文革闹剧已经又交给山城老百姓更多精彩话题，“１２４惨案”所引起轰动效应已经好景难再。公众的灯光总喜欢投射在８１５这个幸运儿头上——完全可以猜想，出现在罗广斌面前的１９６７年岁初的重庆，实在有点让他焦头烂额。好在还没有回来之前，１月６日,首都三司、一司渝办、工人造反军、西师 831 和交院９１５等代表，已经在牛角沱客运站急会密商，统一了斗争策略：就让重大８１５去对付老保好了，我们就反反他们的“右倾”。在中国，反右总不会错,而且总是很愉快的。三天后，１月９日，川大８２６战斗团驻渝办先行发难，召开大会批重大右倾。初试啼声,虽然未一鸣惊人，甚至被蛮不讲理的重大８１５造了反，但毕竟摸了一回“老虎屁股”，毕竟表示了自己的存在，胜利不小了。罗广斌回渝当晚，立即在市文联召集上述弟兄聚会,商议继续“反右倾”、“踢开重大８１５”、由工人造反军主持全市夺权诸事宜：造反派内部倒８１５的程序从此正式启动了。

对于这些个活动，重大８１５压根儿就没看在眼里，无非是几个苍蝇碰壁。仔细检看１月２７日以前的所有报纸，看不到任何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消息,以及以总团名义的表态。只是在１月１４日“关于山城八一五派中一些问题《８１５战报》答群众问”中轻描淡写地说：“有的人，他们俨然以’当然左派’自居，瞧不起群众，到处指手画脚：这个组织‘右’，那个组织‘修’，惟独老子最革命，以‘永远的少数派’为自豪，孤家寡人，个人突出；有的人，他们热衷于仅仅拼刺刀，猛冲猛打，但是到运动深入到了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今天，他们却不愿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严肃的政治斗争，只想冲个痛快，闹个舒服。”尤其奇怪的是，不管多热闹，到１月２７日，战报第八期出版，转载了

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便突然终刊了。这情景有点像古代将军在得胜凯旋路上，偶遇了几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小勇 ，他根本不屑一顾，虚晃一枪，便绝尘而去。

为什么突然停刊？具体细节我现在已经想不全了。至少作为我自己，象是以为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应该亲自投身其中，而不应该再坐在静静的编辑部消磨日子，这是肯定的。在１月２４日日记上，我这样写道：“满街都是老保们戴高帽游街。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已经展开／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八一五的同志们还有什么心思坐下来整风？不行了，杀出去，夺权！夺权！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的是夺权，说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整风暂停，大家又杀出去了。／我真不想坐在编辑室里，人都憋死了!”前二日，即北京正式号召全国夺权的２２日，日记记录我曾经“到八一印刷厂去（笔者注：报纸创刊后发行量增加很快。开始大约为 2000 至 3000，不久便增至１０００0多甚至２００００。重大自身印刷厂的能力不够，从第五期起就改在位于捍卫路的八一印刷厂印刷。从印刷质量来比较，第五期及以后的报纸明显比前四期好得多)，顺道去南岸，今天在城里逗留一会，晚上回来了。”日记写道“解放碑又是水泄不通。正在开大会。什么大会呢？老题目,新内容,就是那个八二八。现在很多所谓的受害者都出来倒戈了,成立了’八二八兵团’，到解放碑开控诉大会。所谓神医季开阳等等，均被抓上台挂以黑牌，冠以高帽，实在狼狈不堪。”

所谓“八二八惨案”，是重庆市委为对付刚刚起事的８１５而编造的一个非常吓人的谎言。说是重大８１５的学生，在１９６６年8月２８日那天，围攻了江北区下横街小学,把女教师的衣服剥光、头发拔光，游街示众。还有，他们用两块门板，把一个驼背老师夹在中间施压整型。还有，有个老师被打成“脾破裂”，应该是不治之症了，后经季开阳大夫救治得以劫后余生。在民风朴拙的当时,这些恐怖故事是很容易不攻自破的,可８１５毕竟刚刚出道，面对漫天流言，一时间确被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不得不数千人星夜北上：去北京，找救星。时间是９月３日，学生们绝食两天对市委以示威胁，无果，以困乏难耐之身，徒步行走数十里方得上车。其情其景，确有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的悲壮。仅仅几个月工夫，事情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当时我们的高兴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惊异地发现还有这么一段极为仓促的记录：

“在大街上,人的海洋里,我看到一双特别熟悉的眼睛和那张白的面孔,是她——就是过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很久没见了。久别重逢，砰然一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心里老不平静。真的，太不平静了!”

在满纸激言奋辞的日记中突然跳出这些纯属私人情绪的话，实在有些唐突，也说明这个女孩在我生活中的重要。请读者原谅我需要费些笔墨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既然无可回避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我所有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甚至最隐密的私人情感，都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我是把自己也作为一具标本的。我解剖自己，也是对我们曾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剖析。

在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我这样记录了我和她的初次邂逅：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大一。大学一年级下期。夹竹桃鲜花盛开的季节。那年我十八岁,正是

情窦初开的年纪。校园里夹竹桃极多。花开时节，红白相间的花枝就蓬蓬勃勃，洪水一样往道路中间汹涌，本来就拥挤的校园小路，就越发拥挤了。

命运注定我要和她窄路相逢。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尤其糟糕的是，在比肩接踵的人群里，我们每天相逢，匆匆邂逅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要向我微笑？目光如电,总让我心跳难平。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我记得我曾在长满青稻的平原上踽踽独行，倏忽间初雷乍起，我蓦然回首：在遥远又漫长的地平线的上头，在充塞天际的浩瀚云团中间赫然跳出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将整个平原照耀得一派辉煌。我欣喜万分又恐惧万分。我以为我偷窥了宇宙的秘密。我渴望辉煌的奇迹再次出现却又畏惧上苍的惩罚。如今，走在长满夹竹桃的小路上，我和她的眼睛天天相逢又倏然离去，我总会想起那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和那一道辉照宇宙的闪电，我总会渴望，又喘喘不安。

那时候我刚刚读到了泰戈尔一首无题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目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却象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涛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的朦胧和准确让我震摄不已，而且从此后日日都强烈地催动我甜美而陌生的心跳。我确信我爱上她了。这种情绪如此强烈，难以抑止，但是我却不敢承认它。大学整整五年,我甚至连和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时都在告知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堕落并等待拯救，伟大的党所赋予的使命那么神圣而激动人心。任何儿女私情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我只巴望着为党作一个“驯服工具”和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漫长的大学时代，整整五年,“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只能“象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 / 在绝望的朦胧里 / 寻找它自己的意义”。三十年后，我到了深圳，我已经和我的过去彻底告别:“铁饭碗”、几十年工龄、职称和公房，开始真正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时候，我才确信我被扭曲、异化和泯灭了的个人自信、尊严和追求已经涅磐，于是我回到重庆，大胆约会了她，并且向她表白了郁积几十年的情怀。我对她说，我想对你讲一个漫长的、无言而又无望的爱情故事，要听吗？她点点头，还是用大学时代我曾熟悉的眼睛微笑。这是一个七月的雨后，沙区公园满目青葱。隔着围墙，便是埋葬有４３３具冤魂的著名文革死难者公墓。静静的湖水中只有我们一只小舟。我给她背颂了泰戈尔的朦胧诗。这时，她突然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啊？那一年，她已经儿女成行，我也年届半百。

１９６７年一月的那个下午，当我得意洋洋地从解放碑走回学校，我觉得我是一个征服者，我觉得整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我们而得救。因此，当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同行（这人

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觉得是在胜利凯旋时刻，突然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尴尬。我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因而只敢在日记上草草记了上面几行文字。如果需要补充，那就是：那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滑稽地突然想起了革命小说、当年我的生活教科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雪筑路工地上，保尔。柯察金突然遇到了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我连招呼都没给她打一个，便高傲地擦肩而过。

八·革联会的诞生和罗广斌之死

《８１５战报》出刊总是很准时的，平均每周一刊。但第八期和第九期却间隔了将近一个月。前面说了，这绝不是疏忽，而确属停刊。因为２月１８日出版的第九期明白标上了复刊号。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天的生活，和《８１５战报》没有太多关系。但夺权，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以为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重庆造反派零零散散的夺权早就开始，大规模的，是从１月２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次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称：自下而上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帮助年轻人产生神圣的联想，社论故意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只可惜这儿没有围攻沙俄冬宫的呐喊、没有阿芙乐尔战舰的隆隆炮响，也没有波罗的海水兵在大街嚓嚓走过，没有穿皮夹克的卫队长，一边用梳子刮着头发，一边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说：“先生们，你们的工作结束了，从现在，直到永远。”重庆市的政权机构：市委和市人委及下属部门事实上早就瘫痪。重庆夺权，无非按照中央意图履行某种手续而已，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和值得让人记忆的精彩情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邹昌义,四川美术学院聘来的战报美编告诉我说，他们学院那一帮前卫派小子对参加夺权这一历史时刻非常珍惜，在顺利收缴了各种印章后，均站在市委机关宽大的办公桌前，模仿宣传画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流行动作，左手握毛语录本以胸护，右手则作天王托塔状，举印章一枚，逐一拍照留念。当时满街都是鼓动夺权的宣传画，画上代表政权的印章 都硕大如斗，而市委的印直径只有３６毫米，举在手上一定是很滑稽的。

社会上当然是连日连夜的游行欢呼。而以重大８１５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在设于重庆少年宫的总部二楼忙于分配权力。社论发表次日，便紧急召集大派各种组织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部署，虽然当时，学生，尤其是重大８１５事实上控制着重庆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从理论上却必须就以工农兵为主体对夺权行动作出安排和解释，因此应邀参会的组织确实包括了工、农、商等各种行业的代表,如工人（二七战团）、农民（红农８１５）、商业（财贸８１５）等，以免授人以柄。次日，学生代表们在同一地点继续开会部署配合与分工。这两次会议后来被反对派称为重大８１５分封诸侯的会议。

对于学生造反派一哄而起的夺权行动，毛肯定是不放心的。夺权号召发布的第二天，即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马上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

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了毛的指示，称："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解放军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称："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重庆驻军负责人闻风而动，韦统泰军长、谢家详政委及蓝亦农、刘润泉、唐兴盛等高级将校，迅速召见重大８１５勤务组周家喻、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熊代富、查正理等十余人。韦军长明确称重大８１５战斗团是"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并要周等主动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夺取重庆市的权，同时，军队还向其推荐了财贸系统造反派头头王绍川、军工系统阳增泰，以及革命干部段大明、及重大８１５造反在第一时间就想打倒的"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辛易之等。三天后，２６日，重庆地区七所军事院校学生示威游行，１６辆军车在山城街头隆隆驶过，年轻军人一路高呼："８１５好得很!""坚决支持８１５的革命行动!"再一日，军事院校学生在大田弯集会，重申立场。再一日，驻军２０００名指战员武装示威，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及其夺权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夺取天下的。毛让军队正式出面干预，这就确认了事实的合法性。"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迅速组成了，正式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２９日，重庆３０余万八一五派在市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会上，原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全部揪到会场批斗，按惯例，一律高帽、黑牌、"喷气式"全套侍侯，而后游街示众。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将老头子老太太一律反剪双臂，以手压顶，做"牛不饮水强摁头"之状。帮助回忆这次大会的"关键词"是，我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当晚，已经睡着了，突然有人敲门，接着用汽车将我接去了《重庆日报》。总编室一个女士给我交代任务，要我马上写一篇欢呼文章连夜发稿。该女士戴着一副优雅的眼镜，说话轻言细语，很有学者风度的。我早就听说过她，报社的名记者，叫沈世鸣。当时我的写作状态一定极佳，在旁边胡乱检一张桌子坐下，稀里哗啦便一气呵成，自觉有点"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感觉，很得意。文章题目十分落套："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署名"红锋"，文题和名字现在听来都十分恶心。很有风度的女编辑表情平静地看过我的文章，很快通过了：她好像心事重重。后来才知道她不久就参加了对立派：这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在重大８１５，或者以重大８１５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导下进行的。重大８１５的影响力和权威不是谁封的，而是几个月文革动乱造就的一个事实，以至于支左驻军首先接见他们，与他们取得共识。这无疑就大大加重了他的份量。我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并且和上层成员保持着特殊关系，客观地说，和追求浪漫、自由、创造，非常情绪化的文科学生相比，专事工科的重大８１５学生更多理性、实际、固执和秩序感。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当初，如果重庆市委不那么急于把他们的校长置于死地，重庆文革的最先发难者，很可能就不会是重大，也不会在8月15日了。他们造市委的反，皆因工作组伤害了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党的化身：对同学一贯客客气气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工作组所作所为使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不能不反了。人家骂他们"右倾、保守"，甚至骂他们"保皇起家"，坦率地讲,此话有理。问题是历史偏偏把８１５推到了那个位置，而且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秉性恰恰和军队领导的胃口非常对路，自然一拍即合。对此，西师８３１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要耍点娃娃脾气。２４日下午一时，根据２２、２３日会议的决定，主持对市委机关夺权的重大８１５如期赶到，而主持人委方面夺权的西师８３１却迟迟不按期就位，最后就根本没有来。召集人缺席，只好由其他单位将收缴的印鉴、钥匙、文档等封存待处。

政治斗争中，耍娃娃脾气，患点“政治感冒”之类的“小病”以搁摊子，有时候当然不失为一种要挟对手的手段，袁世凯不是谎称“脚疾”，和急于要他出山的清王朝讨价还价吗；文革后期，因为不满某种政局而“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老干部，不是大有人在吗。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方能待价而沽。对立派实力的黄瓜刚刚起蒂，嫩着呢，你要娃娃脾气有什么用呢？权利的诱惑大得很，你不干，反正有人干。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地球照样转动。眼见得新政权已经成立在即，反对派才感到必须采取实质性行动了。下面这则几十年前的消息出自《山城战报》第二期文章：“二月黑风从何而来”。文章说：

“元月２６日，罗（广斌）请一司、三司、西师八三一、‘徐派’等等各组织在罗家密谈，声称：‘我们搞不起大联合，就先搞小联合’”。

消息的真实性现在已无法考证，而下面的情况当是确信无疑：２９日的“革联会”筹备大会的召开，已经把他们逼到绝境，必须行动了。第二天，３０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４０余造反组织在人民路小学正式集会，成立反革联组织“联络站”（全名已不详），会议联名向中央发出“加急电”。现在我已找不到该电文的原稿，据２月９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重庆版创刊号载，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一月二十四日，以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的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为了使这种非法接管合法化，他们于一月二十六日拼凑了一个‘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筹备处’，这个处的周家喻等结党营私，拉拢一批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排斥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拉拢一些追随右倾路线的外地学生，排斥与之作斗争的来渝串连革命师生。一月二十九日这个誓师大会发表的紧急通告，竟宣布由大会主席团组成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由周家喻等一手炮制的、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根本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联络总站，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这一系列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窃据的各种大权名亡实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因广斌同志姓“罗”而工人造反兵团司令叫黄廉，故该组织被８１５戏称为“廉罗栈”。和会议配合的是，西师８３１等组织同时开始诉诸舆论，提出了“革联会是大杂烩”、“踢开重大８１５，自己闹革命”诸观点，甚至极不理智地大骂革联会是“枪口下的大联合”，当时学生政治智慧之稚嫩，可见一斑。当然，口号的中心是：“砸烂革联会”。因为此，反对派就有了意思不太雅但音节十分响亮的名字：“砸派”。因意思不太雅，几个月后，刘结挺到重庆视察，这才亲自给取了个新名字，叫：“反到底”。这是后话。

“砸派”联络站的成立会尚未结束，２月１日，便已有与会者到重庆大学告密。81５马上还以颜色。我记得时间是中午，总团团部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起草一份东西，揭露对方的阴谋。紧接着全团动员,地点还是在松林坡礼堂。那一天会场的气氛是十分激愤的。现在我已找不到该文文本，反正我记得我写得很快，也有点“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感觉。文章在

大会上一读，顿时群起应合：通过。接着印发各战斗组抄写成大字报若干，几千人即刻出动，一个下午，便将全市七区三县的大街小巷全部覆盖。

事情已经十分明显，考虑到罗广斌在砸派内部的特殊影响，８１５擒贼必先擒王。谁叫他当初要从渣滓洞里逃跑出来呢？现成一个称谓就足以让你泰山压顶：“叛徒”。更何况他还在文艺部门混迹日久：文艺部门本来就是毛最不放心、最想打理的角落。１月３１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首先散发传单并张贴大字报，明确定义：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２月２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发出“通令”：抓捕罗广斌。派网恢恢，疏而不漏。砸派的力量实在太小了。自顾不暇呢，谁还能保得住本身就有软肋的罗呢？２月５日，重庆建工学院８１５派的红卫兵，轻而易举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架，抓走了。

精神领袖被抓，小兄弟更是进退维谷。参与联络站的组织于是三三两两，悄然退出，只是砸派的始作俑者是无法退的。2月６日，西师８３１和重大８１５分别代表砸派和革联派在解放碑举行规模浩大的辩论会：当着全市老百姓的面，这大约是两派主要首领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的平等较量——以后的较量完全就凭借暴力，甚至枪炮了——革联派主辩为重庆大学周家喻、秦安全、熊代富，砸派方主辩为西师周荣及其他成员。其日春雨霏霏,寒意犹浓，而解放碑四周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气氛空前火爆，连楼房上都全是人头攒动。客观地说，作为文科高材生，周荣是极具辩才的，但在工科学生逻辑严谨、不紧不慢的对抗面前，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主席台下四条大街一直阒无人语，所有人都神色专注屏息静听。辩论至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便陆续挂出大标语：“砸派毫无道理!”“革联会好得很!”“８１５好得很!”继而听众开始向砸派辩手起哄，这类辩论是不需要评论员和仲裁人的，听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宣布大会以革联派大获全胜而告终。文革中重大８１５有个专业的辩论组，番号为“１０１部队”。组长叫柴天祺，动力系五年级学生，１９７６年死于唐山大地震。在学校时也参加业余文工团，在合唱队唱歌。他的歌喉实在很一般，不料文化大革命却让他的口才大露头角。他曾经告诉我一个诀窍，说辩论成败，很重要是事前要组织好听众，一定要让同一派的听众坐前面，辩论过程中要不停给对方辩手提问题、递条子、甚至起哄，千方百计扰乱对方思路，破坏对方情绪。柴天祺甚至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天他和首都三司一位女辩手辩论，题目自然是关于以周家喻为首的重大８１５右倾诸问题。辩论中该女辩手模仿毛泽东一贯的口气，说一句气吞山河的话：“周家喻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由于被台下精心组织的听众搅昏了头，该女士一急，把“老虎”二字说漏了，上面的话就成了：“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柴天祺马上提醒女辩手，说：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一阵大笑顿时把北京人哄下了讲台。2月６日解放碑的大辩论，学生们好像还没有掌握这种诀窍。我是以一个 听众身份站在台下的，我以为那天的气氛挺正常。

下面的事件就如流水下滩一样顺理成章了：

２月８日，“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２月１１日，革联派宣布市文联三个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２月１２日，在大田弯体育场举行革联会成立大会，欢呼“新山城”的诞生。砸派到场造反未遂，当晚，又到《重庆日报》社抄砸大会报导铅版。毕竟“新生红色政权”已经建立，社会需要秩序了，再由不得你胡闹了。革联会早在２月８日已发布《公告》，正式宣称已成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公告》第四条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公安机关以砸坏有毛泽东照片的铅版为由，抓捕了８３１为首人员。军队旋即开入报社实施警卫。

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被革联会一派抄砸。

接下来，１４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驻重庆大学分点、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等，被革联派抄砸……

一切都似乎已成定局。被囚禁在马家堡某军事院校的罗广斌深感大势已去，遂于１０日早上八时许坠楼自尽。他是从三楼的窗口跳下来的。离地距离为１０７３厘米。头先触地，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器人被砸开的头壳，碎脑荦荦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谔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头颅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据笔者保存的资料，现将整个过程的介绍照录 如下：

“从二月五日叛徒罗广斌被抓到畏罪自杀，一直由建院八一八等革命组织的三位战士看守”，“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便，看守人员张ＸＸ（建院八一八战士）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事后曾被两派、尤其是替他打抱不平的砸派炒得沸沸扬扬。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３月１５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５０军、５４军领导的会议上，才由口含天宪的江青一锤定音，曰：“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两派从此哑然，谁都不想在已由主席夫人拍板钉钉的事情上浪费口舌。一代才子罗广斌，只能悄没声儿地成为了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道祭品。重庆的文化革命，从１９６６年夏天开始，吵吵嚷嚷闹过许多回惨案：“八二八”，被市委渲染得天昏地黑,没有死人；一二四，被造反派，包括罗广斌本人，渲染得天昏地黑，也没有死人。到了夺权，一切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却死人了。正是曾为莫须有的文革烈士大喊大叫的罗广斌自己，成了造反派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太性急了。连扑向死神的怀抱也那么急急匆匆。

上面提到的照片，共十五张，除了关于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外，还有这样两张图片和说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猜测罗殉难前的悲楚和犹豫。图片十四：“二月九日（自杀的头一天），罗就在语录本内的一张照片（‘渣滓洞监狱’）的背面留下了遗言’这本毛主席语录和这张照片是胡蜀兴（笔者注：胡为罗广斌夫人）的’”。还有图十五：“叛徒罗广斌进厕所时，把围巾、呢帽、华达呢皮袄一件挂在厕所内。皮袄内有手表、钱、粮、毛主席语录本、照片等物。叛徒罗广斌把名贵的皮袄（貂皮领）、手表、照片等物留下来，正是他自杀前的准备”。

这份资料我是因一个偶然的原因保存下来的：１９６７年６月，重大８１５战斗团为了反击砸派的攻击，在我们印刷厂印了一份对开大小的宣传材料。前面提到的照片和相应的说明文字，就是印在那上面的。纸质不错，数量却很多，没发完，一直就堆在角落里。到冬天了，闲来无事，我想钉一个本子抄些二胡曲谱，就去检来一摞，裁成８开大小，订了一大本。几十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才忽然想起这本乐谱，于是翻出来，拆开：那些可怕的镜头于是重又由几十年前跳到我的面前。而照片的背后，全是我手抄的、年青时候最钟爱的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山村变了样》、《三门峡畅想曲》、《金珠玛米赞》……，将这张纸页的两面对照检看，我觉得真是对那个年代绝好的嘲讽。

他一生向往革命，为此不惜背弃优裕的权贵家庭。国民党把他投进黑牢，共产党却对他并不宽容。他曾用横溢的文学才华抗争，成功了，是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但没有丝毫改变尴尬的处境。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他想重登彼岸，却被一脚踹进了没顶的惊涛骇浪。他是一只扑灯蛾。他一次一次扑向光明，最后却被无情的火焰整个儿烧毁：这就是罗广斌的故事。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不是的。而是：我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化革命的悲剧性逻辑。

九•复刊：一场虚惊

《８１５战报》自１月２７日休刊仅仅２０天，很快就复刊了。

重大８１５对于来自北京的“钦差”首都三司、及其在重庆的小兄弟西师 83１之流，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他们有理由藐视他们。道理很简单，“重大８１５战斗团”８月２６日一开张人马就好几千，你首都三司当时还在哪儿？三司的灵魂“清华井冈山红卫兵”，９月２４日成立时候不过和样板戏“沙家浜”上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一样，不过“十几人,七、八条枪”。等到“井冈山兵团”拼凑成立，已经时至岁末：１２月１９日，这时候的重大８１５早已名满天下，老奸巨滑的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保皇派早已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只是，重大８１５的好汉们压根儿就不懂，从首都窜来的混小子们，他们所作所言不管混帐不混帐，背后都是中央有人指使、或者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或者，至少算得最高层斗争的晴雨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一天，１２月１８日，炙手可热的张春桥便在中南海约见蒯大富面授机宜，一周后，２５日，清华大学有名的“１２．２５行动”便腾腾出笼。这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无非一个形式，无非几千人轻轻松松开进北京城溜哒一番，不打架，不受罪、更不死人，其壮美、其惨烈、其可歌可泣，简直就无法和重庆的８．２８惨案、９．３绝食徒步上京、１２．４体育场万人武斗同日而语，可人家一下子就能在全国大红大紫，成为最高层的嫡系和乖宝宝。８１５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北京高层斗争的一块垫脚石。天子身边的后生仔，傲慢是傲慢，你可以瞧不起他，但你却决不可对他怠慢。谁叫你要参加政治游戏呢？政治游戏就要懂得对比你有权势的人察言观色，就要学会台上握手，台下使拐子。在这个没

有诚实可言游戏圈里，重大８１５的学生是一帮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只会把情绪立即转化为行动。因次他们的活动，哪怕自以为十分神圣、甚至非常悲壮，却往往容易疏离于上层斗争的大背景。历史都是由大人物们书写的，特别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最后乾脆把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人或者几人的国家，离开上层背景，你的政治行为最多只能是就事论事，无法进入主流，甚至只能进入误区。这正是８１５ ，以及许多地方造反派的悲哀。

重庆８１５派１月２４日顺利夺权，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应该说是大功告成了。什么是政权？按照林彪在著名的５１８讲话中的“习惯语言”，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既然８１５已经拥有了“最高”的“镇压之权”，报纸的作用应该说就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了。但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八月份那会儿，重庆市委不也拥有绝对的镇压之权吗，重大８１５照反不误。年轻人，尤其读了点儿书的年轻人，捣起乱来从来认死理，更何况他们确信拥有最高权威在后台撑腰。革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刚出襁褓、弱不禁风。这一点，重大８１５的忧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于是便有了停刊 20 天马上又复刊一事。

复刊号在“告读者”中说了两件事情，一是：“从《８１５战报》休刊以来，某些人利用报纸这一阵地，歪曲事实，借题发挥，向重大八一五和‘革联会’发起进攻。他们这样作，严重地破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运动的大方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应广大工农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报决定从本期起暂行复刊。”我查看了我的日记，复刊决定是１５日作出的，离革联会成立仅过三天。虽然罗广斌已于１０日自杀，砸派的几次行动都已经受挫，但其捣乱活动从来就没停止过。即使“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如此庄重的事情——就是我那篇题目挺恶心的文章“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大歌大颂的那次大会，他们也捣乱，问题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关于那次捣乱的情况，这儿还是引用侯念平同学的日记加以说明：“２月 12 日。今日全市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欢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宣告新山城诞生。但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策划、操纵下，造反军、西师８３１等，借大反重大８１５右倾为名，妄想破坏革联会，他们昨日晚冲进了大田湾会场，赶走了守卫的解放军，几千人占住了主席台，破坏我们的会场布置，撕毁标语……。我们团担任会场服务，我们到时，气氛很不对，有一些人动摇了，问我们会还开不开，我们坚定地宣布，会一定要开，而且要开好！在红号兵带动下，我们冲上了主席台。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奋勇向上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我们冲上去了，红旗插上去了，在一片欢呼声和歌声中我们冲上了主席台，经过艰苦的斗争冲进了广播室，抓住了打人的几个凶手。我们胜利了，大会顺利召开了，阻力排除了。这对那些妄想搞垮革联会的混蛋们是多么沉重的一棒啊 ！”砸派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81５不可掉以轻心了。

那一期报纸，基本上就没有咒骂走资派和保守派的东西了。除了第四版，其余三个版面全都是一哄而上、批判砸派的文章。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那首臭骂帝、修、反的著名诗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接下来就是装腔作势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接下来是“树立革联会的革命权威”、“紧紧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接下来，第三版整版，刊登了２月６日辩论会上周家喻的发言全文：“铁的事实，不容歪曲”。周的发言就事论事，介绍了许多夺权前后的内幕情况，编辑部文章则耸人听闻地宣称：“无产阶级要夺权，资产阶级要反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焦点，也就是当前这场内战的实质。”文章很轻松地栽赃“走资派”，说“资产阶级老爷”原来“是拼揍一些保皇组织，操纵这些保守派的群众去斗造反派的群众。而到了今天，在保皇组织纷纷垮台、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这些老爷为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苟延残喘，保

护自己过关，他们便采用更阴险、更狡猾的手段，纠集一些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利用革命队伍中的个人野心家欺骗一些‘热情高涨’的群众，挑起造反派群众斗造反派群众……我们必须透过造反派打内战这个现象，看到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的实质。我们也必须透过这场内战中大量的内部矛盾这个现象，看到我们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敌我矛盾的实质”说句公道话，那当儿当权派们一个个早被搞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去幕后指挥？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只不过已经成了代表邪恶的政治标签，只用往谁身上轻轻一贴，这厮就必死无疑了。正如几个月前“血统论”大行其道，只要说你爹你妈七大姑八大姨祖宗八代有何种红疤黑迹，你立马就成“狗崽子”，只能乖乖地让革干革军的贵族崽崽来砸烂狗头打你个七窍流血遍体鳞伤。

这个复刊号的“告读者”还有第二个内容，说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认为，第一期选用《‘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在１２４血案控诉大会上的发言》一文不当,特此声明该文作废。”我已经想不起我们怎么会耍起这种纯属无赖的政客作风的。有趣的是，与此相对应，西师８３１不久被打成反革命，作为当初造反的战友，重大８１５为其喊冤叫屈做了非常真诚的抗争，可四月初，等到平反复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二连三发表“严正声明”。第一天的声明说：重大８１５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８１５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８１５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第二天的声明就开始改口：我团原来发表的声明，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律作废；第三天的声明就直截了当了：重大８１５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事求是地说，当初对８３１镇压，我个人心里一直很感不平的，因此看见这些朝秦暮楚的无赖声明，我气愤已极。现在两相对照，我又有什么值得愤愤呢？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一来一往，双方算是扯平了。

也就在发完复刊号稿子的那天黄昏，吴庆举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编辑部来找我。该同学叫何国光，电机系五年级同学，瘦高个儿，生性耿介而善良。大学时酷爱文学。而今退休还家，成了重庆地区小有名气的集邮专家。文革那会儿,我离开战报期间他曾任过主编。而吴庆举，前面说了，是８１５的理论家，他俩一起来，肯定是关于写文章的事。果然，吴递给我一篇文章，信签纸写的，密密麻麻，好一大摞，算是大块文章了。造反派的文章后来都越写越长，大约受中共大骂苏共的所谓“九评”影响，于是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好像掌握真理的多寡和文章的长短成线性比例关系，越长则越革命，越有理论色彩。吴说这篇文章他和何推敲了三天。松林坡礼堂马上要开辩论会。他显然想把这篇文章拿到会上一炮再红，一如当初他的“走一二九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样。但现在，恰恰是文章的长度让我深感不安。我说，这种场合，最主要的，是需要煽动。这么长,大家接受吗？我说他的观点是不错的，但文章要改已经不可能，必须大动。既然时间来不及，我就建议先拿去会上听听反映。松林坡离报社很近，二人满怀侥幸又忧心忡忡地去了。

说吴庆举是８１５的思想家，也仅相对而言,他的思想充其量属于一种事务型的东西。仅仅只是个主意，而不是“主义”。在整个８１５战斗团，我一直以写大字报和编辑报纸出名，算是舆论界人士了，我也绝没有任何思想，只算应声虫。我的所想、所写、所行、所为，完全都是在所谓“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里蹦哒。红卫兵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孙猴子”，算是不幸言中了。算你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最后还得收入如来佛的手心。文革自由带给我们的，无非是展现个人才干的机会感，以及社会认同所带来虚荣。要让年轻人得到满足，这些当然绰绰有余了。其实，吴文章的观点和刚刚发排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大同小异，可等他和何国光走去松林坡，我莫名其妙就激动，平静不下，甚至有些颠狂，大约我确信他的大块文章注定要被枪毙，而很可能我马上会有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他们刚出门，我立刻

伏案动笔，一口气写了二、三千字。刚完，吴和何果然灰溜溜回来了，一脸苦笑，告我说刚开始就给哄下了台。我于是很得意了，我告诉他们新文章已经写好：一读，二人齐声说行！事不宜迟，马上又去。这次是我上阵了，走上台，我才说："刚才，吴庆举的文章大家有意见，改了一下"，礼堂马上哄成一片，要我滚下台，我忙又讨好解释，说这是重写的，是另外一篇，听众们这才稍事安静。我把题目刚刚一念，大家果然镇住了。接着就是三个咄咄逼人的排比段："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牛鬼蛇神，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个人野心家，不是别人，"正是——当然就是首都三司、西师８３１、川大８２６之流了，文章念到："他们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时代，躲在个人主义的蜗壳里气都不敢吭一声，现在，革命快要胜利了，他们于是跃跃然蹦出'峨眉山'，摘桃子来了，"话犹未了，全场哗然鼓起掌来。骂过之后，很快来了一段诚恳至极的自谦之词："重大八一五有没有缺点错误？有。可不可以批判？完全可以，非但可以，而且热烈欢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更不是什么'老虎'……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永远作劳动人民的儿子，永远作革命人民的小学生。我们愿化为革命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子，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的脊背上滚滚地通过！"此时，完全就掌声雷动了，继续念完，掌声经久不息。

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８１５战报》第十期的编辑部文章："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永远当革命人民的小学生"。该文和前一期的编辑部文章相比，没有任何新内容，无非更加煽情而已。笔者叙述上面这一情节，绝无半点自我炫耀的意思。没有。主张精英政治的古代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风急浪大的海上，每一阵演说的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航道。这种民主政治的结局就是专制和独裁。"（第５６５节）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就有点这种情况,表面上，任何重大问题都会上辩论，实际的结果是：缺乏理性者越发没有理性，当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自觉地去求助和服从于某一个保护人；有理性者，从中却稔熟了阴谋诡计和政客作风，甚至名正言顺地充当起了这样的保护人。学生们应该说是很单纯的，包括工人的绝大部份也是很单纯的，而一旦进入了政治圈子，情况总会发生变化。虽然我也是当初的造反派，我从来不否认，文革环境带给的权利诱惑和虚荣心,确让一些人堕落。

复刊后的第二期报纸，几乎也全是一哄而起的论辩文章。无非砸派如何如何的不是。除了一版的《我们》一文外，其他文章有："就《首都红卫兵报》造谣攻击我山城革命造反派一事，我《８１５战报》发表严正声明"，以及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标题下、且加了编者按而转载的《首都红卫兵》报的三篇文章，还有"革联会必胜"，还有"廉罗站丑态百出，分裂会呜呼哀哉"等消息。

现在看来，"简讯"栏目中的两则小消息其实是非常要命的。一条是：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一封信，指出："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份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并严重警告川大八二六：'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不知此时，川大八二六的难兄难弟西师八三一和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作何感想？"另一条是："二月十九日，'左'得可爱的川大八二六，全团辩论结束后，确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这两条消息，明确证实文革期间著名的四川"二月镇反"已经开始,从此，巴蜀大地一片腥风血雨，几十万人被投入冤狱。虽然重大８１５在重庆正春风得意,但在成都以及各专县串联的同学却纷纷落网。在行政区划当时尚属于四川省的重庆，与川大八二六结为同盟的西师八三一一伙，当然在劫难逃。他们此后一段时间的蹦哒呼号，注定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

看来他们真的要完了。

《８１５战报》迫不及待的复刊，只是一场虚惊。到了３月３日出版的第十一期，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几乎和《人民日报》一样，通版全是大好形势，全是莺歌燕舞了。第一版是“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其余几版也都是些什么“关于全团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坚决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砸烂私字，树立公字”等等。看来“革命”是有点成功的意思了。

２月２５日出版的战报第十期还有一则消息需要补充一提，这就是，批判所谓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２月１９日是个高潮。这一天，正式以重庆市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的名义召开了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西南局文革小组刘文珍及重庆市委领导鲁大东、廖苏华诸人陪绑。他们一律被年轻人以手摁顶，反剪双手、弯腰、低头，挂黑牌。会后，以毛泽东笑容可掬的大幅画像为前导，驻军部队武装开道，将李一行押解游街示众。

批斗大会的地点是珊瑚坝。珊瑚坝是长江的一个江心岛，水枯时节便和江岸连在了一起。坝中一直保留着抗战时修成的飞机跑道，足见该岛是相当大的。消息称参加批斗会的人数达６０万，估计不会有太多水份，因为笔者当时在场：江风浩荡，人头涌动，红旗乱舞，其情其景确很壮观的。消息称：“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和迫害的山城广大革命造反派，早就对李井泉恨之入骨，直欲将这个土皇帝千刀万剐而后快。”故而“砸烂李井泉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口号在长江河谷萧萧风雾间喊得震天价响。报纸的印刷质量不行，且年深日久，但从第三版五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仍能感受出批斗现场的气氛，尤其李井泉那张大特写。李的面部很不清楚了，只看见被一只大手死死摁下的头，和微微张开的嘴。头发好像掉光了，显得苍苍老迈,尤其那张嘴，分明痛苦地向前凸着，吃力地咻咻喘气。看见这幅照片，说实在的，我有些同情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老人。我真正对他憎恨并且不想再原谅他，是在后来。１９６８年，我看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明朗的一份揭发材料，说自古富饶的四川大地饥哀满地、饿殍盈野的１９６０年,李还强令农村实行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民可怜的的救命粮送去北京请功。一次会议上，李甚至杀气腾腾地说：你们说四川饿死人好？还是北京饿死人好？我看四川饿死人好。这份揭发材料很自然勾起了我对那个长达三年之久的漉漉饥饿的刻骨回忆。记得６１年刚进大学,同学们饿得夜夜无法入睡，寒卧床塌，大家最喜欢梦想的就是吃一顿回锅肉，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你吃过的最糟糕的食品是什么？”我这个城里孩子算是幸运了，最多只吃过榆树叶，吃后三天没有拉出大便。其他的农村同学则全如神农尝百草，树皮、草根、土茯苓、芭蕉根、干猪草，死老鼠……什么都吃。包括神农氏绝对没有为人类尝过的食品：观音土。只是吃了以后，必需用竹棍子到屁股眼儿去一点点把大便抠出来。几十年后，有关的历史记录当然已经很多，而当初明朗的揭发的确格外撼人心魄。近读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其文有载，说当时“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１９６０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８３年，我到四川南充市参加一个笔会。市委领导曾举办酒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我和一位市委老干部邻座，席间，我突然想起该市不正是文革前李井泉长期蹲的点吗？老干部回答说是的。该老干部文革时也是受过冲击的。出于礼貌，我说，李井泉在文革中搞得也够惨了，老婆萧里上吊，儿子李黎风、李明清被打死，算是家破人亡了。不料老干部很肯定地打断我，说：你只看见他家破人亡，你不知道在四川，他把多少人搞得家破人亡！

下面是我１９６７年3月1日的日记：

“春天来到了嘉陵江。

“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在那淡淡的蓝雾里，山格外秀丽，路格外明亮，而那一片片洁白的沙滩中间，瓦蓝瓦蓝的江水托着一只一只的木船，慢慢地流向远方。江边，树在发芽,鸟在喧噪……

“经过一个冬天风寒考验的山城，在春天，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我们的战斗，不也这样么？”

３月６日：

“下午，原准备去参加段大明的检讨会，去晚了，都散会了，一个人跑进大礼堂转了一圈。这是我到山城五年多来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

“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的宫殿般的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了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正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之后，弹痕斑驳，满地狼籍。这时候，我自己不也在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和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我非常高兴。我沿高高的石梯奔跑，我真想迎着满城的东风豪迈地歌唱：‘我们献身过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这些日记，现在读来，觉得自己整个儿就是一个傻鳖！

其实，说什么大好形势呢？说什么暗藏杀机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些偏居西南一隅的娃娃们的功劳或者过错，而仅仅是８１５感觉最迟钝的中央高层斗争的投影而已。

十·北京的“二月抗争”和四川镇反

１９６７年2月，发生在北京最震撼的事件，当算几个老帅和老将军大闹怀仁堂。此事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而文革后被改称为“二月抗争”。

关于这件事具体情况，老百姓是在一年多以后，即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大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方才知道。我记得是由工军宣队大队长在风雨球场传达的。其时，大学生们对于文革甚而至于对于政治都已心灰意懒。姓戴的大队长对着笔记本照本宣科地告诉大家，说１９６７年2月１６日，有人大闹怀仁堂。某某某如何如何，某某某又如何如何,某某某大拍

桌子，以至拍断了手骨，云云。传达中，只有谭震林是直呼其名了，而且谭对党进攻火色最足，说他一不该革命，二不该入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四不该活到六十四岁。说他跟毛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不跟了。说罢拿起皮包拂袖而去。接着是某某叫嚷：“不要走！留在这里跟他们干！”传达完毕，我的印象就是一堆不知所云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算过，老帅中除了朱德和陈毅的姓名数是两个字，其余都是三个，而朱德显然是不管这些闲事的，因此，除了晓得哪几句话是陈老总所言，晓得有人敢于和毛公然唱对台戏，剩下的某某某就都莫名其妙了。几十年后，以上这些内情当然都已经不再是秘密。根据文革后公开的材料，兹将该事件补略如下：

１９６７年2月１６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的日程是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回答，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就这一下，结蓄几个月的矛盾便一下子开了锅。谭震林雷鸣电闪，打断他：“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还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当时的中央当红左派谢富治在一旁插话劝解，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毫不赏脸，一气喷出：“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身拿文件，穿了衣服便要退出会场，称：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谭的无理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断然一拍桌子，让他回来。此时，陈毅，即传达中的“某某”说:

“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某某”还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会场上一个个都肝火甚旺，一个个都喜欢拍桌子。资料说，余秋里也是拍着桌子发言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还是想充当和事佬，不断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马上打断：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动了真感情，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些话，如果没有必要在个别地方挑剔，仅就其气魄、其胆识、其抗争精神、其威勇,真算

得铁骨铮铮，义薄云天。几十年后重新读来，犹让人沧然涕下。笔者于是想起前些年读过的李锐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一声怨怒，开国元勋们便诚惶诚恐地跟着一哄而上，愤怒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那会场气氛之荒唐，发言水平之低下，让普通读者都谔然难解，只能让我想起１９６５年在川北山区参加农民批斗“四不清”生产队长的混乱和可笑。于是我想，“大闹怀仁堂”的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如果他们的勇气能放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岂不我黎民幸甚！中华幸甚！历史幸甚！

不能否认，在军方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毛是作过暂时让步的。史载,“大闹怀仁堂”前十多天的１月２６日京西宾馆会议，老帅老将就已经有类似表现，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显然对造反派大不利的，毛泽东却在当天马上批 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八条”开宗明义就宣布：“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对于刚刚介入地方工作，被某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搞得不知所措的军人来说，这不啻是一柄所向无敌的尚方宝剑。在怀仁堂事件第二天便发生了所谓“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２１７信件”——后来有说法称该信件是成都军区“韦杰、甘渭汉之流”所伪造——但从逻辑上讲，说它确系中央军委真迹，无论如何是合理的。信件毫不客气地警告正在成都军区门前包围已达六天七夜的兵团和八二六群众，称：“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种只可能出现在交战国之间、或者两个对立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威胁性语言，对于从来高屋建瓴的中央领导，确实有点不太相称。信件是以电报形式发来的，时间已近午夜，成都头顶阴霾蔽空。军区参谋某人拿着电文来到军营门口，向目无王法的造反派们严正进行了宣读，而后扬长而去。其时，虽然示威者们“鸭子死了嘴壳硬”，围在那儿，不依不饶地继续大喊大叫，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威胁军人“镇压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但有机灵者，包括一些威武不屈的头头,已经暗中溜之乎也。中国的权力当局有时候说话是很算数的，一旦动起真格来，嘴巴再硬的家伙也绝对怵着三分。事实上，在宣读信件的同时，整个成都已在调兵遣将，独立师的子弟兵们已将所有路口围困得铁桶一般。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军区子弟，上大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其时正随该校声名显赫的“东方红”驻成都机构“红色堡垒”成员一起参与静坐，形势不妙，率先跟学院的宣传车撤了。老伯母是个军医，惊吓连连地要儿子速速逃离军区大院。其时，所有路口已封，他不敢坐车，徒步出城，夤夜翻过了冬寒犹紧的龙泉驿山脊。后来知道，没撤的人全部落网候审。

面对军人铁腕，川大８２６的造反秀才们除了投降，还能做什么呢？下面的情况，是从当时成都一份叫《８３１战报》上摘抄的。这份小报是８２６的对立派办的，但披露的事实经过证实，无大出入。我抄下它，是想说明六十年代的真诚追随革命的大学生是多么可怜、可悲！如今读来，犹让人想替他们痛哭一场：

“２１７信件下达以后，八二六到处写巨幅标语：‘２１７信件是党和毛主席对八二六战士的最大关怀！’、‘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等等；

“２月１９日下午，中文系分团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到军区门口请罪；

“２月２０日上午，八二六勤务组发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２月２１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上街请罪。他们到人民南路（即现在的天府广场——笔者

注），一声口令，全体下跪，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

……”

这封信件同时印成传单无数，由空军驾机在全川散发。传单凌空飘飞，如乱雪之骤至,锋锐凌厉的“四川镇反运动”顷刻间如黑云压城，寒流急卷，横扫了整个蜀中大地。据有关资料介绍，短短十余天，全省逮捕“人犯”已达十万。

重大８１５赴蓉联络站主任、就是后来险些儿当上广东平石矿务局长又因母校一封公函而把党籍彻底搞掉的郑全体，以及其余同学多人被抓，关押于成都太慈寺。其时拘犯太多，许多临时拘留所均人满为患。重大８１５在川内各专、县串联的学生也多有被抓捕、捆绑、刑讯者。资料介绍，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２３７人，刑事拘留７４６人。２２日，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还是回到重庆。

如果说四川省的“二月镇反”是以军人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的一次大规模报复，那末，公正地说，重庆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以重庆大学为首的８１５派，确实是名正言顺的主流造反派，而重庆的驻军５４军确实是真心实意支持他们的。西师８３１、交院９１５，还有工人造反军，这些组织当然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支流，就人数、名气和资历（中国人很喜欢讲资历）而言，他们和８１５还远不在一个档次上。既然８１５，进而重庆的驻军如此稳健地控制着局势，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就没有必要了。这儿是说“大规模”。因为反对派不多，镇压起来简简单单，而且常常压根儿就不需要荷枪实弹的大兵出面，来点８１５的群众,让他们自己去斗斗就够了。他们互相间不是已经仇恨得咬牙切齿、像乌眼鸡一般吗？重庆的镇反规模大不起来。

下面是具体情况：

２月２０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再次遭到８１５派砸抄，三司人员上街做毫无实际意义的游行以示抗议；

２１日，“联络站”被８１５派砸抄；

２２日，重大八一五及沙坪坝区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及工人造反派，出动宣传车及卡车２０多辆，满载人员前往北碚大闹西师校园，搞所谓“会战西师”。８３１战斗纵队被迫“开门整风”；

２３日晚，革联会组织人员砸抄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２４日，革联会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镇反领

导小组及“打鬼队”专事抓捕“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从二月末到三月初，西师８３１、交院９１５等砸派组织还有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无非让老百姓感觉他们的过份和革联会的宽容，同时为革联会最终翦除他们提供一些借口而已。一次是２月２７日下午，革联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很滑稽的斗争鲁大东、解放辛易之的大会（关于这次大会，笔者下面还另有记述），西师８３１、交院９１５等以对大会造反为由同时进城示威。革联会早有布防，令军队对上清寺一带戒严，游行队伍被拦截于嘉陵江大桥至上清寺达两个小时不得动弹。再一次是３月８日，联络站及北京南下红卫兵数千人以纪念《十六条》发表８个月为由举行游行，同样在嘉陵江桥一带便遭遇８１５派的阻截，出面的是８１５的中坚：六中３２１１１战斗团及八一兵团，两方冲突至深夜乃止。其实，砸派当时已气数将尽。前一天，即３月７日晚，８３１头目周荣从北京返渝，见势不妙，正打算安排全纵队分散撤离回家暂避，不料事犹未行，旋即被８３１中分裂出的“春雷”战斗兵团造反。北碚区驻军继而宣布西师八三一为“右派组织”，勒令解散。３月８日晚上，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四川外语学院“星火燎原”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在网球场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八三一战斗纵队头目周荣、羊衍海、周德英、岳朝亮等７人被拘捕。

３月９日　驻军对后字２４２部队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头头及骨干３０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 29 人。

３月１０日　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头头８人被拘捕。

３月１１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份。随着联络站所属个组织纷纷落马，大街小巷，到处一派请罪声。偌大山城，除了“革联会好得很”，已无戚戚杂音。街上已看不到大字报，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标语：天下太平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正式离开了《８１５战报》。总团通知我说，８１５派现在已经掌权了，原来市委的机关报《重庆日报》就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了。革联会的意思是，从主要院校各抽一人到报社参加工作，组成新的编辑班子。时间是２月２４日。当时《重庆日报》已经改为《新重庆报》，原来邓小平题的报头当然不能用了，便在鲁迅手迹里集字，拼成了新的报头。人员到齐后，报社的造反派头头邱远勋、肖学初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说明意图和分工。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社论、评论员文章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个组就叫“言论组”，并指定我为组长。根据革联会的安排，我们共来了八个人，七个大学生，一个大学一个，唯一一个中学生来自师专附中。我的日记没有记录八个人的名字，只记得政法学院来的叫马岳峰，还有建工学院的张国祯——张国祯这位同学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他，因为我们来前他就一直在报社，而且一直帮忙写言论，写作速度很快，也是个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主儿。他眼睛深度近视，河南人，很少说话，成天都勤勤恳恳地笔耕不辍。而我们这帮来自各校的写作骨干，一个个好像感觉都特别良好，所以对张的文章水平有点不屑一顾的意思，大家成天就呆在寝室海阔天空地话说天下大事，而让张一个人去埋头苦干。张对此从不推辞，只管任劳任怨伏案抄写。大家管他叫“张言论”，真名字倒忘记了。几十年后，１９９２年夏天，我去贵阳

公差，听说他已荣任贵阳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前去拜会，他竟热情如故。贵州酒乡，他开了一瓶绝对不掺假的正宗“茅台”，谈笑间，大展惊人海量，我这才看出一位北方汉子的豪气。文革那会儿，我们很少见他说话。

我临离开《８１５战报》时，刘福一再挽留我，非常舍不得。他说我走了，他也不想再呆了，说得很动感情，甚至要哭起来，这使我十分感动。事实是：如果不是后来的七月大武斗，我完全就可能再也不会回到《８１５战报》了，也不可能有那一篇倒霉的《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我此生遭遇的，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从１９６７年二月末到七月初，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足以让我有理由和报纸彻底绝缘。问题是性格使然，让我在离开了刘福和报社四个月后，再做冯妇，又回了《８１５战报》组阁。而刘福，以后却再没来回来过。直到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女士确认了“关系”。那时说确认关系，也就是说双方已经和正式夫妻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尚未举行仪式和搬到一张床上生活而已。女方是嘉陵江对面一个化工研究所的技术员，胖胖的，待人出奇的热情。我过江去看了他们俩。小两口在仅可容身的小屋里煮了一碗很可口的面条招待我。那时候，对于政治，我已经心冷如灰。又到春天了，走出他们的斗室，我看见江北的田野满目青翠，太阳在薄薄的云霭上面向大地播洒懒洋洋的温暖。绿色的麦田那边，远远的，不知谁的收音机里播放乐曲：《苗岭的早晨》。我记得还在读中学时侯听过这曲子。歌词的第一句是：“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悠扬的旋律突然把我拉回到只有许多好梦而对社会全然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渡江看望刘福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大局已定》已被北京点名，它可能带给我的厄运已经让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十一·创办《山城战报》

前面说到我调《新重庆报》言论组，还指定我为组长，实际上我一件实际工作都没有干，因为到报社没几天，分管我们的邱远勋就出差了。事后很久才知道是警备区首长让他和熊代富、王绍川（财贸系统的８１５头头）一起去北京向中央汇报革联会的情况。“言论组”这帮小子在各学校都是些跳得高的造反骨干，这边厢没活干，学校里热闹事情还多呢。于是东一个西一个就都散了。我本来也想就此机会回校去，突然又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要我去创办《山城战报》。

决定创办《山城战报》是革联会３月５日会议上决定的。根据我日记的记录，“鉴于如下三个原因”，革联会要求各学校和组织的小报一律停办：“１，机器困难：全市今年印刷毛著任务大，一切印刷都得开道让路；２，纸张困难；３，《新重庆报》暂不能为革联会大喊大叫，因此按系统归口，只办《山城红卫兵》和《工农兵战报》”。《山城红卫兵》是原来整个大派学生组织的报纸，一直办着的，而《工农兵战报》创刊时怎么又改为了《山城战报》，我就记不起了。反正我是３月８日正式搬进市委大院住宿，开始报纸筹办工作的。《８１５战报》终刊后，改出《重大８１５》，作为内部报纸的校内发行。主持人就有前面提到的，如今重庆集邮界名人何国光。

《山城战报》的主持人是总后驻渝办的一位军官，慈眉善眼，为人十分厚道，但估计没办过

报，至少缺乏办报经验，更缺乏和造反派打交道的经验，大约也不想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对我们非常放手，几乎就“垂拱而治”。近读李锐回忆延安整风的文章，说１９４２年１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解放日报》，毛泽东认为初期的《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党中央意图，因此解决党报不能闹独立性、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组成部份之一。”《山城战报》理论上是最高权力机关革联会的喉舌,可革联会的头头从来就没谁来过问过,而派来的军代表就这么个好好先生，我们这帮造反派自然就“草寇作风”依然，像办派性小报那样，自个儿高兴怎么写怎么写，爱骂谁骂谁，想怎么骂怎么骂。几十年后，重读《山城战报》上当年我写那些文章，一副盛气凌人、气势汹汹的口气，动辄把这个打为“右派”，把那个骂为“反革命”，草率得实在有点过份。西师８３１平反复出后出版的《红岩》报第二十期第三版文章历数革联会罪状,有一条就明确指责“《山城战报》公开宣布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后工二四二红总是右派组织、反动组织”，这些指责确实完全在理 。

如果仅从办报技术角度讲，唯一经验丰富的当是《重庆日报》一位老报人：何文伟。何头发卷曲有致，整天都和蔼地微笑着，那神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看见他兢兢业业看稿改稿、画版样、定字体、字号，我才知道编报还有那么多学问。还有一位中年人是四川美术学院的版画老师：尹琼。山西人，画报头、画题花、画漫画，标题提字，从来一丝不苟。从二人身上，我发现了许多年轻人的粗燥。余下的报社成员就都是学生了。师专一位李姓文科生，名字已不详，眼镜，很文弱内秀，说话声音频率偏高，有点女人腔，但文笔严谨，颇见功力，战报的几篇短评,如“大江东去”、“小议亮相”、“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唯一的一位女生来自工业学校，文静而勤恳。西南农学院来了一位，叫黄天俊，人亦极端老实。你很难把他们和“造反派”这个词联系起来。同时来自北碚的还有一位，四川外语学院的，也姓黄，叫黄贵。报社所有人员中，唯他的电话最多，每打电话他必先自报家门：“我叫黄贵，我叫黄贵”。他是江浙人，前三音吐得很温柔，而最后那个“贵”字发音却特别响亮，高八度，好似意外爆发出来的。每次听他自报家门，我就要很好笑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阿Ｑ原来的名字好像就叫阿—“贵”。但是我们都不敢和他开玩笑，因为他从来一本正经，而且一进报社就和我们离心离德：后来果然发现他是砸派观点，他的电话全是在向谁告密,通报革联会内部消息。有一天，日记载，是四月二十四日，大家终于愤怒了，同仇敌忾地将该“奸细”的被子卷起来从楼上扔了下去。《山城战报》当时设在市委大院临街的三楼。原来是市委干部休闲喝茶喝咖啡的地方，下楼，绕出一个地坝，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去街上检回落物。黄同学怎么去检的？检没检回来？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位生性腼腆的江浙小生反正再也没有回来过。

报社组建时明确以重大和师专为主。师专除了上面提到的李某，还有一位叫冉隆太，另外一位姓张，自贡人，名字不详了。而重大，是我、刘福和电机系我的同年级同学胡潮正。能和刘福再度共事，我们俩都非常高兴。只是几十年后，他当了贵州省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磷矿的党委书记（好像是正厅级），因为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兴致勃勃打电话向他咨询一些当年报社的情况，他却非常负责、非常友善地把我劝慰了一番，要我别自找麻烦、再提那些毫无意义的往事：我不便继续为难他了。

报纸是３月１４日创刊的。由于有专业人士参加，又在《重庆日报》正而八经的专业印刷厂印刷，从版面安排、版式、质量、字体多样性、美术水平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报纸是很有专业水准的。“创刊宣言”《新山城是我们的》是我写的。“宣言”如是宣称自己的办报宗旨：“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员；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主

席革命路线的誓死捍卫者；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家；我们的《山城战报》，是天不怕、地不怕、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至于办报风格，“宣言”称：“她诞生在这个惊天动地、被‘一月革命’的历史风暴所震撼的年代，她诞生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殊死的鏖战搏击的时刻，严酷的战斗，使她生就了一副英雄相！她没有半点折衷主义的媚骨，也没有一丝虚伪卑微的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山城战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含含糊糊，毫不吞吞吐吐！”。

现在重新读来，我们这些新报人是不是幼稚得有点过份呢？在《山城战报》的报头下面，明明写着：“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主办”，而革联会明明已经宣布自己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最高权力机构说话，观点竟如此偏颇蛮横，这个政权肯定就有点问题了。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一书中谈到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时，有这样一段话：“完善的法律对个人的关系与完善的理性对激情的关系是一样的：那就是协调相互冲突的力量，以避免毁灭并增进整体的力量”历史上的所有政府，实际上都应该是一个调节器。它必然通过政策法令和政治手腕来协调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势力、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乃至于冲突，使之达到平衡与和谐，让大家都在社会的大蛋糕上分一块食。一个政权机构，怎么能以实力而自负，成天去激化矛盾甚至无事生非，专事制造矛盾呢？革联会 一开始就摆出压倒一切的姿态，它的事情注定只会越搞越糟。

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也不能对革联会责备太甚。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说远一些,解放后十七年搞了多少政治运动？近的，从 1962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反修大辩论、到“四清”运动——那怕学雷峰这种教人行善的活动，也偏偏要塞进一个在军营门口以磨剪子为掩护、专事刺探军事情报的阶级敌人！所有这些，不都在无休止地向人们灌输斗争观念，灌输仇恨吗？谁又能得以幸免？

再来看《战报》的文章。仅读看一下《创刊号》的文章标题就行了：“八三一纵队一命呜呼，二四二红总寿终正寝／难兄难弟，一样下场／交院’九一五’、河运校‘航锋’等‘反右’干将也纷纷倒戈。”、“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历史宣判分裂主义者罪大恶极／三司驻渝总站十大罪状”。从内容上看，“扫除一切害人虫”标题下介绍“我市公检、法机关的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从二月份以来，先后在市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几长寿县等地，召开了十五次公审斗争处理大会，逮捕法办了造反军“前哨支队”“六号门纵队”“千钧棒战斗队”和“燎原 815 战斗队”“东风野战分团”等八个反动组织中的首恶份子２１名，拘捕了这些反动组织中的一批牛鬼蛇神”。仅就报纸的话语系统来看，这哪儿像一个政权机关的报纸呢？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派别喉舌。

既然对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就轮着胜利者来细细数落了。从第二期起，就开始来大块评论了，现成的样板当然还是六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九评”。批判对象是砸派带头羊西师８３１的机关报：《红岩报》。一评曰：“二月黑风从何而来”,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二期。3 月１８日出版。二评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三期。３月２２日出版。三评曰：“评二月黑风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刊登于《山城战报》第四期。３月２５日出版。

上面说到的第一篇评论，无非是一些老调重弹，还是说西师８３１等组织如何反对夺权、反对革联会过程，重点当然还是罗广斌如何如何操纵、如何如何煽动等等。所叙述的事件发生时间也基本上是一月夺权前后。第二篇说砸派出现的历史根源，除了牵强附会地说砸派是保

守派借尸还魂外，还扯到发生的８１５腹地重庆大学的一桩历史公案，公案的主角叫徐光明。重大八一五时不时提到的所谓“徐派”、“托派”，就是指他。尽管笔者至今未曾与徐谋过面，但从文革一开始，就知道他在重大绝对算得上出道最早的一条好汉。１９６６年6月１８日无线电系驱赶工作组，他是积极分子之一；８１５事件发生后,还自费去过一次北京。据说他脾气一贯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最有名的例子是某个于文革初期由他同班同学传出来的故事，说１９６４年他们去铜梁县驻军某部当兵锻炼。那年月“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学生一个个见了军人都如见天人，而徐偏偏独出心裁，对当兵的炊事班长说他想吃麻雀肉，弄得一向均以雷峰同志为楷模的班长只得漫山遍野为他搜寻食品。此外，徐思想超前，这也注定他难觅知音，所以在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生死较量的大环境下，他只能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孤孤单单游离于两派之间。徐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就是８１５正和所谓“保皇四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宣布成立了一个《红岩公社》，因为人数太少，据说就十来个人，而且他那些过于超前的观点，如：“８１５本身就是不彻底的革命事件”、“九三、四上北京是右倾逃跑”、“砸烂８１５总团，实际上，就是向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思潮开火”，等等，这些在当时看来全无可操作性的观点，谁会关心呢？《红岩公社》这种绝对少数派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毕业分配前夕，才因一个偶然的、谁都没有料到的原因而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保守派解散后，重大基本上就没有对立派。按照四川省毕业分配办公室的要 求——“分办”主任张西挺，一直对成天骂她烂萝卜的重大８１５耿耿于怀——各高校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必须由两派人员对等组成。大量的、逍遥了一两年功夫的原“思想兵”、赤卫军同学，政治上正发愁无所依托，分配过程正发愁无人为之议价，于是一夜之间便纷纷参加已经隶属于“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公社》(即原《红岩公社》)。人马一下子壮大如此，甘守多年寂寞的徐光明肯定是大喜过望的。只是他的高兴没管多久，因为毕业分配一结束，大伙儿便天南地北，各奔前程去也。更何况这些新社员，他们入社时就从来没有关心过８１５到底右倾不右倾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分个好地方。几十年后，平心静气地来回忆，《红岩公社》人数虽少，但都是些精力充沛、敢于与众不同、对自己的信念非常执着的人，在日后的社会经历中，一定事业有成。如电机系的邹世友，因参加８１５造反后又反８１５，曾被同学们痛打。还有一位女生，叫吴贵伦，造反也很早，后与８１５观点不合，和邹等人成立“偏在寒中俏”战斗队，自然也被同窗们痛打。徐光明是不是挨过打不清楚，但他个子小，８１５的大个子们一遇他就喜欢用手将他的头发摸来弄去，揉得一团糟，而他从不反抗。有亲历者告诉我说，一次看见徐和８１５的同学辩论，人多势众的８１５根本就不想和他罗嗦，不知从哪儿弄些稻草就往他头上挂，往他嘴里喂：因为大家说这位“公社社长”一贯喜欢“捞稻草”，他公然也不反抗，真有“大丈夫甘受胯下之辱”的落落大度。二评花很多笔墨提到徐，显然是要为西师８３１找一个滑稽可笑的思想源头。因为说到反重大８１５的右倾，徐光明确实比谁都要早。对《红岩》报的三评，则回过头来，是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叛徒”罗广斌，以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反革命组织”“六号门”等扯在一起，确认为西师８３１的社会基础。

从文章的语气看，三篇文章好像都是出自于我的手笔。几十年后，重读这些东西，我还发现一个同样很见鬼的事情——如果我在三文中对《红岩》报的引语无误的话——在《红岩》报１９６７年的《新年献词》里，莫名其妙有这么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们的队伍里，机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很能麻痹一部份群众，享有相当的市场。重庆大学的‘红岩’公社就是推销这种货色的经理部。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我们千万客气不得，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此外，早在《红岩》报第六期（据推算，出版时间应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就批判过，说徐“一边举起左手高喊打倒重庆市委，一边却举起右手大叫要打倒八一五派。这真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年代就批判过的戴季陶主义的活标本。”而几乎很快，徐和西师８３１就握手言欢，跳进同一条战壕了。这该作何解释呢？说

他们没有明确的信念吗？说他们缺乏政治智慧吗？说他们不懂得斗争策略吗？都像是，也都像不是。其实，包括８３１，包括８１５，我们好像都是某个上帝做出来的政治玩偶，带智能的。软件操作系统的指令全是仇恨，而实用程序的代码却全是一堆随机数。双方一旦打斗起来，就各行其是，乱了套。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小说世界时说过一段话，对于描绘１９６７年 中国的社会肖像倒有点像：

在此，没有任何事物在世界上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稳固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每一个存在物不是在上升就是在堕落。一切都在自己的邻人或对手交换着特征。那些该寿终正寝的事物都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些早已精疲力竭的生命还仍处在其漫长生涯的开始。在此根本不可能谈论什么秩序和等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在神话世界中得到拯救，然而比起这个世界来，神话世界却不知要年轻多少。

“三评”写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不是无话可说了——要想说的废话还很多——而是,全国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闹怀仁堂的老帅老将们好像已经遭到毛的反击，谭震林首当其冲。对于四川来说，有一个相应的、类似噩耗的传闻：３月１６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会上讲话，说四川翻过来了。３月１６日这一天，这句话当然还没有传来。这句话是过了好些日子才传来的。我翻看了我的日记，恰恰也是在那一天，我对革联会开始发生了动摇，这此动摇是如此强烈，延续的时间几乎达一个月，这样说吧：我自己差一点儿也站到对立派的阵营去了 。

十二 • 迷惑与动摇

使我对革联会发生动摇的事情好像发生得有些突然。

本来，３月１５日那天还好好的。我的日记上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况和情绪：“革联会召了全市造反派的宣传通讯会议。警备司令部作了形势报告，很好。／西师八三一垮台后，斗争缓和了，没有什么对立面，到处是升平景象。每天都有人来报喜报捷，人们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生产都搞好了。这个场面真有意思，在革联会工作的老百姓出来接见报捷的老百姓，互相鼓励，互相祝贺，多有意思！多么感动人！／回学校跑了一趟，似乎一切都正常了，从今天起，机械系就开始军训了。整整半年没有见过这种秩序，我感到有些不习惯。／我很想走了，走到遥远遥远的边疆去！／正如一雏鹰，他在风暴里练硬了翅膀，要到远方去飞行了。”

３月１６日这一天，报社让我和黄天俊去天府煤矿采访一个大会。天府煤矿很远，从市区到了北碚，过嘉陵江，还要坐好长一段小火车才能抵达。西师也在北碚，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对就近多了，８３１的造反学生自然在那儿影响很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初闹革命不都在安源煤矿搞过革命煽动吗？现成一个煤矿就摆在面前，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当然要以伟大领袖为榜样，要去那儿找矿工串联串联。天府煤矿这就成了８３１的“红色根据地”。３月

８日，西师８３１垮台，头头被抓，对于它的“红色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自明了。３月１６日，该矿山召开大会，就是要把被砸派夺了的权重新夺回来。这是一个阴天，才到下午，天就很灰暗了。天空飘着飒飒冷雨，让人心里很压抑。我和黄乘船渡过嘉陵江，等运煤的小火车来了，又坐了好远才到目的地。

大会是在矿区的礼堂举行的。礼堂很简陋，用油毛毡搭成，却大，能容得几百上千的人。我们向煤矿当局的军代表说明了来意，然后便去了会场：礼堂里已经人声鼎沸。接着开会，主持人很神气地宣布大会开始,然后便宣布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揪上台示众：名字很长一串。被点名的人显然早有准备，主持人话音一落，马上乖乖地从各个角落钻出人群上台站好，低头，在台上站了整整一大排，恭恭顺顺作弯腰服罪状。其中有事前将公章带好者，上台后便抖抖嗦嗦把公章倒在主席台上，以示交出权力：这些图章，我猜他们还没机会盖几回。接着大会发言，声讨“牛鬼蛇神造反”“右派翻天”的各种“滔天罪行”。发言我无法记起了，唯一印象深的就是：我首次发现，一个单位的公章集中起来，会有这么一大堆！

不久后我就知道：那些主持“反夺权”会议的，都是不久前才被８１５派打垮的保守派组织“工人战斗军”的骨干们。于是我就很不顺气了。

其实我的不顺气，从天府煤矿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黄天俊回他的学校西农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去８３１刚刚被打垮不久的西师看看。一进校园，就觉得整体气氛有些异常，和城里的平静不一样，好像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得焦躁不安。大家都很忙碌冲动。有点像８１５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似乎随时会发生不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记不起什么地方了，好像是一个水池边上）绳子上新挂出几张大字报，人们正围着争论不休。我们挤上去，才知道是原８３１一位同学写的，大意是为被打成“右派组织”的８３１鸣不平。文章一出，这个同学立即遭到气势正盛的“春雷”战士的批驳，“春雷兵团”理论上是从８３１内部反水出来的，为首的和骨干分子确实都是些老造反，但短短时间却吸纳了大量“思想兵”和赤卫军参加，所以被砸派认为是“老保翻天”组织。前面说了，重庆人管“老保”叫“麻子兵”，因此呢，砸派就管“春雷”叫“春麻儿”。不管怎么说，“春”字总是代表美好代表清纯的，因此后来砸派的漫画总是把“春雷”画成娇滴滴的二八佳人，而把学工科的“重大８１５”画成五大三粗的壮汉，二人总是在下流无比地调情——这是后来的事。却说那张大字报前的辩论很快就愈演愈烈，气势正盛的“春麻子”和“鸭子死了嘴巴硬”的８３１全都涌来参加舌战——非常莫名其妙，当时，我和黄天俊二人公然帮着８３１辩论起来，只是后来觉得身份不对，这才走了：解放台还有一个大会等我们去采访。

解放台是一个露天广场，地处北碚街区。这一天是重庆难得的晴天，太阳暖洋洋的，又开大会，但我的印象却并不热闹。主要听众好像都是西师的学生，都集中在前排。我和黄就远远站在后面。站在后面我还遇到好几个我们学校来此看热闹的同学。开会情况和前一天在天府煤矿看到的差不多。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宣布把“反革命”某某、某某某揪出来示众。今天的某某某只有八九人，首要分子就是前面说过的西师８３１的七个主要“勤务员”：周荣、羊衍海等，其中有一位女士，就是周德英。这些某某某一上台同样站成一排，低头，恭恭顺顺作弯腰服罪状。不同的是，今天的某某某全都戴着手铐，因此更显得杀气腾腾。另外就是让人有一种特殊感觉：他们确确实实和我们不一样了，真成敌人、成阶下囚了，年纪轻轻的他们，这一下真的全完了！问题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和我们一样：造反、受气、威武不屈、叱吒风云。和“黑市委”浴血奋战。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８３１垮台这

件事我们当然是知道的，甚至为此而弹冠相庆，可真正看见这帮哥们儿被弄在台上可怜巴巴地低头示众，而且还铁铐锒铛，站在后排的我们，好像忽然间忘记了他们曾经如此讨厌地和自己作过对。我记得一位同学当时就愤愤不平地问我:“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对吗？他们也是造反派啊！”

这个同学叫余明庆。人白净而清瘦。脾气极“冲”。他有一句口头禅：“现搧！”。“现搧”是重庆土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马上揍！”“现搧”也成了他的绰号。武斗时“现搧”担任重大“３０１野战部队”的发报组长，在“华莹山根据地”闯过一次大祸:为了在女同学面前“冲”一回，他在夜里误发了三颗信号弹，让整个“根据地”一场虚惊,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为此，曾被武斗队的哥儿们“搧”了个鼻青脸肿：这是后来的故事。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７日那天，他在北碚解放台的斗争会表露的情绪代表了我们共同的不满，于是一起退场了。那一天，我的日记这样写道：“晴朗的星期日。在北碚解放台由春雷主持大会，斗争８３１的几个头目。做为一个造反派的我，看到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事实上，让我们感到不是滋味还不止这些。比如，当时革联会老要我们把辛易之“解放”出来，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新生红色政权”，实际上，这当然是警备区军官们的意见。从理论上讲，中央对夺权的要求就有一条：必须实行军队、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砸派攻击革联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８１５学生单方面夺权”，虽然后来军队马上介入，而且态度鲜明地支持８１５，军队算是有了，但“革命干部”一席始终空缺。当时是有一个革命干部：段大明，一直站在８１５一边，但仅仅副市长一个，级别太低。根据重大８１５的意见，原本是想直接让鲁大东出面参政。任白戈下台后，重庆的一、二把手实际上就是鲁和辛，二人还是儿女亲家。问题是从８１５开始，和重大打交道的一直就是辛，鲁一直在幕后。辛在该校学生中积怨甚多，易于感情用事的学生对他的复出自然十分反感。可警备区偏偏要辛出面，我和许多当事人探讨过，都不知个中原由?投桃报李是中国人传统美德，军人这样卖力支持８１５，你８１５这点面子总要给吧？军队通过总团勤务员作了许多工作，同学们虽然勉强答应了行、同意，但总很勉强。有一个例子：２月２７日　下午，由革联会领导下，由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鲁大东大会，五千人参加。除了群众代表发言批判外，谁都知道，今天的压轴戏是让辛易之出面揭发、批斗鲁大东以“火线亮相”。多有抵触情绪的重大８15学生也热热闹闹参会。会中有口号云：“辛易之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革命不分先后”等，大家也跟着喊。回校后谈起，一个个都心里添堵，感觉别扭得不行。会毕,鲁被押回重大学生七宿舍监护地，甫出汽车，鲁訇然坐地，作小儿哭天状，口中大呼冤枉,称：不是辛受鲁蒙蔽，而是鲁受辛蒙蔽云。

为了做工作，《山城战报》全力开动。３月２８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五期，从文中内容看，应当有六个版面，但笔者仅存四版。仅从四个版面来看，关于解放辛易之的就整整两版。现将标题实录如下：消息：“揭发批判辛易之的大会在重大‘八一五广场’举行”／“欢迎辛易之和我们并肩战斗——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代表黄顺义在三月二十三日批判辛易之大会的发言”／“贫下中农社员谈辛易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冶五三战斗组）”／“为什么辛易之可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要武》战斗队、《二七》战斗队、《红旗》战斗队）/“欢迎辛易之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庆八一五机械兵团川江电机兵团）/“我们所了解的辛易之”（市革联会市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

实事求是地说，以上这些文章，也并非全在言不由衷地为辛歌功颂德。如黄顺义的发言，语气还是相当尖刻的，完全像在训斥一个在外面闯了大祸的三岁孩童。现在我倒在揣想：一个

在戎马倥偬和政坛沉浮中摔打了半辈子的官员，将自己的尊严完全搁置一边，仅为了重获政坛上的一席官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一群娃娃声色俱厉的申斥，这时候他该是何种心情？人哪，为了自己在群体中的某种位置或者某种利益，会表演得多么可笑！多么可悲！

但是辛易之没有想到、竭力支持他的５４军军人没有想到，甚至扭扭捏捏拉扯他的重大８１５也没有想到，他的复出已经不可能了。既然他已经和八一五有过这样的蜜月，那么不久后平反复出的砸派理所当然就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死敌。既然他已经成为了两派最具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在重庆的政治宴席上,要让他坐在"革命干部"的椅子上就不合适了。老百姓有句俗话："久等吃好席"，在这儿倒刚好用得着。一年后，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坐在"革命干部"席位上的，竟然是两派都一致要打倒的鲁大东。政治棋局上的博弈规则就是这么奇怪。

１９６７年乍暖还寒的三月下旬，重庆已经听到了有关"二月逆流"一说，预感到上面有谁又出了什么问题。就在意图"解放"辛易之的同一期《山城战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本报观察员"文章："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配发消息："死灰在复燃／保皇四军言行录"，而且，同时很抢眼地摘要刊登了一直被８１５嗤之以鼻的"救世主"，首都三司头目蒯大富的讲话："迎接第八个回合的大决战",还有北京大学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发家的聂元梓的讲话："警惕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胜利弄得晕晕乎乎的８１５，现在感到御林军的份量了。你"孙大圣"上天入地，能跳出毛的手心吗？他们所有的命运实际上都在被北京牵着鼻子走。

下面是我的日记：

"从戚本禹同志的一个讲话中，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在农林口搞反攻倒算的谭震林。

"王力同志讲：四川整个地翻过来了。

"北京来信节节传来，称：北京舆论一边倒，说重庆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而革联会正是这股逆流的产物，罗广斌是革命烈士，红代会发表声明，支持西师，大骂重大815是叛徒集团。

"据传周总理３.３１讲话，说重大８１５变了……

"一场巨大的风暴又在重大酝酿起来，从同志们激烈的神情里，从同志们按捺不住胸中的气闷而爆发出来的歌声中，从辩论会上慷慨的发言中，从满地的大标语中，又可以听到８１５春雷前的风音雨响，而且，同志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出在军队。

"有人写大标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这段文字紧记在３月１７日和４月１日的日记之间，没有具体标出时间,记得很随意。使我无法回忆起上面所说的发言慷慨的辩论会、满地的大标语，特别那一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大标语，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有些什么细节？同学们有些什么不满和困惑？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作为８１５派事实上政治中心，重庆大学再度动荡不安了。从校园，到每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学生。１９６６年8月那一次，压力很大，但他

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站在毛一边的，而这一回不同了：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搞不好，他们很可能就会和刚刚被他们打垮的“思想兵”一样，主观上想保卫毛,实际上却走到事情的反面：这 一点，使他们恐惧万分。

４月１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六期，正式刊登文章，开始“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这个有些滞后的信息向重庆人证实了：在北京，以２月１６日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军人造反，已经被老谋深算的毛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他们跟着毛泽东戎马一生，对于这一次了不起的、悲壮的、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行动却显得过于莽撞。他们对毛的性格应该了解呢，可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像不懂事的孩子耍脾气似的举动呢？

大闹怀仁堂的故事当时大家还不可能知道。但俗话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北京的斗争，势必紧紧牵连着千家万户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了。文化革命,注定开始新一轮的灾难。

重庆革联会的机关报《山城战报》，当然得跟着起哄，虽然自己都有点稀里糊涂。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开炮。

十三·陷入动荡的重大校园

一月夺权，在全国范围内把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势力翦除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林彪当然想乘胜追击，把军内异己一鼓荡平。江青一伙居间凑趣，也是想借林的力量将他们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不仅地方、也包括军队的）统统打倒。毛泽东虽然孤注一掷把刘少奇搞下去而将林推上“副统帅”位,虽然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把打倒军队内的走资派确定为目标之一，但他又绝对不允许林彪为一己的山头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也绝对不允许江青一伙头脑发热、不讲策略地乱搞一气。在玩弄政治平衡方面,毛绝对是超一流的魔术大师。要在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利害中寻找平衡和控制平衡,他的态度总是高深莫测、忽阴忽晴，让人眼花缭乱，摸头不着脑。

如果这种分析不错，那么，１９６７年断断续续、绵延了几个月的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当是属于正宗左派观点：川大八二六，重庆反到底，算是得其真传。问题是，在重庆支左的军队５４军，偏偏又是林彪麾下的主力战将，重大八一五死心踏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能不说也得了护身咒符。重庆的两派于是难分真伪，斗起法来鱼龙互易，泥沙混杂，上天入地，难决高下，其源盖出于此。

下面继续说重庆的事情：

四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山城战报》，以非常显眼的通栏标题刊登了“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的文章，表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紧跟中央开始动作了。只是，这篇长近一个整版的消息，仅仅像记流水帐一样，介绍了一番二月中旬发生在农业部的鸡毛蒜皮，在外间看来毫无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中央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林、中央文革那几个不可一世的秀才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大家完全懵在鼓里。只不过为了表示自己大方向一贯正确，

于是便稀里糊涂跟着起哄罢了。

８１５派、革联会及驻军对所谓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可以从该期刊登的几篇文章看得出来。头版头条："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函重申了军队立场，大意如下：一，"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手炮制的"，"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二，"目前原保守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企图重新恢复组织，对此，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三，"参加原保守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四，"（原保守组织中）如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继续玩火，那么矛盾就会转化。我们一定支持革命左派，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逆流"。此外，该期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还有一篇本报观察员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内容均大同小异。根据我自己作的记号，那篇社论当是我写的，现在重读，亦有不知所云之感，无非把已经垮台的、毫无还手之力的走资派、保守派再次威胁一通而已。只是有一段，作为作者，可能是专有所指。该段内容是："有的革命小将，由于头脑中'私'字作祟，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被阶级敌人利用了，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革命小将，应当帮助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可是有的人却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以当然左派自居，不准他们革命，把这些革命小将一棒子打死。"这段话显然表述了我３月１７日在北碚解放台看见８３１头目带铐示众时的想法。送审和出版后，编辑们对这些话有什么反应？现在已经想不起了。对于我个人，这些话，至少是久压难抑，不吐不快了。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这时已经是山雨已来风满楼。

下面是我的日记：

"３月３１日。不平静的夜。同学们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准备次日大游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团连夜召开小组长会，被迫上马。

"４月１日。压抑在同学们心中的全部激情统统爆发出来了，像火山的岩浆全部爆发出来了。／晨六时，紧急集合，召开全团大会。周家喻上台大放厥词，企图阻止游行，群众大造其反，然后，数千人浩浩荡荡进城，进行了爆发性的游行，震动甚大。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大大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我们这一群为西师、交院早就抱不平的八一五，心里感到无限兴奋。

"４月４日。革联会召开了一个全市的不像样子的大会誓师向刘少奇开火。会上，我校打出大标语：'警惕山城和平演变''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震动很大。在上清寺贴出了４.４大会质疑（革联会原拟定于四月四日举行全市的所谓'工代会'——笔者注）的大字报和不准工纠挤进工代会的大标语。对于即将在旌旗招展的人民大礼堂召开的所谓工代会，同学们表示，若要召开的话就坚决造反。／人们在议论：重大八一五要反了。

"４月５日，革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决定无限期延期召开工代会。"

３月３１日那个"不平静的夜"，同学们到底怎么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的？而

总团在连夜召开的小组长会上，是怎么被迫上马的？次日凌晨六时，天还很黑，我记得广播里号声响起，很紧张，像是有外敌突然入侵，全校同学惊诧诧翻身起床，从四面八方赶到八一五广场（文革后改名为“思群广场”，以纪念文革初被市委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原校长郑思群——笔者注）集合：这时，周家喻上台怎样“大放厥词”？而群众又怎样大造其反？这些细节，一定充满了矛盾、困惑、苦闷和斗争，因此也一定充满了戏剧性。与总团其他勤务员相比，周家喻算不得老谋深算，而最多是个煽动家。读书时，他在业余体育队当羽毛球员，伶牙俐齿，多言善辩，精力极其充沛,满是“坏小子”的乐观、机敏、敢作敢为和恶作剧，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动荡中，他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成为领袖。事实是，８１５总团的很多具体组织工作确实并非他做的，他就会煽动。１９６７年秋，重庆大学准备成立校革委会，全民投票，他的票数竟然排到了第十位！谁叫砸派老要批周家喻的“右倾”，要摸周家喻的“老虎屁股”呢？敌手的攻击成全了他。周家喻成了８１５的象征。１９６８年春两派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讨论领导班子组成人员，815 的代表就公开宣称：周家喻就是个傻儿,我们也要选他进省革委当副主任。这是后话。1967 年４月１日那个春寒犹劲的凌晨，周家喻被大伙儿哄下讲台，那些细节一定也很精彩，可惜时间太久，我回忆了很久，问过好些同学，大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四月初，西师８３１和交院９１５已经正式平反复出。重大８１５战士为此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对它们的复出确也由衷地表示过祝贺。问题是：８３１们既然付出了比重大８１５造反更沉重的代价（他们的遭遇本身就构成了革联会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注脚），在政治棋局上自然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匹倔犟的烈马，原本就不愿被八一五套上笼头，现在自然更不可能充任驽马。政治搏弈的规则往往如此：不作铁锤，就必须作铁砧。砸派既然不成附庸，自然应该成为主宰，应该由他们来号令天下。前面说过，西师８３１复出后的“严正声明”,从第一天的“重大８１５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 815 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８１５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急转而为“重大８１５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个弯转得也实在太快了些，让当初为他们鸣不平的８１５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年轻人的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他们要维护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８１５和革联会，而染尘甚少的正义感使他们又必须起而为确认的信念、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去舍命抗争。重大８１５开始在两扇沉重的磨石之间痛苦地接受挤压。

我在４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重庆乱了，一向称为铁板一块的重大８１５也乱了。／向谁决战呢？／重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什么地方？／警备司令部有没有谭震林？该不该砸烂革联会把这个谭氏人物暴露出来？／重大８１５是不是被利用了……／一连串的问号，把勇敢的８１５战士的思想搅乱了……”

砸革联会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而重大８１５呢？不知所措，沉默了。校园里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坚决砸烂伪革联！”署名：“反到底”。有趣的是：当时砸派还没有确定这个名字呢，却被８１５自己先用上了。更有意思的是，标语竟是当初发起８１５事件的主力：业余文工团的几个激进分子所写。作为组织，一个叫《偏在寒中俏》的战斗队从８１５内部冲出来了，成员是最早的造反分子、电机系的邹世友和吴贵伦。

四月六日日记：“然而，重大８１５没有说话。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在重大８１５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一次，没有结果，又来一次，又没有结果。在总团的会议上，一次,没有结果，再开一次，也没有结果，再开，还是没有结果……／人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砸还是轰？”

事实上担当着领头羊角色的重大８１５，他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重大校园几乎就是重庆的政治大本营。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八区三县的“革命群众”都喜欢到重大来找８１５讨教。先是去总团信访组，又由总团信访组介绍到各系各班的战斗组接待。我就曾经接待过文艺系统的几个人，并且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歌舞团的张运涛、越剧团的田会珍、话剧团的孟庆善、杂技团的郑洪等，一共八人。他们的神情、态度，很像在白区找到地下党组织一样兴奋，一个个都激动难已地争着说，抢着说，而出得重大校园，一律革命信心倍增。我还有个同学，因为接待重纺六厂的来访群众,和其中一位很漂亮的女工一见钟情，后来就爱得难分难解，死去活来，当然，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很失败的婚姻，我就不便在此披露他们的姓名了。重大八一五的沉默对于徘徊歧路的整个大派，无异于一场灾难。以至于其他的８１５战士已经无法忍受。有一个工人在重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代表了八一五派共同的焦躁与不安。这是一首叫《呐喊之声》的诗歌，其时被很多同学传抄，我也把它抄在了日记本上。下面仅录其中两段：

不要这样沉默，重大八一五

让雷霆喊出你胸中的愤怒

为什么万里之外对你缺席审判

为什么前后左右向你进攻

假如你胸中是一轮红日

解开钮扣，把它托上解放碑峰

山城人民永远热爱你，重大八一五

川江雄歌，决不做易水悲曲

谁个是红心赤胆照长空

谁个是沽名钓誉梦云楼

任它柳随风摆，帆听风说

还看今朝红岩，岂效渔家轻舟？

４月５日，建工学院８１８全团举行辩论会，率先统一了认识，确认８１８战旗永不倒！接着数千人浩浩荡荡来重庆大学声援游行。上一年的8月１３日，重大造反派第一次冲出校门，就是到建工学院声援游行，那次行动成为了重庆文革爆发标志的８１５行动的预演。而现在，轮到对方来推动自己了。重大８１５还有什么可说呢？学生自发地一涌而出，和建院的队伍迅速汇集一起，又涌向师专。那是８１５事件的发源地。这次集合本身就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意思。接着，三中、一中等校的“中八一五”也涌向师专。在当天日记上我这样写：“顿时，

夜晚的８１５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八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点起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烽火，八个月后，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前夜，又在这个广场上，响起了重庆市的第一声春雷。夜啊，不眠的春夜，沙坪坝在燃烧，山城在燃烧 ……"

但事情总不可能靠一次集会所煽动起来的激情就彻底解决。年轻的心是飘浮不定的云。今天吹东风，它向西边飘去，一会儿刮西风，它又会向东边飘去。而１９６７年春天的中国天空，刮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狂飙罡风呢！

在当时日记上我还记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自己思想的混乱：一天晚上我回到学校，不是恶作剧，而是非常认真地"试着以砸派的观点与队上的同志辩论"，公然"我胜利了。"于是我兴冲冲地马上返回十多公里外的市区，和《山城战报》的编辑邓庆平一道去找到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准备和他也这么来一次模拟辩论。

刘润泉时任５４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人，个子矮而壮。后５４军调防云南，他曾担任过昆明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我也恰在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与他的接触就更多些。刘退休后移居广州军区干休所赋闲养老（他夫人是广东人），１９９０年，我到深圳经商，其时，我公司的助理、原四川外语学院８１５派一号头目的金光中专程去广州看他,回来曾对我这样说：他老多啦，看起来完全像一郊区菜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一直就好像看不出军人的威严，而更像一个慈眉善眼的和蔼老头。革联会期间，都在一个大院上班，随时能见到他。我记得每向他说到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到由此而在社会、在８１５内部引起的种种混乱，他就只会叹气，反问我：我们该怎么办呢？事情都是你们搞起来的。我们解放军只是对你们支持，你们也闹，我们怎么办？他态度的真诚本身就够让人感动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已经记不起那一晚我和他的谈话如何起？如何终？大约又是他的诚恳把我征服了。于是，我的日记上有了这么一段记录，说我和他交谈后"对革联会又做了重新估价。我有两点看法：１，革联会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由于谭氏人物造成？还是由于认识问题？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我的结论是后者。２，如何看待砸派？他们是真的掌握了大方向？还是出于复仇心理？是孤立地看待他们的行动？还是历史地、全部地分析他们的行动？结论仍然是后者。介于这两点，我认为革联会不能砸。"接下来，我写到："深夜，又赶回学校，把同志们说服了。"事过几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当时我的行为状态，我想用这样四个字 ："掐头苍蝇"。

驻军部队定然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4月8日这一天，５４军副政委蓝亦农和副军长白斌决定亲自出马稳定军心。数辆军车将重大八一五的２００余名战斗组长和建工学院的部份代表拉到了鹅岭公园下的警备司令部。会面是在一个小礼堂进行的。时间是下午，山城重庆的天色晦明不定。主席台上点一盏绿色的台灯，给人柔曼而平和之感。白先传达了刚结束不久的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重点是林彪所谓"古今中外……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胡诌。接着蓝就革联会、镇反等诸问题发表演讲。我记得他看资料时戴一付老花眼镜，说话轻声曼语，显得尤其亲切。质朴的工科大学生被军人的儒雅和真诚征服了。演讲人绝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讲话结束时，蓝已胜券在握，意味深长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正如俗话所说：任凭风浪起——"话犹未了，台下马上齐声接茬："稳坐钓鱼台！"这一天是周末，５４军趁热打铁，当天晚上，马上又派刘润泉到重大召开会议"交底"，对

八一五表示坚决支持。

毕竟保守派刚刚垮台不久，这些热爱党组织的乖宝宝们，他们和所谓“走资派”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喜剧８１５都记忆犹新。８１５们当然不愿意、甚至十分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重蹈覆辙。因此，４月８日下午和晚上８１５与军人的会面，在重大校园，很快就被一些激进分子指责为“拉一派打一派的黑会”，“和当初李井泉和思想兵的黑会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砸派的气焰日盛一日，革联会和重大８１５已经被他们奚落得一文不值。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刺激８１５派脆弱的神经，他们把８１５骂为“叛徒集团”、“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被黑帮收买了”，用漫画将他们画为丑陋的“癞格宝”（重庆地方语，即“癞蛤蟆”——笔者注）。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重大的学生们已别无选择。对方的轻慢欺辱逼得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捆在革联会的战车上 。

４月９日，大田湾再度成为重庆所有眼球聚焦的舞台。８１５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此召开大会，誓师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火。蓝亦农再次到会演说。但效果显然和前一天警备区小礼堂的效果大不相同。大会的主旋律虽然还是“革联会好得很!”但杂音已经很多了。会间，工业校８１５派不听招呼的学生们爬到主席台前，大写其标语：“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中学９１纵队乾脆就多次冲击主席台。虽然造反未遂，但裂痕正式公开，八一五已经不再铁板一块。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都不再迟疑地选定了自己的角色。该退场的，纷纷退场，要和革联会站在一起的，因叛逆分子的胡闹而铁了心，在会场上呆下来，偏偏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从这一天起，重庆的政治格局重新明朗了。保卫革联会营垒里，重大８１５再度成为核心，也自然开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十四•革联会，从迷乱走向明朗

《山城战报》本为三日刊，从４月１日出版第六期前，都非常准时，第七期却推至五天后的６日才出版，而且这一期简直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完全是和重庆具体问题毫不沾边的、空空泛泛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消息和文章，甚至非常铺张地用一个多版面开始连载反刘少奇的先知先觉者陈里宁的《狂人日记》。这个长篇日记很玄乎，谁也不知真假，唯一的好处就是长。在编辑部思想混乱、不知何云的时候，用这种文字垃圾占领版面实在是最佳选择：既符合大方向，又不必向读 者表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革联会原定４日召开的工代会——这次大会是革联会计划中让重庆社会秩序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被无限期推迟后，六日和七日，连续用两天时间召开了一个全市革命造反派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开会的同一天，革联会发布了《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４月１０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用头版全版刊登了这个文件。而三天后出版的第九期则在第二版刊登了联席会议的消息。从这个通告和这个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出保革联派通过一番折腾，对自己的思路已经基本理出了头绪。四月六日《通告》共

谈了八个问题，（一）斗争的主要任务（二）关于革命的“三结合”；（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四）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五）关于镇反工作；（六）关于夺权中的问题；（七）关于保守组织；（八）抓革命促生产。《通告》的基本立场和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看法，在警备司令部三月二十六日《公函》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并且表述得更加明晰具体。如第二个问题中，指出了：“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绝不许把他们当作陪衬，更不准把他们排斥在外”；在第四个问题中，明确宣布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等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在第五个问题中，提出了“在这次镇反工作中凡被错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第七个问题则再次重申不许保守组织“纠集原班人马打着’造反‘旗号，恢复原有组织，更不允许招降纳叛，改头换面重新组织，否则，立即取缔，对于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第九期二版刊登的会议消息中，报导了市革联会常委会的六条决定。“决定”则从措施上对以上原则进行了落实，如：“立即对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肃反问题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处理，抽调一百名红卫兵，由两名常委同志亲自率领到八区三县检查，迅速纠偏”、“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纺六厂——笔者注。我之所以要特别注明这一点，因为紧接着，我将在这个事件中有一段九死一生的遭遇）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至于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组织，革联会“现在公开认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能够取得这些结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山城战报》第 9 期的消息是这样报导的：“各革命组织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份发扬了大民主，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重庆的各种表现，同时对革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关于会场的气氛，只说了：“经过激烈的辩论”平平淡淡一语，而在我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会场情况，却是非常激烈的：

“４月７日－４月８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上台发言，申诉（或者说是控诉吧）本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解放军有很大的责任。当然，问题也是直接涉及到革联会的。／会上，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血和泪的控诉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二轻兵团的一个代表跳上台去，大声说道：‘同志们，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我们为它大喊大叫，为它鸣锣开道，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没有为我们干一件好事。我们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来把他砸烂吧!’／一席话，把同志们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乱嘘、起哄：‘滚下去!’‘滚下去!’。师专唐宗明走上去：‘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有错误，有缺点，我们炮轰它，帮助它改进，砸不是办法……’外院余朝文冲上去：‘同志们，刚才这个人发言是个大阴谋，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态，坚决砸烂革联会!’全场大哗，一群人冲上去，把余推开，迅速在话筒前排成长队，要求发言。／‘我代表２３０７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发言，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革联会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代表八一兵团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不能砸，只能炮轰，只能支持，革联会就是好……’／我说，‘我是二轻兵团的，刚才那个人不能代表二轻兵团，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二轻兵团的广大战士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就是好，好得很！……’／发言，一个比一个激昂。情绪，一个比一个冲动。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这个会场上迅速地分化、集结……”

会议尽管吵得天翻地覆，但毕竟让多数代表对革联会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即消息所说：“大

家一直认为，革联会是我们造反派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不能把革联会看得一团漆黑，一棍子打死。”会议的成功使得财贸系统８１５的头头王绍川，心满意足地代表革联会对大家的批评表示了“衷心感谢”。

文革史家王年一在《“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中说，１９６７年支左之初，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因支错而挨批，弄得十分为难。“１９６７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

会议的结果无疑是对５４军（即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左成绩的充份肯定。他们能在上述背景下做到这一步，应该说非常可以了。作为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当然十分满意。他在讲话中高兴地表示“会开得很好。”并说：“镇反工作要规定三条，不管任何人假借镇反为名，镇压左派，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二，如果有人背着革联会干坏事，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三，今后逮捕人要经过警备司令部党委批准。”５４军参谋长耿志刚也到会助兴，他代表警备司令部全体指战员表态，称：“革联会好得很！我们过去支持革联会，现在支持革联会，将来还要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保卫革联会，支持和保护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就在会议开得热热闹闹的差不多同时，思想处于极度迷乱的我，为《山城战报》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这就是在刊登革联会“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的那一期报纸，我在第二版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出版时间是４月９日。按此推算，文稿应该是正开会前后写的。这篇文章的是非是这样惹出来的：

对于当时的形势的解释，当初在八一五派内有这样一些提法：一是“二月分裂主义黑风”。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在对中央二月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当时气势还盛的砸派和刚刚被打倒的走资派、保守派捆在一起，以便冠冕堂皇地对８３１、９１５等大张鞑伐；二是“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北京已经提出了反复辟反逆流，而在重庆，因西师８３１等被镇压而出现的保守派反夺权，恰好又发生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提法，于是就专指了保守派的反夺权。四月份开始平反砸派冤案，对保守派的反夺权给予纠正，旧恨新仇一股脑儿爆发，八一五派于是一下子就有了许多政敌：才被他们平反的８３１们是一拨。刚刚投入八一五怀抱而马上又被他狠狠一脚踹开的保守派，又是一拨。对八一五一贯耿耿于怀、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保守派、走资派，又算一拨。面临几股反对力量，不知如何招架，乾脆一起对付，于是就有了第三个提法：“反对多边围剿”。文革那会儿，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地位受到挑战，又很容易号召大家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这些提法力图和北京的正宗提法接轨以便为自己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然又力图把北京的正宗提法搅成了一锅粥：客气一点说，是鱼目混珠；说恶毒一点——用当时的说法

——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是当时，我的思想确实非常混乱，于是便在混乱之下，按照当时八一五内部流行的“多边围剿理论”写出了这篇社论，并且很快在编辑部获得通过并付印。这一次，又是我自己重演了“事后诸葛亮”的笑话。这件事情记录在４月９日的日记上：“晚上回校，我和《八一五战报》的同志们又一道讨论了形势，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定了‘多边围剿论’，于是我急急忙忙挂电话给《山城战报》，阐明了我的观点，希望同志们马上考虑，如果这篇社论真有问题的话，该马上通知印刷厂停印。他们又同意了我的观点。”问题是，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进城，匆匆忙忙返回《山城战报》，日记记录：“奇怪，刊有这篇社论的《山城战报》已经在街上出售！我急忙向大家谈及这一事，并迅速挂电话给印刷厂和发行科，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并将已发出的报纸迅速追回。／可惜，事情已经迟了。这一天，街上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山城战报》４·９社论是大毒草，必须批判！’”

作为补救措施，报社确实把４月９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收回了，在该社论的位置换成了上海《文汇报》４月７日的社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重新印刷后重新发行，同时刊发了一则“紧急启事”，称：“本报四月九日第八期社论‘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有严重错误，特紧急声明这篇社论撤消，已发出的少量报纸作废。并于四月十日将本报第八期改版重印。”这样，第八期的《山城战报》就有了两个版本和两个出版日期。如果用集邮爱好者的术语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错版票”。这也算是文革小报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随着对革联会“支”和“砸”的斗争的明朗化，《山城战报》社论凸现出的思想迷乱也很快结束。那些天，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重大声援游行。有大学的，有中学的，也有工人和别的什么队伍，他们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闹腾得重庆大学的校园夜夜不得安眠。“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躺在床上的迷乱的大学生们于是纷纷一爬而起，夹道欢迎。于是掌声、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片，响彻夜天。

有一天晚上回校，正遇了这种情形，我于是也激动万分地挤在队伍里和大家一道呼口号，一道鼓掌。这时，我突然遇到挤在队伍中的薛英江：电机系的激进派，上面提到的“偏在寒中俏”战斗队发起人邹世友的同班同学，于是我问他：“你还砸吗？”他显然也很激动，回答我：“不砸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得很乾脆：“砸派要把我们打成叛徒，那怎么行？”

４月１２日，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举行全团辩论大会。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人跑上台前写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是一锤定音了。人一旦陷入宗教狂热就必然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教义的的盲目崇拜，并任由这种盲目崇拜所掀起的激情泛滥，放纵自己而随波逐流。革联会既然是一月革命的产物，而一月革命又是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的历史创举（《８１５战报》第十五期：“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的再次严正立场”），再对它怀疑不啻是无知，而完全就是触犯天条了。这样一来，以后的行为只需要诉诸情感的神圣激发而不必再作任何理性判断。这一次辩论会，已经没有任何杂音。

重大八一五需要用行动向世人宣示自己的统一意志了。四月十五日，周末，他们和师专八一五、重建八一八等沙坪坝区的造反派组织以纪念八一五事件８个月为名，举行串联游行。队伍由沙区出发，途经小龙坎、石桥铺、大坪、两路口直涌市中区，一路上，人越汇越多，到解放碑——日记载：“已经汇成了数十万人的洪流”——这个说法显然很夸张,不过，反正谁也没点过数，场面总之蔚为壮观就是了。第二天，八一五派又在尚未涨水淹没的长江珊瑚坝集会，日记载：“近百万支革派冒雨召开誓师大会”，这个“近百万”，显然也是很夸张的数

字，同样也谁没点过数。会议题目是“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实际目标当然谁都知道是要炫耀支革派的实力。我已经记不起54军的首长们是不是到了会。而李井泉诸人绝对是参加了。他们是会议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只要恶狠狠 地把他们揪到台上低头示众，就表示了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作为对等的行动，为了表示自己的大方向也始终正确，砸派决定在下一个周日（２３日）也开一个类似的大会，题目定为：“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为此，他们向“伪革联”发出一份“勒令”，令其交出李井泉等诸道具供其批斗时使用。对这一道难题，革联会是很当一回事的，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会议商量对策。已被激怒的八一五这次没有给八三一们好脸色了。秦安全代表重大在会上发言，称：首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向刘少奇开火，砸派砸烂革联会显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其次，砸派砸烂革联会,本质上是企图否定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最后，秦提出了一个很有震撼力的全新观点：砸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萧、李、廖翻案。萧、李、廖是指早在１９６３年5月在重庆市委２０次全委扩大会就被搞掉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据说三人因为上书中央状告李井泉在四川的种种问题，而状纸几经辗转，又回到了李井泉的手上，对此，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政委”当然决不轻饶，严令重庆市委对三个犯上作乱的胆大妄为之徒严加整肃。三人原均为重庆政坛的年轻才俊，萧为市委组织部长、李为副秘书长、廖为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都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心腹爱将。无奈李政委催逼太急，任虽欲保挟过关已不可得，李甚至威胁任说，如不处理萧、李、廖，就得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市委书记只好上演一场挥泪斩马谡的苦戏。三人虽被统统革职，三年后的１９６６年6月，重庆市委为保自己过关，又旧帐重算，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把肖、李、廖这三只“死老虎”又拖出来作为重庆“三家村”的黑后台大批特批一通。不意仅过数月，市委头目便纷纷落马，而且连气壮如虹的李井泉自己也摇摇欲坠，这时的萧、李、廖，确实想和罗广斌一样乘机翻案，还一个清白男儿身。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首都三司确实在三人身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北地东方红”早在１９６６年底即把李、廖秘密接到北京，住进地院，后又悄悄弄到成都，转入四川大学，要他们揭发李井泉问题,企图像刘、张一样，把他们作为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秘密武器。几十年后，我曾问过八一五总团的核心人物黄顺义：对此情况，你们当时是怎么知道的？黄回答我说，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么秦安全哪儿弄来的情报呢？就不得而知了。重要的是，该情况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本身就让人耳目一新，这就够了。秦指出：在这次运动中，市委的实力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以肖、李、廖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当前砸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些不甘于失败的少壮派翻案、反夺权!秦读书时一直是学生会干部。在饥饿年代度过青春期、个子普遍偏矮的一代人中间，秦算得是身材一流了，用现代术语说：帅哥。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当中，他出道较晚。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伊始，他一直被派往全市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作，校内鲜为人知。他第一次回校亮相，是“１２４事件”后，在那次关于罗广斌组织“赴京告状团”和“联合指挥部”问题的辩论会，他的演说一鸣惊人，从此后，他便以办事稳健干练而在总团里声望雀起。他的演讲词虽无周家喻的煽动激情，但却事理俱在，逻辑严谨，很有说服力。一言既出，常常满座为之叹服。

革联会的这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砸派如果不用“勒令”，对革联会的称谓上不用“伪”字，可以考虑将道具给出。否则：坚决不给。

作为报复，４月２１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组织，对北碚地区支革派召开的“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发起造反。大会地点依然是北碚解放台，正是八三一头目周荣一帮人的耻辱地，所以造起反来怒不可挡。其时，

重大８１５宣传车正在会上奏乐助兴，八三一们一涌而上，顿时把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了稀吧烂。８１５的传单叙述此事，说那一批铜管乐器价值上万元。在当时，这是足以把人吓死的天文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不过说它值钱倒不假。再说，从造反一开始就一直掌握在重大业余文工团员手上的这批乐器，每次游行，特别开始，全重庆的造反派都还非常寒碜，这批铜管乐器在队伍前面一列队，一走步，一吹奏，确实为八一五大壮行色。感情很深了。如今这些宝贝被反目成仇的八三一们公然砸烂，八一五的愤怒可想而知。消息传来，正在重大集会的师专附中、一中等八一五派，立即和重大学生一起，杀气腾腾，直奔北碚示威而去。示威人等一律身着民兵装，腰扎皮带，有点北京高干子女在"红八月"搞红色恐怖的劲头，吓死人的。次日，不依不饶的重大及沙区学生上万,继续盛怒游行。被砸坏的宣传车、广播器材、铜管乐器等等，全数随队展示，作为砸派挑起武斗的如山铁证，在市中区上、下半城杀气腾腾地绕行一天。再次日，砸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就是上面说的"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的大会，八一五继续以牙还牙，对本来就不甚庞大的游行队伍实施围堵、嘲弄、捣乱，弄得人数本来就不多的游行，整整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方才了结。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是５月６日公布的。四月下旬，已经开始盛传被川大八二六（当然也包括西师八三一）捧红的刘结挺、张西挺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活动，即将正式成为四川省最高权力机关革筹组的组阁人，甚至一、二把手。对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砸派，这消息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时候，不知从北京什么地方已经传来了所谓"三十六条权经"的政治秘笈，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记得。如第一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又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又如："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又如："谣言重复三次就变成了真理"，还有什么"与其花十倍的力量去掌握一门技艺，不如花十分之一的力量去交一个精通这门技艺的朋友"；还有一条十分要命："诱导对方犯错误"。作为少数派的砸派，显然想抓紧时间激化矛盾，刺激人多势众的八一五过于自信同时便过于脆弱的神经，诱导他们犯错误。４月２７日，政法兵团心血来潮，公然开着队伍直接跑到八一五的腹地重庆大学示威挑衅，大骂八一五"右倾"、"叛徒"、发誓要"砸烂伪革联"。这一队区区人马，自然被重大学生轻而易举便赶出了大门：政法兵团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开重大，他们便径直开到市委大院静坐去了：强烈抗议伪革联挑动群众斗群众。１９６７年四、五月之交，革联会所在的市委大院，已经乱麻麻一团。政法兵团这次长达五天的静坐，把这种混乱推向了高潮。

严格意义上说，砸派这次静坐质量实在不高，因为当时我在报社上班，天天路过看见,他们的静坐显得太随意、甚至还又点游戏成份，毫无悲壮可言。说游戏成份，是因为户外太阳大了，大家就到办公楼的门厅里去吹电扇，躺沙发；天凉一些,又到地坝来坐着聊天、唱歌，喊喊口号。"战友"声援、慰问来了，大家彼此热闹热闹，口号便叫得更响些，而"声援""慰问"者一走，办公楼前的大坝上就仍然稀稀拉拉坐些人员休闲。既然对方没有激烈行动，革联会也就不想理会，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整个过程只有八一五小股骚扰，其中，有六中３２１１１者来贴过几条标语："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好耍"、"电扇＋沙发＝静坐？"、"祝政法砸牌把地球坐穿"、"静坐只能触及屁股，不能触及灵魂"——我对这次静坐的全部印象，好像就这些。

问题是，这种长时间的不战不和终于让双方都觉得应该找台阶下了。于是突然传来消息，说砸派预谋，要在五月二日那天对革联会采取行动，准备冲击办公大楼了。时间是凌晨２时，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啸而起，数千学生于是紧急集合，稍事动员，便迅疾开赴城区，将市委大院里坐得迷迷糊糊的政法砸派突击合围，以几对一的悬殊力量将对方拖的拖，

推的推，赶的赶，稀里哗啦便驱逐出境。事实上，警备司令部的军人早已等候待命，重大８１５刚把政法学生驱赶出门，他们便已出现在现场，以制止武斗为名将双方隔开，接着出动军车五辆将大街封锁起来。

几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情节，客观地说，８１５和警备司令部的行动配合得默契如此、严丝合缝，真正的预谋者显然是他们无疑。宣扬危机或者制造紧张空气往往可以凝聚军心、激励斗志：我记不起在“三十六权经”里是否有这一诀？反正八一五总团的学生领袖们肯定是这样做的。而实实在在面临危机的砸派，当然不愿忍气吞声受此窝囊气，于是迅速在全市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对市委大院实行反包围。当时，重大８１５的主要人员已经得胜返校，留下守卫的军人太少，无法抵挡砸派如潮攻势。入夜，军人已多人受伤,眼看大院即将失陷，支革派组织的数倍于对方的兵力又及时赶来——这一次，砸派见好就收。他们显然不愿意进行一场显然会丢掉的战斗。扔下一地的汽水瓶、废纸、垃圾，他们主动撤了。

事情当然没有完，人的仇恨，和爱一样，一旦埋进心底，就会像种子埋进泥土，它要么它被遗忘、死亡、消解得了无痕迹；要不它就定然会顽强地破土而出，长得浓荫参天，长出比它自己大得多、多得多的累累果实。埋在砸派心里的仇恨，在１９６７年夏天的山城，催生了一片血雨腥风。

十五•沙市纱厂险遇

前面说到，四月六日至七日，重庆市八一五派的权力机构革联会常委会作出了六条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庆棉纺六厂，下同——笔者注）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事后，革联会确实很快这样做了。

关于沙市纱厂“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情况，５月１０日出版的第十期《红岩》报第二版“棉纺六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调查报告”一文（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四月十七日撰写）有如下叙述：

六棉纺织兵团“于元月二十八日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所掌握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在四清运动中被列为四类干部的厂长王ＸＸ和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曾ＸＸ（保卫科长）、屈ＸＸ（厂办公室主任）等，惊魂稍定，又立即支使已垮台的工纠中的顽固分子，于二月二十三日拼凑了一个新的保皇机构——重棉六厂’二七’分团……／六棉’二七’分团，在革联会和区ＸＸＸ部长的支持下，于三月十七日晚，借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到该厂’镇反’为名，行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进行反夺权之实。当时区公安分局的政法兵团何ＸＸ说：’把章交出来！如果他们夺错了，我们帮你们夺回来。’当晚革联会也去了三人，其中王庭学（一直隶属于八一五派的工人组织“二七兵团”一号头目——笔者注）也表态说：‘二七分团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缺点和错误’……以后王ＸＸ（厂长）等一小撮混蛋，还拉大旗作虎皮，欺骗群众说：‘三月十七号夺权，警备司令部是支持的。当时就是早夺了两个钟头，若迟两个钟头，警备司令部还要派一排人来支持夺

权。’”

关于上述过程，和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第十期《山城战报》四版消息所报导的大同小异，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在此不赘引了。关于反复辟夺权，《山城战报》的消息则有如下报导:

“四月三日，市革联会组织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三中抗大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单位部份战士开始进厂，配合着该厂的广大革命战士，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大造声势,协同作战，在兵团战士的凌厉攻势下，几天之内，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御用组织、纯‘工纠’变种——六厂二七兵团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四月七日,兵团战士在毛纺厂红岩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协助之下，把大权重新夺了回来，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之所以印象特别深，不为别的，就因为我觉得棉纺六厂太远:位于九龙坡对岸的李家沱。大学时期担任业余美术队队长，每年都要找借口组织同学到四川美院参观。从沙坪坝到美术学院所在的黄桷坪本来就够遥远了，而李家沱，从黄桷坪还要前行，到了九龙坡，还要乘船渡江才能到达。美院同学的写生画中有那么多薄雾漫漫的九龙坡、灰蒙蒙的长江和江对岸依稀可辨的李家沱，而我，直到文化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了,才因了纺织厂的公案，第一次去了那儿，周围的景色自然十分新鲜，所以我能肯定这则消息是我写的。连带的记忆是，为该消息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革命尚未成功，刀枪不能入库”也是我写的。

这则长消息的眉题是：“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长革命左派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正题是：“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逆流”。副题是：“他们重新掌权,扬眉吐气，振臂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共占了一个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语录:“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 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可谓气势汹汹了。

相比之下，《红岩》报的调查报告对于造反派的重新夺权的记录就很显无奈，有点言不由衷了。报告只在最后一段轻描淡写地谈到：“虽然在四月七日，革联会的人来假惺惺地支持六棉革命造反军’红日’纵队和纺织兵团把权夺回来了。这是真的支持吗？……现在工纠变种六棉’二七分团’在高叫要砸烂革联会！他们又是真的反革联会吗？不！是周喻打黄盖，在演双簧，迷惑群众，革命的同志们！警惕啊！”

按常理推断，既然革联会那么一本正经，而且完全公开地把“二七兵团”打成“右派”，打成“阶级敌人”，——需知：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人最高级别的政治定罪——罪犯可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宣判者“演双簧，迷惑群众，”吗？几十年后，如果要实事求地叙述这件事，我以为只能这样说：当权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能不把真心巴结他们的重棉六厂“二七兵团”一脚踹回他们原来的位置；“二七兵团”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幸而成为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那个撰写调查报告的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呢，不幸的是，偏见让他们跑得比无知离事实更远。至于我，则因为这篇文章，莫名其妙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生活故事。

整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４月１７日，我和报社编辑冉隆太一道去灯泡厂采访。该厂保守派的“反夺权”在重庆的代表性仅次于六厂，而且对该厂造反派的“平反”——据说——是革联会军方代表54军首长

白斌副军长亲自前去处理的，足见对此事的重视。行前，我和冉先找革联会军代表郝子义了解情况。郝，５４军某处副处长，在革联会分管政工。郝身材魁梧，络须满腮，很有军人的棣棣威仪，与亲善平和的刘润泉相比，正好形成强烈反差。１９６７年烽火连天的８月２２日，郝同另三位副处长、一位处长分乘三辆吉普从市区返回警备司令部听报告，途经两路口，遭遇占据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砸派枪手的袭击，驾驶兵颇多战地经验，在公路上绕“之”字作狼突虎奔，全速驶离射击区，皆因火力过猛，仍有多人中弹，死处长１人，伤副处长等５人。郝很幸运，仅击中腹部，大肠外流，经救治后无大碍。后５４军调防云南，郝继续派地方支左，在昆明市革委会分管政工。另一副处长曾惠民股骨被击中，整条大腿截肢，后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党委书记。我在昆明时曾去看过他们，话说重庆当年，他们依旧感愤难抑。中印战争，打得那么厉害，５４军牺牲者最大不过营职，而重庆一日，竟伤亡六名正副团级大员！对于砸派的怨尤，自然很难平抚。

且说我和冉走进郝办公室，正好有二人坐在沙发上与郝唇来舌往，语多冲撞却似不激烈。见我进门，郝乘机顺水推舟，向二人介绍道：“他就是报社的，你们问他吧！”我正觉奇怪，二人已经发问了，说：“重棉六厂的文章是谁写的？”我快语答道：“我写的。怎么啦？”来人于是大声叫好，说今天要找的就是你！要找的就是你！你快快给我们平反!我明白怎么回事了。遂反问：“谁打你反革命了？”我毫不示怯，我说：“处理六厂复辟是革联会的决定，你找我有什么用？”“我们就找你!”目标既定，对方不依不饶了：“你把我们两千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坚定不移地大喊大叫：“我们就找你平反!”

只是，毕竟在政府领导机关，毕竟我的态度十分强硬，更重要的是，对方毕竟保守派出身，保守派在单位里一般都是领导的乖宝宝，敢于斗胆来市府找麻烦，已经就很难为他们了。二人和我纠缠半天，实在拿不出半点杀着，只好讪讪撤退。撤前，二人壮胆问我名字。我得意洋洋，宣布：坐不改名，走不改姓，我叫周某某。 二人悻悻走了。

大约第二天，革联会即通知我作为报社代表去六厂听意见。同行的是分管政法或者组织的军代表，李姓，瘦而高，不苟言笑，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这次是革联会派车专送，我们很快便到了九龙坡，渡长江，上了李家沱。六厂几百职工等候已久，球场上黑压压一片，我们一下汽车，要求“平反”之声便不绝于耳。为首的那天曾在郝办公室见过,他把我们领进一间屋子：很大，象是食堂，还没落座，跟涌的人便已将我们二人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平反的口号声又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进场，落座，我莫名其妙想起了古老的三国故事：关云长单刀赴会。我记得当时我很平静（反正有军代表压阵）。再说，他们全是些老保，老保就只会嘴巴上嚷嚷而已，口号喊破嘴皮又怎奈我何？会场组织得糟糕透顶,看不出谁主持？谁拿主意？反正就任凭群众一个劲儿地乱吼乱叫。李代表正襟危坐，以逸待劳，我也正襟危坐，以逸待劳。老保们有点儿害怕惹出反军嫌疑，不敢怒对军人，于是呢，叫骂声便全冲我一个人来了。吼去叫来，无非还是要我平反，还是骂我黑笔杆、烂笔杆、臭文人、死文人等等。待到大家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这才一声断喝：“革联会派我们来听意见，你们谁说，谁就说呀！乱嚷嚷干吗？”

满场顿时鸦雀无声。好一会，又有勇者带头吼叫，满场马上又此起彼伏了，口号声再度山呼海啸。待到又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再次断喝：“我们今天专程来听意见，你们乱吼什么？你们没诚意，我们现在就走!”

这回没人害怕了，反正会场没人主持，军代表话音刚落，喊叫立刻启动，而且吼声更劲。军

人已不耐烦，金刚怒目，拍案而起，宣布："你们既不想说意见—— 小周！咱们走！"

这一猛拍，真地个又把四周吓坏，会场再度鸦雀无声。军人已拉我出场，人们只得退潮一般乖乖闪出一条路，让我们大摇大摆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围攻者如此之多，从大厅一直挤挤地排到球场：我们的车就停那儿。工人们继续抓紧时机对我吼叫，依旧是要我平反和臭文人烂文人之类，只是加入了若干口水——就是没人动手。关上车门，我们便轰隆隆溜之乎也。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多亏老保！多亏老保！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

事后第二或者第三天，上午，编辑部正开会，两个不速之客上楼来了，怯生生向众人发问，说周某某在不在？前次的上访者记住了我的姓，但对我的名字却只模模糊糊记了个音，故而来客所报二字都不正确。正主持会议的军代表问他们找谁，他们又重复了一次——军代表马上回绝了，说，报社没这个人！接着继续开会。二人无奈地下楼走了。

过一会，又换了两人上楼，又问周某某在不在，依旧怯怯生生，依旧把我的名字报错了。军代表依旧很快回绝，二人又怏怏地下楼去。会议继续进行。只是我自个儿心里却暗暗有所预感，他们肯定是找我麻烦来了，编辑部就我一人姓周。而且来人肯定就是重纺六厂的。我担心意外事情就要发生。

果然，下班下楼，窄窄地坝已被人群围得满满宕宕。其他编辑先走了，我、军代表和刘福最后出现，顷刻间被团团包围。有人已经辨出我来，于是大吼："就是他！就是他把我们两千革命职工打成右派！"。我们三人是被分割围困的。对军人不敢造次，很快放行了。军人顺势把刘福拉走，接着来拉我，但已不可能。我被围得里尤其紧凑，局面是一人对数百，无法脱身了。我孤军奋战，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今天的抓人行动组织得挺好，没谁乱吼了。为首的肯定告诉我：

"要你跟我们回去！"

我问：跟你们回去干吗？

回答：给我们两千革命群众说清楚！平反！

对抗是没有用了。我爽快回答行。但我必须吃了饭才能出发。

大院里已看不见人来人往，没有谁可以对我施以援手，唯一的办法只有拖延时间，再寻机会。老保确实就是老保，为首者姿态很高地说了："行，我们就等你吃饭。"他通知弟兄们原地等候，接着亲自带彪形汉子数位陪我一道前往食堂。一路上，首领明确威胁：把话给你说清楚，到了厂里，群众对你的态度不满意，发生了什么过激行动，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毫不示弱，也威胁他：我出了事，你敢不负责！一路舌战，走进机关食堂，食堂早已空无一人。径直打了饭菜，我一个人便开始轻嚼慢咽。我当然吃得极慢，因为我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借机观察动静，拖延时间：情况已经清楚了，食堂所有大门都被彪形汉子封锁，逃跑已经完全不可能。

几十年后，如果有谁要我说说市委机关食堂的印象，我想，那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前市委书记任白戈。任早在七月份就被中央文革通过报纸点名，打下去,真正算得是“死老虎”了。其他书记常委什么的，全都宝贝似地被群众组织东一个、西一个地抓去监管起来，而他，谁都不想管，交给革联会一放了之,反倒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和我们在同一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不管有无空凳，任白戈反正是只能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对于该罪大恶极的走资派，只能卖给低价位的菜，如清水白菜之类。我曾有意识靠近他吃饭以作近距离观察，有时乾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清汤菜肴，而他每次都吃得极负责，满嘴咂咂有声。他的心态绝对正常，我想，因此呢，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硕壮如初，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显出了有多落泊，像大字报漫画上的丑形。我如此观察他完全出于好奇。因为６６年８月我曾写过一篇大字报，便描绘了此公的住房。那年代成年累月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学习大庆“干打垒”精神，先生产后生活什么的。可此公常住人口好像就仨（他，夫人华逸，还有一个上音乐学院的宝贝女儿），却住了花园一院，别墅两幢，一中一西。其间小廊回合，曲径通幽，道不尽的幽静闲适。那时他已下台，人去楼空，胆大包天的中学生便逾墙而入，把他的公馆整个儿打开办了个展览，而这个展览让众多在“干打垒”和准“干打垒”里艰苦度日的山城老百姓大开眼界，一如当初党委组织大家看阶级教育展览，据说，有工人还当场大放悲声，说真是修了真是修了，如此下去，劳动人民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我曾就该展览会写过一份传单，题目就叫：《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传单后被选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革联会“斗批改指挥部”编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录》。传单专门提及，说任的屋子里有“电扇６台，梳妆台１个、收音机３架，地毯１３条，缝纫机１台，海绵运动垫２张……”这一连串数字当时实在让人咋舌。重庆造反早、造反派多，任白戈公馆展实在功不可没。

机关食堂给我印象深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厂人员抓我那顿午餐。彪形大汉严把各个大门，我还有何心思吃饭？因为故意延宕时间，所以对食堂就观察得特别仔细。我第一次发现食堂那么大，空旷，任何小小动作，都会引起空空回响。大汉们发现我饭已吃完，于是急不可耐地催促上路。其时，大院小路还不见人走影动，离上班时间一定还早，于是我又找借口说，六厂的事情具体由组织部门人员经办，必须找他们和我一起去才能处理。呆头呆脑的老保们又非常宽厚地同意了。

大汉们再次跟我在大院里乱窜。当时，我满脑子都是抗日影片中游击队的“磨菇战术”，我别有用心地带他们到处兜圈儿玩，故意找些根本没人的房间，冬冬冬冬乱敲一气,确实无人应答，马上又另找一间再敲。左串右跑，对方终于发现了我的阴谋，不准我再敲了，只管紧催上路，并且继续预告说群众将会有过激行动云云。正在绝望，厕所却突然在我前面出现，我顿时惊喜万分：因为只有我清楚，厕所后的隔墙正在维修，扒开了一个大缺口，从正面是看不见的。我克制住跃跃急切之情，镇静地通知对方说：“行，我走。我去厕所解解小便，解了就走。”

除了保守派工人的老实巴交之外，剩下的就是我的运气了。大汉们傻呆呆地等在路旁,我却已身手矫健地翻越厕所围墙，溜之乎也。墙后是市委领导宿舍区，一幢幢小楼掩映在初绿的林中，我如脱笼狡兔，破网游鱼，一口气急穿而过，心中说不尽的紧张与快愉。其实，翻过围墙那一刹那，我就确信已经脱险，但我还是跑得很快。我个子瘦小，体育活动的唯一强项就是长跑。这个好习惯一直坚持几十年，至今能在老迈之年保持旺盛精力，盖得益于斯。穿

出宿舍区，下坡，是一溜烟的石阶，左边是科委机关，右边又是什么的，这些我全熟悉，跑到底，面前就是巍峨高耸的人民大礼堂了。正好有公共汽车开来，我跳上去，直奔望龙门码头，然后上轮渡，船行大江，长风浩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在南岸姐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学校呆了两天。报社是有电话的。大约当时信息意识差，我没打电话，到第三天下午，径直便又回市委大院去了。从上清寺到市委大院,几百米长的路上人头拥拥，极多，走进大院，人更多，熙熙攘攘，像是赶农贸市场。反正那段时间来此走访寻事的人很多，我自不在意。匆匆忙忙登楼，刚进办公室，刘福就惊诧诧喊起来，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怎么啦？不可以回来？他说：你没看见下面这么多人？我说：看见啦。他一声长叹：坏了！那些人就是抓你的！在下面静坐好多天啦！声援的、轮班的，人越来越多了！

全编辑部的人都为我没被发现而庆幸，又为我如何脱身而忧心忡忡。很快商量对策，最后，想了个主意，立即派人行动。编辑们下楼去，不知在哪儿找来一架很长的竹梯，悄悄绕出大院，进了报社侧面的一户居民院内，从那儿把竹梯迅速架了上三楼：我于是神不知，鬼不觉，援梯而下，穿出居民院，出门，上坡，又趸上市科委旁那片山坡，顺三天前逃命的路径再度直奔望龙门码头，再次渡过长江避难去了。

重棉六厂的二七兵团，后来正式成为了坚强的“反到底”派，即砸派。

十六·重庆问题解决前后

重棉六厂抓捕我的事情发生不久，我便返回学校了。并不是害怕他们再找麻烦，不是的。而是：当时北京已传来消息，说中央认为重庆情况特殊，其问题将在四川问题解决后单独处理。这消息当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毛主席党中央确实太关心山城人民了！还有鼓舞人心的是：总团勤务员秦安全通知我立即回校做资料工作，以备上北京参加会议。我自然喜出望外，兴冲冲返回学校了。据日记载，时间是５月１日，打那时离开《山城战报》,我就再没有以该报编辑人员的身份回去工作过了。

事实上，还在四月底，为了配合四川省和重庆问题的解决，重大８１５就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百人赴京战斗队”开赴首都开展活动。领队是吴庆举。他非常喜欢主持这类具有悲壮色彩和轰动效应的活动，而且在这类活动里，他总有自我牺牲和独胆英雄一类的上佳表现。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重大８１５绝食两天而后徒步上京，数千人呆在北京展览馆及几所中学里孤立无援，凄凄惨惨切切，那一次，便是吴带领一帮人去府右街中央文革接待站苦守多日，终于等来了那位虽为国人却必须随时带翻译说话的夫子陈伯达接见,老头的福建话谁也听不懂。那一次，吴在中南海门口守得确实太漫长也太可怜，以至有一天他自己已痛感顶不住了，遂从府右街捎回一封信，倾吐满腔苦水，甚至对此次北上行动表示了许多绝望。这封信连夜向寒卧北展地铺的数千同学宣读,当即便有意志脆弱者失声痛哭。那一晚我也在，九月秋凉，辗转无法入睡，便和几个同学起而谈议，直到东方之既白。此时，军号忽然响起，紧催集合，一脸乾瘦的总团勤务员黄顺义跳上石凳，声色俱厉地向众人宣布：昨天晚上，吴庆举的信把

形势估计错了！现在，我们重新估计！黄激情充沛，演说进到高潮，他总喜欢把话停下来，嘴唇咬得紧紧的，全身凝然不动。他的坚定把大家重新鼓动起来，一直顽强坚持到陈老头接见，算是给刚出道的８１５挽回了许多面子。返回重庆已是子夜，数千人在山城绕行示威，一路高呼“我们见了毛主席!”把睡意朦胧的重庆市民搞得云里雾里。１９６７年4月的重大８１５当然老练多了。其时，北京舆论几乎一边倒。清华《井冈山》报、北地《东方红》报等配合四川、重庆问题的解决大造舆论。《山城在浓雾中》、《妖雾迷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之类耸人听闻的文章就累累登在那一段时间的显赫版面。仅仅读读标题就足以吓人一身冷汗。同样自命不凡的８１５决定披挂北上，对首都三司进行正面抗击。临行前，在８１５广场举行仪式，宣誓出发，威威乎激烈壮怀，有点北上抗日的感觉。他们满以为威师所至，一定所向披靡。其实呢，这一次的遭遇并不比１９６６年9月那次好，甚至可以说糟糕得多：既然北京的“救世主”们在重庆被８１５砸过抄过，现在你送上门来，首都三司当然决不手软，要来个一报还一报了。８１５到北京不过几天功夫，北地“东方红”就两次派人光顾他们的住地东大桥接待站——东大桥是新落成的一片住宅区，居民还没入火，政府就临时安排上访人员呆下了——首都造反派冲进住房，把他们从重庆带来的告状材料一抢而空，撕毁战旗，还“绑架、毒打我赴京汇报战士”。好在“重庆崽儿”生性刚烈火暴，素多亡命之徒，住地被砸,百十号人立即开到中南海门口去宣誓，把胆儿壮足了，又开去北京地院找“东方红”抗议示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寡不敌众，自然少不了又被一顿好打——事后，告状团的同学对我说，他们正在无可如何之时，突然间一彪单车队呼啸而来，一色黄军装、一色铜扣皮带、一律红色无字袖标。飞车队迅速实施包围，继而皮带如长鞭上下，对准“东方红”们便一阵乱打：８１５趁机溜了。后来知道，飞车队原来就是恶名昭彰的“联动”份子。刊登于《８１５战报》第十九期头版、写于4月２７日的《告首都人民书》，以及刊登于《８１５战报》第二十一期头版、写于5月3日的“誓词”，除了向首都市民介绍伟大的重庆一月革命和８１５的忠于毛的拳拳苦心，同时也倒出了在首都遭遇的这段冤情。“重庆崽儿”的强硬态度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作为参加解决重庆问题的代表赴京工作，曾和赴京战斗队的同学们一起住东大桥，十来天，“东方红”就一直没再来找麻烦。８１５在窗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墙上两条字体斗大的对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横批：“坚决自卫”。那画面，分明就是一个月后重庆大规模武斗在首都的试用版。告状团的主持人吴庆举已在几年前作古，而另一些总团勤务员对此事都依稀莫记。我只能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和自己的记忆对告状团的活动记略如上。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是5月6日公布的。紧接着果然接到正式通知，指示重庆问题单独处理。要驻军、革联派和砸派三方派人上京与会。两派群众组织各出代表３５名。

革联派的代表是9日晚１０点乘２０次特快出发的。所有代表先在重大党委办公室集中，统一做了交代，然后齐赴车站出发。会上到底交代了什么，现已无法记忆。我只记得上车后我和后来担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熊代富临座。两天多车程，随时随地都能聆听他讲大好形势，讲革联会地位如何之固若金汤。熊系冶金系二年纪学生，性格素多稳健，为人为事周到慎密，在重大八一五总团内部，他和秦安全属同一类色彩，具体日常工作也就他二人做得较多。熊的谈话给人总的感觉就是字字有据，很权威。革联会如此优秀，如果中央不承认，事情就绝对邪门了。

５４军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等是１０日飞京的。其时，我们列车正在路过我的家乡成都，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早上，车过成都……街上一片荒凉，站内也一

片荒凉／我们在想，重庆是光明的重庆，重庆的革联会有很大的成绩，甚至可以说是一面红旗吧。这次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毛主席既然指示重庆问题要单独解决，那么，一定不能与四川问题的决议那样处理／欢笑的车轮，铿铿锵锵地载着我们充满希望的心，驶向北京……”

我们１１日晚抵达北京，其时，军方代表已经向全军文革作过了长达三小时的汇报，并整理了书面材料上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赴京告状的重大校业余戏剧队的张田春和美术队的傅运政、彭支云等人到车站接了我们，那一晚，我们就在东大桥接待站和同学们一起过了夜。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北京的春天，风沙满天里弥漫，空气乾燥，第二天一早就发现鼻子出血：所以我对那段生活记得很清楚。熊代富、秦安全等一早就去５４军将领的驻地,当是面聆机宜去了。我非核心成员，在东大桥和同学们玩了一天。

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是我们到后的第三天，即１３日进行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汪东兴、王力、关锋诸人与会，群众两派各选十人出阵。砸派七人先行发言，而后革联派三人发言。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已无任何具体可供回忆的材料，我的日记只有如下几句：“我们取高姿态，而砸派以谣言含量达９０％的咒骂向我发起攻势。我们摸了他们的底，心里更踏实了，决定下次全面反攻。”这些情况很可能是参加会议的勤务员们告诉我的。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日记，以为自我感觉不错的我们，其实幼稚得实在有点可以。政治领域的所有结果，其实都不能用神圣、正义之类的概念来议价的，而是上层集团利益和实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特别文革。学生充其量只能成为上层行为的背景点缀而已。重庆问题怎么处理？说穿了,得看文革派和军方在分配权力方面如何讨价还价？而毛准备如何从中平衡？从事后知道的情况,这次会议砸派由谁出席？由谁发言？发些什么言？都是由首都三司圈定的,而首都三司背后无疑是中央文革浓厚的影子。同理，８１５谁出席？谁发言？发些什么言？也一定有军队在幕后提词。事实上，接见第二天，即5月１４日，便有了四川省革筹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八条意见上奏。这些意见如此快捷精准，和后来公布的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丝丝入扣，他们一定是在得到了上面的授意才能如此写出。让群众代表到接见厅去象征性地发发言，不过是给热血沸腾的造反群众下点毛毛雨，安慰安慰罢了。

１４日那天午后，我应召赶去西苑宾馆。５４军的耿参谋长正就中央重庆解决问题的意图向８１５的代表吹风。中央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肯定驻军而绕过革联会，以驻军为核心重新组建革筹小组。山城数月，两派群众诅咒发誓、闹得你死我活的，不就是对革联会这个心肝宝贝，一个要“誓死保卫”而另一个要“坚决砸烂”吗？８１５巴心巴肝，喊了如此众多口号，写了如此众多文章、对口词、打油诗、甚至还有歌曲，什么“新山城嘿战鼓敲，一月革命卷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了权，滚滚长江拍手笑……革联会就是好，革命红旗永不倒!”现在被中央一句话，便像扔废纸团一样，轻轻松松扔一边了：对于稳操胜算的八一五们，简直无异于噩耗惊雷。这帮政治上的榆木脑袋们完全不明白，肯定驻军，不就是绕着圈子肯定了８１５吗？他们就知道否定革联，就是否定了自己而肯定了砸派。耿话犹未了，满屋已乱成捅开的马蜂窝，一片嗡嗡营营。好像要找谁而又不知道该找谁拼命似的，大家就发疯似地向楼下跑。耿参谋长闪到楼口，大张双臂阻拦：其实,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到哪儿去？只知道楼梯是唯一的通道，于是就死命往下挣。耿个子不高，但壮硕结实，稳站如钟，确然将大家拦住了。我们几个站后排的人已先冲下楼，正遇春风得意的张西挺站在大楼

门口等车。看见这帮凶汉涌来，她一定吓坏了。我们确实认为发现了最佳的泄怒对象，都冲上前去揪她。张且战且退，跳上汽车便绝尘而去。

我已记不起后来两天是怎么渡过的。大约还怀抱着某种侥幸心理吧，以为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中央不了解重庆的真实情况所至。我们还有机会向首长报告的，而且相信最后结果定然会对革联会有利。可惜，中央首长们那样忙碌，哪有闲功夫和你们罗索？两天后，５月１６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王力一干人等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第二次接见驻军及两派代表。关于重庆问题的中央文件已经敲定。两派群众代表进场之前，周、康、杨、王等已经先见过了５４军领导谢家祥、白斌、耿志刚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等，想必该宣布的都已宣布过了，该交代的也都已交代过了。根据笔者保存的那次接见的记录稿，周恩来一走进群众代表的等候处就开宗明义宣布："四川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都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接着点名让八一兵团的张益代表８１５派发言，紧接又让江陵厂砸派代表发言，江陵代表一说完，周恩来就说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接着便开始宣读中央决定，并逐条作出解释。"决定"凡五条，其意略谓：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李井泉、重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任白戈；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三，"立即建立"由５４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吸收各派群众参加；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五，要拥军爱民，云云。

我的日记记载了会外人当时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两方的同志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是决定双方政治生命的最最关键的一步，结论会怎么样呢？"站在这儿的造反派们应该说都是些重庆最自命不凡的人，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最不自信的人。站在夜幕里沉默不语的大会堂巨型圆柱之下，就象惶恐的囚徒喘喘不安地等待终审判决。中央领导们对群众代表的接见实际是从１７日凌晨１点１０开始，至３时３３分结束的。双方群众都已无法忍受这种漫长等待的折磨，回驻地去了。

参与接见的两派各十名代表，他们躬身其中，对事件的真谛，比一般群众当要先知先觉些。笔者比较了中央的正式决定和前面提到的张、梁、刘、张四人的意见，虽然大意无甚出入，而正式决定对驻军的肯定程度，却还有甚于四人意见。如：四人意见仅仅说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而正式决定却明确肯定："有显著成绩的";四人意见说到驻军在处理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式决定就乾脆将此话删了。难怪事后，砸派一个代表曾说，听完五条，心里明白权还在５４军手里，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而从接见的记录看，８１５的代表周家喻，当时信誓旦旦地向周恩来和康生表态要解放全人类，要到保守派产业军去做工作，当算是明白人了。但局外的同学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千里之外的重庆，事情更加糟糕，局面失控到有点象好莱坞大片里峰回路转的悬念故事。

留在重庆大学校内主持工作的，是勇者激情有余而智者柔韧不足的黄顺义。八一五所有人员心里都堵满了乾柴，星星之火就足以点燃燎原烈焰，而黄的失控理所当然成为了最早的火星。

５月１７日那天上午，他和同僚们异常紧张地一起守候在电话录音机旁，瞪大眼睛看着总团的女值班员将北京来电逐字逐句记录纸上。四周如此安静，只有磁带机嘶嘶旋转。当最后一句话记录完毕，中央文件终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革联会”的字样，勤务员们顿时傻了眼。他们的感觉肯定和那位砸派代表的感觉雷同：“怎么会是这样呢？”问　题是，他们对于领袖毛、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崇拜，几个月来，已经那么根深蒂固地物化为了对革联会的崇拜。对于革联会的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无疑于整个世界的颠覆。天崩地裂，大家不知所措了。马上召开总团会议传达辩论：吵得一团糟！接着在阶梯教室召开小组长会辩论：同样一团糟！下午，乾脆在风雨球场召开全团大会辩论，情况更严重了。动力系四年级学生杨宪腾第一个跳上台，他的发言劈头盖脑第一句就是：

“给老子啷个搞起的!”

杨出身一个十分可疑的家庭。父亲在共产党接管大陆前夕跑了台湾，留下孤儿寡妇苦度日。按当时标准，算是标准的黑五类狗崽子了。可他活得十分性情，很轻松，文革中该造反他照样造反，该骂谁他照样骂谁。这种性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以“低姿态”为宗旨的《横眉》报的主编。毕业分配时，有人告他一状，说他骂过“林彪是奸臣”“江青是婊嬉”而被弄来“学习班”和我们一起写交代。虽然当时我们都竭力帮他开脱，但内心里却对他的口无遮拦深信不疑。５月１７日杨的演说火色一定很足，出格的话一定多多，这是肯定的了。接着柴天琪发言。前面说过，柴是学校专业辩论组的组长，他的演说想必更具煽动性。革联会是八一五的圣殿，圣殿倒了,大崩溃似的惶乱势不可免。大家认为 100 多人到北京工作，做了这么久的工作，结果弄得中央还不了解真实情况：告状团的人首先就该打屁股。至于中央呢？一贯英明伟大的党中央为什么也糊涂如此？无线电系李姓学生曾怒而在六宿舍前写出标语：“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算是极而言之了。最后，留下唯一的、天真烂漫的悬念就是：这五条毛看没有看？林看没有看?重大八一五在当天发表了一个“对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反映了当时的集体惶恐与迷乱。“声明”继续自以为是地宣布“重大８１５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继续毫无意义地为不复存在的革联会招魂，同样自以为是地宣称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声明”发誓要“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声明”还怒气冲冲地警告：“山城砸派从二月黑风以来,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必须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否则，坚持下去，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矛盾 就会转化。”最后，他们高呼“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陡然降临的绝望使八一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理性，洋洋洒洒数千字，通篇竟然没有半个关于中央“五条”和拥护“五条”的字样。这个严正声刊登与 5 月１９日出版的《815 战报》第二十一期。

与此相反，５月１７日成了砸派的节日。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反正“伪革联”没有了，他们就算大获全胜，于是大游行，于是喜洋洋，满街都是他们欢呼五条的标语，满街都是庆祝“伪革联寿终正寝”的口号，文化宫的大门前扎起了两座纸做的“伪革联之墓”，倒吊着纸扎的象征革联会的“癞格宝”，不少顽童还用竹竿吊着真正的癞蛤蟆满街欢跑。

砸派的欢呼极大刺激了八一五脆弱的神经，于是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敌手的圈套。五月十八日，八一五派迷迷瞪瞪地举行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击示威：“誓死捍卫革联会”。好像国破家亡，要

复仇，要救亡了。整个气氛极其悲壮，极其严峻。重大八一五队伍自然最引人注目，走在最前边的是一群体工队员，人高马大，个个手握军用皮带，杀气腾腾地簇拥着一道革联会的金字招牌，上面还扎着红绸，接下来是巨幅标语：“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整个游行队伍中仍无一条关于拥护中央五条的标语，反之，革联精神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对中央的不满分明写在每一张杀气腾腾的脸上。

一贯以大方向正确自居的八一五气还没出完，神还没有缓过，砸派的大标语已经铺天盖地而来：重大８１５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坚决揪出重大八一五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５４军肯定是急了。十分明显，重大八一五一旦滑坡，整个重庆的局势将不堪设想。　５月20 日，驻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韩怀志、参谋长耿志刚一行人等，火速前往重大发表演讲，稳定大学生情绪。虽然中央文件刚刚批评了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可大会上，驻军代表还是公开接受了重大８１５的袖章，并表示“能作为一个８１５战士，我感到很光荣。”并明确宣布，他们是来“向同学们学习，趁这个机会给同志们作个汇报”的（白斌语）。军人的态度如此真诚谦恭，学生们还有什么好说呢？于是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重大八一五永远忠于毛主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上任伊始的革筹组长蓝亦农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文件经“毛主席批了的、林副主席看了的”这个真实性作了确认。他说：“八一五总团的同志……要我们打包票，我们所有的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一致打包票。”接着像幼儿园阿姨那样给大家讲了一个津津有味的故事，说５４军参加１９６２年的中印之战，大胜对方，缴获枪械无数，他们在５０００多米的喜玛拉雅山上把敌人散落的武器收起来，擦好——上级却通知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全数交还对方。“指挥部的同志有的哭，有的气……当时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发愁。这时马上来了一个电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政治工作的就很高兴了，就把这句话传下去，全体指战员没说二话。大家议论这是为什么？说不出道理，只晓得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这个故事顿时赢得满堂彩。他还在演讲中明确宣布：“（军队）过去坚决支持你们，今后坚决支持你们、相信你们！（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今后“如果不依靠你们，不相信你们,(我)就是光杆司令”。对已经笑逐颜开的大学生，他又面授机宜，说：“看问题要看得远，看一千里，革联会是临时的，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更上一层楼”——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八一五派有名的口号:“革联会开新宇，革筹组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白斌副军长的演说更从感情上对学生们进行了煽动。参加过当时会议的人，至今还记得白讲的一件事，说三中抗大兵团给５４军军部打来电话，“他们一面打电话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说希望我们给重大八一五作一些工作。重大八一五是重庆八一五的旗手，这个红旗不能倒。说我们三中抗大兵团看着他们。我们思想上也想不通，但五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就要坚决照办（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团小将学习！毛主席万岁！)。……这是中学生将了大学生的军，这个军将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为什么中学生不能教育大学生呢？完全可以。（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是不是大学生更书卷气呢？相比之下，八一五的中学生们确实更懂得实惠，下面这句有名的口号也出自于当时的中学生：“方糖也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笔者注：铲铲为四川俚语，空空如也之意）。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演说和激荡满场的口号，必须承认，中国军人确实不愧为政治工作的典范、一流的煽动家。当然，当时的大学生，思想水准和娃娃差不多，两者一结合，效果自然

很快显现出来。就在这一天，重大八一五发表了“再次严正声明”。除了继续重申“重大８１５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除了抽象地继续表示要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高呼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之外，已经不再具体地要誓死捍卫什么，这些条文的位置也在声明中往后挪了。第一条是：对中央五条“最最坚决拥护”“最最坚决执行”；第二条是坚决拥护由蓝、白、唐等人组成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从“严正声明”到“再次严正声明”,时间间隔不过前后三天：这个弯子实在也转得太急了些，不免有点羞羞答答，言不由衷。“再次严正声明。”不像两天前的“严正声明。”那样气壮如牛，放在一版的显著位置，而放到了四版的尾巴上。第一版刊登的是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159 号)，即“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五条原文，接着是一个号召学习的通知，为了淡化五条，在号召学习“红五条”的前面还故意加上了号召学习“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要大家明白：“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毛主席说了算，八一五照着办。”工科学生就是工科学生，政治家们应有的厚脸皮，他们半点没有。以上这些，都发表在姗姗来迟的５月２６日出版的《81５战报》第二十二期上。

２１日，八一五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与会人数号称２５万。会议主题是：“坚决拥护中央五条”、“革筹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山城八一五派英勇奋斗的胜利。革联会好，革筹小组更好。”革筹组长白斌到会讲话。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热热闹闹折腾了几个月，这一个回合算是尘埃落定了。“中央五条”，从而革筹组的存在，已经无可置疑：这使两派都面临了新的、巨大的难题。大凡执着于宗教信仰的人，当厄运骤至，他们要么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要么果敢拒绝，以死相争。８１５和砸派都是些信仰坚定的人，他们对信仰的执着不亚于任何狂热的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实现心灵上的安慰；真实存在的上帝就不一样了。他健在，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都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这些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只能是尴尬和无奈。骄矜自负的八一五这边，原来，他们所感知的砸派，就是颇似小丑的徐光明、和他那个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红岩公社》,而如今，在他们必须遵循的红头文件里，砸派突然间成了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一大派，他们必须学会与之平等生活。再说砸派（后来很快更名为反到底派），他们和成都的川大八二六一样坐过牢，在云诡波谲的政治搏奕中做过太大的风险投资,他们应该得到巨额回报了。川大八二六原来不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小小支队吗？而现在一转眼却成了把红成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主流。西师八三一呢？相比之下，他们收获的利润就太可怜了，充其量就平了个反，让他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依旧两手空空，依旧什么实权没有。枪杆子还在八一五一边。他们依旧生活在枪杆子的阴影之下。

十七•我所亲历的六五大血案

上面说到的、有关中央五条下达时重庆大学发生的荒唐故事，我不在场。当时，我正在由武汉开往重庆的船上。

从北京返回，我没有坐直通火车，而取道武汉，乘轮船溯江而上。取道武汉，一是因为革联会被否了，我心情太差，想乘机去看看三峡风光。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这条风景线路我在早几年前就曾走过。主要原因是：我有个姐姐在武汉工作。我叫她七姐。她是我们家兄弟姊妹中长得最漂亮的，我从来认为把她的照片登上当时最受欢迎的《大众电影》封面，绝不会逊于任何当红明星。而这也不是主要的，更要紧的是：她是我们家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共产党党员。因此我一直就把她视为我们家族的骄傲和我生活的偶像。整个大学时代，凡遇思想问题，我都给她写信，而一收到她的回信，我的思想问题总是非常愉快地顷刻化解。比如：上大学时，家里每月给我寄１２元生活费，这１２元的消费内容首先包括９元的伙食费，然后是书籍费、洗理费等等，甚至还要从中省出假期返家的车票费，够紧张了，比很多领助学金的同学还困难。于是我就向校方提出了每月３元的补助申请——姐姐一听就急了，马上来信对我讲述国家如何困难，青年人应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等，同时还寄来姐夫成色尚新的旧衣服旧胶鞋各一：我羞愧难当了，马上找老师收回了申请。当然，遇到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向政治辅导员忏悔，只是政治辅导员太一本正经，而姐姐的教导却充满暖暖亲情。

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武汉地区的文革形势本来就晦明莫辩。姐姐是共产党员，姐夫是南下干部，大小属于“当权派”级别，文革中都已经失去光辉。他们自己也面临许多困惑呢。在姐姐家呆了两三天，憋得难受，很快离开了。从武汉到重庆整整需要五天工夫。５月２４日一早出发，２８日下午才到达朝天门码头。下面的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5月２５日。万里晴空。／船在辽阔的大海一样的长江上航行了一天。／山城的斗争，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在船上，什么都听不到。

5 月２６日。阴。/已经第三天了。昨天下午三时，船过沙市；今天凌晨２时，船过宜昌，逆流而上，便已进入西陵峡了。大约四点过，从梦中醒来，披衣起望，两岸已是群峰壁立，岗峦起伏，淡淡的夜色里，构成一道暗蓝色的长城／在船上，真的像到了世外桃园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消息都听不见。”

5月２７日，星期六。雨。/船在航行。/驶过幽暗的峡谷，绕过险恶的滩头，白天黑夜，不倦地前进着，驶向山城……/船没有在奉节过夜，今天上午９点，船到万县，刚一停船，我马上就跑上岸去，我多么想在大字报上找一点关于我们重庆的消息！/街上，大字报很多，但关于重庆的消息很少。在一个剧团门口，喇叭吵得特别厉害，在一条一条地数落重庆伪革联的罪状。/另外，在街上还看到一个重大８１５和建院８１８合办的宣传拦。上贴《８１５战报》和《８１８战报》各一。８１５战报是5月１９日出刊的，第一版是重大８１５关于重庆时局的严正声明，口气很硬/在街上，还有所谓重庆来信，嘲笑伪革联垮台了，重大８１５公开写大标语反中央。并一半人上京告状云云/我的心啊，早就憋不住了。它飞了，飞到战斗的山城去了。/此刻，我们的８１５，到底怎么样了？……”

重庆等待我的，是一派刀光剑影。中央五条没有给山城带来和平。尘埃落定，八一五已经明白自己是真正的胜利者了。他们显然希望不战而将天下一统之，于是便以胜利者常有的宽容挥舞橄榄枝，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呼吁和平，仅5月31日出版的《８１５战报》２３期一期，就有如下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止内战”、“同

志，你的枪口对准谁？”。 6月3日第２４期又发表大块文章：“致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停止内战。但８３１心里明白，同意对方的和平呼吁无异于束手就擒。他们与其被蚕食消解，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一年前,刘少奇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用仇恨帮助毛泽东培养了一支别动队，使毛顺利开始了倒刘运动，那么现在，二月镇反炼炉里煅烧出来的,就不再是那么听话的天兵天将了。他们已经窥破政治斗争的许多诀窍。他们是潘多拉魔瓶里放出的魔鬼。八三一必然不会傻乎乎地任人摆布了，他们懂得要夺取政权，必先搅乱局面，从而寻找机会。于是，就有了不断升级的舆论：“警惕没有伪革联的伪革联”、“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誓与山城赵永夫血战到底!”，重庆也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摩擦。赵永夫是当时青海省军队的一位将领，据说因镇压群众而被中央点了名。

下面是我能根据日记能回忆起的事件：

５月２８日，砸派召开大会粉碎炮打中央的反动逆流。称：“重大８１５不投降，就叫它灭亡”。８１５立即回敬：谁要８１５投降，先把头颅交上。

５月３０日,重大８１５四名学生前往重庆医学院张贴大字报,遭对方围攻并殴打。回校时，全团正在风雨球场召开辩论会，于是疯狂的掌声把被打的同学簇拥上台，其中一位沿半圆形台口绕行一遍，将鲜血淋淋的背部展露给全体同学，顿时激起满场怒不可遏的仇恨旋风。

５月３１日，８１５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邹茂林“烈士”追悼会。邹茂林系重庆石油学校学生。怎么被打死暂无资料可考。《８１５战报》２６期上有一篇邹茂林母亲的悼念发言，题目是:“红卫兵勇献青春，烈士志气贯长虹”。发言除了一些流行的豪言壮语和孩子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的事迹，对邹的死情只字未提。因此现在我只能知道他死时仅仅１９岁。而刊在《８１５战报》上那张稚气未脱的照片，则完全可以确认他定然是母亲面前的乖娃娃。

６月2日，重大８１５数百人前往重医递交照会，就5月３０日同学被打一事提出抗议，又遭医学院及航锋（河运校砸派）毒打。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人们懂得了，对于景阳岗上的老虎，没有什么可以忍让的余地。武装起来！用战斗粉碎反革命的进攻！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一把弹弓，每人一根棍棒，每人一顶藤帽，把每一座大楼，都筑成一座堡垒。”关于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到了现实的样板，某天去石油校，天已快黑净，可校园内依旧一派繁忙。男男女女，全是半大的中学生，来来往往地扛石条，用废纸包石灰、用铁锤砸石块以作“弹药”，在每一面窗户上挂草帘以为掩护。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时的繁忙景象毫无二致。重庆大学的校园后来武装得就更现代化：当时沙区最高的建筑物，六教学大楼门前，甚至架设了七弯八拐的管道和巨大的高压喷射装置，其威力足以致人死命。

自从二月底我离开报社，《８１５战报》就一直由何国光、周兴福、李文全等几个电机系和动力系的高年级的同学操办。北京回来，无所事事，好像已被疏离于主流群体之外,我终日晃荡。六月七日，晚饭后，正在无聊，王太康、蒋元伟二人突然兴冲冲闯进门来，大声问我:敢不敢去打砸派？王太康即８１５事件第二天和我一起去北京告状的那位亡命之徒。而蒋之亡命程度又远在王之上，保守派甚嚣尘上的１９６６年秋，他曾独自闯入数十人的包围圈，爬上几十米的高烟囱顶将”麻子兵“的大喇叭强行撤下，英雄独胆，让保守派惊骇唏嘘！整个文革期间，蒋好像都未明确呆在某一战斗组织，总是四处奔走，如绿林之游侠，在最精彩

的地方，总能遇到他在其中张扬。毕业后亦如是。九十年代末，他从贵阳电厂总经济师位上归隐，才一直与麻将为伍。蒋、王二人当年都是舞蹈队队员，身手矫健。在他们眼中，我当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了。我正年轻气盛，自然不愿怯场，遂答:有什么不敢？走就走！

于是，他们递一根金属棒给我，接着一起爬上卡车，开到三教学楼停下。三教学楼是采矿系办公大楼，该系同学下矿实习时都由学校配备劳保用品，藤帽极多，大家进去一人取一顶戴上，就出发了。车开进距重大不远的重庆师专，暮色迷茫的操场上已经停满卡车,足有好几十辆。车兜里挤满武斗人员，手中全都举着棍棍棒棒，多无顶戴护卫，装备不如我们精良。满场气氛鼎沸，全不像是去冒死拼杀,而像是去观看世界杯足球大赛一样兴奋。不一会下雨了，雨滴绵密如丝，飒飒啦啦一片。这时蒋、王二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又从哪里回来了，急冲冲地把我拉下卡车又带我钻进了一辆莫名其妙的大客车，要我躲雨，上去了,我才知道是指挥车。熊代富，就是后来的重庆市革委的副主任，正和一帮人紧紧张张商量作战方略。他是这此行动的总指挥。

天慢慢黑净，雨越下越大，卡车开始编队出发。雨太大，路滑，车启不动，就命令大家全都下去推车轮。马达轰隆隆嘶吼。推车人满身泥水，惊咋咋呐喊。光柱里，雨丝如麻,人车乱成一片：让人很容易想起历史巨片中大战将临的镜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将要干什么去。

这就是：去北碚，亲历重庆文革史上著名的“六・五血案”。

届时为止，这确实是双方有预谋、有组织、大范围、调动了大量人力、器械、运输工具的最大一次武斗，一时间成了两派舆论渲染最多的事件。６月１６日出版的《８１５战报》２６期，几乎用了全部版面报导此事，文章计有：“一腔热血怒澎湃，洒去犹能化碧涛——记西师六五大血案”、“西师８３１炮制六五大血案铁证如山”、“杀害解放军的凶手，往哪里逃!”、“何其残忍！何其狠毒!”、“勇献青春谱壮曲，笑洒热血写春秋”、“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文章有铺垫、有高潮、有细节，而且每个细节都惊心动魄，通读文章，宛如重读战争年代的悲壮故事。比如，写到”八三一“将“春雷”围困三楼，然后准备实施爆炸一节，文章道：“暴徒们点燃两枚雷管的引线。引线在迅速地燃烧。大楼在危急之中！二百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就要毁于一旦！／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高大的身躯冲上二楼，猛地扑向炸点。’轰——’雷管爆炸了！这个身穿绿军装、背着水壶的解放军战士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大楼没有炸毁。……他的共产主义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关于事件的准备,《８１５战报》则刊登了若干八三一战士的揭露材料，其中有刘ＸＸ说：“六月五日中午，我大队勤务员说下午有个统一行动。下午约两点半，同学通知我到美术系办公室，并叫带上棍棒……约三点到了总部，周学昌（勤务员）说今天下午攻新图书馆，把春雷赶出来……约四点，广播里吹起了冲锋号。见很多８３１战士手持棍棒冲进图书馆大楼。总部门前的宣传车（北碚反复辟指挥部，是井冈山）高叫：‘春麻挑起武斗’……周荣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武化大革命。四川最后是枪杆子解决问题，最后逼你拿起枪杆子了。’”还有张ＸＸ说：“５日午饭后，总部通知中文系大队的全体战士把基建科的铁器搬办公大楼上，搬完后回到宿舍。这时是两点半左右，班勤务员个别通知说，等会儿广播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开始行动，反穿衣为号。”这些材料估计是后来被俘的西师八三一人员在提审时的供词。以上资料，有一些，现在可以依据逻辑判断进行证实或者证伪，有些却不能。但是，正如控制局势的８１５想稳定大局，以求一统天下一样，处于劣势的砸派要寻找重新分配权力的机会，必然要搅乱政局、打破均衡，这当是毫无疑问。几十年后，把那些偏颇的、过于离奇的成份剔除，重

新叙述这段历史，我以为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先是，西师八三一总部设在中文系大楼。离它不远的山头上，图书馆大楼新建垂成，算是个制高点了。勤务员周荣事前曾主张占领那幢楼，尚未动作，却被春雷抢了先手。春雷占据大楼之后，立即着手修建工事，据称，其间还有若干外单位的同派工人、学生参与抬石扛木之举。工事既成，装于楼顶的高音广播便开始日日刺激八三一的本已十分敏感的派别神经，按八三一的说法，算是"挑衅"了。据说八三一人到食堂吃饭路过，也有被春雷掷石子击中者。于是周荣便有了充足理由，向勤务组坚决提出：把楼抢过来！这样，经过一番策划，八三一在西农８２６、川外８２６、十三中"九八"、河运"航峰"、重庆医学院等数百人支持下，于六月五日下午向大楼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是一座刚刚断水的建筑物，由阅览楼（主楼）和藏书楼（副楼）两部份组成。主楼高四层，副楼高六层，主楼二楼有天桥和副楼相通。八三一从主楼底层和藏书楼同时攻入,将春雷完全困到主楼的三层以上，既后便将二三楼之间的楼梯用炸药炸断，既后又用火烟炙烧熏烤，火中还加上些辣椒、六六粉之类辛辣刺鼻之物以加强熏烤效果，显然是想将春困死楼顶。事前，春雷已有所准备，用汽油铁皮桶装了好些凉水，还准备了饼乾之类的干粮若干。听说前来劝架的解放军还用吊篮送去了一些食物，这样，春雷得以艰难困苦下坚持下来了。被困第三天，即六月七日晚，八一五经过精心策划，几十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于是在莽莽夜色飒飒风雨中出发了。

从沙坪坝开车到北碚，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可那天晚上我们的车却走了整整一个通宵。天黑如墨，行动又力图隐秘，车速就极慢。更严重的是，途中不断遭遇袭击,行车就更谨慎了。开始是在双碑，正行进间，车龙突然停了下来，估计前面遇障碍了。一辆吉普车在密密雨丝中逆向而来，车轮吱吱作响，车上人一路用手电筒直射天空——这是约定的信号——我们立即用手电光回应。指挥车位居车队中间。吉普车在我们面前急停，侦察兵随即跳出车报告，气喘嘘嘘说前面山谷已被砸派用石条封锁，且两边山头疑有伏兵,车队不敢前进了。总指挥熊立即开会商议并作出决定：令后面的人全部下车，徒步前去包抄山头，打掉伏兵，占领隘口后抬开石条，然后齐喊杀声冲杀而过。等位居后面的空车开到，抢夺隘口的人员再行上车跟进。

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久便得侦察兵报告，说山头已经攻占，隘口已经疏通，指挥车于是下令所有车辆全速前进。那一刹那，我记得非常清楚，恐怖万端的"杀"声在旷野里呼啸而起，真的个撕心裂肺，震天慑地。所有汽车顷刻之间提至全速，疯牛狂奔，猛冲而前。闪过隘口那一刻，瞳孔急剧放大，我看见两边站满手握棍棒的人，乱石已被扔向路边。有那么一刹那，山上好像有一根木头滚下，还有一个人跟着滚下来，没及站稳，被我派人员发现，冲过去，一棒将其打翻在地。

出了峡谷，几乎凭借一种惯性，车队继续狂野奔突。周遭黑不见指，我们如坠虚空，如临地狱，直向一片未知空间坠落。突然间，惊天动地的破碎声砰然炸响，让人顿然觉醒,很快发现客车两面的窗户被砸得粉碎，碎玻四溅，石飞如矢，我们车厢里已有人被砸得尖声怪叫，头部血流如注。前后的车队中也叫声一片——知道中了伏击，于是急令停车等待,并派人下去向道路两边的田野搜寻追击。俄倾，平静无事了，车队又缓缓启行。雨脚已住,野地里云路俱黑，什么都看不见，害怕再遭伏击，车队只敢边停边走，缓慢而行。时近凌晨，好容易快挨到北碚了，突然又得报告，说前面隧洞里闪烁有光，疑是伏兵，车队只好又停下来，又

派人包抄山头，打通隧洞。当时已时近五更，年轻人都已困顿难支，昏昏欲睡，不知又过了几时几分，等到把山头占领，曙色已依稀放明。驶车行过，隧洞里原来是红农八一五点着火把在那儿接应：算是闹了一场误会。次第到达北碚，天已大亮，大战将临，大家顿时倦意全无。当地妇女老太箪食壶浆，送来稀饭、咸菜、点心和鸡蛋等物，我们一点都吃不下，急急开车奔现场去了。

现场场景让我大吃了一惊，以至几十年后我叙述这一节，还能记忆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原始部落的械斗图画：废墟般的楼顶站满了人，都光着身子，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脸、手均被熏得漆黑，头上扎着棉花（大约没有头盔，故撕开被子以棉代之），白色。每人均手持棍棒，活脱脱一群头顶插满翎毛的印第安土人木立蛮山荒岭。楼间尚有火烟缭绕，其味刺鼻。山城六月，很热了，飘绕的火烟让人更觉酷热难耐。此情此景，让我心中不觉大骇。

大队人马的突然出现让八三一猝不及防。八一五还暂不知如何动手。双方于是对峙。很沉寂，如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的指挥现场设在楼旁不远的几株树下。四周作了布防。地上摊开一张示意图。熊等就蹲成一圈商量攻略。接着召来许多建筑工人，又运来木料若干。很快钉成云梯几把。接着，指挥人员用最古老的办法：射箭，与四楼的春雷交换了信息，攻略便布置完成了。一会儿，春雷从四楼扔下几根长绳，攻方拉过绳头将云梯捆好，冲锋号就凄厉响起：总攻开始了！云梯很快被拉上三楼，顷刻之间，武斗人员便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大楼涌扑而上，由云梯攀爬而上，多数是中学生，什么装备都没有，光着头,全不顾矢石如雨。很快，有人被砸，被伤，被坠，血流横飞，喊声震天，但无人畏缩，一个个只是奋勇争先，前赴后继。飞石是从二楼倾泻而下的，如瀑，如雨,飒啦啦掷地有声。三、四楼的春雷为掩护冲锋和登楼者，便奋力向二楼洒石灰，扔石头。云梯上偶有伤者坠落，但更多人已冒死上楼，爬进窗口接应疲惫不堪的“春雷”。

我站立旁边呆看了一会儿，便禁不住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急，并且急不可耐。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拼命，所有人都在生和死的边沿撕杀，我不想成了局外人。于是提起棍棒，我冲锋向前。杀声和石雨在我头顶呼啸那一阵子，我什么也没想过，我不想证明什么，也不想取得什么，所有动作完全都是情绪使然。人是很渺小的，如潺潺小溪。也许命运会让你在阳光下蒸发，变成云，到天空里自由翱翔，变成风，去吹动船帆和磨房的风翼，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会被大河急流所裹挟而身不由己，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你也只能跌落而下，这是你无法选择的。你为世界炫示了一幅壮丽的飞瀑图，而你自己，却被砸得粉身碎骨。——就这样，我冲上去了，冒着如雨矢石，在重庆第一场最大的血与火的撕斗中。我不愿意胆怯，我就想和谁拼命。

主楼一楼的几个方面已快突破，唯正面大门堆满石条，又有厚厚的黑板阻挡，攻击人员甚显薄弱，我就向那儿冲过去。先是，双方通过大门上方的天窗互扔石头，外面人多石头多，火力凶猛，很快把敌方压倒了，于是人员就冲上去搬石条，用棍棒砸黑板。里面的敌人大约已无东西好扔，于是突然扔出许多点心和茶叶鸡蛋之类，攻方多为中学生和农民,一见掷物中有如此美味，马上停下进攻俯首拣拾，一边拣一边揣物入囊。眼见得胜利在望而这般人如此眼浅，我怒气中涌，跳出头疾首大呼：不要拣！不要拣！话音未落，里面已经一阵乱石抛出，当场砸得贪小利者惊呜呐喊，这才不敢懈怠了。我于是成为领袖人物，我大声呐喊，指挥大家扔石还击，同时命令大家把堆积如山的石头抬开，同时喊叫着砸黑板。黑板很厚，结实，砸了很久才砸开。破门了，跨越而入，冲进大厅，其他几方大门早已洞开，八一五呼啸涌进，

八三一惶惶作鸟兽溃散。

冲上二楼，已全是我方人员了。二、三之间的楼梯已经炸断，众人一边搭木板把“春雷”接下来，一边又顺天桥向藏书楼冲击。藏书楼空间狭小，窄窄楼道更被胜利者挤得水泄不通。事实上，“大八三一”们早就跑掉了，有没有跑掉的，人数已经极少。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层楼一层楼地向上溃去。八一五人多势众，从楼梯通道用急雨狂飙般的石块开道，呼啦啦尾追而上，还有一些人就用棍棒冲打楼顶的铁皮－－书架是混凝土整体浇灌的，为了通风，在书架处预留了一排排空档，其上叠放着一层层可以上下挪动的放置书籍的铁皮隔板。隔板捅开，其余人就通过空档向上猛抛石块。八三一已兵败如山倒，很快退到六楼：无处可退了。我们到达了制高点，如苏联电影之攻克柏林，红旗应当插上国会大厦了。只是空间太窄，也没有红旗好舞动，面前就一大群惊恐万状的战败者，我方于是得意洋洋高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造反派们平时都很非常慷慨激昂，动不动就喜欢“誓死”这样“誓死”那样的，可一旦面对真刀真枪的敌人，举手还是举得很痛快的，而且一个举得比一个快。也有举得稍晚一点的，胜利一方正好就有了表现自己英勇无比的机会，于是便毫不客气地一棒打去，打着哪儿是哪儿：头部、肩部、胸部、臀部……只要打得出血打得叫唤，哪儿都成。可惜满屋子很快就连举得慢的人都没有了，只好就砸碗、砸水瓶、砸洗脸用具什么的，好像器皿也属砸派观点，都该挨砸。

现在我承认，我也是这帮冲上六楼的胜利者之一。我也用棍棒砸过碗、砸过水瓶、砸过洗脸用具，直到把它们砸得粉身碎骨、七翘八拱－－而且，我也抡起棍棒打过举手迟缓的“敌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完全投入地打了人，我已记不起我打了谁？打到他什么位置？把他打疼打伤没有？总之我是打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盲目而疯狂的情绪彻彻底底主宰了整个全身。我已经不属于思想而属于恶魔般的激情。这大概就是小说书所说的“杀红了眼”吧？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手上有一柄钢刀，我完全可能和对方来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几十年后，每想到那场景，我都如恶梦般地困惑：那个冲上别人的图书楼抡起乱棒砸东西打人的家伙，是我吗？他怎么会那样呢？读者们还会在下面的文字里读到重庆武斗许许多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在重新记述它们的时候，有时还不由自主感到恐怖而全身颤栗，我不敢相信这些只可能发生在历史小说或地狱里的故事曾经发生重庆的阳光下，发生自己身旁，发生在同学、朋友和亲人中间！他们都是那么可亲可爱，在若干公众场所甚至还十分腼腆。他们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如此残忍的杀人者，或者无辜地被杀？这种困惑和痛感逼迫我把自己的文章写下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悲剧，而不会在现实中——面对计算机的荧屏，这时,我必须认真地清理清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人，那么迅速地异化成了野兽？

下面继续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发生在西师的故事。

俘虏全部押下楼，一清点，多是北碚地区的中学崽儿。事后，“八三一”的宣传材料说有三百壮士遇难。我以为这个数字太夸张。因为藏书楼一层空间就那么大，根本容不下如此众多好汉。“战斗”结束，我曾溜哒到大楼旁边收容俘虏的平房去看过，俘虏全蹲在地上，由带队者领颂毛语录。还发了点心，并通知家长逐个领走。大学生就十来个，全押回重大了。

事发第二天，重庆街头就出现惊人消息，说西师八三一在“六五血案”中有“三百壮士”跳

楼，其穆烈悲伟丝毫不让于抗日战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消息再次把我打懵了。我承认，在我过去所写文章里，叙事不实者有之、夸张骇听者有之，究其原因，最多不过道听途说、派性偏见而已。在亲历了惨烈血火的切肤之痛，发现舆论与真实竟如此天差地别，这确是第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打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的胆儿也突然间忒大了，我也让哥儿们马上写出八一五的悲壮故事：在施家梁遭劫中，八一五有“八百壮士投江！”。从此以后乃至很久，甚至大学毕业后到了遥远边疆，在全民“庆九大、献忠心”，即庆祝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向毛敬献忠心的活动中，写通讯稿、写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材料”，我都一直沿袭红卫兵遗风，胆大妄为、随心所欲、信笔由僵，爱怎么写怎么写，极大提高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发稿率和好稿率，深得领导赏识。当政治理想和支撑它的革命理论还是一种信仰的时候，人们的所有行为，不管崇高、愚蠢甚至荒唐，却必然都是真诚的。而一旦发现政治仅仅是一种功利，人们就会把支撑它的理论当作一种武器了,就和商人手上的金钱一样。为了实际功利，原本十分神圣的理论简直就成为婊子，爱怎么耍弄怎么耍弄，可以搞权谋、可以夸大其词，可以欺骗，可以造谣，可以假冒伪劣，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战地重新平静下来，满场一派狼籍。后来，对方又组织了几次反冲锋，都无功而返。该打扫战场了。

那一辆作指挥车用的大客车开来楼前地坝上，说是接运伤员先行返回。我的小腿不知何时被石块击中，这才发现已肿得老粗，算得伤员了，自然被劝上车。顺带的任务是把俘虏们解回重大。所谓押解，其实很简单。俘虏们都被捆绑得十分结实，像箍桶一样，用绳子上上下下扎了好几道箍。怕他们叫，又从地上胡乱拣些破布、臭袜子往嘴里一堵。然后像木料一样塞到座位下面。动弹都不可能，反抗绝不会发生了。让人担心的倒是：满车都是伤病员，如果路上遭到对方武装拦截，待会儿全身被捆、嘴巴被堵、像木头一样塞在座位下面的，就该换成我们了。为了掩护，车前挂了个“３１路”公共汽车标牌。全身太赃,大家就把衣服反穿：虽然依旧很赃。一路提心吊胆，遇了几处盘查，还好，都是八一五的,放行了。回学校把俘虏交给了学校的３０２，大大松一口气了。

当时重大有两只专业武斗部队，一曰３０１，性质属野战，成员多为敢作敢为、敢拼敢打的血性汉子，比较受人尊崇。３０２就不同了，负责校内治安，名唤卫戍部队，可大家更喜欢叫他们“乡丁”，以为这帮人不敢上战场，只敢在学校耀武扬威，系属：“门坎猴”。

回校第二天，有“门坎猴”兴冲冲来叫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说抓到一个《红岩》报编辑，要我去帮忙审问。现在我已记不起那俘虏姓甚名谁，面貌更不清楚：因为他眼睛一直蒙着，跪地板上。几个同学正在审问。有人还踢他小肚子一脚，我忙劝开了。并非政策水平高，前面说了，在战地，我也打过人，在捆猪捆狗一样捆扎俘虏时，在向他们嘴里塞进肮脏不堪的破布、破棉花时，我没有手软过。但事情一旦归于平静，我内心一息尚存的良知还是抬起了头。我莫名其妙觉得他有点可怜，我问他什么他都回答，而且回答得还忒老实。对于《红岩》报，其实我也知道的不多，于是就胡乱问：你写过些什么毒草？他回答写过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很快无话可问，于是就搜身。搜出几斤粮票，几毛钱，还有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缙云山狮子峰顶拍照的，四个人，拿一面“八三一”战旗，表情凄然，迎风而立。据他说是八三一被打成反革命时的留念。我马上宣布说是反动照片，必须销毁。他不表示异议，只申辩说，其中有一张是他和姐姐的合影，而他姐姐远在新疆，好不容易来重庆看他。他说钱、粮票和“反动照片”都可以交我们处理，他和姐姐的照片务请予以留还。我记得我说得很肯定：可以满足他的要求，而且钱和粮票也绝对如数退还，审问就此结束。至于后来

乡丁们把他怎么处置，我就一无所知了。听说是写了检讨，就放了。前面提到的《八一五战报》上的揭发材料,估计就是出自于这些“俘虏”之手。

说八一五优待俘虏，当然也有虐待的。这就得看什么情况下俘虏的？还看俘虏是落在了什么人手上？我看见虐待俘虏至少有这么二次：（考虑到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便公开虐待者的名字）一次据说是捉奸细，抓来一个女老师。文工团的。人不算漂亮，正因为不漂亮，所以就从不像漂亮女孩子那般喜欢出风头，让大家对她众星拱月。但这位老师演技不错，在参演阶级教育剧《年轻的一代》时，她曾出演革命老人肖奶奶Ｂ角，演得出神入化。因此我们忒尊敬她。不知道谁告密，说她奸细，就被几个原来非常尊敬她的乡丁抓了来，捆在一张凳子上，用烟头烧她的手臂，烧得她嘤嘤哭叫。我从门口路过，没进去，这么多男人对付一个女人，而且是老师，我难以接受又无法评价，只能走了。

还有一次，我推门找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也是“乡丁”。他正忙着打一个人。这人是从河运校捉来的。像箍桶一样，全身被箍了好几道箍。“乡丁”打起来就很方便。他把铝合金棒举得高高的，然后劈柴一样猛砸下去，又举起来，又砸。每打一下，“俘虏”就惨叫一声，像木头一样在地上滚一个圈。“乡丁”已经打得很累了，大汗淋漓，索性把衣服脱光，就穿条底裤，又打。见我进门，他告诉我，说这是个砸派。那表情有点其乐无穷似的。这件事，在以后的相处中成为我心中的一团阴影。

十八·六五余波：施家梁兵败和熊代富虎口余生

六十年代的北碚是个小小城镇。蔚蓝的嘉陵江水静静地绕城而过。背后是郁郁葱葱的缙云山。山下则是有名的北温泉。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摆布着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三所高等院校，算是文化礼仪之邦了。本来人就少，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富于人情味的。“六五”这么一打，双方杀红了眼，怨怨相报，很难再相处了。西师图书馆大楼被攻克之后，作为权宜之计，两派代表达成妥协：八一五势力暂时撤出北碚。

时间是六月九日，前来北碚的数千八一五开始向市区撤退，害怕被报复的北碚８１５观点居民也跟在后面撤退，熊代富带队撤离，走在最前，其后是疲惫之师，和扶老携幼各色人等。车少，就先运老弱病残，运进城，再返回来。为加快速度，车来回接运，人则不停步行向前。速度很慢，一步一步挨。后来听现场人员谈起那场面，我总会想起《三国演义》上刘玄德携民渡江时的尴尬和混乱。

意外情况出现在队伍刚刚离开北碚不远，出隧洞，行至一个叫施家梁的地方，突然有若干卡车呼啸驶来，与八一五的疲兵惫勇伤病老弱逆向而行，向北碚行去。八一五很快发现车上人员均头戴藤帽、手执棍棒，预感事情不妙，忙大叫中了埋伏！这时，从市区前来增援的砸派军工井冈山几十车人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八一五的包围，从前后两个方面将他们堵截在狭长山谷中。还好，那一路段正好是三叉路口，有一小桥，穿桥而过的一条小路可抵达嘉陵江边，八一五便踞桥狙击，掩护撤退。只是路太窄，不可能疏散出多少人，而且对于不会水性者也是一条绝路，更多的人便往旁边的山上撤退，依据高地对抗，同时漫山遍野地撤退。其

状可谓落花流水，实为“八一五”一次十分丢脸的战迹。根据笔者了解的亲历者个案，现简述如 下：

个案之一：文昌武。电机系五年级同学，和我同班。为人热情奔放，身材高大，篮球水平不俗，一直担任班文体委员。他说，他们见势不妙，立即跳上路边山坡，开始掷石还击，毕竟寡不敌众，且连续作战三天，体力明显不支，只好且打且走。山坡陡峭，杂木乱生，他和另两个同学好容易会齐，提着哨棒，像游方的绿林好汉,开始了漫无边际的爬涉。方向不清。乱走。怕被砸派告发，也不敢轻易留宿。历时三天才回到学校。他说他记得最深的是，饿得不行了，突然发现半山上有个幺店子，遂强行把柜台上唯一的食品：玻璃罐里剩余不多的硬糖全倒出来吃了。说是“借”，看他们蓬头垢面，满脸凶相，谁敢不借？借条倒是写了一张，事实上，文告诉我，他们哪有工夫去还？对方又怎敢来讨？逃命回校,幺店子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呢!更何况兵慌马乱,还有什么信义好讲？施家梁一战回来,文就逍遥于运动之外了。据我所知，文进校时好像家庭成份不错，贫农什么的，到６４年农村四清，不知怎么查出是漏划地主。以黑五类之身而如此激昂无畏参加革命，已经很难得了。一场战斗被打得如此惨烈如此窝囊，自然再没心思冒险。再说，高年级学生本身就面临毕业分配，马上可以挣钱养家了，无辜身亡，轻如鸿毛，何以面对家中眼巴巴等着儿子寄钱的老父老母？后来，文回老家去和读中学时的廖姓女同学谈起恋爱来，而且最终结为了连理。

个案之二是张国梁。机械系三年级学生。身材短小精悍。长跑尤为强项。我已经记不起他如何从乱军丛中跑脱，总之，冲出重围他就一刻不停地顺着渝碚公路向沙坪坝飞跑，一直跑到二机校，那已经是八一五势力范围了，中学生前去搀扶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遭伏击了!”然后就昏迷过去。醒来已是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是该校的学生宿舍。一个女孩子正在给他打扇。从施家梁到二机校距离相当远的。有好几十公里吧？所以大家就把他比作马拉松英雄。后来，那打扇的女孩常常来重大看他。每见面时女孩都含情脉脉。不知道二人为何没能结为伉俪？这件事在我们旁观者来说，总觉得有些遗憾。

最有名的个案，当然算是熊代富了。他太出名，所以他一旦被抓很快就被对方认了出来，而且遭遇也最为惨烈，真的个九死一生。这段经历后来曾被谁写成了一篇在重庆流传很广的传单，叫:《熊代富虎口余生记》。整个过程在该文章里记录得十分详尽，可惜笔者没有收集到这份传单。１９８９年，我在深圳某公司担任经理，曾礼聘熊作副经理。距他被抓已过二十多年，他那只被捆的手还伤痕累累，绳迹荦荦如新，整只手已变形如鸟爪一般可怕。他告诉我说，那天被抓后，先是被打得昏迷不醒，继而被对方用铁丝和绳索反绑起来后扔进西农的大棚泥地里，醒来已经不知过了几日几夜。后来又被注射大量麻醉剂,弄去北京，后来，手便整个儿无法复原了。

他被弄去北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砸派大约想把他作为人质弄北京关起来，反正北京砸派的哥们儿多。为便于运送，遂给熊注射了大量的麻醉药，又，为不让人发现，给他披一件大衣，由人以护送病人上京救治为名，在茄子溪或者离重庆更远的一个小站上了车,一上车就关进了一间软卧车厢，房门终日紧闭。这帮绑架者鬼鬼祟祟的行动很快被一个叫徐登贵的乘警看出疑窦，(他是八一五观点，也见过熊代富）一路上就开始动脑筋了。具体情节大约是：徐取得了车上同观点的人的配合，在列车到达前与北京站派出所的警察取得了联系，绑架者刚刚背着熊走下火车，立即就被警察截获了。

熊被民警截获，虽算是逃出砸派虎口，日子也并不好过。大约被公安部门是作为疑犯或者什

么身份可疑者关进某接待站，也全然没有人身自由。在重庆，熊当是个跺跺脚都能让地皮发颤的人物，可在天子脚下，他却一文不名。关着就关着，不管你也不放你。后来重大的弟兄们倒急了，派出一个强大的营救行动小组，赴京营救。组员就有前面提到的亡命之徒蒋元伟。据蒋说营救的过程也十分惊险。但年深日久，无法记忆。在深圳，虽然熊和我朝夕相处，大家忙于做生意，也无暇回忆这些陈谷子旧芝麻。他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倒是：我们到深圳不久便发生了六四事件。后来追查闹事份子追得风声鹤戾，某日，我和他一起从住地去上班，他突然对我说一句话：这下好了，我们压力减轻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遂问他此话怎讲。

他说：当局花这大力气对付六四份子，我们这些文革分子，可以松口气了。

作为整个事件的尾声，是解放军到现场制止武斗过程中亦有多人被殴打或被扣押者，警备司令部甚至为此，怒而向一个群众组织发出公函索人。这也是重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现将公函全文照录如下，作为本章结尾：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
(67)警司字第２２号

军工井冈山：

六月九日八时左右，重庆炮校侦察营一连连长陈干清率本连四十余名战士，和警司派出的部队（均系徒手）共同在西师执行调解武斗任务后，乘军车返回天府煤矿（归警司统一担任军管），在北碚渡口候船时，军工井冈山一千余人，手拿木棍，头戴安全帽，从北碚街上，吹着冲锋号，朝渡口冲来，先打、抓群众，后围住我侦察营的军车，不问青红皂白将连长陈干清、班长周长军、战士郑克俭、刘家荣等四同志，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抢走帽徽，强行抓走。十四时左右，陈等被押至西农八二六，十七时左右又押至军工井冈山总部进行非法审讯，审讯前用木棒压在肩上，铁棒压在头上，逼着战士承认“打死了人”并说：“不老实，就打死你”。审讯中，均遭毒打。二十三时左右，班长周长军等三同志被赶出门外。周长军、郑克俭重伤入院治疗，刘家荣轻伤归队。连长陈干清至今仍被扣押未放。

我们严正指出，军工井冈山必须立即释放连长陈干清，并对这一事件进行赔礼道歉。同时还必须指出，你们这种强行架走、扣押、殴打和侮辱我人民解放军人员的行为，是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亲自签发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七条通令”。在审讯我战士时提出所谓“解放军不是制止武斗，是专来打人，还说用刺刀挑死三个女战士”等一系列问题，纯属造谣。希望军工井冈山的革命同志，能够正视缺点，改正错误。否则，如对我们的劝告置若罔闻，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附：炮校侦察营战士郑克俭等同志向警司谈“陈干清等四同志被抓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主送：重庆军工井冈山
抄送：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

十九·《横眉》和《８１５战报》成都版

在关于重庆文革的史料上，６５事件被公认为首次、最严重的流血事件。打斗规模确实不小，双方动员的人都多达数千。双方以此为题材大造舆论，也算是造得够耸人听闻了,耸人听闻得有些类似天方夜谈。遗憾的是，这场血案双方都难论输赢：砸派虽被赶出了图书馆大楼，而施家梁对８１５追堵伏击，使之损兵折将，还俘获大将一员：熊代富，两相比较，８１５还算吃了点亏。于是，８１５便总结了惨痛教训，以为第一，不能老说自己怎么被动怎么受害，仅仅博取老百姓的同情已毫无意义。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得靠自己“跎儿”（拳头）大。基于这一点，重庆各区八一五派便有了建立“捍红指挥部”之举，反到底派自然毫不犹豫，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也纷纷建立。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著名的野战部队（３０１）和“卫戍司令部”（３０２）也就在这个时候先后成立。部队成立后，还专门去搬装公司延请一位武林高手作教席（名字已不详。只记得他三十上下年纪，精瘦，中等个儿，一脸英气的，如果当时有香港版功夫片上市，人们定会把他和成龙李连杰之流联系起来一起加以崇拜的），上千大学生每天在此武星带领下练拳习武，啫大的团结广场便杀声震天了，很有些全民皆兵的豪迈景象；其二，大家深刻认识到:宣传舆论也不能一味高姿态了，光一个《８１５战报》已经不行，《８１５战报》就喜欢高姿态，就喜欢煞有介事地讲大道理，训人。对于此，大家意见已经很大了，总团于是决定办一份低姿态的、专门损人骂人、让人解恨出气的报纸，这份报纸，就叫《横眉》。

当时我刚从北京回来，整日闲游浪荡。总团勤务员黄顺义就把我叫住了，要我主持。筹备会是在《８１５战报》办公室开的。参会人员有杨宪腾（动力系）、吴明才（无线电系）、龚堂光、吴红彬（采矿系）、窦绪昭（系班不详）等。这些同学就成为了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我知道自己性格使然，骂人损人绝非强项，但还是把事情应承下来了。关于刊名，开始提了好些，最后确定的《横眉》——这名字是我取的，所以火药味依然不够浓。

《横眉》于是１９６７年6月创刊，因其宗旨是向砸派作“低姿态”舆论进攻，到第二年中央“３１５”指示下达，即８１５被中央狠批一顿，该报文章就很难做了，从此终刊，不再为继。该报纸我虽也算是始作俑者，但从来没有管过。该报一共出版过多少期？发过些什么文章？我一无所记。具体主持《横眉》的同学叫杨宪腾。我之所以没有介入该份报纸，现在承认，事情和杨大有干系。

杨宪腾，四川泸州人。动力系四年级学生。八十年代移居美国，现在美某公司编写软件，１９９５年回乡省亲，专程取道深圳出境，曾同我一道小住数日。他的穿着言谈还和学生时代毫无二致，随便简单得很。有一天去珠海游玩，他唯一的一件西装外套遗失船上了，返回房间时，只见他穿一身暗红色毛衣，书包斜挎肩头，毛巾胡乱扎在包带上，一幅典型的红卫兵装扮，我于是大笑，说他：“革命大串联回来啦！”他说：“在美国，我从来随便如此！”我说：“你们美国佬不讲点企业形像么？许多深圳公司上班还要求西装革履呢！”他说：“要什么企业形像？我们老板专门拉拢国防部，做政府定单。不关我们的事！”只是谈及文革经历和去国生涯，他会流露出许多沉重和无奈。年轻时候，杨为人为事热情奔放，嫉恶如仇，嘴巴尤

其不忌生冷。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下达当晚，重庆大学举行辩论大会，第一个跳上台怒气冲冲大骂“给老子啷个搞起的”，那位仁兄，就是他。如此脾气火爆者参与《横眉》编辑应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虽然对于他印象一直不错，但要由他来担纲报纸编辑，我却有点心里发怵。前面说过，他家庭出身极端可疑，刚进大学，他报名参加美术队，正好由我主持招考，严格讲，他的绘画水平不低，但一了解政治面貌，方知乃父４９年随国民党跑了台湾，问题就很严重了。我的家庭本来就可疑,故而尤其害怕沾惹屁股上屎比自己还多的人，便把他拒绝了，作为补偿，同意他以编外人员身份参加活动，对此，他毫不介意，一直和我交好如素。文革动乱，到处都是陷阱，随时随地都是未知的厄运，我总希望有一个出身硬扎的人和我褡档，出了问题好帮忙担待些,哪敢再找一个包袱给自己背上呢？基于这一点，杨既然愿意揽事，我便趁机溜之乎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我如此机会主义，小心翼翼做人，毕业时侯，还是和杨宪腾一起被揪出来，和他同时住了学习班 ，一起写了两个月的检讨。

既然我不愿主持《横眉》，总团就让我到了成都，去协办《８１５战报》成都版。成都版五月份刚刚创刊，编辑是赴蓉挺进纵队的三位同学：王益富、黄肇炎刘新泉。王和刘都是校业余体育队队员。王习长跑，因为年级低（机械系一年级），运动成绩平平，常被高年级学生当成马仔呼来唤去，皆因写得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文化革命遂让他大出风头而自信心亦大大增加，独行校园，他总是高视阔步，鞋底如置弹簧，走路时肩头永远一颠一耸，好像随时准备向全世界发布宣言。还有一事给人印象尤深，那就是，王不知从哪儿弄来留声机一台和老唱片若干——大约“破四旧”时收缴的－－放在枕头边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来回播放印度歌曲《拉兹之歌》，而且只听过门，过门一完，演员正要开唱，他毫不留情，马上又将唱针放回起始位置：重来，嘴巴同时大叫一声：“巴实!”。“巴实”是四川俚语，“真棒”之意。听他大呼“巴实”的神态，你准会想起超级球迷高呼“好球”时的疯狂和满足：足见他的文革生涯是很愉快的。他愉快，还因为文化革命确实让他得了很多实惠，比如，参加四川问题的学习班离京回川，他搭乘便机偕５４军军官们返回,成了莘莘学子中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同学们羡慕万端，齐问他感觉如何？他愈发得意了，答道：“总而言之：巴实!”大学毕业，他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份让人羡慕不已的好工作：给十三军军长张英才当秘书。大约仕途太顺，政治柔韧性就差，一遇挫折就受不了。　　１９７６年毛逝世不久，他为军领导某某某给江清草拟“劝进书”一份。江青一倒，上面追查下来，该领导还稳如泰山呢，他呢，偏偏无法承受，拔出手枪自杀了。成都版的第二位编辑刘星泉是乒乓队员，喜欢写诗，于是就多一些诗人的多愁善感而少一份造反派的张扬。黄肇炎虽然没参加体育队，但足球踢得极好，思维慎密，做事有条有理，动手能力极强，做饭、裁衣、打家具样样精到，一个天生工程师的料，皆因为出身可疑，所以在报社内部，也只能做些具体的文字工作，出风头的勾当，就都留给低年级的王益富去处理了。

我是六月中旬到成都的，其时，成都版已经办了二期或者三期了。我参与的仅为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内容都由王等三人编写,我只是在编排、画版样等方面帮助做些技术指导。该报因我一份都没有保留，所以内容也无法记起。只记得刚到成都不几天，成都形势便急剧恶化，报纸办不下去了，我很快重回烽烟四起的重庆。王、刘、黄三人也于三个月后撤回学校。《８１５战报》成都版，成了一现昙花。

所谓成都形势急剧恶化，情况是这样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五月六日下达，就在当天，成都发生了造反派冲击飞机制造厂而该厂

保卫人员开枪还击，打死打伤数百人的流血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保守派“产业军”的迅速瓦解。按一般规律，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内部还应该有一个短暂的蜜月，可惜，红透半边天的省革筹副主任刘结挺及夫人张西挺上任伊始，便毫不掩饰地采取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政策，将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矛盾的迅速催化。６月２０日，成都军区出了一个为成都兵团、八二六，万县主力军，宜宾方面军等组织平反的公告，平反自然没错——现在找不到公告原文——估计具体措辞和政策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多有不利，按住葫芦起了瓢，没坐牢这帮造反弟兄当然又不高兴了。作为红成的铁哥儿们，当天我的日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心情。日记称：“没有什么可抱幻想的了！……除了造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还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地院的小将们把头都推得平平的，准备当反革命！／小将们呼出了呼天抢地的口号：‘生作毛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红成在大街上游行，整齐、威武、像九月的白色恐怖下那样。／红卫东的工人在街上游行，整齐、雄壮，他们高呼：‘红成小将往前冲，后面有我红卫东！’……”(“红卫东”是当时成都东郊片区红成派的工人造反组织。东郊片是成都有名的工业区，产业工人力量很强大的。几十年后情况当然大不一样了，国营工厂纷纷倒闭或者萎缩，当初为捍卫毛泽东出生入死的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成都东郊片成了成都“穷人区”的代名词——笔者注）

６月２４日，成都地院和工院的学生砸了省革筹办，据说抄出了整红成和８１５的大批黑材料。还不解恨，于是又有６月２５日红成冲击成都军区、捉拿刘结挺之举，捉人不得，撤离军区时，红成扬言要到北京去直接找毛泽东告状。那情状，好像毛是他们远房亲戚似的，只要御状一告，刘张这帮权贵就注定顷刻之间垮台无疑。于是，６月２６日，人民南路广场（即今天府广场）隆重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欢送红成小将北上京城。由是，开始了成都文革历史上有名的千人上京告状大行动。这次活动一定艰苦卓绝。从８１５战报３２期的报导：“七月十日，陈伯达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广元军分区，要军区派一武装班护送红成一百名代表上京／红成地区总部已于七月十一日早五点二十一分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一百名代表乘３４次车从广元赴京”。６月２６日出发，７月１０日才到广元，很艰苦了。关于这次行动的另一份原始记录，见于黄肇炎八十年代的一份说明材料。其时，重庆大学重掌权柄的一两位当权者对当年造反的学生总有骨梗在喉之感，于是四处发材料、搞外调，如追索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黄肇炎其时已在云南边疆群山之颠某炸药厂任总工，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科技奖项，尽管如此，远在母校的那一两位当权者仍不想让其轻易漏网。黄于是做了如下交代：“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因支持红卫兵成都部队北上告状,受挺进队派遣，随同红成去北京。当时纵队负责人是郑全体、张正茂、童正荣。我们一行 20 多人，由童正荣、何培余带队，同行有刘兴泉、陈开阳、李川荣、张胜科、覃文发（担任总务）、任开祥……7 月 7 日到达北京，住二轻部接待站。到京后，我们在重大８１５驻京联络站的领导下参加文革。驻京联络站负责人是动力系曾世明……”

上北京告状，尤其徒步上京告状，对于重大学生绝对是强项，红成兄弟上京,重大 815 赴蓉挺进纵队全力配合，当属天经地义。只是编辑部三个人走了两个，剩下一个王益富也不知身遁何方，我一个局外人，工作也就难以为继了。当时我们编辑部设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时叫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牌大学，所在地是有名的华西坝。校园风景如画。晚霞里的钟楼、肃穆的大屋顶、静悄悄小溪和草坪都是成都风景照片上的经典镜头，我儿时梦中的圣殿。可动乱年月，我住那儿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诗意。我们住在解剖房里。四周都是储放死尸的黑柜子。打开盖板,全是被肢解的耳、鼻、头、手、五脏六腑，浸泡在称为福尔马林的黑色液体中。有喜欢恶作剧的中学男生，经常从液体里提出某个人头或某条

手臂，跟着女孩子追，追得女孩们惊吒吒地乱叫。和肢解的人体一起生活实在难以寻觅出诗情画意。年迈的父母亲依旧住在劫后的老屋，整天躺在狼藉不堪的稻草之中。我没有回去和他们同住。血雨中的重庆时时在召唤。我只在家乡呆了十余天。我决定走了。

是６月２９日晚上乘坐３０１次车返回重庆的。那一夜，四川盆地天气特别闷热，半夜还下了一场大雨。雨滴砸在车顶上劈劈趴趴乱响。我在当天的日记上非常娃娃气地写了两句话：

“长夜欲晓天更暗，残冬将尽雪更寒。”

二十·七月山城，血火初起的日子

回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双方已经开打。砸派已经不叫砸派了，刚刚走马上任的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亲自给起名为“反到底”。刘副组长大约觉得砸派这个名字不雅，容易被对立派按谐音演绎为“杂种”“杂酱”之类意含讥讽的贬义词。事实上，八一五确实是这样干的，即便对立派已经被正式命名为“反到底”,他们永远把对方蔑称为“杂”系列。其实，１９６７年的七月，名称怎么叫已经不重要，问题是，以６５事件为发端的武器的大批判，已经远比口头的批判更有说服力。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并流处，群山环峙，气候奇坏，交通发达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孕生了重庆人鲜明、火爆的群体个性，催成了许多耿介豪侠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朋友、云南儿童作家张焰铎，第一次出差重庆，从小感受云南人的温婉内向，重庆人性格的火爆激烈曾让他大感惊诧。回昆明到我家谈说见闻，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重重的惊叹号：重庆民族！重庆民族！他认为重庆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落，其鲜明个性完全足以构成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特征。这种环境孕生的性格特质足够滋养邹容、江竹筠、成然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而它一旦被导向了邪恶，必如急流狂泻，演绎出破坏一切、毁灭一切的社会悲剧。另外，重庆军工厂极多，除了飞机，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可以在此配套。据可以相信的资料记录，1967 年 7 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而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两个原因汇而合一，重庆成为中国文革武斗最惨烈的地狱渊薮，便很自然了。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文革前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教育，已把许多人起码的良知泯灭殆尽，而将仇恨膨胀到了临界点。如连接炸药桶的长长导火索，经过十多年的燃烧，到文化革命，算是燃到尽头了。人们对于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都毫不足惜。可以轻薄，可以践踏，可以蹂躏，可以屠杀。性格火爆而又掌握了杀人武器的重庆人，把人性的丑恶，残忍，演绎得淋漓尽致。

六月下旬，我还在成都、天真得一塌糊涂的“红成”娃娃们正壮怀激烈徒步北上时，重庆已经热热闹闹打起来了。据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３日，便有了双方由上百人参加的重医附小武斗事件。此役死四人，伤百余人。7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

院再次武斗，使用钢千、刺刀、自制燃烧弹，死二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６６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千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回肠荡气。“烈士”亲属作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我至今清楚记得回重庆后一次经历：黄昏，不知为什么事情，我跟学校的卡车到了位于石油路的五一技校，那儿已成双方武力拉锯的前线。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就设在那儿。暮色如晦，不大的校园里，技校的少男少女们全在备战。正是花季。他们应该穿着宽松的Ｔ恤和漂亮的连衣裙去黄昏的花园小道谈说自己的梦想和温情。但是，这时的他们却全都穿着肮脏的衣服在抬石头，将石头堆码在楼前构筑工事。还有的把石块砸碎，再用筐子挑进大楼作武器，更多的女生则用作业纸一包一包地分包石灰，也是做武器用的。所有窗户都已砸光，挂上草荐做为掩护。这景象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时的繁忙毫无二致。我在兵慌马乱的校园里胡乱溜一圈，接着就看见有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把几个俘虏押上车来，眼蒙着。脊背被打得鲜血淋淋，长长的伤痕一道埃一道，像是用刀背砍出来的，十分可怕。第一次对一位受虐者做如此近距离观察，我心中不觉微微震颤。不是电影镜头的渲染，不是教科书的说教，不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中的模型，而是真实的、皮开肉绽一个活人！我不敢直面它。我只能竭力鼓动自己去回想一月前在风雨球场展示过的我的同学被打得同样血肉模糊的背，好让我迅速催生报复的快感，保持心理的平衡。

车开了，站旁边的人告诉我，说那是“红大刀”成员，“红大刀”是建设厂有名的武斗之花。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乘夜来此，是要将这几个俘虏运回重大。大坪地处两派热区,不安全，而地处沙区的重大，作为八一五的大本营，显然非常可靠了。几经折腾，车回重大，径直开到了六教学大楼。六教学楼虽然是我们电机系的教学大楼，我们上课做实验总在那儿进进出出，可除了知道这幢六层的黄色大楼是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除了在月色清明的夜晚，从长满青苔的石阶向晚自习的教室走去，心里会充溢着青春的情绪，我根本不知道下面有一条很可怕的暗无天日的地下通道。通道很长，中间还隔着几道铁门，扭动铁门把手，会发出地狱般的匝匝声。完全可以想像，将人关进去根本是无法逃跑的。那天的经历，使我第一次亲身感触，我们和对立派的仇恨已经完全白热而赤裸了，无法逃避也无法调和。不是我们把他们消灭掉，把他们像今天这些俘虏一样关进地狱，我们（包括我）,就同样会被他们关进地狱，消灭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的教导已不再是“语录本”上的教条，它已经变成了１９６７年的中国人类群体每一成员必须遵循的生存原则和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是的，可怕的事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都在不可动摇地刺激我们的神经中枢。我知道我已经被栓在奔向死亡的战车上。我别无选择。我只能从我的视角将他们一件件记下来，记录在我编辑的报纸上，如同无法逃遁的囚徒在墙壁上刻画记号，作为时间流逝的见证。在我重新接手编辑的第一份《８１５战报》（第三十一期）上，所有的版面都充斥着血腥和仇恨：

二版、四版：悲歌震华莹，碧血涌大江——望江机器厂反革命暴乱纪实

二版：七七枪声：六中小将惨遭枪杀／二七战士英勇献身；匪徒血洗歇马场／英雄头断红岩厂；

三版：死难烈士万岁。刊登了近日武斗死者生平事迹。死者计有：余成英。建设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航峰、军工井冈山九一纵队“血洗”石油校时被长矛刺伤，抢救无效死亡，时年３７岁；杨胜金，红卫纺织厂消防队员，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对立派毒打致死，死后被剜眼、割去耳朵和生殖器，用镪水腐蚀后沉江未遂。时年３５岁；冯仲荣，望江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在望江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用三棱刀刺为重伤后死亡，时年四十三岁；余开泉，望江厂供销科长，在该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惨杀,年龄不详；张朝喜，林校学生，六月二十八日被红阳中学对立派追打，落入水池。死后发现左耳被割，头顶钉进二寸圆钉一颗，左肋骨被打断一根，左胸被刺进一刀，喉管塞满盗草。时年十七岁；王吉强，供销社职工，六月二十四日凌晨被砸派用弹弓石头击中头部，跌下大楼，触断电线而亡，时年２４岁；苏毅，六中学生，死时２０岁；丁正贵，建设厂工人。七月一日被航峰武都队员连刺九刀而亡，时年３１岁；邓树荣，重纺五厂老工人，据称，七月一日，为制止砸派暴徒破坏该厂锅炉，被进攻方用长矛刺中胸部、腹部和大腿，流血如注而亡；周芳英，重纺五厂老工人，和邓树荣死于同一事件，同一时间，被刺穿腹部，腹中，已满四个月的婴儿尚在。死者年龄不详。王崇杰，四川外语学院学生。七月三日，北碚八一五派抗议重纺五厂７１血案，抬尸游行，砸派对游行队伍实施冲击，王腹部被长矛刺穿，肠子外流，血涌如注而亡；包自成，兵工厂（八一兵团２０团，不知为何厂——笔者）工人,七月五日被“偷袭”的对立派用钢千刺穿左胸死亡，时年二十八岁。

其他的死者就是“七七枪声”一文中，被小口径步枪击毙的六中学生陈乐州、八一兵团６５团的李叶明，七月八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等的发动突然袭击中，红岩机器厂的死者，计有：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８１５战报》的。如果说一个月前办《横眉》，我还表现了些许绅士风度，那么现在没有了。如果说过去，我做事情总会因种种原因而忧心忡忡,那么现在不了。我需要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寻找一个理由、一个支点、一种方式。比如，我对自己说：八一五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作事要善始善终。比如，我对自己说，其他哥门都在舍生忘死，自己怎么能当软蛋？甚至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感觉不再重要。有一段时间,嘉陵江的对面，对立派炮弹夜夜都会在报社头顶呼啸，在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又一道红通通的弧线，我们不得不深垂窗帷，施行灯火管制。在挥汗如雨的斗室，我记得我给一位深爱的女友写过一封信。她是我的同学，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在信中对她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 这封信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

于是，我接了战报这个招。现在，除了编辑霍晓琳（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和管发行的布依族同学韦亮清，《８１５战报》的人员已经差不多都离开了。我必须迅速重招人马。

第一个是张国梁。霍晓琳推荐的。张是霍的同年级同学。我原来曾读过他的文章，犀利而机智，颇有鲁迅笔风。我和他到沿江马路谈心。我问他：“你喜欢写什么样的文章呢？”他的回答非常侃切：“骂砸派！”他说，“我就喜欢写骂砸派的文章！”

除了张国梁，还有一个张姓同学，叫张忠云，电机系四年级学生。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帅，其次，他不仅有工科学生慎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有极其灵活的政治头脑，这样，全国和四川、重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零乱事件，很容易就被他串在一起，然后抽象出一个高屋建瓴甚至耸人听闻的理论或者观点。他考进工科学校完全是一种错误。他应该去当政客。他从政一定会大有建树。

另外还招了两个同学：采矿系的郭德福、冶金系的吴克。而挑大梁的，是两个张、我和霍晓琳。补充一点，名字极似女性的霍晓琳是个男生。好读书，工作勤勤恳恳，富于激情。我以为，我们四人，成了整个战报的黄金搭档，因此也就有了后来闯下大祸的《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及后来评论四川时局的一系列所谓“毒草 ”文章。

编辑部重新搭建起来了，但战事日紧，印刷器材供应、制版、发行等都很困难，无法保证按时出刊。比如第３１期。７月２０日出版。周期不准。很困难了。后来交通完全堵断，发行渠道完全已经不行。从　３４期开始，只能象征性地印一两千份，由编辑自己拿到街上去叫卖。原来报纸都是送到城里的印制一厂排版印刷的。七月下旬开始，就留在学校印刷厂自己印了。从３４期可以看得出来，字体单调 ，印刷质量也明显差得多。

其实，在当时，报纸出多少份？甚至出不出，都并不重要了。在血火烽起的山城，舆论本身已经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武器的批判已经整个儿代替了批判的武器。８１５战报继续出版，唯一的作用仅仅是为了表示了自己的存在。正如，当时有几人对文革还怀有当初的神圣之感呢？可大家还要在枪林弹雨中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而奔走呼号，为什么？他们已别无选择。不用武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会被对方消灭掉。如此而已。

有一天，我和张宗云到沙坪坝卖报，一个女孩笑嘻嘻走来，我们以为她要买报，正要抽报纸给她，对方却急忙摆手。她把拳头纂着，举在胸前，要张把手伸开。张把手张开了,于是她也把她的小拳头伸过来，打开：一块金属落在张握满硬币的手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响。我们看清了，是一枚半自动步枪子弹。

女孩快活地笑起来，说：“拿去打砸派！”

然后又是一阵胜利的大笑，她飘然而去。

廿一•毫无意义的插曲：钦差大臣的重庆之行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首都三司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所谓“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读过该次大会的报导,印象最深是“北航红旗”代表的发言。我怀疑那篇发言稿是经某演说家反复推敲润色的，全文警句叠出，妙语连珠，每个段落都足以赚得如潮如瀑的掌声。比如有这样一句：“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少数。可少数有什么稀罕？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敢于向全世界宣战!”（大意）还有一句，演说者说他很自豪，“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年轻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完整地重演了一遍。”（大意）我当时理解，发言者的意思是说，造反派从制造舆论开始，到组建政治组织（当然是指战斗团之类），经过和政敌（当然是指当权派和他们的附庸保守派）的反复争斗，再到夺取政权（即当时的抢广播站、印刷厂之类），年轻人有幸在短短两三月内非常简洁、非常有效率地走了一个全过程。

后来的事实说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那个后生仔的结论下得实在太匆忙。如果我们大体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应该补充的是，直到１９６７年夏天的全国武斗，才算把那句话补全了：人类的械斗撕杀，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从野蛮时期的棍棒、石头，到铁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在短短一两月内非常简洁、非常有效率地升级到了现代的枪炮、坦克，即由冷兵器时代迅速前进到热兵器时代。说那句话前一半时，可以很浪漫很威武雄壮，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１９６６年的武斗大不了就挥挥拳头，抡抡皮带，死个把人就很了不起了。真刀真枪就不一样了，尤其重庆这种步枪，坦克、军舰、榴弹炮、高射炮、海岸炮、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应俱全（幸好这儿没有飞机制造厂,要不，海陆空整个儿添全就更热闹了)，准确地说，那已经不叫武斗，叫战争了。面对紧张气氛，很多同学表示困惑，困惑无计，乾脆一走了之，回家，谈恋爱，帮爹妈种庄稼去了。

就在这时候，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几个“北航红旗”的学生到西南巡游来了。他们是６月２７日第一站到达昆明的，据他们自称是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接着，７月４日离开昆明到达成都，还在成都军区主持了什么会议，接着到达重庆，他们的快速穿梭，当然也是想要“就地解决问题”。

关于他们的重庆之行，８１５战报第３２期用大量篇幅作了报导。题目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章说，谢王诸人“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派，于七月十三日抵达重庆，并于十四日凌晨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砸派。中央首长听取了双方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从报纸全文刊载的王力讲话中，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也想稳定局势，因为讲话中一直强调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说“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二、三月份的事”，中央十条和五条发出后，“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解决。”讲话还一再说重庆驻军（５４军)“是毛主席的好部队，是可以信赖的。”在天下大乱的危局面前，军队是唯一尚存的权威。 肯定军队，事实上也就是强调稳定。

中央大员的到来，给战火初起的重庆和迷乱惶惑的重庆人，似乎带来一线曙光。

但是没有。

首先，即使是从“毛主席身边来”来，他们也未必知道毛的心事。那时候，毛根本就不想武斗降温。据文革史家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一文披露，７月１８日，即王力重庆讲话后的第四天，毛在武汉召见周恩来、王力等人便明确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是１５日到秘密到达武汉的。他想亲自出马，在年轻时代曾给过他横空豪情的地方解决解决问题，抓个典型样板指导全国。１３日，即谢、王诸人赶到重庆当日，周恩来也正匆匆忙忙赶赴武汉为毛的巡视作安排，并电告谢王诸人火速赴鄂听候提调。因此１４日凌晨谢、王对重庆两派代表的接见极端匆忙。会议是在警备区礼堂进行的。《８１５战报》载：“会后，首长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登上直升飞机，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离渝返京。”

战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那张合影照片。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挤在谢身旁抢了个恰到好处的镜头：一脸笑容可掬，充份凸现出八一五战士紧跟党中央继续革命不动摇的满腹衷忱。其他人也都笑容可掬，表示对首长讲话的一致拥护——其实，这些都毫无意义，业已被仇恨全速驱动的战车，已经把整个山城拖入火海。而且，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几位大员

不是返回北京，而是开始吉凶难料的武汉之行。几天后，就是那个王力，因执行毛的意图竟惹得武汉“百万雄师”冲冠一怒，直接导致了震惊全国的７２０事件。事后,我听武汉的老百姓危言耸听地告诉说，如果那天不是王挺身而出，让群众抓走，秘密住在东湖宾馆的毛就差一点儿出事了。老百姓说，毛多年不坐飞机的，那一回，武汉满城都在都兴高采烈欢呼“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这时，毛泽东金蝉脱壳，坐上飞机，匆匆忙忙潜回北京去了。伟大领袖遭此险厄，自然举国震惊，于是全民共讨之，全军共诛之。东海舰队紧急奉命西进，溯江而上，近逼汉口，预防鄂省兵变。被群众释放回京的王力抵达首都机场，“第一夫人”江青顶着烈日亲自迎接。据看过记录片的同学说，这位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明星非常带有表演性质地热烈拥抱了王。纪录片名《北京支持你们》。接着，７月２５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亲自主持大会，欢迎王等人凯旋归来，愤怒声讨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一伙的滔天罪行。在中国，中央的权威一旦受到挑战，任何报复都不嫌过。据说，该记录片有副统帅林一本正经站着讲话的镜头，而臣下王力却舒舒坦坦坐着凳子上悠哉游哉。看过影片的人于是又说了，王力你算老几？不过被群众斗了斗嘛,连喷气式也没有坐，伤得就那么重？站都不能站了？真也忒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题材，足够让后世的艺术家们演绎出票房价值极高的历史大片。而对于山城老百姓，乃至全国老百姓命运关系更大的，却是“七二О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及其他方面代表，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第二天的《文汇报》以传单的形式，刊登并散发了这个讲话。

看到这位权力很大的毛夫人的“懿旨”，我们整个报社都震惊了。传阅过这份《文汇报》，我们不知道是恐惧？困惑？还是松了口气？既然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了，我们还期盼什么呢？没有谁能保护你了。打吧！破罐子破摔，就名正言顺地乱打他一气！天下真的大乱了。

下面的事件是谢、王离开重庆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我把它们从重庆文革研究史家陈晓文的《重庆武斗大事记》中直接摘录于后：

１９６７.７.２５　两派在工业校武斗中使用枪支。其后全市相继发生抢劫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事件，武斗全面升级。

１９６７.７.３１－８.６　荣昌县城两派大规模武斗，参战共６００至７００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７８人。

１９６７.８.３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舰上三名军人罹难。

１９６７.８.５两派在建设厂清水池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２２人，伤多人。

１９６７．８．８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以三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２４人，打沉船只３艘，创１２艘。

１９６７.８.１２－１３　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和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

１９６７.８.１２－１３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进攻驻厂部队指挥部（设在郭家沱中学），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一名工人。两派在解放碑地区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

１９６７．８．１４　两派在嘉陵江大桥武斗，打死１１人，伤多人。燃烧市二轻工业局大楼、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房及部份设备。

……

阅读这些条文，犹如阅读小学历史课本上的大事年表，也许会感觉过于乏味。作为注释，我想在下面再直接引用一段文字。这是一位部队官员在当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讲话。讲话介绍了军工企业造反派头头方文正（８１５派）和邓长春（反到底）在八月武斗中的一些“罪行”，我以为它们基本可信：

“1967 年８月１８日，在舰艇反到底一号船上邓长春为了纪念武斗中打死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上，邓长春亲自下令枪杀两个革命同志，为李鲁沂这个坏蛋祭灵。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四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学生遭到别人反对才没被杀，但陪了杀场。……当时邓长春把李鲁沂留下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害了这两个同志，尸体被丢在了江里”

８月２２日，８１５派撤出空压厂，撤出前，方文正“阴险地问大家，地下室二十多个所谓俘虏怎么办？有人说用手榴弹去把他们全炸死。方文正同意了并指名三个学生去执行，……后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不通，未去炸成。２３日晚，……一个叫何大发的说，”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方文正同意了，并叫何大发带三个学生去执行，何大发就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枪杀了。……特别残忍的是刘素德同志怀孕五个月。邓（刘的丈夫，也属五人之一）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遭到何大发拒绝，邓又要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何大发等人说不行而全部枪杀了。”

几年前，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曾用非常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场面，让人视而全身颤溧。而现在，当我重新摘录曾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杀人故事，我除了恶梦般的震惊，还有，就是深深的自责：这一切，不过才过去三十多年呀，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就忘却了？

廿二•我的记忆中的死者

我的印象中，重大在武斗中共死亡 31 人。查阅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８日出版的《战报》第３７期，编辑部文章“活着的八一五要报仇”后面曾有一“急告读者”，说是“决定出版《青

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希望这些“烈士的亲友和同志们多多给我们提供材料和投稿”。后来，我们确实收集到了很多有关死者的资料，照片、同班同学写的事迹、日记、书信等，我把它们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编排，又加了按语，集成了一册——只是，书没来得及出版，书稿却在动荡中散失殆尽。因此，我手上已经没有了死者的具体情况记录，连死者的准确数字也说不出来。

按照毛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了，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１９６７年的大规模武斗结束后，确实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差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而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１９６７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死的同学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成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８１５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碑文是王益富写的，而那个流传很广的８１５火炬图案，则是编辑战报时我设计的一个题花。大概图案比较简洁鲜明吧，又比较好画，很快被广为采用，成了八一五派得以共识的徽记。

几年后，我因一个意外机会读到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关于那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符号的出现，作者曾有一段专门叙述。文章说：“他（指希特勒）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于是希特勒绞尽脑汁亲自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图案作为纳粹的党旗和党徽。读书至此，我暗自忍俊不禁。我只不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偶然地画出了一个图案，没承想，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个派别的徽记，更没承想，这个现象，竟应了历史上一段可怕的政治斗争的规律。

又过了几年，我回母校造访，重新登上苍树迷离的松林坡，这时,天正下着密密细雨。时间是１９７２年夏天。死去的同学的墓尚未掘除。无语的纪念碑上爬满苍苔。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嘉陵江静静东流。我在潮湿的碑台前独坐良久，感慨无已，随即口占了一首古体诗，其意略为：“千里重归访旧冢，独上松林路，雨蒙蒙。烽烟战旗无寻处，草离离，残碑苔痕浓。／此别难再逢，邀我众冤灵，出冥宫，一江碧涛作琼浆，请共我，醉酒论英雄。”

后来，我果然已无法与这片坟茔再逢。母校那一两个曾经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重掌权柄，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此外，还包括在广场上一本正经挥动巨手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毛泽东，等等——继续刺激他们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神经。于是叫人把它们推了！挖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得白茫茫大地真乾净！

又过了二十年，１９９２年，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又回到了母校，下榻于松林坡外宾招待所。面前——我发现，正好就是当年的墓地。只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水池，半亩横塘，里面全是落叶和暗淡的天光。我问刚刚成年的宾馆服务员：

“这儿曾经打过仗。你相信吗？”

天真烂漫的女孩拼命地摇头。

“这儿曾经炮弹满天飞，一晚上打几百发炮弹，你相信吗？”

还是摇摇头。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于是我说了，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就是在这儿，在现在水池这个位置，埋了好多好多死人，和你差不多，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冤死的大学生！

这一次，她真地吓坏了，吓得跑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终究再也无法弄清楚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准确的数字也难以统计。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

唐世轩、李盛品和董继平就是其中的三个。或许，还应该有段亚伟、刘文举。

我根据资料回忆，第一位死者应当是张全兴。采矿系统三年级学生。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死于化龙桥市工业校之战。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位死者，却是唐世轩。他也死于同一天，死于同一个地方，同一场该死的工业校之战。

唐是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很奇怪，我们学校好几位死者，包括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的李盛品和段亚伟，都是独子。大约独子所受到的母爱很容易造成他们的任性和行为上的一意孤行。唐世轩刚进大学，正遇校党委宣传部通知我们美术队要把新闻摄影工作兼做起来。于是我们就悬榜招人：这样，我便认识了唐世轩。我主考，他来报考，他非常得意地带了一大摞照片要我鉴审：全是１２０相机照出的６Ｘ６厘米的生活照。照片主角大约是他女朋友：斜歪在公园的草地上扭妮作态。女孩的相貌十分平常。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这类照片，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只能够悄悄藏起来自个儿孤芳自赏的，怎么能恬不知耻地拿出来炫耀呢？真是荒唐!我既然以党的宣传工具自居，理所当然便把他回绝了。再说，他那般清瘦，简直就尖嘴猴腮，我坚信他决不会有什么艺术气质。

但是他决不灰心，依旧常常找我套近乎，理由非常简单，当时学生都穷，拥有一台相机比现代人要拥有一座别墅还难，而美术队有相机，当然是党委配发的——这对唐世轩的诱惑力是毋庸置疑。那是党的宣传工具，非常神圣，我当然不敢对他打开缺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他的艺术才华最终提供了展现的机会。造反了。他的性格使他的造反成了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很快在总团宣传部门谋了个梦寐以求的的位置，就是摄影。那年头自由得很，更何况他出身工人阶级，底气绝对足。于是他有了专用的相机，不知从哪儿搞来的。九三徒步上京，九一五天安门广场谒见领袖、国庆大游行，我都看见他不知疲倦地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淋：八一五经营之初的所有活动照片，都出自他的镜头。

８１５战报成立后，我们的交道就更多了。他常常送些照片要我鉴赏，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将作品刊诸报端。当时制版条件太差，我一直没能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他的热情那么让人感动。

我确实也答应过一定给他发表——没承想他却死了，死得那么突然！

事情是打工业校引起的。

重庆工业校位于沙区通往市区的咽喉：化龙桥，而工业校又正好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对于这颗钉子，八一五自然是必欲拔之而后快。这就有了７月２５日之役。进攻中，八方先是死了张全兴，这是重大八一五第一次死人，听说是被守方射手用小口径步枪射杀的。据说凶手还是市体委的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枪法很准的。尸体抬回，举校哗然。从来喜欢出头露面的唐世轩当然憋不住了，断然宣布：我马上去把现场拍下来！我要用镜头揭露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于是去了。赶得还特别急。据说，出现得十分意外的枪声使进攻方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全停住冲击，躲在四面的安全地带等候命令。唐世轩去了，看见主楼前面大一片空地了无人影，心中好不欢喜：偌大空地，完全足够他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呢。于是，他大摇大摆走上去了。于是——据说，主楼上方狙击手黑洞洞的枪口正好对准他——躲一旁的同伙吓坏了，一齐大喊大叫要他躲开。可他，他是唐世轩呀！唐世轩是不管这一套的。他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要抓拍这样的好镜头嘞！告诉你，这才是过得硬的历史镜头嘞！躲什么躲？他只管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还等不急摁下快门，枪响了，就一枪。唐聚精会神对镜头的时候，枪手也正好有工夫认认真真地调整枪口准星，就一枪，正正击中唐世轩额心：他死了。

唐世轩和张全兴的尸体同时放在图书馆，供同学们凭吊。二人的遗体都穿着军装。这些军装当然是赝品，总团不知从哪个纺织厂搞了些黄布来加工的，缝工极其粗陋。给他们的尸体穿上，算是安慰一下殉道者和苟活者焦燥难平的心吧。二人的死相都极可怕，而活着的模样却幼稚得可爱——我们在八月二日出版的第３４期战报上刊发了二人的照片，还用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纪念文章，第三版几乎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张全兴的日记摘抄，并用他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了标题："我要作一个雷峰、王杰似的人"。唐世轩没有留下日记,本来想刊登几张他的摄影作品以为纪念，但烽火连天，交通阻隔，进城去制作图版实在太危险，只好作罢了，仅由"唐世轩烈士生前所在战斗组２１１１纵队"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题目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几十年后才得知，那一仗反到底也死了人。战斗以八一五的胜利而告结束，抓回的俘虏自然不少，都交重大处理了。重大的"卫戍部队"除了将其中少数"首恶份子"扣押待审，其余人等全部用翻斗车运去沙区门户小龙坎，唏哩哗啦倒在街上了事。这事当然也很荒唐而且残忍——现在重新争论谁的死伤更为惨重当然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举起杀人凶器，对准素不相识的、并无怨仇的陌生人下毒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暴尸街头？说实话，我甚至更愿意相信仅仅是我们这派死了人，这样更能让我永远保留住那份震惊和悲哀。因为这悲哀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把事实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几十年后得知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在那一场战斗中不仅仅"反到底"动用了热兵器，八一五同样也动了热兵器——我突然想起，这说法确有实据。作为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学生,重大八一五利用其他院校学生不可能有的知识和条件,很早就开始试制热兵器了。这些热兵器包括："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土火焰喷射器等。说土，是因为这种火焰喷射器不过是用普通灭火器的外壳，内部装上一些液体燃料而已，这种改装对于从事科技研究的大学师生虽属"小儿科"，而在仅仅只有大刀和铁矛的战场上，它的出现，威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中梁山战斗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八一五方使用了自制的土火焰喷射器。

时间是 1967 年７月１０日，重大３０１纵队得知反到底武斗队从煤校返回电机厂，便安排喷火手人员及土炮在路旁玉米地设伏，指挥者在房顶上用探照灯和号声指挥。反到底“武斗之花”航锋战斗队先行通过，小伙子们胜利凯旋，士气正旺，排成整整齐齐几路纵队，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矛而前,很像十九世纪欧洲精神战中神气活现的步兵方阵。那势不可挡的架势，神经稍有脆弱，谁见了谁害怕。后来我曾听成都方面的人说，到成都支援八二六的重庆砸派崽儿，就是凭着这种赤膊方阵，就是这样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一天之内，兵不血刃，便将“红成”派的几十个广播站端个精光。

且说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这一天，重庆大学３０１纵队看见“武斗之花”的拼命方阵神气活现挺矛而来，却不慌不忙排成横队，挺直长矛拦住去路，只是个巍然不动。等到“敌军”方阵步步接近，突然，屋顶上一声哨响，横队忽地如门洞开，喷火手Ｚ和Ｈ从人群中冲到正中：灭火罐中的火焰喷射而出——古典兵器遇到现代化，结果不言而喻：“武斗之花”顿时被烧得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漫山遍野地逃命，大学生于是乘胜追击——据几年后清理文革学生“罪行”的结论性材料称，该战斗烧死对方两人，刺伤轻、重各两人,活捉多人押回重大“处理”。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类武器，甚至看过某些武器的制作过程，严格讲，这些杀人凶器质量是很糟糕的，比如８１５式冲锋枪，一抠板机，子弹没射出，弹簧倒先从枪膛里蹦了出来。更严重的是，手榴弹的引爆时间严重不准——据一位参与制造的同学，姓Ｄ的电机系高材生、现四川省某大学教授告诉我——从拉环拉出到爆炸，时间应该是三秒六：这个时间正好足以投掷出去并正好杀伤敌人。可重大八一五自制的手榴弹，引爆时间七长八短，根本无法掌握投弹时间。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当时著名的“八一五烈士”，就因为这个白白送了命。

李盛品，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很土却非常乖巧的好后生。１９６７年８月８日出版的战报第３５期几乎用了一个整版刊登关于他的文章，计有：八一五总团追认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三人为“优秀红卫兵、模范八一五战士的决定”，有李的生平事迹简介，有悼念文章一篇、悼词五则、评论“无私才能无畏”等。但我始终想不起为什么偏偏没有登他的照片？那张梳偏分头的照片绝对是送到我们编辑部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然，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发表在同一版的李盛品日记摘抄：“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和“李盛品烈士给一位朋友的遗书”。这封遗书，实际上是他死前写给他女朋友的情书。当时大学生忌讳谈恋爱，所以我们发表时提法上做了如此技术处理。该情书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还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他家所受过的大苦大难，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他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都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告诉她去做什么。同学们可是知道的，就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重大的自制手榴弹。对于本校产品的质量问题：引爆时间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进行演示时，他让中学生躲得远远的，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不幸的是，他试验的这一棵，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

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信在刊登之前，曾用大字报的形式先行公布在九宿舍门前，这个故事和抗美援朝时著名作家李准写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都感动不已。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总团专门派车派人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亲人接来当天我就赶去看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过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

董继平的尸体不在墓坑里。他中弹后没有马上死去，一直到了几十年后，他才默默无闻地倒在了四川新津岷江支流一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而无人知晓。他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当时没有痛痛快快地死。

这是由全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统一策划的战斗。开始是想攻占建设厂——那是一间著名的兵工厂——以获取武器。队伍开都开到了，快要开打了，该厂的内应人员却说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火力点布置在什么地方？真是荒唐透顶！好吧，反正人来也来了，就去攻攻空压厂吧，空压厂也是个好东西，厂里武器肯定也不少，不攻白不攻。反正有坦克掩护，这回胜仗是打定了，这就：冲！目标是该厂医院和水塔一带。时间是８月２日。这一仗战果如何现在已无资料可查，但重大死了好几个人却一点没错，我能询问到的，便有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刘问举。在向水塔前冲的路上。董继平的钢盔被子弹击落，接着子弹便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就会发连贯的音，甚至会说话了。我记得清楚，他恢复发音后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正因为这，大家把他称之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那六十年代著名的战斗英雄。在海战中创造了子弹射穿脑颅还高呼毛万岁奇迹的广东小伙子——再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校，还能随时对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不久毕业分配，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似的英雄”境况就说不完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十来块生活费，后来，乾脆就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去年，我到四川公差，这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什么时间，他终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关于这次战斗，一位亲历者：侯念平，就是将日记送给我作为素材的同学，曾对我作过这样的叙述：Ｌ大汉做了简单的动员，说：这一仗，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大家接着就冲上去了。我们是分三路上去的。正行进间，听冶金系纵队方向有人问：口令！不等回答，双方就交了火。我们是由“红农八一五”的人带上去的，突然发现前面有对方工事，大家急忙卧倒，紧接着从后面响起了炮声，炮弹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扑下身子回望，发现是空压厂的坦克在掩护我们进攻。对方工事很快被摧毁了，但我们还是不敢进攻，整个指挥一团糟，我们害怕坦克打了我们自己。一直等到坦克开走了，我们才向山头冲上去。上去了，对方战壕里还留下一架１２７（按：一种机枪，发射直径１２７毫米炮弹的）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地下是一大滩血，估计枪手受伤撤退了。旁边还留了很多炮弹，刘文举，我们一起冲上来的同学，一看便高兴了，高兴得蹦起来——就在这时，正好一排子弹扫来，他大腿中弹，翻身

倒地，鲜血涌流如泉。我们马上组织还击，把残敌打跑，这才急急把刘背下山去，到空压厂医务室找人紧急处理。

一个医生对刘的静脉注射一种叫右旋糖痟——据说是扩容的药剂——但不知弄错还是什么原因，注射成了酒精（是装右旋糖痟的空瓶，装的酒精）把刘拉回重大的时候，血管完全僵硬了。我们正围着尸体抱头痛哭，来了一个七军医大的女军人，告诉我们，说那医生很可能有意杀人。大家顿时盛怒难遏，提起枪就赶回去抓那个医生：那人已经跑掉了。

几十年后，我想，幸好那位医生跑了。如果不跑，文化革命的死亡簿上，肯定又会多添一具冤魂。

在这段笔记上，我还记了侯念平对我说到的另一个人：段亚伟，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侯告诉我，说段是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的，后来被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侯对我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呀，才是真正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呀。他说，我至今怀念他们！

段亚伟死后的情况我也至今记得清楚。同学们在广场上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并且把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请了来。父母亲好像都是教师，而且好像也只有他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容易把他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很悲苦的。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象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她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她发言时的悲苦和庄严让我想起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那幅有名的《牺牲》：可怜的母亲用树枝一样枯瘦的手臂将自己的孩子举向冥冥中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在《战报》第 43 期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时间是 1967 年１０月９日。我想不起为什么这么晚才对他进行追悼？是不是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尸体？大字报也为他出了纪念专栏。我们把她母亲发言中关于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而骄傲这句话，写成了通栏大标语。

我曾经读过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伯尔的许多作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毁灭、忏悔和沉思，曾让我深深震动。现在我已不知道两位可敬的父亲母亲身在何方？如果还健在，我真想再见一见他们，和他们一起平静地讨论一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想把段亚伟和他母亲的故事写下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会和伯尔的故事一样动人心魄。

廿三 • 沙坪坝。战火中的社会生活、人和事

１９６７年的８月，沙坪坝是一座孤城。

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东北面，横亘着嘉陵江深深的河谷和滚滚江流，对岸是被八一五称做"沦陷区"的反到底势力范围。有名的兵工厂江陵机器厂的砸派绝对控制局面；东出化龙桥、沿江至少有三公里路段完全暴露在江陵的机枪火力之下。八一五周年纪念，曾有外地来渝参加庆祝会的，从城里回来，正遇江陵的机关枪密集扫射，子弹打在路边岩壁上辟哩叭啦响，火光如电，石飞如雨，全都是些真家伙，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得匍伏在地，靠着江边

马路的石栏杆连续爬行几公里，到了土湾方才敢起身直行；沙区东南出口是小龙坎，往前就到了大坪、杨家坪，那儿鏖战正急，打得难分难解。过不一会，卡车总会拉些鲜血淋淋的伤病员和死尸回来，一会儿又将一卡车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拉上战场。和平老百姓们挤在小龙坎狭窄的街道两旁，热热闹闹地向他们鼓掌欢呼，送稀饭送鸡蛋什么的，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凯旋、以送子弟为国捐躯的热烈与悲壮。往西北好点，出北碚，一直向西，到合川、到武胜、到南充……都是八一五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坪坝最关心的，是它和重庆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市中区的联系。一旦卡断,它就成孤城了。

当然也有急事需要进城的。但必须是武装车辆。如：坦克、土装甲之类。所谓土装甲车，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卡车的外面完整地蒙上一层钢板，仅在驾驶室前面露一个长方孔以作观察之用，这种当然就比较接近洋装甲车了，还有一种更土的，就是在汽车四个车轮外各装一个圆形钢板，在车斗里垒上砂袋,在驾驶室外蒙上些棉絮什么的。这种比较多。用来运输粮食货物，从化龙桥至沙坪坝来往的车，多是这种，遭遇袭击，只要没把车轮打坏、驾驶员打死，都可以全速开动冲过封锁线。

我一直没机会乘坐这种有文革特色的运输工具，将近两个多月时间，六十多个日日夜夜，一直没进过城。我都在沙区渡过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的沙坪坝，夜是最黑暗的，黑暗得象地狱。夜还没有来临，热烘烘的夕阳还悬在山头发烫，嘉陵江两岸的大喇叭就开始骂起阵来。先是东北边江陵厂的。每天都气势汹汹地宣告；“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接着是西南边重大的，重大的广播内容要丰富些：首先,“向战斗在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战友表示崇高的敬意!”接着,“对生活在江北沦陷区水深火热中的江北和平居民表示亲切慰问”接着还要奉劝对方的顽固份子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之类，最后才是“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骂阵结束，不一会就动真格了。一排排炮弹挟着红通通的火光从天而降，炸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关于这一段炮战，我们还会在下面详作介绍——为了避免挨炸，大家都不敢开灯的，都躲安全地带去了。校园一片漆黑。重庆大学图书馆一位职工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江陵厂——笔者注）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里，人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１０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６时才停。”

《８１５战报》报社位处江边，远离学生宿舍，一次我到宿舍区和同学聊天，深夜返回，只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走回，突然间被荷枪实弹的人唬住，大呼：“口令!”——原来是３０２，即学校的“卫戍部队”在戒严。发现是我，他们放行了。事情过去很久，才知道是在杀人。据资料披露：被杀者为重庆水泵厂工人康水云，当然是对立派人员。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旁边那棵很大的黄桷树下处决的。用半自动步枪射杀，对准头部，就一枪。执行处决时先戒了严。时间是８月２２日。

白天还是热闹的。战争打成这样，工厂自然是不上班了，没有去处,就到重大看热闹。重大

校园面积不小，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于是行者游于途，累者休于树。有些人是被赶出来的，如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派，被赶出来，无处可逃，就跑重大来了，反正重大钱大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有些“难民”住在学校里，无事好干，每天只能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真的热闹非凡。看点几乎都集中在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那儿是停放死者的好地方。山城八月，毒日似火，尸体很容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蚊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是好过些。难民和本地居民喜欢去那儿为陨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非常狰狞的“砸匪”到底什么样子？被俘的反到底分子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尸裹尸。负责押解和管理俘虏的叫郑志胜。他也总是蓬头垢面，也和俘虏们一样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战友洗尸裹尸。

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前，每逢课余假日，他都喜欢背个竹篓到街上捡废纸捡桔子皮，卖掉，又买回些字纸篓、理发剪什么的为大家义务理发服务。那时大学生都穷。同学们对他的义务服务赞赏有加，遂评为班级学雷锋先进分子。他本人当然也穷。没钱买鞋，就光着脚丫上课，某天，在五教学大楼阶梯上遇到校长郑思群,他不知道是校长。那时校长和中央首长一样深居简出，高不可攀。校长问了他为何不穿鞋？问了他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便出现了奇迹：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他很快知道了，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校长秘书。文革初起，校长郑思群无辜蒙冤，自杀身亡，重大学子因此奋起造反，发起八一五运动，首开四川“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先河，郑志胜顺理成章当了八一五的铁杆。因为太铁，因之在１９６７年的武斗中便与多起血案牵连最终被监禁十余年。出狱时，郑已两鬓斑白，万念俱灰。一次我去重庆公差，听说他出来了，曾相约在母校见了面，话说文革当年，大家都有说不完的感慨。我告诉他，当初看见他天天和俘虏们一起兢兢业业洗尸裹尸，我们都特别感动，我还在报社内部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实际行动就是让编辑们走出办公室，分批上前线做战地采访，和３０１的哥儿并肩战斗。感慨唏嘘之后，我认真问他，当时你为何造反呢？他眼神木纳,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我：“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这已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１９６７年他还风华正茂。武斗初起，他对文革也曾想不通，曾非常困惑。让他命运发生转折是有一天黄顺义来找了他。黄是他同系同年级的同学，八一五总团勤务员。黄诚恳无比地对他说，现在送来重大的死人太多哪，本单位的，外单位的，凡死了人，都送重大来。真是不堪重负呀！事情也是，谁叫你是重庆八一五的大哥大呢？谁让高教部每年要拨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钱给你化费呢？现在不上课，教育经费自然都用来给文革派上用场了。黄说，总团请汉渝路的王老汉来裹尸，裹一个５０元，裹两个一百，如今死人成堆，国家的经费受得了么？黄顺义对这个学雷锋的模范说，反正你没事，就干干这个吧！为国家省笔钱！郑志胜二话没说，出山了，让总团把俘虏交给他——从此以后，他便有了重大文革史上很出名的一个绰号 ：“尸长”。

尸长非常敬业，每天一早就将俘虏们带出来，先把裹尸布洗洗乾净,在运动场的双杠、单杠上晾好，然后像幼儿园阿姨一样，成一行地带着俘虏们向防空洞进发。俘虏衣服褴褛，他也衣服褴褛。俘虏蓬头垢面，他也蓬头垢面，和俘虏毫无二致。问题就出来了：老百姓站在防空洞外面看热闹，对“砸匪”骂骂咧咧，骂得性起，甚至捡起石头便砸，操起棍棒便打，尸长外观既然和俘虏毫无二致，也就免不了要挨点石头挨几下棍棒什么的。为了表示区别，领导就给他配了一柄手枪——当时武器紧张，给他的枪是没有机头的，根本不能实战，无非作

为标识而已。不料，这柄枪日后却恰恰成了一条线索——有人就以此为线索，举报他曾持枪杀人。于是他就被审查了，于是他就和我一起住了“学习班”，天天写交代。关于他的举报材料最多，他的交代材料自然就写得最是没完没了。有一天写着写着，他突然嚎淘大哭，自言自语叫道：我处理过这么多尸体，难道都是我杀的么？这样写交代，什么时候有个完？说着拿起尚未写完的材料便撕——被我们拦住了。审查结束，工宣队长给我们发放毕业分配证，念到郑志胜名字，他从凳子上始而讪讪地站起，继而猛地大呼：毛主席万岁！接着扑倒在床，大放悲声，哭得人人为之动容。工宣队长也感动了，走上前拍他肩膀，象诳娃娃一样，说：毛主席说过，老实人不吃亏！老实人不吃亏！你看,事情不是说清楚了吗？

事情当然没有说清楚。事实是，在那个是非颠倒、整个中国都着了魔的年月，他已被套上了他自己无法解脱的链条。他果然参与过杀人。他被从遥远的克拉玛依捉回来，投入了大牢。几十年后，我看过有关他的审查资料。他和其他一些同时被捕入狱的同学们，在战火纷纷的１９６７年８月，在那些个我们不知道的、戒严的黑夜里所做过的一切，确实让人震惊，又匪夷所思。我竭力让自己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纷飞战火中去，设身处地去重新想一想，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又总是这么害怕。我无论如何不想去责怪他们，事实是，他们（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这就够了。

我还是要回到上一世纪的１９６７年８月。

江陵厂对重庆大学的炮轰是从八月初开始的，用的都是该厂自己的产品：三七高炮，不过作平射而已。所幸的是：反到底掌握着高炮厂，也掌握着炮弹厂，但引爆的引信厂偏偏在八一五派手上，这就救了重大的命。炮弹没有引信当然不会引爆。不会引爆的炮弹就等于一个会飞的铁丸子。重庆大学高达六层的六教学楼是全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理所当然成了最佳攻击目标，几天之内，被打得千疮百孔，有如蜂窝一般——也就蜂窝一般，无非戳了些直径为３７厘米的窟窿。房子巍然不动，一个人没死没伤。没有死没有伤的同学们每天早上就把四面八方散落的弹头收集起来，装进竹萝，放在二宿舍和三宿舍间的马路上办展览：这自然又成了战火孤城的一道风景线。还有同学索性搭起梯子，用斗大字体在“蜂窝”上写了一首毛泽东的战地诗：“昨夜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具有喜剧意 味的是，电机系系主任，后来的重庆大学校长江择佳的厨房也被一枚飞天铁丸击中，在墙壁上戳了一个直径３７厘米的窟窿。老教授哭笑不得，于是合伟大领袖原韵，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窟窿边上。题目是：“八一八炮轰纪念”，诗云：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我和敌

山城八月，许多年轻生命每时每刻都在血泊中訇然倒下。蓬勃生命里无法阻挡的爱情也像潜流在暗地里汹涌澎湃，演绎些非常特别的故事。下面是其中之一：

武斗开始后，学校医务室医生都跑光了，于是刚分来的两个卫校毕业的女孩Ｗ和Ｊ，就成了

唯二的战地医生。伤员太多，两人就轮流值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麻烦的问题是,Ｗ和Ｊ都长得如花似玉，这就难免会惹得有人春情萌动了。果然，一个大学生，我们叫他Ｆ好了，Ｆ没上战场——没上战场当然无可指责，对文革想不通呗！——问题是，他除了不上战场，而且也不是什么铁杆，呆在学校自然就无事可干了。无事可干自然容易春情萌动。还有一个问题：Ｗ和Ｊ住在三宿舍，Ｆ也刚好住在三宿舍，早不见晚见的。一来二去,Ｆ就和其中的Ｗ的两情相许了。Ｗ和Ｊ住一间屋，一个白天值班晚上睡，一个晚上值班白天睡。这就很方便了。Ｆ便总有机会和Ｗ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隆隆枪炮声中尽情享受战火中的青春。

隐情当然很快被发现。哥儿们全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你老兄公然还如此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怒的哥儿们于是设下陷阱，非抓Ｆ一个正着不可。

捉奸的过程是这样的：

一个晚上，Ｊ值夜班，自然轮着Ｆ到Ｗ的房间幽会。正好，当晚无战事，武斗队员便在该房间四周秘密设伏，然后通知广播站打开广播：下面播放紧急通知！下面播放紧急通知！今晚送来伤员太多，请Ｗ医生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校医室来！请Ｗ医生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校医室来！当时，学生宿舍的每个楼道都装有喇叭，那晚战火正歇，校园很静的，这喇叭一叫，全校都听得见，正在温柔之乡的Ｗ和Ｆ肯定也是听见了，只是半夜惊梦，他们定然如惊弓之鸟，他们定然害怕落入圈套，躲在蚊帐中迟迟不出。伏击队员等急了：他们单等Ｗ出门那一刹那便冲进屋将Ｆ从销金帐中生擒活捉，广播嚷了半天不见动静，只好让Ｊ回屋去喊Ｗ。这一次，Ｗ出来了，Ｊ刚一进屋，Ｗ就匆匆出门而且很快将房门带上。二女孩前脚一走，武工队员马上后脚跟上，用Ｊ的钥匙将门打开：奇怪！屋内空无一人！——原来，Ｆ已经翻窗出逃，爬到旁边的女卫生间去了。他是从窗户上逃出的——房间在二楼，他显然是像壁虎一般抠着墙缝从心上人的窗口爬过去的。他爬墙行走的情况一定也和上战 场一样亡命，一样地惊心动魄。爱情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同样伟大。

但他还是落了网。武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能逃哪儿呢？他很快被哥儿们从卫生间里抓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重大校园传出的头条新闻便是：Ｗ无地自容，服安眠药自杀，但未遂。

廿四•８１５周年纪念印象

８１５一周年的纪念日是在非常特别的境况下渡过的。

我查阅了那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尴尬：

８月５日，即杨家坪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激战正酣，人心惶惶，“八一五风暴”剧组的十几个同学（其中七个女同学）想不通，断然退出剧组，回家“逍遥”去了。“八一五风暴”是模仿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照葫芦画瓢搞的一台综艺节目。类似做法当时全

国各地都有，如成都搞了个“四川很有希望”、云南搞了个“八二三风暴”等等。据当天传回的消息，这七位女同学和其他男生刚到火车站即被砸派武装人员抓获。下午，坚持战斗的演员们绕舞台游行数周，宣誓将演出进行到底。

８月６日，杨家坪战事吃紧。这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武装八一五，公然直接闯进重大总团，敦促３０１马上出兵驰援前线，否则立即交出弹药。重大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挟，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拔刀相向，在重大校园内摆开战场，打了一整夜的枪。枪好像都向天上打的，因为事后就没听说死人。３０１一帮枪手气急败坏地夜闯报社，把机枪直接架到战报编辑部窗口上：我的办公室正好在二楼，算是制高点了。

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俗称“十六条”）公布一周年纪念日。上午总团开了一个会，大约是要庆祝庆祝吧，但我没去，心情很坏，根本没心思庆祝。几十年后，我从日记知道，那一天上午我们编辑部“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开始的。

我确实已经不知道话题是从什么开始的了。因为这一天的日记写好不久，很多地方就被我自己用墨彻底涂掉。估计那些话非常异端，怕日后出问题，就抹了,而且抹得非常黑。几十年后，我曾用酒精和水去搽拭墨痕，可惜年深日久，底下的文字已很难露全了，只是断断续续可以看到：“上午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全国一大批……和某些受压制的左派，难道不可能成为别的势力吗？中国又会怎么样？那时，恐怕就不会是苏联式的政变了，不会是了，而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政变了。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原则在哪里？纯粹是宗派斗争!”

从没有涂抹的日记中还能看得清楚，说当天，无线电分团的勤务员们写了一个“严正声明”称，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越来越不理解，因此，“从８月８日起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署名是“Ｘ井冈Ｘ延安，Ｘ韶山”。而当天晚上，我们编辑部不知哪儿去弄了些酒菜，“胡乱吃了一通，胡乱闹了一通”。我是下过决心一辈子不沾烟酒的，但“这一天,我喝了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８月１２日，日记写道：“去年我们炮轰市委，今年的今天，砸派可是真的炮轰我们啦，真的炮轰。用打飞机的四联机关炮或大炮。总之，昨天炮轰了我校一夜。……今天（早上）检到１００多个弹头。／今晚又炮轰……嘉陵江漆黑漆黑的，连一只船都没有。山城死亡啦！真的死亡啦！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通红通红的炮弹在天空中轰轰地飞过，在山谷中引起一阵阵巨大的回响。”

“8月１３日，昨天半夜，江边造纸厂的草堆给燃烧弹打燃了，火烧得很大，没法救，一直烧到今天。我们都伏在战壕里看，很晚才睡。”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迎接八一五周年纪念日的。

《８１５战报》一共出版了６０多期，基本上都是８开版小报，所谓基本，是因为其中有两期是四开版的大报，算是豪华版了。一期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出版的特刊，庆祝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毛泽东巨型塑像落成。另一期，就是为了迎接八一五周年纪念这一期了，出版日期是８月８日。该期报纸除了刊登印刷清晰的毛泽东大幅照片、花里胡稍地摘登了不

知从哪儿抄来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言论、小故事、诗歌之外，第四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通栏标题下，登了一期画刊：“八一五之歌”，含七张照片和五张画作，还第一次刊登了文艺作品,署名“周炽”的半长不短的抒情诗歌。五张画作和诗均系笔者所为,足见为准备庆祝专版我们是很下了些工夫的。报纸印刷整个儿十分精美。仔细检看，该期报纸的排版和印刷质量和那段时间的报纸形成了巨大反差。可以判断，这一期肯定是在城里正规印刷厂排版印制的。前面说过，由于重庆战事日紧，交通阻隔，从８月２日第３４期开始，一直到９月２０日第４０期，都是在学校印刷厂自己印刷的，纸质差，排版、印刷质量更没法说。尤其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３６期为最，刊头画连制金属版已不可能，只好用木板刻制（由我画稿，一位布依族同学韦亮清刻的），整个报纸有点儿抗战时期传单的味道，极显土气。现在我就想不起了，在当时烽烟四起的重庆，为何３５期恰恰又能进城进行印刷？大约只能这样解释，为了纪念八一五这个节日,我们事前很早就把文章、图版备齐，送进城开始制作。不意战争迅速升级，使得８月１５日出版的３５期想豪华，也没办法豪华了。

纪念会是八月十五日举行的。原来准备十四日举行，不意天公不作美，突然降起了大雨，遂改期在第二天。地点选定重庆三中广场。重庆大学在江陵厂炮火射程之内，绝对是不能聚众停留的。江陵厂的砸派在广播里放出风声，要为八一五的生日放礼炮，这危险不能不考虑。前面说过，江陵厂的炮弹都没有引信，打过来吓人是吓人，可无非是些会飞的铁丸子，没什么杀伤力。可是，无论如何，人家毕竟是大炮呀！你重大八一五最多只有重机枪，你的子弹反正够不着人家的眼皮子！你只能眼睁睁等着挨打：这使弟兄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重大的广播每天也叫得厉害，要对岸的和平居民后撤,但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重机枪手们就出发了，开到江边阵地去作象征性还击，毫无实际意义地把子弹打得劈哩叭啦山响。每天看见牛高马大的武斗同学扛着重机枪，神气活现地在校园走过，大家都要向他们致以愉快的掌声，而枪手也很理解地腾出手来感谢致意。八月十四日这天，双方都发出威胁，要对方附近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而重大，这回是认认真真下了通知，实施灯火管制。校园很凄凉了，完全说不上节日气氛。

在三中召开的纪念大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无非是主席讲话，大家捧场。据第３７期《８１５战报》载，纪念大会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似的。重大一号勤务员周家喻以主席身份作中心发言，接着发言的，外地的，有清华４１４总部代表、新北大公社代表、西安交大红卫兵总部代表、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等等；本地当然更多，所有铁杆弟兄，都利用机会来这儿显示自己的团结和实力。

把开会地点改在三中，绝对是明智之举。当天－－据我的日记记载：江陵厂确实“连续向我们开炮。打得很厉害。他们……声称，这是为我们鸣礼炮，我们也当真把这些炮当成礼花来看了，的确没有什么威力，只是吓人，我们倒喜欢看呢！”那天大会后，举行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八一五风暴》的演出，演员们绝对非常卖力，但满天的炮火似乎更有吸引力。日记记载的是，那天，我仅仅将演出看了一半就走了，我和几个同学专门跑到位置比较高的学生甲舍屋顶上去观战，看红通通的炮弹像急雨一般向电机系的教学大楼倾泻,炸出惊天动地的响声。我们看得如此有趣，直到天降大雨，我们才次第离去。

必须补充的是，就在我们回屋不久，嘉陵江对岸突然传来几声巨大而沉闷的炮响。重庆大学叫了很多天，要炮击江陵，只是在喇叭里叫叫而已。而八月十五日深夜，重大的炮队算是动真格了。这一回没有虚张声势。这一回可是真家伙。而且很准。事后知道，用的是真正的榴弹炮。而且是有引信的。而且是由专业人士指挥的。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的日记记载：我

们“轰了他们三发榴弹炮，他们是受不了的”当时盛传，榴弹炮打得很准，江陵的一幢办公楼被打垮一半，死伤惨重——事实是，那一天对方确实被打懵了。对重大的炮击声确实哑了三天，直到８１８才又恢复。

几十年后，我从一份可以取信的资料上得知，那次炮击共打了九发炮弹，确实打坏了该厂的“围墙和办公大楼”“打死该厂工人周厚才、陈锋华和学生丁伯寿，打伤胡义衡等七人。”

六十年代初期，苏共头目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现代战争里，士兵不过是等着挨打的一堆肉。当时苏共被明确定义为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中共理所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武器的作用嗤之以鼻。林彪的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所谓“精神原子弹……比物质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当是把这种“唯意志论”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但重庆的八月战争为我们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佐证：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没有先进武器，确实只能成为一堆等着挨打的肉。狠狠教训了江陵厂反到底弟兄的这门１２０榴弹炮从此成了八一五的英雄，哪儿紧急派往哪，哪儿需要就出发。八月十八日，调去攻打河运校重医学院、潘家坪，八月二十八日，调北碚歇马场炮击ＸＸＸ部队（实际上是一个军校），三次共发射炮弹３２发。所到之处，无坚不催，屋残壁断，天崩地裂，真的个人心大快。只是半个月后，九月，我重到满目疮痍的杨家坪大街去独自徘徊，战事已经停歇，街两边向我涌来的无法回避的废墟，突然间又让我感到不知所措。

这门炮是“借”来的。炮兵学校和我们八一五关系不错，派一帮人去“抢”，对方半推半就，就“抢”来了——那时候八一五的武器大都是这样弄来的。大炮来之不易，很珍惜的，八一五战士白天把它藏在防空洞里，打的时候才拉出来。停战了，借来的东西得物归原主，送走它，哥儿们依依不舍。9月２１日是送还日，３０１炮班的弟兄给炮口披红挂花，然后，一个个全副戎装，挨个儿和大炮站在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敲锣打鼓将它送出学校，送回把它“抢”来的地方。

光有物质基础当然还是不行。硬件好还得软件妙。这就得承认人的因素了。几次炮战弹无虚发，打得如此专业水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每战均由炮校教官亲自指挥。这名教官叫Ｘ。名字中有一个字很生僻，故而在官方的文件里往往写错。

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小伙子。就因为他参与了这几次炮战，事后清查文革劣迹，他不可避免地被清除出了军队。开始是到成都一个机械制造厂当工人，后不知何故又转到什么环保制造部门，后来又不知干什么，他乾脆独个儿跑了南方。大约内地日子不好过吧，八十年代，他只身去广州开始了漫长无涯的闯荡。广州东站后面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瘦狗岭，他就在那儿的小公路边搭个棚子惨淡经营，堆码些石材兜揽生意。他雇一个人守店，自己则成天开个摩托车到处攻关。店后面的山坡上是一片完全象贫民窟般的大杂院，他在那儿租了一个单间住宿。每次我到广州看他，两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恶卧长谈。有一回，他电告我说他弄到一部小轿车了，我到广州，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我真以为他发了，很高兴。那一回，等他的小车开到了，一看，原来不知什么年代的伏尔加，周身油漆脱落，破败不堪，像是从垃圾堆中拣回的。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１９８９年，我一个亲戚从台湾回内地省亲，专程取道广州看我，这消息使他十分振奋。那些天，他什么生意都不做了，一早就用摩托车把我从瘦狗岭载进城，全天候地热心陪伴我亲戚游览、进餐。而且“叔叔”“婶子”地叫得十分熨贴。我亲戚夫妇都是极端虔诚的基督徒。

每饭必祷告，感谢上帝赐福，如文革期间饭前必诵读毛语录一样。我和Ｘ暗自好笑：明明我们买单请饭，可他们不感谢我们，偏偏去感谢主赐宏恩，真他妈牛头不对马嘴。Ｘ很有耐心，私下对我说，别急，老弟！你等我用生意经去打败他的圣经！我说，这厮太顽固，你未必能成功。他依旧信心十足，说当初我们信仰毛思想不挺顽固么，现在如何？

亲戚离境的前一晚，他果然情真意切地对台湾来客说了：叔叔，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可广大山区的贫下中农还困苦得很呢！他绘声绘色地告诉对人间事毫无兴趣的老夫妇，说山区有大量石料等待开采，而城市建设又急需石材，如果能帮助山区的农民弟兄开采石材，（一开采出来就是钱呢！)，帮助他们致富，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呀！只是，他现在手头资金短缺，叔叔，您能否帮忙融资？

只懂得耶和华、摩西、路德、彼德的老夫妇如听天书，只因为撮了我们几顿饭，吃人嘴软，只好客客气气敷衍一通，说是回台后一定向富有的教友宣传。事实是，我亲戚回了台湾便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Ｘ的阴谋破产了。他依旧过着拮据的、却依旧没有屈服的日子。

有一次，他曾到深圳我们公司来看过我。依旧背个书包，依旧一身工装，不修边幅。事后员工们非常不解，说：你不是说他怎么了得么？在广州闯荡这么多年，怎么还像个游击队长？我说：你们读过巴尔扎克的《夏培上校》吗？不管怎么样，他曾经在过去的时间里英雄过。只不过时代把他毁了。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对方的情报工作一点是很出色的。对我们的炮的行踪非常清楚。八月十八日，大炮和Ｘ一起调去攻打河运校。当天晚上，江陵就恢复了对重大的炮击，日记载，对方“向我们展开了大规模轰击，估计打了三百多发炮弹，二舍、四舍和甲舍也都挨了炮”。我们那位备受尊敬的江教授韵和毛泽东的打油诗“弹洞灶房壁”，其灵感就源于那一晚的隆隆炮声。

日记说，那一晚炮弹呼呼地在我们编辑部头上飞。而我和另一位编辑，以“骂砸派”为重要嗜好的张国梁同学，已经呼呼入睡了。

廿五•战争无胜者

毛泽东曾如此定义，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１９６７年的中国国内八月战争，无疑是高层政治斗争流血的产儿。

自该年三月始，因“大闹怀仁堂”事件而引出的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沸沸扬扬几个月，事实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各地军队仍旧普遍支持偏于稳健、甚至乾脆就是改头换面的保守势力。对此，毛自是很愤然的。他必然想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打破僵局，因此便有了御架亲征、南下武汉之举；有了７月１８日他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诸人宣称要对造反派发枪之说。“７２０事件”横空出世，毛仓惶避祸，此番刺激使他对军队问题定然已有骨梗在喉，不除不快之感。郑刚主编的《红色纪要》如是介绍：“毛看到一些部队明里暗里给

保守组织发枪”，于８月４日，曾致函江青，再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做，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应缓行，请提出与林、周和文革各同志从长讨论。”

此举对于急于翦除军内异己的林彪，自是正中下怀。而中央文革小组一帮弄臣，一旦摸准毛的脉相，当然也闻风而动，煽风点火，试图把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地方动乱迅速引向全军。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新华社《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由关峰执笔、康生审定，明确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口号。六天后，８月１日，《红旗》杂志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法更加直截了当：“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揭露出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社论明确声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对于和军队素有芥蒂、一般来说思想偏于激进的一派组织，（如重庆之“反到底”、湖南之“湘江风雷”一类），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始有江青号召，继而有理论支持，顷刻之间，全国上下顿时一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之声。１９６６年肇始的大乱，已使整个国家秩序丧失殆尽。而枪杆子，毕竟是国家最后的权威所在。军队被搞得灰溜溜，天下焉能再有宁日？日益升级的武斗，全国各地不绝于耳的轰轰枪炮，顺理成章成了“揪军内一小撮”这道政治风景线的背景音乐。

绝对的权威，必然是建立在绝对秩序之上的。毛破釜沉舟打碎原有秩序，是怀疑他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从而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的秩序。真的将整个秩序彻底摧毁，他的绝对权威又毛将焉附？毛确实想打理一番军队，可稍一动作，便处处雷区：他不得不犹豫了。

“720 事件”，他从东湖宾馆惶惶离遁。龙颜大怒之时，将武汉军区司令、政委陈再道、钟汉华揪北京午门待处；将闹事最凶的８２０１部队上万官兵悉行遣散，连人连编制全员取消〔按：我的日记上曾记下了这么一个场景：“８２０１部队走（被遣散）的时候,都流了眼泪，车下送别的人也哭”。〕可是，即便如此，毛对陈再道这个十恶难赦的叛臣还是“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蹊跷的问题却是，不过一个月工夫，文革‘功臣’王力、关锋、戚本禹，“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毛泽东是在上海让代总长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他的口头指示的。指示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１　８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5月版）

对这些发生在京城的宫帏变乱，远处西南一隅的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娃娃们当然浑然不知。这时，他们正好打得热热闹闹呢。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一份官方的结论性文档，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名一律隐去，而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重庆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司令Ｙ等人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找到Ｑ商讨武斗问题。Ｑ立即召开勤务员会议……着重研究攻打重庆河运校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以利固守沙坪坝地区。因武斗规模大，Ｑ建议Ｙ召开沙区片会，做出决定和部署；

“八月十六日上午，Ｙ在市一中召开沙区各单位各头头会议……一致同意马上调集力量攻打河运校和潘家坪地区,并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各武斗队于十七日到指挥部报到。

“十七日下午，Ｑ在ＸＸＸ部队会议室召开武斗部署会议，决定重大３０１武斗队的榴弹炮阵地设在虎头岩上，一中、三中和二机校的武斗队埋伏于ＸＸＸ部队与河运校之间……二钢厂等单位的武斗队布置在重庆医学院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十八日拂晓发起总攻。

“十八日凌晨先使用榴弹炮和高射机枪射击各点后，开始冲锋。仅把河运校的武斗队打跑了，其余各点无进展。十九日凌晨又发动第二次总攻，也被对方打败。

“由于连续两天遭到失败，Ｑ、Ｙ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Ｔ去乐池调三七高炮，派Ｚ去北碚搬“援兵”，Ｗ去空压厂调坦克车，二十日凌晨再次发动第三次总攻，亦未能奏效……”

“为了配合Ｑ等人在大坪、潘家坪作战，八一五派空压厂头头Ｙ等人将住在该厂的重大３０１武斗队３３、３４、３５和３７纵队调去攻打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此次武斗中，３０１武斗队的何孝柱、萧再光等八人被打死，方维汉等七人受伤。……”

这段文字所述事实基本可信，只是叙述语言似流露了过多的、本不应有的偏见，很像是当年一位对立派人士的叙述。可惜这确实是一份官方结论。我非常理解授意作文的个别当权者，因被同学们冲击过而愤愤难平的怨尤，可是这些死者，毕竟是他们的学生呀！对于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至少应该有起码的怜悯啊！更何况，年轻人从容赴死时所表现的信念（不管现在看来这些信念有多愚蠢），不正是这些当权者们在政治报告会上喋喋不休教导的结果吗？

作为同学，他们的死讯带来的悲哀无疑是巨大的。８月２０日上午，重庆大学８１５总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前线返回的同学介绍战地情况。会场设在冶金系的学生食堂，大厅空荡荡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留校同学静聚其中，坐着，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演说者一顿一挫、掷地有声的发言。气氛尤其悲壮肃穆。我在当天的日记上记录报告会内容，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这个山头易守难攻，我们坚持了五个钟头，人都快昏死了。本来，我们是可以撤退的，但考虑到全局，考虑到伤员同志，因此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直打到弹尽粮绝。／我们的同志牺牲很多，我们心里十分难过。我们一天都吃不下饭，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前线指挥之一，Ｌ在会上非常沉痛地说，虽然战斗中对方死的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的同学都是多好的同志呀！我们一个换他们十个也不值呀。说得激越悲愤 ，声泪俱下。台下一片沉重的唏嘘和亢奋的呼喊。

王家大山的失利使全团震动。不管怎么说，一次战斗就死了这么多人。日后无论如何是难以交代的。总团于是当机立断：把上述四个纵队全部撤回来，休整！反到底派在军工企业里的势力毕竟太大，武器配置毕竟太强。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了。其时，北碚区已经完全控制在八一五的手中，甚至成了所谓“模范区”。再往西，合川、武胜、南充、广安……其中除了岳池县还被反到底控制，整个西线已全部联成一片。位居这片“红色根据地”的中南段，有一座华蓥山，地势险峻，危乎高哉，曾因罗广斌小说《红岩》而在全国一举成名。解放前，

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确实曾在此与国民党进退周旋,是个坚持游击战、保存实力、准备将来大反攻的好去处。——几番酝酿，重大八一五总团于是有了挺进华蓥山，建立长期战争根据地的设想。

就在这当儿，中央调查团来了。

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组长叫陈斌，听说是总政治部什么人。还有一位团员，名唤温伯华，据说是周恩来联络员。调查团在重庆呆的时间一定很长，至少到１１月份还没走。十一月四日重庆大学开了个“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二人都参加了。在１１月１５日出版的第４６期《８１５战报》头版刊登的大会照片上，他们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重庆警司司令员韦统泰一字儿坐在主席台上。陈组长戴眼镜儿，瘦削，鼻略尖，很有些知识分子味。中央调查团的到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影响。文革大员谢富治、王力来了咱们照样打,小小陈斌算得老几呢？整个山城激战正酣,你们喜欢看热闹悉听尊便。警备司令部曾惠平、郝子义、张甲奎三处长及戚姓科长等七人被袭事件，就发生在调查团到达的第二天，即２２日。是日上午十一时，七人陪中央调查团分乘四辆吉普由市革筹组返回警备司令部开会，车过两路口，被反到底枪手射击，二人死亡、五人受伤。《８１５战报》第３８期对此事的报导原文如下：

“司机当场被打死。张处长身负重伤,送警司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郝处长被子弹击中肚子,肚子被打穿四个洞，生命垂危。曾处长腿被打断。戚科长手臂受伤 。”

那一天我的日记非常低调：

“中央的调查团来了……不知道这次来又会干些什么？我不明白。不过我对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本来今天中午是第一次接见两方代表，后来因故停开了。原因是砸派在两路口开枪射击警司首长，一人身死，三人重伤，他们都是师级干部 （按：原文如此），这，也许是给代表团的一个见面礼吧。”

只是这次背景不一样，后果应该不一样了。前面说了，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对部队动手术绝非易事，风险殊大。毛说话喜欢云遮雾绕，前秦后楚，让人摸头不着脑，而他自己则永远立于正确之地。可这一回他批“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曰：“还我长城!”；批王力“八七讲话”，曰：’大、大、大毒草’”。这些，好像不是信口开河了。他需要给枪杆子们吃一粒定心汤元，也对利令智昏的王力之流使个眼色，让他们稍事收敛。不管怎么说，他最大的一块心病：刘少奇败局已定。毛确实想稳定稳定了。中央调查团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即发布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运动的号召》。这个“中发表６７（２７４）”号文件明确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垮台了”；要人民务必搞明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伟大的长城”。文件宣布：“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文件警告：“要防止破坏，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总而言之，事关大局，在军队问题上，造反派是不能再胡闹下去了。文件最后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齐呼万岁。

接下来，九月一日，周恩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诸人出席北京市革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谈话，声色俱厉地指出：“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南京、重庆很紧张，对野战军大军区司令员动

不动就打倒，新调去的野战军马上受围攻，这里面没有坏人伸手怎么能令人相信咧？”（周恩来语）。任何场合都风头必出的江青在会上自然很动感情，她说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啊！你们夺他们的枪，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一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要“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康生，讲起话来更是寡廉鲜耻：“解放军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问题，他们想动摇毛主席的司令 部完全是痴心妄想，是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解放军，白日做梦”。

再十一天，即九月五日，上述四单位再次发文。这个中发６７（２８８）号文件乾脆就叫做命令了（俗称“九五命令”）。题目全谓：“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除了重申“八二五号召”中的几个“不准”之外，更加肯定地宣布：解放军（对反军抢枪者）“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如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应采取措施，对其少数坏头头和少数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进行自卫还击。”

重新摘录上面这些资料，我发现一个问题：一贯以“紧跟党中央”、“大方向始终正确”自诩的《８１５战报》，对上述这类文件、“指示”刊登得十分详尽，而对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这一类“揪军内一小撮”的权威文件，却只字未载。我想不起这是印刷困难所致？还是对“中央精神”搞各取所需、断章取义？总之，事情反正已发展到了毛泽东高呼“还我长城”的时候，八一五当然又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了。翻看那段时间的《８１５战报》，到处可以看到“举起双手，迎接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伟大胜利的曙光!”（第四十期文章“编辑部就当前时局答读者问”）、“把砸派的坏头头和黑后台揪出来示众!”（同期“六五支队”文章）之类的呼喊。看到对于反到底派盛气凌人的教训：“交出黑后台可以，溜走不行!”（同期“指点江山”评论员文章）

还是回过头来说中央调查团。

反到底派枪击警备司令部诸位处长这个“见面礼”确实起了作用。第二天，２３日凌晨４点２０分，中央文革办事组即紧急致电重庆警司并要求转交两派群众组织。这个电报指示刊登在《８１５战报》第３８期上。原文如下：

“根据中央调查团的反映重庆武斗严重。

1,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两派做到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居民点进攻和射击。请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出包围；

2,绝对不允许对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双方立即达成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的《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１８１页载，该电报稿是周恩来亲自审阅的。足见问题的严重性，亦足见这次来渝的中央调查团确实手眼通天，不同凡响。

电报中提到的空压厂，当时正被反到底久围强攻，形势岌岌乎殆哉。进攻方主力“军工井冈

山”，人多势众，控制在他们手上的武器多而精良。这些优势让八一五大感头疼。“军工井冈山”原来不叫“军工井冈山”，叫“军工造反兵团”，发起人是江陵厂保守派组织“红旗”兵团。年初，２月１０日，革联会如日中天之时，由“红旗”兵团的傅之光等人串联军工系统各大保守派组织整合而成。既然“老保”变种，其中自然党员多、干部多、转业军人多，人多而势众。２月１２日，这批兵团团员决定集体倒戈投靠八一五，政治口号自然是“八一五好得很”“革联会好得很”之类。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八一五为着其组织的纯洁性，还有，革联会内本来就有了一个军工企业的正宗老造反：“八一兵团”——一个槽里同时栓两头驴，这就难办了——两个原因相加，答案只能是一个：把热心热肠的“老保”们干掉！热脸蛋遇了冷屁股。军工造反兵团冲冠一怒，于１３日立马再度转弯，宣布“八一五右了，修了”，正式投入“砸烂伪革联”的革命阵营。不幸的是,随着砸派领头羊“西师八三一”的倒霉，还在襁褓中的军工造反兵团便免不了被株连的命运——最后，被“伪革联”勒令解散：时间是三月下旬。

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下达，两派都取得了合法地位，饱受怨屈的军工造反兵团当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权利重新抗争了。5月２１日，军工井冈山兵团在重庆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其时，重庆大规模武斗已箭在弦上。再度出山的军工工友为着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靠山吃山，以自己强大的武库为后盾，纷纷成立专业的武斗组织，如“红大刀”（建设厂）、如“金猴”（望江厂）、如“六月天兵”（长安），如“红色暴徒”（不知何厂，待考），等等。“井冈山兵团”凭借强大武力和精良装备，于６月２日，占领江陵厂，赶走了八一兵团６５团；６月１３日，占领嘉陵厂，赶走了八一兵团２３０１团（按：据我的日记记录，该厂于八月十四日被八一五派重新夺回，指挥为重大八一五勤务员吴庆举）；６月２０日，占领望江厂，赶走八一兵团２０团；７月１日，同时占领了建设厂和长安厂，赶走八一兵团６６５７团和１６团。

如果当初，八一五派里面多一些政客幕僚，情况可能会好得多。政治场中的功利成败永远高于道德上的善恶之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这句名言，直到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单纯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才从这位资产阶级政客开诚布公的演说里得知。如果八一五当初接纳了军工企业的保皇大军，重庆文革的武斗史肯定会重新改写。但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八一五不得不接受面前的残酷现实——好在,中央调查团总算来了，八二五文件总算来了，他们可以高呼拥军爱民的口号，顺水推舟，体体面面地下台了。

只是反到底偏偏不给中央来人好脸色。尽管中央电文明确指出，要反到底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他偏不。血战一周，死人无数，好容易胜局在望，怎能轻易言退、功败垂成？反到底继续加强武力强突猛攻——而八一五，决定撤退了。方文正，空压八一兵团 2602 团的一号勤务员，身材瘦小，在撤退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环顾四周，问：

地下室里那二十多个俘虏怎么办？

有人说：扔几颗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算啦！

大约已别无选择，方，这个不苟言笑江西小伙子，同意了。

接着，他指名三个学生去杀人。只因敌方火力太猛，地下通道被封锁，行动延宕至第二天才得以执行。第二天，一个叫何大发的弟兄似乎清醒了些，他对方文正说：全部炸死,太多了

吧？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行了！

忧心忡忡的方文正看看他，又同意了。顺便叫他带那三个学生去速速行刑。何去了。

他们从地下室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悉数枪杀。

死者之一邓Ｘ，是车间什么干部，他妻子刘素德已怀有五个月身孕。临刑前，邓哀求道："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何没有理会这个素无怨仇的工友。邓又哀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

全厂陷落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延宕。何说不行，接着一阵乱枪，五人全部被杀……

又二天，７月２５日，空压厂被反到底占领。

让空压厂之战的失败者感到安慰的是，从空压撤除的第三天，八一五派以牙还牙，在北碚歇马场,把该地区反到底的最后据点：某军校一锅端了。缴获步话机等军用物资若干。八一五很得意地把这次胜利称为："八二八歇马场大捷"。

一九六七年的重庆八月战争，至此算是基本告一段落了。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注定没有胜者。不管杀人者和被杀者，伤人者和被伤者，从本质上说来，他们在撕杀中所表现的真诚信念和献身精神都不过是被人欺骗和愚弄而已。真正应该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是那些个别有用心、煽动仇恨的人。而那时，他们正高高在上，手握权柄，他们总是胜利者。

只是，仅仅从表现形式来看，八一五没有从战场上得到的东西，轮到战后来获得了。毕竟中央调查团来了，毕竟"八二五号召"来了，毕竟"九一讲话"来了，毕竟"九五命令"来了。这些东西都在斩钉截铁地维护军人的权威。反到底呢？他们那么地沉不住气，喊过那么多让重庆军人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口号，诸如"揪出山城赵永夫！""打倒黑警司！""绞死匪首兰亦农、白斌！"之类。从六五事件抓捕连长陈干清等四人起，后来又有了八月三日望江厂人员用高炮击沉军分区交通艇致使３名军人罹难一案。还有八月十三日，同样在望江厂，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被反到底人员打死一案。当然，还有就是八月二十二日两路口，警备区处长多人被袭一案……总之，现在轮到反到底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了。而八一五，洋洋自得，他们为自己是始终和军队站在同一战线而骄傲无比。

不管是颓丧,还是得势？其实,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很快证明,所谓拥军派的暂时胜利，也是毫不可靠的。要对付这帮无知的、充满政治理想的、初涉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实在是太简单了。记得初入大学，正值全国大饥荒，我记得我至少有两次饿得几乎昏迷。可政治辅导员站在讲台上一说：这些，全都是苏联修正主义作的孽！说：有志气的中国青年，要发愤图强卧薪尝胆！说：党中央说了，困难到此为止！我们马上就激动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饿着肚子穿着裤衩去和赫鲁晓夫拼命。１９６７年的８月，我们死了这多人，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曾经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恰恰，正是这种虚妄的短暂的狂喜，催生了后来我那篇文章,像阴影一样笼罩了我整个人生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廿六·军事根据地的闹剧

九月三日，我去北碚参加所谓“八二八祝捷大会”。当天的日记记录了如下情景：

“作为八一五派红色根据地的北碚城，给我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的车是早上８点左右出发的。从重庆——北碚的公路，一直都十分平静。到同兴乡时，开始有第一道关卡，三道交错的石墙拦住去路，只留出一条很窄的Ｓ型通道。车停下了，一个手持‘三八大盖’的‘兵’走上前检查证明，然后放行。/一会儿，车过施家梁，沿着嘉陵江奔跑一段路，过龙凤桥，便到北碚了。迎接我们的，又是一道检查介绍信的关卡，又是一道有Ｓ通道的墙，再绕过一道用灭火机改装的炸弹网，便进入了繁华的北碚城。/祝捷会已经开完。大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热闹程度，大概只有节日的解放碑可以与之匹敌。大字报非常多，大标语也稠密已极。一会儿，锣鼓声响过来了。红旗和欢呼声簇拥着一队队英雄队伍。他们是在八二八大战中，用生命换取胜利的英雄。他们都扛着枪，握着最高的奖赏——毛主席著作，骄傲地在大街上走过——街道的墙壁上，宣传画向他们欢呼，写着喜报的大红纸向他们欢呼，林荫道中幡飞的标语向他们欢呼：‘庆祝八二八大捷！’‘文攻武卫好得很！’‘穷追砸匪！’……”

就在祝捷大会的第二天，九五命令正式下达的前夜，四日，重大３０１纵队以军训为名，私匿武器，神不知鬼不觉向华蓥山进发了：按照总团的部署，此行是去建立根据地，保存实力，为持久战作军事准备。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田野和山峦都肃杀无声，很利于实施军事行动的。此前，《８１５战报》编辑部已经开过会，决定用实际行动向３０１学习。行动之一，就是派员分期分批跟队３０１做战地采访。霍晓林和张宗云作为第一批成员跟队出发——在华蓥山采访数日返校,他们曾兴致勃勃地向留守编辑汇报了全部见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天是很黑的，知道从沙坪坝至北碚的道路和山峦是很黑的，也知道了行进过程中，所有兵车的大灯全都关闭，只亮着荧火般的尾灯，行进得十分隐秘和缓慢。车上都配备步话机，每车一台，从“八二八大捷”中缴获的。车与车之间完全用电台传递信号：“一号！一号！二号向你喊话！我们已到陈家桥！我们已到陈家桥！”“一号明白！一号明白！二号二号，请继续前进！请继续前进！”完全和电影里看过的镜头一样，挺刺激，挺有英雄感。遇上了部队岗哨（那时军队已经开始动起了真格，对两派的枪支格收无论），大家就远远地背起武器下车，从漆黑一团的田间绕行。从霍、张的介绍中我们也知道了３０１的同学们住在山顶的江华镇，指挥部设在一座小学校的校舍里，而大家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军训和打靶。此外，华蓥山到处都茂林嘉树，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记者的介绍十分刺激，谈话间，还不时出示些武斗队发给他们的东西，如宝贝手榴弹之类。当然，还有３０１纵队成员才配发的赝品黄军装，这待遇，他们二人也享受了——这一切，足以把大伙儿的胃口调得足足的，一个个都恨不得马上也轮值去根据地走一遭。

但是很快传来了惊人消息：9月１２日，３１纵队十一名同学，其中包括一名女生、人称“小联动”的，从根据地出发去岳池县，在石垭镇遭遇了砸派武装伏击，一人中弹身亡，十人被俘，生死不明！

据事件亲历者之一刘抗生回忆，他们此行是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整个南充地区都是八一五的天下，唯独乐池县尚为砸派盘据，老八当然想利用重大进驻华蓥山之际，趁机将老砸一鼓而荡平之，十一个人便这样出发了。下山，先到广安，这是老八的势力范围，问明情况，壮壮行色，又从广安县城出发，顺公路两侧向岳池搜索前进。十一人很快到了广门公社地界：这已经是砸派范围了。一路无事，于是越发大胆。枪端在胸前，是五六式冲锋枪，很先进了，似有符咒贴身，刀枪不入，怕什么？重庆那样的大江大洋都闯过来了，料此荒远地界，敢有何方凶神挡道？天高高，云淡淡，蝉儿在婆娑的树梢浅唱低吟，好难得一派田家秋景！远远坡头上，影影绰绰，似有人头晃动，遂一停，一望：不过是些村夫野老、牧童稚子罢？不警觉，依然次第前行——就这当儿：说时迟，那时快，一梭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斩杀路旁草叶，飒飒啦啦一阵惊惊惶惶的乱飞。事情不妙！武斗队员们一齐扑倒路边——路边一片红苕地，枝蔓正旺，急匆匆匍伏爬进——他们根本不知道，其时，敌人已经对他们完成了合围！

武斗队员冯纵，校足球队队员，父亲是重庆市中医界的超级权威人物，家境优裕，小伙子故而一脸白白净净，灵毓清秀，帅气逼人。如果当时他不去穿那一身愚蠢的赝品军装,不扛着冲锋枪到素无怨仇的川中丘陵游荡，而继续留在校园，他绝对是女大学生梦中的多情公子。可惜，历史不可回避地让他去了，不可回避地让他爬进了那片红苕地。红苕地枝蔓横生，茂密的叶片儿被他的赝品军装撕扯得哗啦啦响。只是，地势太开阔了，而他个子又高，还来不及成功隐蔽，一枚子弹已经准确无误地射中他的胸膛：就一枚。弹孔应该是正穿了心脏，大动脉顿时血喷如注——扑卧他旁边的刘抗生如是说——他只蹬了蹬腿，像临死前的青蛙那样，接着就不再动弹了。顾不上处理他的尸体：大家发现旁边正好有民房一院，急急地便退了进去。数倍于学生的武装人员也紧跟着将小屋团团围定。

他们是无路可逃了。躲进小屋的学生们全都抠紧枪机，握紧了手榴弹，对方只要敢冲进来——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刻，双方只能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就在这一刹那，刘抗生，就是向我叙述这段生死经历的同学，突然呐喊着向门外冲出去，他高声喊：

“双方都别打啦！双方都别打啦!”

这是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刘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要跑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喊？反正，命运就这样让他跑了，喊了，并且就这样，整个事件的进程便回转了方向。余下这十个大学生的命运，本已像急流出山，眼看就要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因了这一声喊，却突然转了向。人的命运常常就这样，因为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细节，便改变的面目全非。几十年后，我已无法记全这十个人的名字，除了刘抗生，好像还应该有钟永志、范和棣、郭汉宗、李伟森、刘再明……我总相信，如果当时没有那一声喊，那么，我们西南地区的厂矿，包括昆明钢铁公司这样的省级特大型钢铁企业，就会缺席了这几位优秀的总工程师、厂长和高级工程师。

对方首先把刘捉了。在继续对屋子实施武力围困的同时，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 。

刘抗生，四川成都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他本来他应该是上五年级的。１９６１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乃父曾作过国民党成都市府秘书长，他理所当然落了榜。悟性极高的刘对于这个结果早有所料，于是毫无怨尤、心平气和地走上了社会。他性格快爽耿介，敢说敢为，

聚谈豪饮间，他的伶牙俐齿、如流的粗言俚语总让人啧啧叹服，在江湖闯荡中很快找到了别人的认同和自己的位置。１９６２年，刘少奇、邓小平出面收拾毛泽东大跃进留下的乱局，四川副省长康乃尔据上峰精神主持川内考务，宽大的阶级政策成了被家庭包袱压得喘不过气的青年们的福音。刘初听此言，信疑掺半，他不相信共产党会对他们这帮另类网开一面，皆因劝说的人多了，他姑妄听之,不抱任何希望再次去了考场试试运气。不料这一回，他竟然中了——大概就因为如此吧，他做事从来不会忧心忡忡瞻前顾后，从来就敢说敢干，他相信运气。在乐池被俘之前，文革之中，他至少已经注定该死了两次。一次是在李子坝，他开“造反车”进城——“造反车”是文革中的专用术语，即，既未经过正规驾驶训练，也无正式手续取得车辆使用权，弄辆汽车就上路去满世界狂奔，“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战争中学习战争”。——车过李子坝，不知为什么就翻了，打着滚翻下几十米的悬岩，车被摔得粉身碎骨，他竟然没被摔死，而且很快又活鲜鲜地走下病床继续革命了。第二次是去炮兵学校“抢”枪，该校的军人本来和八一五观点一致，也不知道为何神使鬼差，那天却得到情报，说是有几车“砸匪”要前去抢枪，军人们于是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严阵以待。这一回，刘依然神气活现地开着“造反车”，车门两边还神气活现地站俩护卫。名为“抢”枪，实为到八一五哥儿们的仓库去搬武器，当然不会什么任何危险。护卫站在车门边上，一手抓车窗，一手腾出来迎着万里东风挥舞开道，那感觉一定很酷（按：那时的“造反车”上几乎都有如此护卫。更神气的，还在背上交叉插两把红绸大刀，或者在腰上别两柄盒子炮）。既然炮兵学校的学生们事前已经得知“砸匪”要开车来抢枪，而现在果然又来了这么几车耀武扬威的不速之客，当然就不客气了。第一拨子弹刷刷射出，首先就把站在车门边出风头的同学打翻落地。其余人等惊慌失措，四下里鸟逃兽散——误会很快澄清，可是人已经死了。奇迹在于，就在死者旁边把玩方向盘的刘抗生，公然又躲过了一劫！

死过两次，站在死亡面前当然容易镇静自若。周围都是林林总总的的刀刀枪枪，他呢，故意装得像个被人胁迫的乡下佬，懒洋洋，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对方问他：“做啥子的？”

“我们能做啥子？”他说，“工人。挣钱吃饭。养婆娘娃娃。”

这已经很有人情味了。于是又问：“你工人，有婆娘娃娃,为啥还到我们这儿胡闹？”

“厂里个个都参加革命，我不参加得行么？毛主席号召么！不参加，人家说你觉悟不高，以后在厂里还能混得下去？”

他还说，除了婆娘娃娃，家里还上有高堂老母，体弱多病，难着呢！工资本来就低，日子本来就难过，你们打死我，我倒痛快了，可老母亲咋办？婆娘娃娃咋办？可怜啊！你们就看着办吧！反正我活着也艰难！他还说了，他的弟兄们倒净是些无牵无挂的小年轻，都没结过婚，没老没小，他们真要和你们拼起命来，谁吃亏谁划算说不准呢！

论舌战，专县上的“土八路”哪能是他的对手呢！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行,不打了。你去动员你的弟兄们先缴械吧！缴了械再说。

事情暂时就这样摆平了。十个人被关了起来。据说，对方还同意对冯纵的尸体先做了妥善处理。算是非常人道主义了。

这些情况，我们当然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传回根据地的消息，只说是全军覆没。梁大汉，冶金系五年级学生，３０１纵队司令员，星夜从广安驱车回重庆搬兵。政委吴庆举正好夜奔广安前线。两车路遇，风尘仆仆的梁跳下来，大叫一声:我们十一个弟兄全完哪！说罢，便与吴抱头痛哭！梁大汉道旁发誓，除非砸派乖乖放人，否则，不将乐池小城踏为平地，绝无颜再见全校弟兄！——后来，听说他果然把重庆八一五的各种土洋战车、土洋武器通通动员起来，把乐池围了个水泄不通——该消息是否确切，待考。因为部队收缴武器风声日紧，大规模的武力调动如何进行？再说，当时五十四军确已通过成都军区对岳池县的武装部施加了压力，打了招呼，和平谈判已很快提到了议事日程，武装包围已似无必要。

８１５战报的第二批前线记者，就是在这个时候赶上华蓥山的。第二批记者也是两人:我，还有张国梁。

我们赶去山上，岳池方面的情况已经明朗：双方没有打起来。通过军队干预，对方同意重大八一五派人前去谈判俘虏问题。关于这次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谈判，上一世纪７０年代，八一五的首席代表吴庆举曾非常详细地对我说过所有细节，只是年深日久，记不全了,而吴已于几年前作古，许多情况也无从证实，如今尚能记起的两件事情是：一，由于当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因此八一五方面是很主动，甚至有点儿以势压人。对方不敢出来,非要八一五进岳池谈判不可。去就去！无非虎穴狼窝吧！还能把得理不让人的八一五怎么样？吴带一个高参（机械系钟姓老师）一个警卫员（冶金系一个大汉），当即就出发了，还专门开了一辆外表不错的吉普车去。车过广门，到敌方地盘了。砸派的武装部队荷枪实弹恭侯大驾光临，刀刀枪枪在路两边一字儿排开，像古装电影的军阵，很是杀气威武。对方要吴等三人下车，换乘他们预备的车辆入境。吴很有大将风度，走下吉普，带领参谋、警卫威仪棣棣登上对方破车，然后绝尘而去。那阵仗，很有鸿门宴的感觉：吴对我如是说。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对方对国内形势省内形势完全稀里糊涂。

于是他就大谈八二五号召，大谈九一讲话，大谈九五命令，谈得对方诚惶诚恐，转弯抹角倒想反过来巴结八一五。事前商定的所有谈判事宜自然十分顺利,都按八一五说的办。最难的是一个小小细节：胶卷问题。听说十位同学被俘后，曾被对方强迫举手做投降状，逐一拍照留影存档——这就有损八一五革命战士的光辉形像了。八一五从１９６６年8月成立之日起，就有一句响当当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南下学生还心情激动地将它谱成战歌,大会小会，游行示威，众口一词，高唱此番战斗旋律，非常震撼人心。可现在，你瞧，八一五的钢铁战士们公然在敌人的淫威下举手投降，成何体统？——几十年后，我已经无法想起此胶卷问题是否确实？可能有，那么，艰难的谈判肯定已经把它摆平，就是说，毁了,为我们出生入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弟兄们挽回了面子。也可能没有，那么该问题的谈判就完全是多此一举。几十年后旧事重提,他们举没有举手？投没投降？当然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双方冒死捍卫的，都是莫名其妙的、虚妄的玩艺儿。忠于它和背叛它，其道德评价没有什么不同。

西线无战事，根据地自然无事好干。战报编辑去了，大伙儿自然要我们给讲讲山外的革命大好形势。没有事了，我也就跟着他们军训、打靶。打靶是每天早上必修的晨课，半自动、冲锋枪、机关枪，都要轮着打。这就遇到一件趣事，差点要了大伙儿的命，不记可惜，兹简述如后：

却说某天早上，大家正在打靶，旁边闲游浪荡地来了仨人：一男，后跟着Z女。男的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现搧”，机械系学生，时任根据地电台负责人，Z女孩是电台发报员，记不起是何系何年级同学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现搧”是重庆土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马上揍!”。“现搧”热情奔放，好出风头，故有此绰号，学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现在，有Z女战士紧跟侧旁，他当然随时随地更想露一手。看见大家打靶,“现搧”自然也想来几个“十环”让女同胞开开眼。可惜，持枪的弟兄们对他的作派偏偏不买帐！你想打？偏不给！求了几个人，都不行。真是太丢人了！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他对Z女孩说了：有什么稀罕的？今晚上，你们等着，我有更好的让你们打!”

那天早训结束，总部传下话来，说岳池同学已经定于当日出狱，各队均派代表前去广安县城迎接。早饭毕，四辆卡车便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也随车前往。几十年后，为晋谒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故居，我专程去过广安。当是时也，广安已经撤县建市，街道花团锦簇，大楼楞次栉比，很现代化了。可１９６７年9月第一次去时,广安是很寒伧的。麻石路两边，全是些低矮发黑的木板房舍。甚至还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城门洞，墙头乱草萋萋，很显衰败荒老。从华蓥山到广安不远，早餐后出发，中午就到了。吃罢午饭，岳池方面还没有消息。大家就扛着枪满街里游荡，到空寂无语的渠江边去，拣破瓦片打“水漂”,用冲锋枪射击对岸的石头。一直到黄昏了，吃过了晚饭，岳池的战友还没有回来——那边传来消息，说尚有什么细节没有谈妥，今天就不必等了，我们只好驱车回山。那一夜天很黑，没有星月，山峰和旷野晦明莫辨，如历虚空，如坠地狱，大家就挤在车斗里任崎岖的山路颠簸 。

突然，我们听见司机在驾驶室里大叫“危险”：大家警觉起来。奇怪，凡遇转弯处，凡遇道口，黑暗里都有人向我们发信号：用手电筒发出的预警信号。整个根据地山区实现联防，每晚都会给出一个通行口令,遇到情况就紧急盘查。那一晚的口令是“三长两短”。就是说，如遇盘查，行人需回答“三长两短”，汽车则需用喇叭鸣三长声，两短声。如果错了，地下到处都有地雷，马上就会拉响，埋伏的枪手也会乱弹齐发，来你个人仰马翻。那一晚，我们根本没听说有什么紧急情况，为何一路警示？司机捏一把汗，不停地鸣着三长两短，竞竞颤颤地沿山路盘旋而回。 坐在车上的人也竞竞颤颤，深怕司机摁错了节奏，顿时车毁人亡！

好容易回山了，指挥部空荡荡的,为数很少的留守人员一下子全冲上前把我们包围了。他们不是要问我们是否接到了被俘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莫名其妙 。

此时，武斗人员也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撤回总部，把我们包围了。他们光着膀子，气喘嘘嘘，子弹带斜挎在汗水淋淋的肩上。枪刺在黑暗里闪烁有光。有的人还拖着重机枪，枪拴拉得哗啦哗啦响。他们也不关心我们是否接到了俘虏，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更加莫名其妙了。好一会才明白：他们差一点儿就把我们当做入侵之敌予以歼灭了！幸好我们回答正确，要不，机关枪早已瞄准，地雷也早侍侯着呢！情况是：当晚，不知谁传来情报，说有四车砸派将要前来偷袭。而我们的车，又正好四辆！更为蹊跷的是，当晚，天上确实发了三颗信号弹，均为绿色——这正好是当晚的特急信号。已经酣然入睡的武装队员翻身而起，立马拖枪上山，进入阵地，各就各位，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了。

问题又出来了，这三颗绿色信号弹，是谁打的？几十个人集结在黑黢黢的小地坝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排查，很快证实：总部绝对没有任何人发过信号。那么是谁呢？山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几个，目标很快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现搧”。对，就是他！前面不是说过吗？早

上，他想在女孩子面前出风头，碰了一鼻子灰，有人就听他说了："今晚上,你们等着，我有更好的让你们打！"

没错，确实是"现搧"。那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搞到一只信号枪，三枚信号弹。趁着月黑风高，他确实带着Z女孩，上荒野山头去小小地过了一回枪瘾，一人一枪，偏偏都是:绿色！

有点像古时候的故事了：烽火戏诸侯。武斗队员们怒不可遏，如狼似虎一般齐扑"现搧"的房间。"现搧"知道坏事了，倚门而立，手里紧紧抠住那柄信号枪，把一颗信号弹顶上枪膛——那枪弹射出来，近距离还是很有杀伤力的。"进来呀！"他喊道，"谁敢来，我就开枪！"

没有人上去。几十人全呆围在四周。局面正在僵持，总团勤务员查正礼赶来了，他慢吞吞上前，对"现搧"命令道："把枪放下！"

"现搧"乖乖把枪放下了。不等查再说什么，怒气冲冲的武斗大汉们已一涌而上，把他按翻在地，结结实实地"搧"了个鼻青脸肿。

第二天早上，在小学校的小地坝上开了"军人大会"。鼻青脸肿的"现搧"和两个女战士规规矩矩做了检讨，说自己犯了"自由主义"，犯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又一天，被俘的同学回来了。好像是直接回的学校。因为不久。根据地也就解散了。时间是９月２８日。３０１从上山到下山，一共二十四天。

下面是我的日记：

"9月２９日。阴。

"301的战士都回来了。在北碚缴了枪。是昨晚回来的。我去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那心情该是怎么样呢？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解甲归田一样。大家狂跳，乱吼：好了！完了！大联合了！和平了！要武斗，再从拳头重新开始升级吧！"

廿七·无法重归的私人生活

华蓥山根据地解散，标志着１９６７年的重庆武斗正式结束。国庆节快到了，我去南岸看姐姐，近三个月，这是第一次进城去。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处是战后恢复时期的景象／……从两路口一直走到红港(按：即朝天门)，又走回来，细细观察了一番战争的遗迹和战后的恢复景象／航锋（按：指河运校)、解放碑交电公司可算是首屈一指的战争纪念物，经过战火摧毁之后，全剩些光架架了。红港大楼和我校的六大楼差不多，密集的弹痕记下了血痕斑斑的'八·八惨案'。在大楼前的街心花园里，有一个新垒的土堆，上面压满白花，前面有一个木牌,上写：'八八事件殉难

烈士’……／街上人不少，因为商店全关着,游人只好在街上溜哒。这些人大多和我一样，是来看稀奇的。／电车线正在修复。‘人交８１５’写出大标语：‘向抢修线路的五十四军学习！’／一辆辆汽车在街上奔驰。为了避免检查站的解放军同志多此一举，因此车上都挂着牌：‘邮政专用车’、‘粮煤专用车’、‘蔬菜专用车’、‘毛著印刷专用车’等等。／小街上的垃圾堆如小山，现在正被一车车拉走。／这一天，恰好是大太阳。九月明丽的阳光下，山城像在春天里一样苏生了。……我心里非常舒畅，我 真想喊一声：‘新山城，你好！’”

我开始领工资了。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领工资，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我不再是消费阶级了，而是一个用自己的劳动来为人民工作、养活自己的人了。工资是这样一个标志。／在过去读过的诗歌中，我记得，是歌颂过这件事情的。但我没有心情写诗。想起死去的伙伴，那些勇敢的英雄……我感到难过。”工资标准是４２点５元。我给父母寄去了二十，余下的，除了交伙食费，我为自己买了一件灯芯绒外衣。动乱一年，我的衣物已丢失殆尽。后来发配云南边疆，出发时，所有行李总重仅仅１３公斤，除去非常压秤的一大捆书籍、笔记本和画册（还有我保存至今的文革资料），衣物重量几乎为零。我差不多是赤条条走向远方的。

同学们都陆续返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１１月４日，全校学生在风雨球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陈斌一行、驻军首长兰亦农、白斌一行均出席了大会并演讲致辞。《８１５战报》第４６期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刊登大会消息及首长讲话，还配发了社论。紧接出版的第４８期（第４７期为与《山城战报》的合刊）又继续发表社论：“让教育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发表头条消息：“欢呼我校教育革命高潮的兴起／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年初三月，革联会如日中天、形势“一派大好”之时，重庆大学也曾搞过一次“复课闹革命”，那次活动因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而迅速流产。这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这次的号召更鼓舞人心，而是半年多的经历让人对“大革命”心灰意冷，大家精明了许多也务实了许多。把壮丽的理想和官场的是是非非留给政治家吧！老百姓靠空头政治是过不了日子的，要让自己在社会立足，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一身过硬本领。于是，同学们纷纷把老师重新请回讲台对自己传道授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初期、和所谓“红八月”的情况恰恰相反，学生们对那些曾被自己批判过的老师、“学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在已经不再反感，甚至简直就有些巴结了。毛泽东的文革，在他所期望的若干领域，开始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采矿系的同学，入校时一个个绝对都为自己黑矿红心的未来而骄傲，可现在不了，他们非常清楚在暗无天日、充满冒顶、爆炸、灌水等诸种危险的井下作业意味些什么。空泛理想的滋味他们已经尝够了。他们需要实惠。不用谁批准，全体同学一致宣布“造反”：通通转入机电专业学习——这个“革命行动”日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我所认识的采矿系校友中，至少，一位丁姓同学，后来成了云南省著名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而不是成天在矿井里爬进爬出的黑不溜秋的技术员。

五年级的同学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好学了。比如我，恰恰在毕业设计完成的第二天,未名湖畔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横空出世。我们，接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都被彻底搅乱。既然领袖号召，还有什么犹豫？干就是了。从此干了一月又一月，冥冥之中一干就整整一年！一年革命，工资全免，哥儿事后想想实在太吃亏。现在好，终于该领工资了：记得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发的话——就为这句话，１９７６年老先生辞世，大伙儿要为他流眼泪为他十里长街送灵柩就绝对有理——因为冲着这份儿,五年级同学的革命彻底性就远远地不如低年

级同学。武斗一开，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全往家里跑，像笔者这样“坚持战斗”的痴迷者确当少数。回家何为？一曰避祸。五年寒窗好容易熬过，马上该挣钱了，死之可惜；二曰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在我的大学时代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１９６３年，上大二，高教部就发来了条文明令禁止，共青团员带头实行。记得团支部的组织生活曾经反复交代政策：有朋友的，一律交出情书，和对方一刀两断，并作出深刻检讨。没有朋友的——没有朋友好说：以前者为鉴戒，下不为例。我是没有现行的，但我清楚记得哥儿们交出情书深刻检讨时的狼狈相。文革动乱，所有旧秩序一律砸烂，原先转入地下的故情旧爱全部反弹，轰轰烈烈浮出水面。有的乾脆就宣布结婚。要结婚就需要钱。钱比革命理想更实在，国务院总理发话给钱，谁能不积极呢？大家自然从四面八方回校来了。

报社的人也都回齐了。含历任编辑，含成都版的编辑，都回到了设在原党委小院的编辑部，热热闹闹聚会了一次，开座谈会，还照了相，然后留下部份骨干，其余散伙，各回各的系班。历任编辑凑在一起，共二十多个，在民主湖畔留影一张，在风雨操场留影一张,人太多，镜头幅面有限，有几个人只得爬到树上站位，所以大家管这张纪念照叫“树倒猢狲散”。

既然“树倒猢狲散”，既然高年级同学，包括我，已经开始领工资而且马上开始毕业分配，编辑部自然就该由低年级同学接班了。大家一致推举王亦富，就是绰号“王二麻”的机械系一年级同学做主编，他没有经过太多推辞，便接受了。王，四川乐山地区人，乐山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一代才子郭沫若就生于斯长于斯。王也自幼聪明，还上小学就常参加镇上的年节川剧演出。他喜欢和人扎堆，喜欢自我表现，命中注定他将在文化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终为它殉葬。——１９７７年，他时任十三军军长秘书，因为替人起草过给江青的劝进信而被审查，自尊心无法忍受，于是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战报召开散伙会，时值八一五政治上豪气正雄，有很多风头可出，大家一致推举王作主编，他很容易便接受了。更何况，武人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光荣，再次轮到文人表演了，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检看那以后的若干期报纸，好像还是我在组织编排，一些重要文章还是我在撰写，但很多具体事务都由王安排了。我这样做，用八十年代褒誉下台老干部的话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我算功成身退了。一年文革，为我的大学生涯划了一个重重的圆满句号：我为此而自豪无比。进大学第一天，我曾坐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庄严地写过一篇日记，模仿我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意思，写了一个“我的大学五年计划”。这本日记后来不幸丢失，该计划的具体条文也已十分模糊，但大意却记得清楚。大意是，五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岗位，人们将发现来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朝气蓬勃，工作勤奋，热爱生活，富于理想……等等，反正他优点很多因而倍受领导赏识和群众赞扬。大学五年，我确实以为自己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色，继而在文化革命的血火考验中，也绝对没有拉过稀，还出足了风头。我以为我兑现了自己的设想，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甚至——这样说吧，大家谈情说爱，而我，连这个敏感问题都顶住了——在十分模糊的“个人五年计划”中，我的确也写过一条，宣布大学五年间必须集中全力学习，不得与任何女生谈情拍拖。现在，既然计划全部兑现,我可以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了。

我们班管毕业分配的小组长黎专门来报社找我，他问：你的毕业分配自愿准备填报哪儿？他告诉我，同学们的分配自愿表差不多都填写好了。他还对我说，按我这样好的条件,可以随便挑好的地方、好的单位填，别人是没法和我竞争的。他所说的我条件好，除了上面我说的那些，还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就是：我没有女朋友，分配时不需要照顾未来的“夫妻关系”。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反问：还有些什么地方没人填？

黎说：西藏。

我追问：西藏一共几个名额？

他答：两个。

我说那好——依旧没有犹豫——我说，我曾说过毕业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我绝不食言，我就去西藏吧。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我在他交给我的分配自愿表上很痛快地填了如下三个自愿：第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西藏" 。

其实，我在冠冕堂皇说上面那些话的时候，暗中已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我之所以问西藏几个名额，其中就已经暗藏着一个无法挑明的原因：我以为那一个叫Ｚ的女孩，一定会和我一起去飘泊天涯的。我在前面曾经写过，还在大一，在夹竹桃鲜花盛开的校园小路，我曾邂逅了一位女孩并一见钟情，从此后便一直执着地暗恋着她。只是大学时代的政治高压和过于神圣的理想使我一直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对她吐露私情，这样，另一位男同学理所当然地和她相恋——正是文革的动乱环境使他们轻松地坠入爱河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另外一位女孩，我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Ｚ，多年来，却对我抱有那么深沉的好感。她的好感让我十分感动，无法拒绝。１９６７年８月，当嘉陵江对岸的炮弹夜夜在头顶呼啸，给黑暗的天空粗暴地划出红通通的弧线，在深垂窗帷、挥汗如雨的斗室，面对着死亡，我确信她是我最终的选择了。

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我说，如果有一天战争会结束而我还能得以幸存，我们定然又会见面并且可能面临未来命运的选择，比如说：毕业分配。我说，我们已经相识五年，我很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结论：反正，我们都这么大了，已经用不着脸红……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查阅了日记，这封信是８月１０日写的，但直到９月２日战事平息才从邮局寄出。

她很快给我回了信，她在信中第一次明白地向我表白了好感。表白得热烈而且肯定。这就让我这个对女性心理全然无知的"胜利者"产生一个极端错误的想法：她定然会服从我的选择，（因为我是这样的革命而全无自私自利之心呀！她能不服从吗？）心甘情愿地我一起去浪迹天涯的。我错误地认为和她讨论分配去向已经是多此一举了。因此，根本还没来得及和她见面，我就向分配小组表了态。我的"自愿"很快被传为美谈同时又极大地伤害了Ｚ的自尊心——她当然是知道了我的选择。她需要我向她作出解释。

这是重庆冬日一个晦暗的黄昏，我和她在嘉陵江边一株巨大的黄桷树下约会。我感觉得到，她是鼓足勇气来和我见面的。但一路上她却一语不发。坐下了，是在树下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她仍然沉默不语，甚至有些局促。我终于忍不住先开口了，我说：

"我已经填报了自愿，你听说了吧？"

“知道了。”她说。

那么，我问，你意见怎么样？

她低头不语。夜色在四周弥漫。我有些急了。因为我马上要去出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四川三大组织：重大八一五、成都红成、南充临联的联席会议，商量关于在全四川“倒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她一直不说话，我只好摊牌了。我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藏，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起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之间也就不再存在任何超过同志之间的友谊了。——时过几十年，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我的原话就是这样，像最后通牒一样冷酷和不可动摇。

她不说话，用顽强的沉默进行抵抗。

我于是追问：你愿意吗？

沉默许久，她终于说了：我正在思想斗争。

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好吧，你再想一想吧。我等你消息。接着，我非常残忍地告诉她，我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需要提前走了。

人说，时光如白驹过隙。现在一转眼，我们都已年近花甲。我不知道那位可敬的Ｚ能不能读到我的这段文字。但是，行文至此,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粗暴、无知和丑陋而痛悔不已。我希望能得到她的饶恕。

我离开她，径直去重大校务办公楼参加了整整三天的会议。前面说过，正是这次联系会议，直接促成了我那篇混蛋文章，那个我一生都没有走出的阴影：“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应吧。我伤害了一位可敬的女孩Ｚ，而命运，对我进行了惩罚。

我还必须坦言的是：就是我于炮火连天之夜给Ｚ写信后不久，一群中学武斗人员从“江北沦陷区”兵败撤退到了我们学校，一部份人还住进了我们所在的党委小院。于是，有几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成了编辑部的常客。她们甚至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常委”，因为她们认为，机关报报社的主编，从级别上应该是总团常委一级的。在大学生面前，她们显得那么的幼稚无知，以至我们仅仅只能把她们当成调皮贪玩的娃娃。但是我（甚至包括其他的编辑）很快就发现了，她们其中之一：Ｓ，对我却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的好感，她的天真无邪对我发生着一种难堪的诱惑。我不敢承认这种情绪，更不敢向她拒绝这种双方都以为模糊不清的东西。于是我对自己定出计划：等一等吧！反正什么都没有发生。等到我和Ｚ的事情一定下来，我就正式通知她，那时候，这个难题就不解自决了。

但是，毕业分配的方案迟迟定不下来。听说四川省分办主任、被八一五臭骂为“烂罗卜”的张西挺对于重庆大学以一派掌权而完成的分配方案颇多歧见，事情就无限期地拖了下来。对此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Ｚ干吗老不给我回音呢？这种马拉松似的延宕对于我急于想对与Ｓ关系下结论将非常不利。我不能不托人给Ｚ捎信，但没有回答。第二次捎信，情况也如石沉大海。面对两个女孩的好感和完全不确定的因素,我陷入了极大的难堪。

能够让我解脱的，也许还是只有乱麻麻的社会动荡。我一如发狂的陀螺，需要有鞭子不停地抽打以维持旋转，一旦停住旋转，我就会訇然倒下。这鞭子就是争斗、撕杀、狂热。事情过了很久，当各方关系都已尘埃落定，Ｚ曾非常宽容地告诉了我，那时候她并非不理解我的革命热情也并非不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天涯，她只不过希望在我的思维框架内和我一起认真讨论一些今后的实际生活，包括成家和生孩子。而我,竟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她！她怎么能不彻底失望呢？而年轻的Ｓ，也许比Ｚ更多些激情和不懂事，因此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革命狂热表示认同和钦佩。我的虚荣心很容易便和她的欣赏发生了共振——命中住定，我只能沿着荒唐之路，稀里糊涂地继续滑落。

Ｓ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廿八 •“必胜”出炉前后

“九・五命令”下达后的日子,是八一五派的节日。整个战斗团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和历史上所有的胜利者一样，我们开始做着胜利者们胜利后常常想做的事情：如纪念英烈,如讴歌胜利，还有，既然胜利了，那就必然要追究失败者的责任，清算他们的罪行，穷追不舍。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烈士陵园是修在松林坡顶上的。松林坡紧靠嘉陵江边，一幢幢教授别墅沿坡而筑，掩映于密密的马尾松间。山头一片开阔的草坪是共青团员们过组织活动的绝佳去处。八月武斗，死去的同学陆续埋进草坪中央的大坑里，还把校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成了围栏。现在的工作就是把整个场面再完善一下，立个纪念碑，铺一条路，按照设计还在上山处竖一面诗屏，上刻毛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纪念碑碑文是王亦富写的。陵园落成于是年十月。

讴歌胜利的主要作品当然是《八一五风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该“史诗”从武斗期间就开始排练，几经修改，现在重新上演了。剧本始由重大文工团舒正国等人编导，其间曾让我参加过剧本修改，所以知道最后的排练一直在新华路人民剧场进行。执导的是市歌舞团一对中年夫妇，女的叫黄茜，男的叫李光亨，胖，精力充沛，点子极多。有专业人士加盟，应该说整个节目是有一定质量的，于是就演出了。修改版首演时间是 11 月 5 日，地点是人民大礼堂。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及驻军首长全体出席观看并接见全体演职员。从《８１５战报》记录的文字知道，梁兴初在接见演员时曾如此表态：“我希望你们多给山城人民演几场!多给山城８１５派演几场!多给解放军演几场!”。

全川各地的八一五派这时都走亲戚一样，纷纷来重庆聚会，兴高采烈，弹冠相庆。据１２月１０日出版的第５１期《８１５战报》报导，前来串门的友好团体计有：“张思德同志的母亲刘光友率领的南充临联赴渝慰问团”、“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率领的成都地总、红成赴渝慰问团”、“邱少云烈士的父亲率领的烈士家属赴渝慰问团”、“中印边界反击战战斗英雄吴元明率领的江津九七赴渝慰问团”、“三二一一一英雄钻井队英雄王有发、彭美凤率领的泸州赴渝慰问团”。他们来，除了带宣传队来渝作文艺表演外，自然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报告会和

控诉会。主题无一不是“反军派”的罪行及其黑后台刘结挺、张西挺之其罪当诛。让那么一大堆名人出马，自然有助于加强串联活动的政治份量，（资料说明，张妈妈还荣任南充“临联”政委）同时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黄继光烈士母亲邓芳芝，自５０年代初就已风光无限，成了公众人物，见过的世面不计其数，做过的报告不计其数，可说久经锻炼。至于中印边界反击战英雄、３２１１１钻井队英雄诸人，也绝非等闲之辈，报告会决不会怯场的，问题就出在那个张妈妈——《为人民服务》主人公张思德的妈妈刘光友。文革前，尚无“老三篇”一说，知道张思德从而知其母者自然寥寥，皆因文革大闹腾，“林副主席”著文倡导，延安那位辞世多年的烧炭兵一下子才和神话故事中的老愚公、大洋彼岸的白求恩一起名列三甲，伟若天人。南充地区的革命群众经过一番深挖细找，发现那位被毛赞叹不止的张，其母亲竟然还活在凡界，其兴奋就不亚于基督教徒发现圣母玛丽娅之在人间显灵了。问题是，张妈妈长期蛰居山村，什么世面都没有见过，更没在大庭广众间露过脸，要她到大码头对千千万万陌生面孔发表演说，就不得不由人捉刀了。讲话稿自是经过认真编撰的，既与身份贴切，又把捉刀着的意思说得明白，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为人民服务”中毛的原话改头换面。如：把“八路军”改为“八一五”、把“根据地”已经“有几百万人口，但这还不够，还有更大些，更多些”原话移植于“八一五解放区”。还有什么“我们要把他们（指反到底）的头头打死,他们死了是‘轻于鸿毛’。我们的人死了，是‘重如泰山’”余类推。老太太毕竟初出此道，演讲中即使全程提词，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仍不时发生。一天，张妈妈在重庆大学风雨球场演讲，我们就亲自看见了这出难堪：讲完了“革命战士把连（把连，四川土话，全部之意——笔者注）要心连心，肝连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后,她开始“振臂高呼”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麻烦就出来了。那年头需要打倒的官儿太多，北京街头一张《群丑图》，榜上有名的“走资派”，大大小小，光中央就好几十！再加上四川省的、重庆市的，谁能记得清楚？老太太办事极认真，她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坏蛋漏网，同时，如此众多的名字又让她极不了然，因此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以后就不知下文，只好转过头问主持人：还打哪个？

主持人悄悄提示：打陶铸！

老太太马上高呼：打倒陶铸！

打倒陶铸以后，老太太又问：还打哪个？

主持人提示：打彭真！

老太太马上又高呼：打倒彭真！

剩下的功夫都这样，问一个打一个，慷慨激昂一直打了二、三十个，一直轮到“打倒刘家两口子”，大会才胜利结束。

我已经记不起张妈妈做演讲时梁司令员在不在场，但根据战报记载，梁那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这是千真万确。凡遇重要活动，他总要出席，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谴责“反到底”之反军乱军行为，其中不乏对其后台刘张的明伐暗讨。梁在重庆这种巨大的、长时间的存在，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实际结果，毫无疑义是把重庆对成都的反叛，把八一五派对八二六派的进击，把整个四川的“倒刘张运动”有效地鼓动起来了。有点如文革肇始，毛以上海为基地策动对北京的反叛一样。梁兴初是“四野”虎将，解放战争时期战功赫赫。五十四军也是四野

的王牌之一。梁在五十四军的地盘上活动自然心情舒畅，如鱼之得水。除了到处接受八一五由衷的敬意和欢呼，他至少还单独两次接见了反到底派的头头，一次是１１月３日，另一次是１１月６日。从现在能看到的谈话记录来看，那不叫接见，只能称之为训斥甚至审问，弄得第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第二次通知接见，黄廉、邓长春和李木森等几个头头已经兴趣索然，想躲而不可得了。第二次通知接见，梁就明确宣布：反到底的头目“都要来！只准多，不准少！”

下面是几段对话：

梁兴初问徐光明：《人民战争救山城》是不是你写的？当徐回答“不是我写的。”时,梁打断他：“你是司令嘛，你没有责任？《人民战争救山城》是十分错误的。你们报上的文章没哪一张不是错误的。你们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枪毙这个枪毙那个，还要绞死这个那个，你们能绞死吗？谁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力？你们不要当狗头军师了。你们大学生都怕死。 ……”

当徐光明说：“八一五把我们的广播站砸了”时，梁一点不给好脸色，说：“他们不砸我都要砸。你们宣传的什么呀？不宣传大方向，而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对准革命群众组织。……”

谈话中，梁兴初没有忘记拿八一五作为反衬来寒惨反到底，梁说，八一五印了那么多批判走资派的材料，你们搞了些什么？回答：我们搞了，没地方印。梁兴初申斥：没地方印，那些小报少印点不行吗？你们的大批判专栏我也看了，大都是别人的。你们自己不会写文章？《人民战争救山城》不是会写吗？

五十四军的几位处长之死和军分区快艇之被击沉，当然是使军人最为愤怒的。接见中，梁拿着反到底印发的传单向军工反到底头目邓长春责问：黄纸黑字，还想抵赖！就凭这个就可以逮捕你！他说：“你是舰队司令，由你打沉了几只船？你不要认为你有后台，你们的后台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还不知道你哪个后台是好是坏？你今年２３岁了，够枪毙了。邓长春你还跑不跑啊？”

邓很可怜地说：“我能跑到哪里去嘛！”梁兴初道：“你跑不了。你跑到天上，我们有飞机，有高射炮，还有地对空导弹。你跑到地下，我也要把你抓回来。你跑到外国去就是叛国！”

五十四军军长韦统太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向处长之死：“你们打死了我们的处长，这笔帐一定要清算！”梁兴初遂问黄廉：“锯掉曾处长大腿的那个人，你同不同意逮捕？” 黄答：“同意。”又问：“他现在哪儿？”警备区有人补充：“那人现在医院扫地。”梁兴初下令：“马上派部队去把那人抓起来！”

《八一五战报》载，梁发话之后，警备区当即派员离开会场前去执行抓捕任务了。而在其后第５１期战报续报此事时，特别注明，说“杀害警司处长的第一工人医院右派‘医生’李一士是砸派”，且“已上三十斤铁镣”。《山城战报》３９期和《８１５战报》５０期的合刊，曾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一场惊人的反革命谋杀案”记录“警司处长曾惠平受害经过”，说８月２２日，遭到袭击的军车共四辆，第一辆车乘员曾惠平，遭遇射击后人被反到底人员绑架；第二辆车被袭击后逃离火网，第三、四辆则绕去文化宫得以脱险。文章花了很多笔墨介绍曾惠平被绑后的遭遇。其中强调说，对曾实施截肢手术的医生叫李一士，是个右派。这

儿我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真是右派，那么他本人肯定不可能公开参与砸派的活动。如果他真是砸派，他又肯定不可能是个右派，砸派不可能让一个“阶级异己份子”参进来给自己添麻烦。既然上面说到的正在扫地，那么他是为右派，这个结论应该成立。那么，接下来，反到底故意让他做这个手术，无疑使用了暴力挟迫，而他，定然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勉强为之，而最终成为了替罪羔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他的被抓，甚至被上铁镣，又何等冤枉！

从１２月开始，八一五这部政治战车已经加足马力，全速启动了，原来，提到刘结挺张西挺还半遮半掩，什么“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王力在四川的追随者”，后来乾脆就直呼其名直呼打倒，再后来乾脆就“烂萝卜”“野心家”“阴谋家”地喊得热闹了。12 月７日，沙区六万多人正式在师专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大树毛主席绝对权威，大破刘张个人淫威”，其他各地区的活动就更多了。

所谓“一评四川时局”《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一文,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关于该文的写作过程，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我和编辑部另外三个同学，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然后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好些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似乎只要再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咱们的了。于是凭空想象，开始舞文弄墨。文章由四人分头执笔，写好后由我润色定稿。”现在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霍晓林、张宗云和张国梁。

文章的反响是我们四人始料不及的，但写作过程确实很平常，所以在日记中对此无任何特殊记录。文章写完后我曾让吴庆举看过，他大加赞扬，高兴之余，我就送《山城战报》去了。开始，无非是想请李乃如主编也看看，提提意见（当然想炫耀炫耀），结果李一看完就提出合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时间是１２月１日。

关于文章本身，我以为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人将它与杨曦光诸人“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相提并论为“五大毒草”，实在有点冤枉，因为该文实在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独创性，也谈不上什么异端，仅仅是一篇停留在操作层面的事务性文章而已。只是在叙事逻辑方面组织得相对严密，而文字更加耸人听闻、更富于煽动性罢了，更由于偶然之中被毛看见，从而说了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遂被人视为圣旨,开始了同样始料不及的大张鞑伐。

在追查该文章“后台”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某天总团勤务员Ｑ极认真地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份证明材料，说他事前绝对没有插手“必胜”一事。他说有人要以此事加害于他。Ｑ与吴庆举素多恩怨，我一听就知道他所指为谁？于是大笑，说：你与此事何干呢？这个证明，我写。事实上，既然问题恶化至此，我是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连直接参与写作的同学我都全部包起来了，我干吗还去伤害本来就与此无关的人呢？

如果要补充背景材料，就是“必胜”是在我和Ｚ分手后写的。文章的轰动极大刺激了我的虚荣心。后来，在众人的怂恿下我接着又写了二评，三评。关于这就更没有什么好说了。仅把题目照录如后：

“二评”的题目是“从王力的倒台到新独立王国的破产”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刊登于两报合刊，《山城战报》第３９期，《８１５战报》第５０期。

“三评”的题目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刊登于两报合刊，《山城战报》第４１期，《８１５战报》第５４ 期。

廿九·高司事件

“九五命令”以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全国稳健派的节日。所谓稳健派，是指与激进派对立的一派组织。他们和“重大八一五”一样多是老造反，相对比较注重秩序和纪律，所以比较容易得到军人的青睐。因为老造反，因此彼此之间联系时间就比较长。如西安交大的造反派，和重大八一五早在１９６６年八月刚刚出道时就建立了联系。和重大八一五长期交好的的铁杆老造反，除西交大外，长春二总部、长沙高司，昆明八二三，平时也都时有电函往来、互相吹捧的。“拥军派”胜利了，彼此心情都好，更要互相走动了。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反修报》的主编来渝，《八一五战报》自然全程陪同，游览红岩村、渣滓洞诸景点，并相约在各自地点出版合刊，介绍两地的文革情况。合刊的“长春版”于１２月１６日在对方出版，头版文章曰：“乐在天涯战恶风——致英雄的重大八一五战友”；而“重庆版”则于１２月２５日在重庆出版。头版文章对等吹捧：“向英雄的二总部战友致敬”。除了写文章互相吹捧，派宣传队巡回演出也是互相沟通的好办法。昆明“八二三”的宣传队就到重庆来演出过《八二三风暴》，其模式当然也和《八一五风暴》一样，照《东方红》的葫芦画瓢而已。甚至武汉“钢工总”也派出代表携宣传队到重大慰问演出，“钢工总”可是在“七二〇事件”中出够了风头的激进派。代表团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竟然也于１２月６日正式发表声明，大肆歌颂五十四军和张梁首长，力夸“八一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山城人民的骄傲，是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八一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发誓“做山城八一五派的坚强后盾”,与之“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真是有点邪门了。

也就在这时候，一件麻烦事找上门来了。

重庆大学不知怎么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求援信，是长沙高司赴京告状团寄来的。时间大约是１２月１０日，信中痛陈他们在京城备受百般苦难，如：被首都三司驱赶凌辱，如：被中央文革接待站冷眼相向，甚至说到：他们数百同学求告无门，成天只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靠女同学卖血度日，云云。这封信被人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在校园里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重大八一五１９６６年9月上京、１９６７年4月上京，都遭到过类似冷遇，只是没可怜到睡火车站、靠卖血度日的惨境。如今八一五已风光若许，同是老造反的哥儿们竟如此困顿，岂能不让人忧心难平？

同学们非常同情也非常义愤了。总团勤务员黄顺义还在风雨球场举行了一个全团大会,宣读这封信件，读得许多同学热泪盈眶。全校立即掀起了一个捐赠热潮：有钞票捐钞票，有粮票捐粮票，很快便积累了一个不小的数目。

战报的编辑们自然是很同情高司弟兄的。但是，面对全校轰轰烈烈的捐款热潮，我们却突然表现了出奇的冷静。报社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小报，信息比较灵——我想这样说明我们所收到的小报之多：几乎每隔两三个月，我们就要用板车把满满一车报纸拉去卖给废品收购站，然后买上两只鸭子和一筐土豆拿回编辑部狂吃烂饮一顿。这是题外的话——我们从

小报上已经得知，长沙高司当时正是被中央文革搞得如此凄惨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恰恰又是他们自己的人太过意气用事，比如说，为了发泄对戚本禹（戚当时还正在位上）的不满，他们公然仿照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的模式编写了如下一首歌曲：“戚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打砸抢抄。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杀人，就放火，就干资本主义。”（毛的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如此直截了当地反对中央首长，其后果可想而知了。八一五当时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怎么能去粘惹这样不懂事的穷亲戚呢？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当时我们自觉得政治上已经很成熟了。明白作一个政客首先需要的是大脑而不是心。

于是我们紧急敦请总团勤务员黄顺义到报社一叙。黄一进来，我们就开玩笑说今天要对他进行再教育。我们说他当官当了这么久，为何作出如此不明智之举？接着我们出示了若干有关高司的问题材料，以及中央首长有关的讲话，我们三、四个人轮番围攻，黄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语。等我们说完，他表情沉重地拿着资料便走，只说：我回去考虑考虑。

我们非常担心黄的固执会把事情搞糟，于是和１０１部队（即辩论组）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大家平抑情绪，理性处理此事。事情终于引起了总团的关注，很快召开了全战斗团小组长会议，专门让战报和辩论组做中心发言，并且最后得出结论：将钱粮先行封存再议。

我们为自己的成熟而得意洋洋。其实，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在黄顺义的支持下，被暂时冻结的募捐钱粮，被人秘密带走，悄悄送去北京，交给了高司的哥儿们。秘密上京的人员之一，就是现已定居美国的刘云仁。刘，电机系三年级同学，为人善良而极富正义感。文革之初，即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工作组泰山压顶，被内定了右派学生的我有些吃不住了，想一个人秘密去京城告状。刘云仁不知如何知道了，遂悄悄和我约见。坐在风雨球场前的草地上，他真诚地向我捐赠了１０元钱——对于我这个穷光蛋，这不啻是雪中送炭啊！后来因８１５事件骤起，个人行为已无意义，我又郑重其事把馈赠还给了他，而我们之间可贵的友谊却从此开始。

《８１５战报》没有能阻止事态的发展，反过来，我们自己却成了大众嘲笑的对象。战报编辑走到路上常常遭受围攻。大字报乾脆大骂我们是“臭文人”、“市侩”、“刀笔吏”，是发了财就忘了穷亲戚的土财主，大年三十把前来探访的乡戚赶出家门，等等。

几十年后专门把这一段经历写下来，是想说明当时的大学生是如何单纯可爱。即便已经过了九死一生，多历骗局，而他们的良知、正义感和激情，仍就那么地难以压抑。

那一段时间，是《８１５战报》创刊以来人气指数最低落的日子。

三十·校革委会的成立和吴庆举的出走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毛泽东七十四岁华诞第二天，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

革命委员会成立当然意味已经“革命成功”，意味着已经大权在握，不能不大大庆祝一番。权力这东西实在太诱人又太害人。动乱年代，英雄豪杰窥视神器，策马问鼎，总要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在和平年代，要让一个人犯错误，堕落，只用叫他为官一年半载（不论官位大小）就绰绰有余。对于权力崇拜，林彪的“５１８讲话”可谓到了极致。文革期间老百姓中由此衍生出来的名言警句就更多了，什么无产阶级“想的是夺权，看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什么“权权权，命相连；有了权，蜜样甜；没有权，苦黄连。”等等，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作为重庆第一个一边倒的权力机构，它的成立，对于重庆乃至四川的八一五派，其鼓舞激励，不啻是一针巨大的强心剂。

原来当然是想在毛的生日２６日成立的。据说报告呈报成都军区审批时遇到了一点麻烦，大约说是委员中没有另一派的代表，事情不得不延宕下来。问题是，其时庆祝事宜万事具备，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更何况梁兴初司令员在重庆坐阵指挥，这点面子总得给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成都军区不承认也很难办，只好批了。于此结果，正处于下风的刘、张自是无可奈何。拖了一天，虽然错过领袖的华诞吉日，不过反正批了，这就一好百好。重大八一五十分得意地对此事做了如此评价，称：“重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八一五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已经在重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们八一五革命派在‘炮打司令部’，在大造李井泉、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中，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击来自右的和左的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在大树特树毛主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权威的斗争中，大方向始终正确。同时，给了那些煞费苦心要颠倒历史，把我重大八一五打成‘叛徒集团’‘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跳梁小丑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处心积虑要把八一五打成‘反红十条反动逆流’的刘结挺、张西挺及其信徒们当头一棒。”(《８１５战报》第５６期文：“革命洪流，不可抗拒”)

重庆大学从造反开始，“八一五”在人数上就一直占优势。1966 年底保守派跨台，八一五的优势更无庸置疑。虽然后来出了个“井冈山公社”，头目徐光明和公社社员加起来也就不过几十号人，仅就数字而言，对于将近万人的大校来说，他们实在太无足轻重。更何况那时间他们还戴一顶“反军”“乱军”的帽子，徐社长被大家鄙夷地称为“坏社长”,日子很不好过，重大八一五在此时机抓紧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绝对只会一派掌权。

当然也考虑了“反到底派”的存在和徐的代表性。作为象征性的表示，按人数比例，给他们留了一个委员名额。至于其他委员，则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关于这次内部选举，我以为绝对是民主的。后来张榜公布的选举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选举结果非常出人意料甚至还有点莫名其妙。榜示按票数多少顺序公布，选举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名列榜首的，竟然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典型老好人：贺尔金。

贺，电机系三年级学生。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永远对人微笑着。如果仅就外表，你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往“造反”“闹事”这上面扯。事实上，文革一年多，他确实没有半点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激动人心的说词，从没上过台出过风头，甚至压根儿就口齿木讷。皆因做事情老老实实，他一直在总团担任“财政大臣”，成天给大家记帐报帐,对人客客气气，工作任劳任怨，故而很得人心，民选中意外夺冠。票数排行第二的也是著名老实人，人称“老黄牛”的黄顺义。与此相反，外间大名鼎鼎的周家喻，票数公然落到第十！真让人匪夷所思。这也说明，同学们不管怎么造反怎么激进，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得人心的还是“老好人”。

吴庆举得票第四，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老造反，名气不小，此外，还因为他在刚刚结束 的武斗期间敢于挺身而出，大家觉得他够汉子气。

还有一个至今让人深感蹊跷的问题是，吴庆举尽管造反早，名气大，而且事实上一直在总团担任领导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应该是校革委当之无愧的主要负责人。可在校革委会的最后名单中，他不仅没有当上副主任，甚至连常委都没有弄到一个，仅仅只当了个可有可无的一般委员。这自然让他恼怒万端：关于这件事，我们留待下面再说。

前面说到，庆祝大会原定在毛生日当天举行的。因为该庆祝会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重庆市最大最高的毛泽东塑像也将在那天同时举行落成典礼。塑像高９.１５米，象征 1966 年９月１５日八一五上京告状，到天安门广场觐见毛的“幸福日子”，塑像加台高共 12.26 米，象征毛的生辰吉日。碑台四边各宽８.１５米，像后八根８.１５米的旗杆，其意当然十分明确：象征８１５战士紧紧围绕毛干革命呗。像后有诗词屏一座,上刻毛词《满江红》“小小环球”一阕，初建成时用铜箔贴字，不意时过不久铜箔遂变质发黑，只好由警司特批，另外购买金箔重贴，得以几十年后光泽依旧。只可怜毛的塑像，落成之时，巍巍乎高哉，建造之时，专门延请全国最有名的毛塑像专家叶毓山亲自主塑，即便八月武斗，满天炮火纷飞，忠心耿耿的大学生们亦日夜为尚为泥身的塑像站岗，好容易送上碑台，浇成了钢筋巨身。只可惜伟大领袖在高台没站上几年，文革中备受打击的当权者便重掌权柄，一声令下，好端端的毛就被炸了个粉身碎骨！

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毛的巨像之下举行的。梁兴初、韦统太、兰亦农等高级将校一字儿在前排就座。从照片看，参加大会者不下数万。气球、彩旗、标语更多得无数不提。《８１５战报》破天荒地出了六个大版，内容共用五个板块和大量照片做了报导。主题两个，首先是毛塑像落成，其次是革委会成立。第一板块内容为“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对革委会主任周家喻、副主任秦安全诸人及会场群众场面进行了报导；第二板块为“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梁、韦、兰等做了大幅报导；第三板块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共刊登照片三张：中印反击战斗英雄陈代富大会发言、警备区武装军人为大会值勤和解放军驻渝部队参加修建大会广场。第四板块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全是照片：广场上礼花井喷之夜、重庆话剧团的话剧演出：《张思德》、重庆京剧团的京剧演出：《智取威虎山》、还有驻渝部队、西南民族学院等的演出，当然都是文革标准动作：一个个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其智慧和美感绝不高于现代机器人。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是代表发言和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从头检看，规格最高者当数李世英，文革一开始就名满天下的西安交大学生领袖。其余贺客及发信发电朝贺者为数极众，现将主要名单照录如后：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

同济大学革委会东方红兵团总部

山东红代会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天大八一三

贵州省红代会

青海大学八一八联委

郑州大学革命委员会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吉林省红革会长春市二总部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安徽工学院纵队

新华工革委会

武汉新湖大革委会

武汉工造总司

大连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新厦大公社

新浙大联总

焦作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河南二七公社焦作矿院八一八兵团总部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

新杭大公社、杭州大学革委会

中山大学红旗公社

四川林学院一O一战斗团

西昌一二?一三革命造反团

开江二一O联络总部

夹江一O一八司令部

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

辽联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总团

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办公室

宜宾市红代会

自贡红井总

文红筹红卫兵内高总部（内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江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万县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市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充人民武装部

如此盛事，有人高兴，当然就有人不高兴。“反到底”不高兴。刘结挺、张西挺不高兴。为此他们还专门让省革筹办驻重庆联络员郭凤歧写了一个《我们对批准重大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上报，说重庆大学“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八一五’一派夺权”,“将捍卫‘红十条’的‘重大井冈山公社’排斥在外”等等。这些人不高兴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自己窝里公然也有不高兴的，最不高兴的当数吴庆举。从‘八一五’造反起，再早一点，为郑思群鸣不平，反工作组，反市委，他从来都是领头牵线的。现在革命成功，他公然连主席台都上不了——我完全可以想像他心里的不平衡。吴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也极倔的人，革委会成立庆典，他上不了主席台，就担任了大会的纠察队长，站在一辆指挥车上（他故意站在车门口），挥舞手臂，在会场上来回穿梭,向拥挤不堪的人群大喊大叫。我看得出来，他需要向人们表示他的存在。我看得出来，他表情中非常愤怒。那一刻，我对他深感同情。

深夜，庆典曲终人散。东方红广场满地寒光，一片寂寞。吴突然来约我去那儿散步。那时候，只有毛的塑像还孤零零独立高台，巨臂直挥天穹，显得那么超凡脱俗。想起白日里的“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突然间让人有些悲哀。吴和我在学生宿舍邻室而居，文革开始又一起造反，生生死死，悲悲欢欢，患难与共，走在阒寂无人的广场，我们都无限感慨。他突然对我说：你信不信，我们内部的有些仇恨，可能比敌对势力还重！可能会记一辈子！

我知道他指什么，也猜到他是指什么人。我当然不希望革命刚刚成功，八一五又起个萧墙之祸，于是很轻松地笑了，我说：文革中发生这些恩怨，对我们个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是马上就分配了吗？就让你做个主任副主任又有什么意义？我真诚劝他：别把作官不作官看那么重！

那天晚上的谈话当然对他毫无作用。吴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非常有抱负的青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意外给了他那么一段的非凡经历，在和平年代的日子里，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杰出人物的。可恰恰是他的文革经历助长了他内心潜意识的偏执和不应有的自信，他最终被时代毁了。１９９５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乡看望他。我们二人应该说都已饱经沧桑，对世事的洞悉当是很客观平静了，可当我对他在经商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深表赞叹，那一刻，他竟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算什么？我们这种人，原本该是当ＸＸＸ的角色！出于对朋友、对死者的敬意，我把ＸＸＸ三字隐去了，我祈愿他在阴界安息，阿门！

庆典次日一早，吴就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前宣誓。然后去南充地区演出了。然后我很久没有再见到他。

这次演出的唯一印象就是温栋梁之死。温栋梁，四川自贡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业余尤精二胡。直到文革才发现他写讽刺文章更见了得，俚语笑料，信手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我的印象中，把保守派命名为“麻子兵”，始作俑者，就是他。他的死事发生在南部县。宣传队住在二楼，他们本已演毕就寝，不知如何来了一批武斗勇士，住楼下,并且开始擦枪，一颗误发走火的子弹便向二楼飞去，正正击中温的下身，流血不止，当即送医院抢救。倒霉的是，那一晚停电，整个南部县一团漆黑，医院无法手术。命中注定了他该于那个暗夜离去：于是他死了。

温成了重庆大学文革遇难的最后一位死者。第二十四位死者。

卅一·１９６８，散淡的印象

在吴庆举遭遇政治危机同时，我的私人生活也面临着危机。这是１９６８新年给我的记忆。一年前的元旦，正值“无产阶级大夺权”前夜，每一个日子都让人热血沸腾。大学时代读过一本美国记者写的十月革命实录：《震撼世界的十天》。１９６７年初“一月革命”，傻乎乎的年轻人正为自己能躬身“震撼世界”的革命生涯而深感幸福与自豪。一年后不一样了。私人生活中的难题搞得我焦头烂额。仅此一点，足以说明面对政治激情全面沉落的社会背景，我个人的迷茫。

我和Ｓ匆忙地确认了恋爱关系，显然使我和Ｚ的关系已无法挽回，我内心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年轻人尚未泯灭的真诚使我必须向Ｚ作出解释。在１９６８年1月１０日的日记中我记录了这件事：“我想马上离开学校。如果不和她见面，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她”就是指Ｚ。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如实陈述了我和Ｓ相识的整个过程并真诚向她忏悔。我至今记得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些话，说当我们年迈迟暮，回首往事之时，我相信我对党对人民都将问心无愧，但有一件事，我却永远会痛悔不已。这就是对与Ｚ的事情处理过于草率。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正在风雨操场参加什么批判大会。见我穿过闹嚷嚷的人群向她走去，她显得意外激动。我永远记得那一刻她眼里闪烁的喜悦之光。我惧怕不已。我不敢看她，胡乱将信交给站她旁边的ＳＨ便匆匆离去。而Ｚ，据同学告诉我，收信当天就哭倒在床，一两天不吃不喝。这让我恐惧万端。我没想到我对她的伤害会一至于此。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冬天，我终因“必胜”一文而被审查，前途吉凶未卜，那时候,这种内疚才稍有缓减：Z 终没因我的

倒霉而受到牵连，这使我自觉欣慰——这是后来的事。而１９６８年初，我只有远远避走一条路了。

这样，我就离开“战斗岗位”去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海口。南中国遥远的海岛上公然莫名其妙有一个重大八一五的忠实崇拜者：红卫兵海口第三司令部。该组织周年庆典,好像谁也没有请（至少我在他们的庆典上没遇到别的“革命组织”代表），偏偏给八一五总团发来一封非常热情洋溢的邀请信，这样我就去了，同去的还有张宗云和张国梁。是我主动向总团提出要求的。我这样做，可说纯属上面所叙述那一个私人原因。

海口给我的印象就是又荒远又静僻，如同成都郊区的乡镇。在那儿，我于他们的纪念庆典会作过一次演讲，出了一期两报合刊，除此之外，就是成天和三司一帮中学生厮混。南海的冬天迷人至极，闲来无事，我们常去沙滩拣拾贝壳，睡大觉，听海风把椰林吹得沙沙作响。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神圣的十字军军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正在急剧堕落的世界。重任在肩，好像自己须臾离开，整个世界就会发生灾难。1966 年１０开始大串联，很多同学都免费外出旅游，阅尽大山名川，而从小渴望游历天下的我却公然不曾为之心动。而今无所事事地躺在南中国海暖洋洋的沙岸，如卧桃花源中，不知秦汉，何论魏晋。正在震动着整个中国命运的灾难显得那么遥远。当时流行一个提法:“逍遥派”，也有叫“胖左派”的，指那些对政治斗争不热心、或者已经彻悟的、既不参加这一派也不参加另一派的人。一提“逍遥派”，两派都会嗤之以鼻的。以为对毛号召尚不积极，对国家大事尚不关心，此类人活在世何用？遑论担当革命接班人！可惜随着文革深入,事实上是逍遥派数量与日俱增。据说重庆第一中学食堂某日会餐，因分肉不均,欺负了“逍遥派”,“逍遥派”竟当场打出大标语:“胖左派不可辱!”足见逍遥者已是人多势众了。只是作为我个人，情绪变化至此，是自己始料不及的。

我们与三司合办的合刊未署《八一五战报》名，仅以《惊雷》第３３期的名义付梓，时间是２月２６日。我代表编辑部写了“敬礼，英雄的海口三司！”一文，作为对等的是,对方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紧紧握住你们的手，英雄的山城８１５战友”。现在重读这些无聊的游戏文字，我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克雷洛夫寓言的一句话:“为什么公鸡要吹捧乌鸦？因为乌鸦吹捧了公鸡。”此外，二张分别写了“王关林和重庆八月战争”和“让革命大联合东风来得更猛烈些吧！”二文，算是对对方热情款待做了个交代，也算是我为红卫兵报社作完了最后一件事情，从此后就再没有参与《８１５战报》的具体工作了。海口归来，我直接回了成都，并且终于走回那间被“红八月”砸抄得狼籍不堪的斗室，和同样潦倒的老人呆在一起。文革以来，我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这么安静地呆在家里。斗室依然劫后景象：地板撬得光光的，泥地上铺满零乱的稻草。成都春寒料峭，我便整日价蜷在铺满泥地的草堆里读书，和父母亲一起评说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偶尔太阳出了，天暖一些,我就独自上街走走，看看还在继续上演的文革闹剧。时逢成都著名的“十中保卫战”。“八二六”打红成。我专门去现场看过一回，子弹霹哩叭啦打得热闹，可没伤人也没死人,比比重庆八月战争，我觉得完全像看小孩子“过家家”，除了有趣，全无半点恐惧。我如此超然，皆因我的政治热情已经开始沉沦甚至麻木。我也去拜会一些小学和中学同学，老友重逢，彼此间好像都忘却了各自政治观点曾经有过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甚至还曾渴望为之献身。有一位姓Ｙ的中学同桌在四川大学工作，我毫无芥蒂也毫无惧怕地去看他，那可是“八二六”派的老窝，校园里到处贴满批判《大局已定，８１５必胜》的大字报。我和Ｙ漫步其间，很有趣地相视而笑，这些事好像与我毫不相干。记得Ｙ还对我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该去大字报上批一句，“必胜作者到此一阅！”，看有何反应？

二月底，有消息传来，说毕业分配有结果了，我遂匆匆忙忙返回学校。那年二月月大,回到重庆是二十九日。回了学校才发现局势正乱，五年级的毕业分配根本没任何动静，而低年级同学还在满校园里热闹，写出不少大标语来。原来，中央要最终解决四川问题了，故而马上又要掀起一个“打倒刘张”的高潮予以配合，而且两派武斗又有山雨欲来之势。校园里的标语盖有如下内容：“打倒刘张，斩断黑手，围剿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文攻武卫，彻底粉碎刘张之流武装夺取专县的反革命阴谋！”／“加强纪律性，恢复重大民兵师！”／“念念不忘专县！”等等。

我抓紧把那一段时间的战报索来检看，果然，就在我外出逍遥之时，2 月 22 日至 25 日,全校一本正经地开了个“重庆大学首届战士代表大会”，并且刚刚通过了决议：“发扬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拼死战斗！”。“决议”凡七条。此前十几天，２月７日至９日，全市１２所大专院校八一五派还在建工学院召开会议，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个所谓“建院公报”，确认四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由于有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有四川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五十四军和其他驻渝部队这道伟大的长城，有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八一五革命派的浴血奋战，山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公报号召全体八一五战士为“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我返回重大的前一天，我校赴京参加中央四川问题学习班的人员刚刚在毛泽东塑像前宣誓出发。这次学习班的成员极其庞大，双方各约五百人。两派的主要头目全部入彀。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大气磅礴地说：“你们七千万人的大省，才来一千人学习，太小气了,笑话！来七千人嘛！折中来四千也行。”这么多人到北京学什么？说穿了，无非把这些不安分的家伙统统软禁起来，省得放外面“山高皇帝远”，没完没了地胡闹。一个多月后，总团让我去北京做学习班班外联络员，我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判断——当时，各地区、各派都有我这样的联络员，在京城找个地方住下，每天就准时去学习班通风报信、交换情报。我们管每天去学习班叫作“探监”——学习班离城很远，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门由持枪军人严把死守，无法出入。问题是围墙——准确说是一排长长的铁栏杆，其功能很像亲属探监时横隔于探访者和被访者之间的铁栅——各地各派的联络员总是在每天晚饭后准时守候栏杆外，各地段约定俗成，互不干涉，都隔着栏杆交换情报。里面的人憋得难过，也常有翻越栏杆外出游玩者，彼此之间从不揭短，不管在政治问题上双方吵得如何之天翻地覆你死我活。重大一共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反正主要的头头全部就范。“８１５战报”的代表自然是王亦富，家里就留两三个看守编辑。而我的同班同学，广义地说，广大的五年级同学，回校拿了工资，一看局势不妙，马上又跑了个精光。我曾回班上看过，所有寝室都空空如也，一片狼籍。“建院公报”中专门写了几句话：“会议严肃批判了‘逍遥正确论’的错误思想。指出，逍遥派就是不革命派。”对比现实，确也是无可奈何了。

签署“建院公报”共１２个组织，现将名单按原顺序开列如后，供文革史家研究存录:

１，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２，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３，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４，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５，西南农学院星火燎原纵队、６，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７，重庆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８，重庆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团、９，重庆交通学院工程兵战斗团、１０，重庆邮电学院支革纵队、１１，四川美术学院伏虎战斗团、１２，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战斗团。

还需补充的是，在“重庆大学首届战士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如下一句：大会“给我团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献身的二十四位烈士的家属，颁发了追认为我团优秀战士的证明书。”此举在现在看来当然毫无意义，甚至有点滑稽。只是由此可以确认重庆大学在文革中罹难的准确人数。加上后来死去的董继平，重大武斗死者当为二十五人，此数应该准确了。

当是时也，《山城战报》因几篇“四川时局”评而名声大躁，且大有不将刘张两挺评垮决不罢休之慨。我离渝期间，《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已约请四川外语学院一位老师续写“四评”：“再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兼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文章中所称的“看法和建议”是指“反到底赴京汇报小组”和“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在半年前，即１９６７年８月搞的一个“绝密”文件。不知道怎么给八一五派抓了个正着，以为是打倒刘张的钢鞭，于是“四评”声势就搞得尤大，由《山城战报》、《８１５战报》、《八一战报》、《山城红卫兵》、《星火燎原》、《机关战报》六家报纸联合出版。李乃如知道我已回渝，马上又约我写“五评”。我应约躲进了交际处（《山城战报》当时已搬该处），闭门造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到３月１７日算是 脱稿了，文章取名：

“把刘张推上历史的断头台”——几十年后,我已完全记不起那篇文章胡诌了些什么？为什么写？反正稀里糊涂就写了：可惜（可喜？）等不及文章发排，四川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就是我的文章脱稿的前两天，周五日，晚上，八点钟，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的领导。接见凡四个半小时。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众口一词，对“红成”和“八一五”几个月之“倒刘张”行动大张鞑伐,骂了个狗血喷头。康生坚称：“反刘、张就是给李（井泉）、廖（按：指廖志高。四川省委书记）翻案。”周恩来乾脆明确加码：“就是刘、邓复辟。”一贯喜欢出风头而又严重人格缺陷的江青当然又是指示又是插话，宣布反刘张“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虽然仅仅时过两年多，１９７０年秋，刘张二人就被同样这批首长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被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一五”，作为四川文革的黑色星期五，给正得意忘形 的八一五派沉沉地当头棒喝。

“五评”显然是不能问世而且必须马上毁掉了。如果不是撰写此文而查看当年日记，我已把此事完全忘却。关于３.１５讲话，我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因为我个人的整个命运，都和那次讲话有关。那就是：接见一开始，周恩来就说了：“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当然，仅仅从语法就事论事，这话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是，联系着整个讲话的意思和杀气，“必胜”一文显然其罪当诛了，要不，身为四川高校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的张西挺,为什么会那么底气十足地宣布,说周ＸＸ“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 ？

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了。圣光已经消失。我们开始觉得中央首长的讲话，已经不都是在代圣人立言了。即使代圣人立言，我们也以为它们不再神圣，更何况他们的信口开河那么地让人反感。时过几十年，我还能记起江青讲话的荒唐。其一是：“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这岂不比当初批刘少奇“资反路线”时批判过的“血统论”还“血统论”么！当时重庆盛传，化龙桥某人，其实不过杨的远之又远的远房亲戚，皆因当初杨在中央为官，

于是逢人便喜欢吹嘘此段血缘——其实他半点好处没得过，而江青懿诏一出，该倒霉鬼却被雷厉风行地揪出来实施了“群众专政”。还有一句让人尤其恶心的江青名言也出自于“三?一五”指示：“李大章同志,（按：李为四川省原省长，江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在如此神圣、关乎四川七千万生灵命运的场合大谈特谈几十年前的小恩小惠，并要对方为两个区区烧饼而必须保持所谓革命晚节，如此荒唐透顶的人竟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我泱泱中华，其可哀也 ，何能甚哉！

我肯定是什么都不能干了。同学喜欢善意地向我开着残酷的玩笑，要我多多锻炼身体,吃饱喝足，他们打听过：南岸的监狱里每天只配给六两米饭。给我说这话的是武斗队的后勤部长陈捷。我对他的消息一笑置之。事后想起，他所说监狱情况，说不准真是经过了解的。因为武斗期间血案牵连，他后来真被监禁多年。说不准 他对自己的命运已先有预感，想通过和开我这一类玩笑寻找些安慰。

那段时间，我的安慰是摄影。我迷得如此深沉，成天就只知道和“战报”的留守编辑黄肇炎一起探讨照片的反差和层次、上光和着色、米吐尔和几奴尼。我们在编辑部布置了一间暗房，用木架自制了一台放大机，并且自己配制显影和定影药液。正在谈情说爱的同学们都喜欢找上门来要我们冲洗女友、以及他们和女友一道亲热的生活照。我们从不拒绝.还有从“封、资、修”书籍上翻拍来的插图，当然都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的，也拿来要我们复制，我们一律欢迎——反正无事可干，就学技术呗。

我的摄影技术正日趋完美，北京传来消息了，说学习班追查“必胜”风声日紧，“王二麻”无法招架，急电我速去北京候处：时间已到四月下旬。后来看资料，知道当时重庆武斗又起，若干地方交通再度阻断，但成天泡在暗房的我却浑然不知。那一日总团派人用摩托车带我绕道而行，径直送至杨家坪一片山岩下的长江岸边，再用一艘小艇把我送到朝天门，这时我才估计城里的局面一定很紧张了。

在轮船上无忧无虑地走川江，过三峡，尽阅高山流水，再换车从武汉到北京，已经时近“五?一”。几天前，即四月二十七日，前述中央首长们第二次接见了前述人员，因“三?一五”之后四川各地不停出现新混乱，首长们不得不将尾巴翘得高高的八二六和反到底训斥了一通，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把五十四军安抚一番——制造矛盾而又利用矛盾，使打得头破血流的两派必须求助于矛盾制造者，而矛盾制造者便得心应手,永远稳稳地高居其上。这种领导艺术，虽说早已不是什么秘诀，但却总是百发百中，屡用不爽。——“四二七指示”一下，不管怎么说，四川的局面又趋于缓解，至少，对于我来说，那篇“毛主席批判过”的“必胜”似乎已成了过时题材。而我，也就没必要再进铁栅栏里边去作“无谓牺牲”了，留在外面尚可以通风报信，发挥点机动人员的作用。这样，我就住进了前门外一条什么胡同里的高教部招待所。

我每天的任务当然就是按时“探监”。哥儿们呆得不耐烦了，翻墙越栏出来，我就陪他们去逛大街逛公园。那时候“坏头头”们翻墙越栏技术已炉火纯青，有人甚至暗中将栏杆敲断又虚掩现场者，进出就更方便了。当时我对照相术正迷得发热发烧，凡愿外出游玩散心者，我从来全程陪同并负责摄影留念。学生穷，就找了个窍门，到王府井的摄影器材商店去买过期的电影胶片，２７定的作２１定使用一点问题没有。因为过期，商店将电影胶片剪成五米一段处理零售，每米平均价仅为两毛一分，装进１３５相机，可以照出４０多张来，很适合穷学生的消费水平——我于是有了一项十分愉快的日常工作：制作胶卷、照相、冲胶片。包胶

卷和冲底片都是用被子蒙住，全凭经验进行的。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没暗房，无法洗放照片。我统计过，那几个月仅我个人自拍的照片就近１５０张，其他人的则更多。仅从照片的数量就足以说明学习班的哥儿们玩得有多野。这样说吧，凡是当时有人（不管哪一派）说得出来的景点，绝对都被通通一扫光，包括远在门头沟外那座衰微破败的潭柘寺。而且常常是步行出游。十三陵之类的通用景点，更被走得熟门熟道。我们是在夕照苍凉中沿着燕山山麓行走的，沿途常会遇到北京大学生，三三两两，也作徒步之行,他们总是极其认真地扑在斑驳难辩的古石碑上，用作业纸和铅笔小心翼翼地拓碑上的字。他们工作得极认真，有时候一天仅仅能拓几个字。回忆“红八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中国的年轻人就轰轰烈烈破“四旧”、砸庙宇、烧字画，摔古董，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事情就完全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年轻人对残破的古代文化表现的热情，真是对当年自己荒唐的革命激情的最好讽刺。

回到重庆已是六月底。好像学习班已经结束，革委会成没成立却记不清楚——那时我对此已十分漠然。我在武汉姐姐家呆了很久才启程回重庆。船过三峡，重进四川省境，陡然发现局面仍旧可怕。船泊巫山，停靠了很久。先是在驾驶仓四周累满砂袋，接着把所有乘客统统赶下底仓。离岸不久，我们透过钢板的缝隙往外看，长江两岸的山坡上果然工事林立，枪炮严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船靠涪陵，一群武装人员虎狼般冲上船来，令所有人等到甲板列队检查。涪陵是有名的砸派窝点，而我衣袋里恰恰装着《８１５战报》的工作证。列在队里，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以为这次被抓，当是凶多吉少了。１９６７年4月那次被抓，其时武斗尚未开打，而现在，有了“八月国内革命战争”的血腥锻炼，杀个把人，简直就如小菜一碟。有一刹那，我简直就自暴自弃了。我对我的同行者说，如果我不行了，你到重庆找谁找谁。同行者也是我一派的，成都人。他排在我边上，安慰我别着急——也算上天有眼，正在此时，有一被查者突然间和武装人员大吵大闹起来，队伍顿时出现了混乱。我趁机挪去后排站好，后排是已经检查过关的人。全船乘客太多，队伍里发生一点混乱谁也察觉不了。而且我还趁着混乱，眼疾手快地将《８１５战报》工作证扔进了身后滔滔奔流的长江。

这几乎是一个象征：我的红卫兵小报经历，在经过最后一次劫难之后，结束了 。

我现在完整保留的报纸共有６０期，即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出版的创刊号至 1968 年３月２０日出版的第６０期。第６０期是和《山城战报》合刊的。只有两版。和创刊号的气吞山河壮志凌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６０期满纸都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可奈何与言不由衷。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表征：红卫兵作为毛泽东时代一个畸形的政治群落，从被利用到被遗弃，它短若蜉游的生命，已经开始消亡。６０期第一版通栏标题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学习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下面是重庆八一五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知：

“号召全体战士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坚决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还有就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３１５指示的声明”。第二版也只有两篇文章。其一为社论：“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其二，两报编辑部“关于撤消《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根据我当时在藏报上作的记录，这篇“撤消声明”是由我执笔写的，足见相当滑稽了。其后《８１５战报》又出了多少？什么内容？除零零散散保存了几张外，我一概不再了然了。

我所知道的只是，王亦富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以后，就完全负责起了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虽

然当时谁也不再关心这个，《８１５战报》已经可有可无。王以一个小县城的孩子而能出人头地、能参加中央举办的学习班，能和重庆市的最高军界人物同机飞返，这些都足以让他非常自豪的。从北京回来后他情绪极好。于是后来，他被进驻学校的军人相中，入了伍，当了军官。那一身像征中国最后权威的黄军装，曾让正在铁路工地接受军人“再教育”的同学羡慕不置。他当然也有理由很得意。再后来，他当了军长秘书。再后来，他开枪自杀：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百废将兴。

卅二•走边疆

下面是当时的几段日记：

“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儿曾经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们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垃圾。”

“８月５日。事情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事情闹大了，自然牵涉到我个人：这个写‘必胜’的罪魁。阶级斗争太残酷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当初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的敌人来看待，那么，他们胜利之后，也必然要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来看待，这有什么奇怪？”

“８月９日。到处都传抄着省革委首长接见重大８１５代表的讲话：‘必胜’的作者分配到哪儿呀？‘必胜’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动的，你们知道吗？……”事实是，面临厄运的不光是我个人，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日记没有记录我当时的想法：当我得知大学生们将和我一起倒霉的消息时，是不是有过些许安慰？

８月２６日。姚文元那篇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开发表，文章把他们曾用以策动文化大革命的高等学校即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式斥之为“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等等。文章把“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相提并论，居高临下地加以“奉劝”，实则是一并加以申斥。从此以后以至很久，“知识分子”紧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专政对象之后，正式列名第九，简称“臭老九”，成了一种准专政对象。七十年代，我曾在某工厂当过为时不短的电工，师傅们对大学生动辄就“老臭”“老臭”地喊得顺口。开始心里很反感的，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无非一种称谓罢了，何必自己找气生呢？在这个问题上，王二麻的态度一开始就很豁达的：“反正姚文元又没有奉劝我。老子从来瞧得起工农兵！一看见工农兵，老子就忙不迭喊爹喊妈：爹！妈！——你奉劝我干吗？”。

工宣队进驻重庆大学那天，哥儿们与其说是自发地前去欢迎，不如说是去看热闹。正是吃饭时间，大家把手中的饭碗敲得震天价响。发现队伍中有不少女工，大家尤其兴奋，很多女宣传队员都正值妙龄花季，相貌可人，不少同学暗暗动了凡心 。

工宣队进校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日记都没有任何记录，大约心情太坏。然后到 10 月 16 日，日记本上又开始有了些断断续续的记录："坚强起来吧！乐观起来吧！天塌不下来的，哪怕再大的苦难，哪怕再大的风浪，你都应该经得起。"１０月２１日日记："不管是自我欺骗，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我还是希望着，还是追求着，我愿意把我的前面看作绿柳春光，而不是黄花秋叶。往事不堪回首，我愿意它们通通死去，而后踏着这具尸体,更加稳健地向前走去。"

１０月２２日那天，我把珍藏多年的信件全部烧了。日记上留了一首七绝：

缕缕火烟焚锦书

西风飒飒冬凉初

韶华如灰归去也

还望边陲叶正绿

这几则日记，估计是在我被弄进学习班审查之前写的。当时已风声日紧，我需要作些准备，同时也不敢再多记什么给自己添麻烦，我的日记便到此为止了。后来，一直到工作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了完整的日记。不久后，我被审查。

两派有争议的人物都被扣留下来不予分配。八一五当然多些。他们人多，干的事情多,名气太大，惹得麻烦也多。"智擒李井泉"的、参加武斗的、处理尸体的、疟待战俘的……问题随便一抓一大把，不管问题为真为假。"井冈山公社"人数寥寥，人们印象中，他们好像任何像样的事情都没干过，你能抓他什么把柄呢？没把柄。所以我印象中，他们的人一个都没有揪出来。苦了的倒是一些代人受过的"右派"（１９５７年被打的年轻右派，１９６２年又有些返校复读)，因为同情反到底观点，于是被揪来陪了绑，弄我们一起被审查了。记得某晚学习结束,电机系四年级右派学生韩公第,一个弱不禁风的瘦高个儿,看见四下里无人，遂可怜巴巴地将我拽住，说他挨得好冤。他申辨他绝无反八一五之心，皆因无辜被疑，多次被班上的同学打得遍体鳞伤,说着就撩开衣服要我看他的满身伤痕。他的痛述使我很受感动。

他说我们人多势众，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又好，他恳请我替他代为疏通。其时，我和他同时被审，观点相同相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我亦正为自己的检讨书而焦头烂额，又何能对他援之以手呢？再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身份明确的右派，阶级敌人，我帮助他岂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我对他表示理解。至于别的，我断然回绝了。

除了个别的如韩公第者流，学习班里写检讨的，全都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有时去参加全校的大会，我们这帮人一入场，全体同学便起而哄笑——称我们为新的"牛鬼蛇神队"——甚至掌声雷动。其意也，我们知道，有善意的嘲讽，也有无奈的酸楚。我们于是就友善地向哥儿们挥手致意。

韩公第说我们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好，这话确实没错。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军人宣传队员和工人宣传队员确实没有为难过我们谁，他们审查我们，无非是要给气势汹汹的张西挺做个姿态、

有个交代而已。如下一件事情可说明军代表的仁义。某同学Ｙ，因被审查，其女友分配山东济宁，一到工作地便给他寄来绝交书一封。其书概云：她到了工作岗位，在老工人的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经过了斗私批修，深感她和Ｙ的关系是没有革命基础的，故而正式分手，云云。读罢来信，Ｙ的心中怒火不打一处来。下午的整个学习时间他都心不在焉，独个儿扑在桌上写字，就一句话："火可以烧死人，水可以淹死人，但水比火更可怕，因为她有一幅温柔的面孔"，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写，把一张白纸的两面都写得漆黑一团。军代表发现他对学习心猿意马，于是点名他发言，Ｙ正当气头，一开口就骂娘："说老子炮打林彪，炮打林彪，老子什么时候炮打过？现在好了，你们查了半天，查出没有？你们问题没查出来，老子的婆娘倒搞吹了！这算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军代表听罢，当即也一拍桌子，大吼："你婆娘搞吹了关我屁事？说明她对你不忠嘛！这点考验都经不住，这种婆娘拿来干啥？再说你婚都没结，算什么婆娘？吹了，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军代表话犹未了，Ｙ倒嚎啕大哭起来，哭罢，悻悻地摔门而去。这次种极不礼貌的行为，军代表不过一笑置之，并没有找任何麻烦。不久，Ｙ和我们同时离开四川。他去了遥远的北方。八十年代，他又远渡去国，成了美利坚公民。

我的问题关键是交出后台。人家说像"必胜"这样高水平的东西，年轻人是写不出来的，尤其工科大学的年轻人。我能有什么好交呢？该"大毒草"整个儿就是我自己的主意。一次交不出来，又继续交代；不行，再交——后来实在走投无路，便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已被揪出。他问题严重得很呢！一九四八年他就去过台湾，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跑回来，很可能是潜伏特务。开始他在川报做编辑，皆因历史问题才弄下来教书的。我的朋友们动员我，说反正李是在劫难逃了,在他本已非常严重的问题上多加一条罪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再说，他本身就是《山城战报》主编，说他黑后台也不冤枉——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主意。我对李印象一直不错，但为了保我自己过关，我终于在交代材料里违心地诬陷了一位可尊敬的长者。几十年后，检讨自己一生行为，我为此深感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愿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我被放出来了。所有八一五被审查的人员几乎都一齐放了出来。四川是我的故乡，却又是个是非之地，我们那样眷恋它有那么仇恨它。担心事情有变，夜长梦多，甚至来不及告诉父母，就在拿到"报到证"当晚，便急急忙忙买车南下了。时间是一九六九年旧历岁末，春节悄然将临。我们没工夫在故乡等待节日。那一夜，重庆夜色如磐，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我走了。

火车拥挤不堪。车上，意外发现一拨和我们同样亡命天涯的重庆中学生，他们认出我们了，就主动前来攀谈。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他们想躲避"广阔天地"的追逼。而"八一五的亲密战友"五十四军已经调防云南，中学生们想前去那儿从军。和我同赴云南的共三人：黄顺义，还有冶金系同学张应田，都是被审查的"班友"，加上这一拨中学生，一起沦落天涯，路途相遇，我们夜夜作达旦之谈，丝毫不觉困倦——真正的寂寞是从昆明开始的。

我和大家作别，继续驱车西向，从此后便各自赴东西，为险恶的命运奔波。张应田不久后死于工伤。黄揪回重庆审查。而那一帮中学生，从此消逝在茫茫人海，连姓名都全部遗忘。

那真是漫长的路程啊！从昆明到边疆保山，几十年后的今天仅八小时车程，而那时需要整整四天！横断山重岩叠嶂，陡峭的山路断弦游丝般在崖头飘动。车过风城下关，幽黑的苍山山头还飞着碎雪。越后来道路越加险峻了。两旁的云团像沉疴不起的巨兽，一群群横卧峡谷中，好容易出了山峡，终于看见一个狭长的灰黄色的坝子，牛车在路上毫不动气地缓缓行过，辐

条四射的木轮像古老的太阳化石，慢悠悠地碾着山里悠长的日子。有人告诉我，说保山到了——我突然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块荒远的土地上终有一个属于我的生活驿站了。

面对陌生边地，我突然口占了一首七绝：

苍山雪岭脚下踏

横断山头驱长车

花街灯市何足恋

边陲自古男儿家

我预感到我将同命运进行新的抗争了。我将会遇到更多的悲欢、厄运、成功、 失败，还有我无法拒绝也无法知晓的故事。

记录这些故事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